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18

河北教育出版社

13. Гольдмана

[illegible]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十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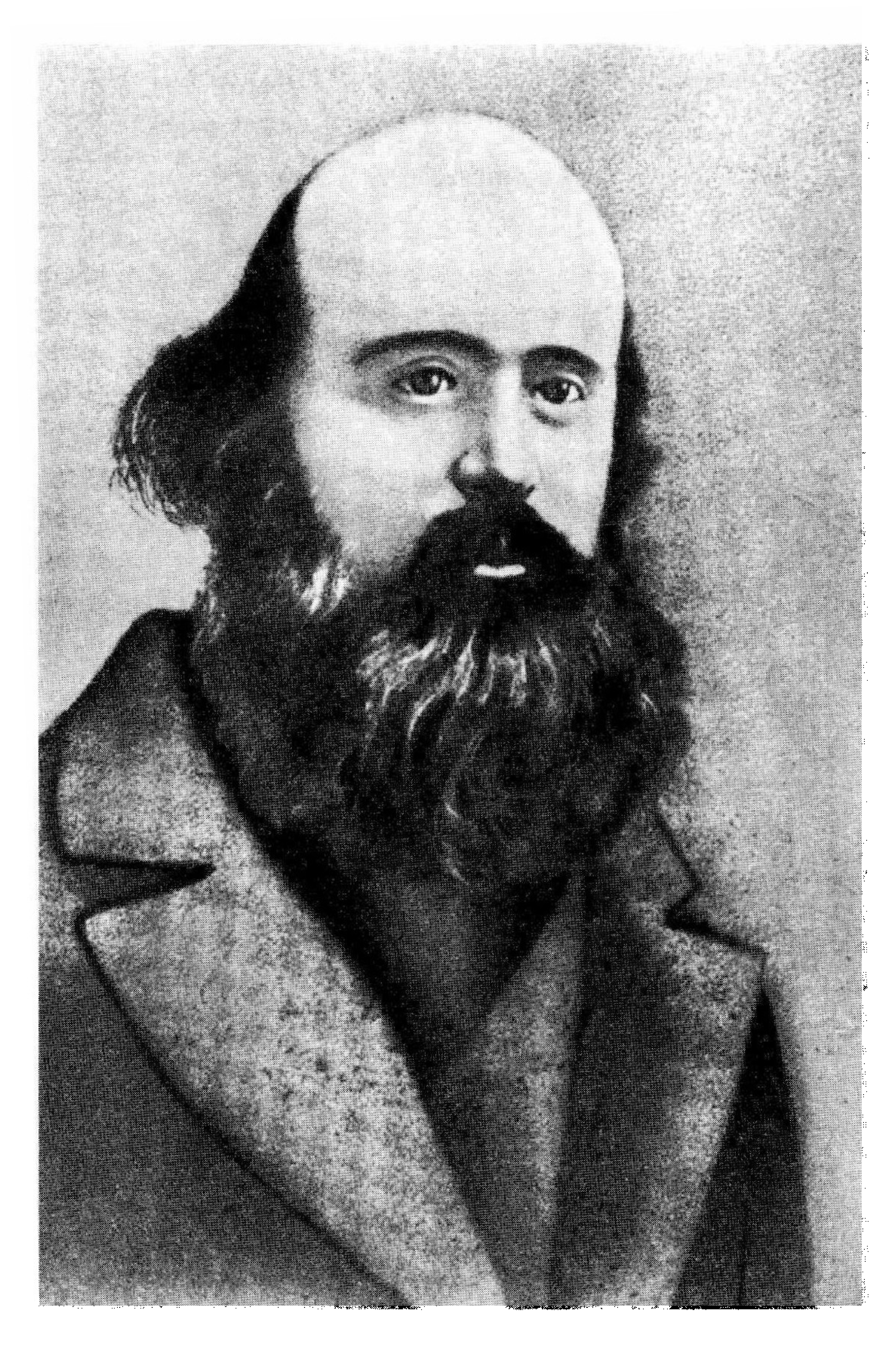
文论（下）

陈　燊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白春仁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　19世纪60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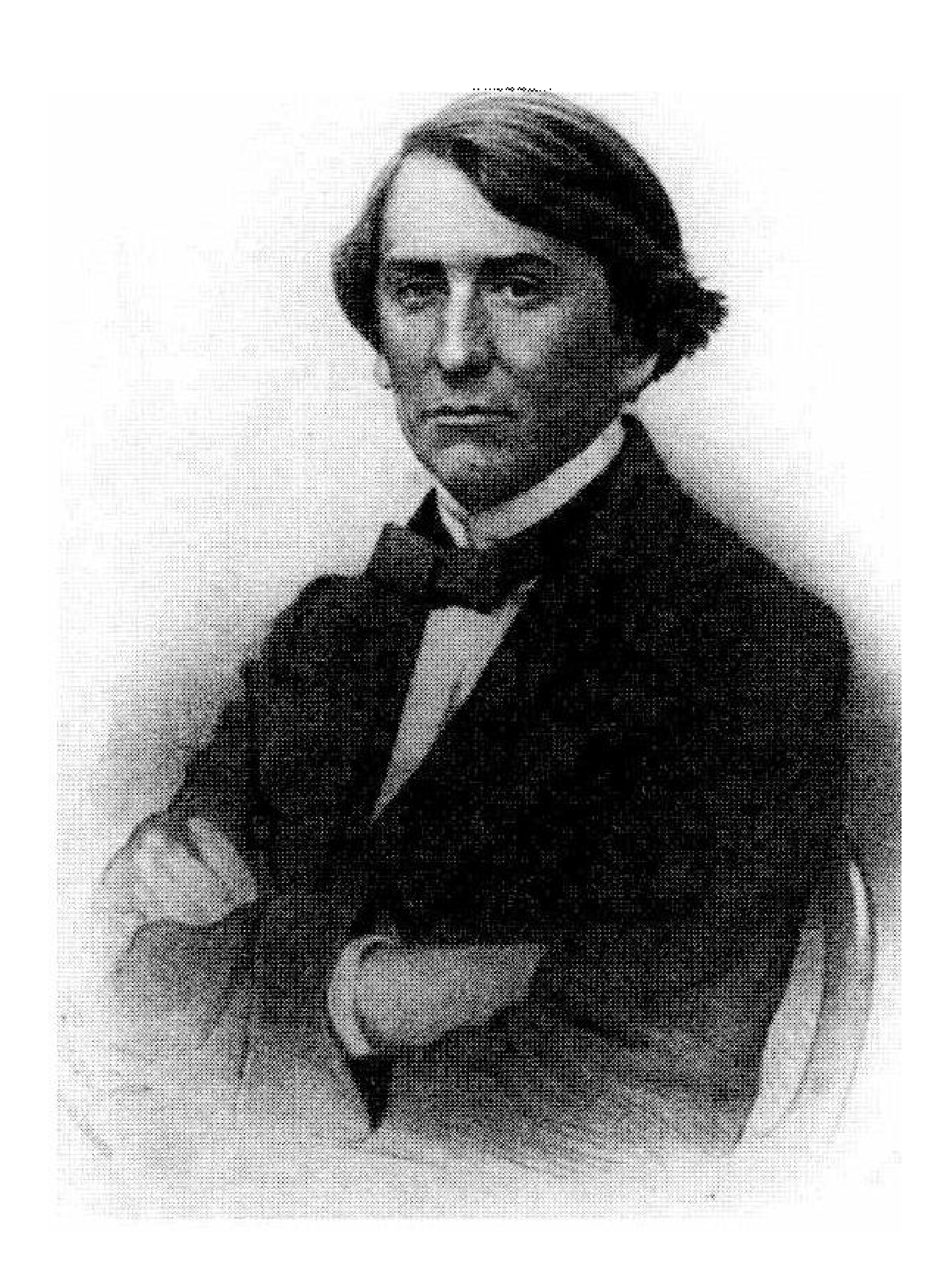
米·瓦·彼得拉舍夫斯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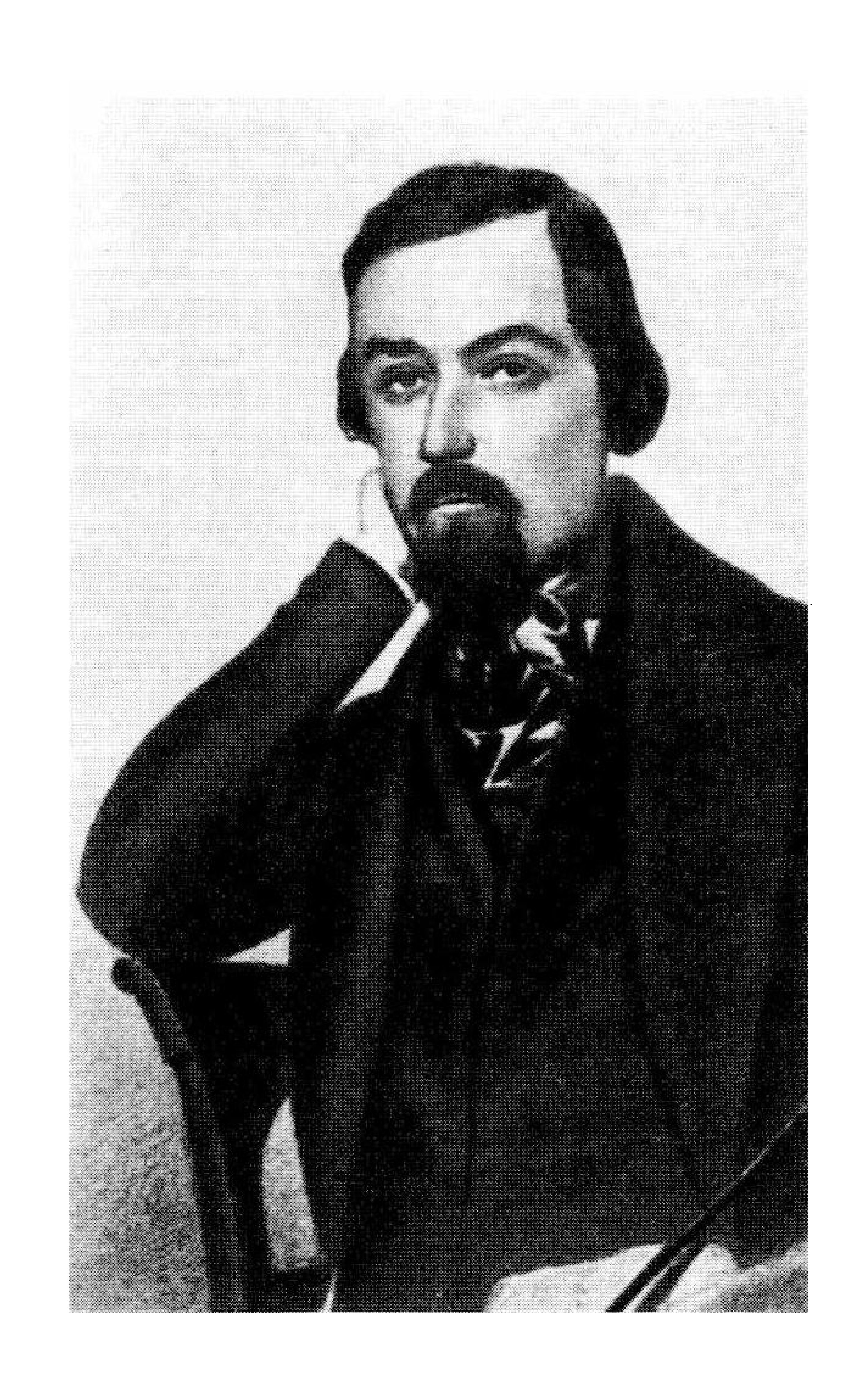
谢·费·杜罗夫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



亚·伊·帕尔姆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



阿·尼·普列谢耶夫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　19世纪50年代）



尼·亚·斯佩什涅夫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 A. 涅伊曼作　19世纪40年代）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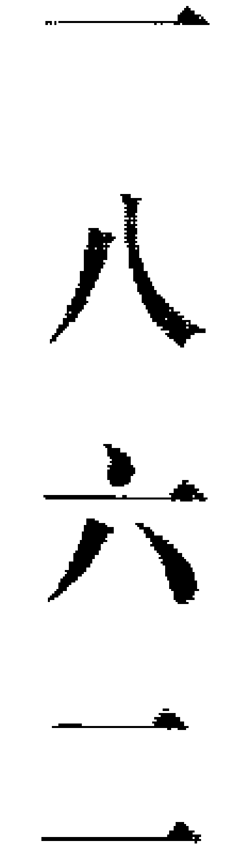
一八六二

一八六三

一八六四

附　诗稿

附录



一八六二

理论家的两个阵营
(关于《日报》及其他)

正是现在，我们需要有人诚实而直率地、主要是准确地讲一讲我国的人民……根据2月19日立法[①]，人民要参与社会生活，如今他走上了舞台。那么，人民是怎么回事，我们刚刚听说，但还不了解的这个国家（看来我们已接近了它）又是怎么回事，俄国生活中这个快要更新我们社会的新因素是怎么回事？一句话，什么是俄国的地方自治机构[②]？关于它的历史情况，我们只知道过去这是支配我们生活的主要基础之一，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渐渐退居次要地位，很长时间里似乎已销声匿迹，有时露面则往往在严重抗议痛苦现实的活动中[③]……人民的问题在今天是个生命攸关的问题……如何解决它可能决定

---

① 1861年3月3日（俄历2月19日），俄国颁布废除农奴制法令，给农奴以自由身份。这就是农民改革。

② 十月革命前俄国县、省的自治管理机关，由选举产生的地主议员组成。其中如地方自治会，负责审核摊派地方的贡赋，地方自治执行机构的报告，提给政府的申请书等。在贵族团体的领袖主持下，每月召开会议。

③ 暗指拉辛（1630—1671）和普加乔夫（1740/42—1775）所领导的俄国农民起义。

着未来俄国进步的命运。这是因为俄国人民的问题而今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里现在有没有一个不同于各官员阶层的地方自治机构？它今天是否还有生命力，它还能够使我们这里生机微弱的社会得到复兴吗？

这样生命攸关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按照理论来解决的。问题的出现是在很久以前了，当然不那么突出，那时我们的社会开始意识到自己不同于其他西欧人民的特点。可是热衷于理论，妨碍了理论家们直接看待事实，真正理解事实。理论是好的，但得有某些条件。如果理论想要确切地表现生活，它得服从生活的严格约束。否则它就会侵犯生活，无视生活事实，如人们所说扭曲现实来迁就自己。西欧主义者建立了泛西欧人的生活理论，当看到与之根本不同的俄国生活时，先就谴责这种生活。斯拉夫主义者则把老莫斯科① 的理想当做标准，同样一下子否定了俄国生活中一切无法塞进他们狭窄框子的东西。情况也只能是如此。错误的开头导致十分错误的结论，因为理论喜欢始终如一。而狭隘的片面的开头，按照理论的一贯性，必然导致否定生活中与所取原则相矛盾的那些方面。

但这正可能是理论家们的功绩，可他们有时过分注意逻辑的彻底性，因而不怕得出任何的结论。当代理论家中有一批人②，不仅否认俄国地方自治机构的存在，不承认这是必须保

---

① 莫斯科最早见于编年史中 1147 年的纪事。自 13 世纪成为公国的中心，14 世纪成为莫斯科大公国的中心，15 世纪后半期成为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首都，至 1713 年俄国迁都至彼得堡。所谓老莫斯科的理想，就是指斯拉夫派所迷恋的彼得大帝改革前的俄国社会和制度。

② 这里是指《现代人》的政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马·阿·安东诺维奇(1835—1918)。后者是俄国批评家、政论家，也是革命民主主义者，1860—1866年在《现代人》杂志工作。

留的基础，而且从原则上根本就否认民族性原则本身。我们不打算详尽分析这一派人的见解，因为这将占去我们许多时间和篇幅，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一理论过于狭隘和肤浅，再说也很陈旧了。早在席勒的作品中，波沙侯爵就幻想过世界主义①。至于讲到我们目前关心的对象，那么这一理论在今天是经不起批评的，我们对它只想说上几句。

一派理论家说："我们理想的人，应具有人类共有的品质。我们所需要的人，应该到处都是一样的，不管是在德国，在英国，在法国，应能体现在西方形成的那一普遍类型。他所获得的全人类因素，可以大胆地传给任何一个别的民族，全人类因素可以引入任何的环境中去，不管这环境是什么样的。这里用不着谈什么根基问题，似乎在掌握其他民族的一些东西时，却须要使这个根基能够适应。"这就是说，理论家们想要从全人类，从一切民族那里找出某种完全没有个性的东西，在世界所有国家里不论气候和历史条件如何差异却总是一样的东西……这个任务看来很宏大，目的也很高尚……可惜的是问题并不在于任务的宏大和目标的高尚。我们非常希望这些理论家中有谁能解决如下的问题：如果每个民族都变成一枚磨平了的硬币，人类是否一定从中获益匪浅？这个益处究竟是什么？请哪一位理论家给我们指出看看任何个人均应努力做到的那个人类共同的理想。整个人类尚未形成这样的理想，因为教育的遍及也只占世界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既然他们拥有的这个人类共同的理想，仅仅是西方酝酿出来的，难道可以说它十分完美，以致任何别的民族都不应再添加什么自己的东西，只需按照西方的书

① 参看席勒著《堂卡洛斯》，第 3 幕，第 10 场，第 4 幕，第 21 场，波沙侯爵是剧中人物。

本消极地学习这理想吗？不是的，只有当一切民族都能在自己的基础上获得发展，以自己特别发达的某一方面来充实整个生活的时候，人类才会过上最充实的生活。只有那时我们才可能想望有圆满的人类理想。有时我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每个民族由于是在自己国家特有的条件下得到发展，它必然要形成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思维方式，自己的习俗，自己的社会生活准则……我们觉得，既然不可能在实际上强迫一个民族放弃它的经验和创造的一切，从而只求有利于别国达到的人类理想，那么就不可避免地要关注民族性，这样才会促使一个民族得到某种发展……民族的本能，对来自外部的任何侵犯都十分敏感，因为有时奉为全人类因素的东西，在某一国家中却毫无用处，只能延误这一民族的发展……我们以为，任何植物到了缺乏它的许多生存条件的国家，都面临退化的威胁。有时我们甚至感到，想把一切民族全按照一劳永逸规定的理想统一起来，这未免太霸道了。这样就剥夺了各国人民任何自我发展的权利，精神自主的权利。联系到俄罗斯历史的千年纪念，我们今年还产生了如下的看法：经过千年的历史进程，不管是怎样的进程，我们总还积累了某些经验……西方已经通过彼得大帝来拯救我们，在这整整一百五十年间，西方以各种方法来改进我们的生活。而这些举措的结果又如何呢？如果说他们还是给我们做了些好事，那就是向我们证明了：我们仍是有着自己根基的，有些情况下还必须十分重视这一根基。彼得大帝的改革，可说在我们这里建立了 statum in statu[①]。改革建立起一个所谓有教养的社会，它不是像《现代人》所说仅仅不再喝克

① 拉丁文：国中之国。

瓦斯饮料[1] 了，它还学会思考俄罗斯。这个社会时常背离人民的要求，同人民大众完全隔离，不只如此，对人民大众还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结果花费了许多气力和时间，这个脱离了根基的社会里，才有一部分精英重又萌生关于人民的思想，关于人民发展的思想，重又意识到必须了解人民的需要，必须与人民相接近。

从理论家们否认任何民族性的存在，就可断定他们也不懂得什么叫“与人民接近”。他们无法理解，地方自治机构是我们俄国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他们不懂得我们同人民相接近指的是什么。《现代人》说：“是我们应该走近人民呢，还是人民应该走近我们?”“人民应该走近我们，最好是我们应该把人民领到自己跟前，因为人类共同的理想存在于我们心中，在俄罗斯我们才是进步与文明的代表。人民是愚昧的，至今什么也没有树立起来。人民的环境是没什么意义的，是愚钝的。”不过有时我们想，要是我们不收敛自命不凡的样子，要是我们不在事实上而非口头上先向人民伸出手去，人民是不会走近我们的。因为人民不觉得需要我们，没有我们，他们也很坚强……我们要是觉得脚底没有支撑，背后没有人民，就会虚弱不堪，人民却不会。他们本身就坚强。我们这些有幸称为有教养社会的人，并没有什么力量，缺少活力。人家劝我们相信：“人民，也就是我们的地方自治机构，是愚笨的，因为乌斯宾斯基[2]

---

① 俄国从基辅罗斯时就享有盛名的清凉饮料，用黑麦芽、大麦芽以及黑面粉加糖和水等酿成。这里以它指十分古老的传统的东西。

② 尼·瓦·乌斯宾斯基（1837—1889），俄国作家。他的特写和短篇小说写当时俄国农民生活。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论文《转变不是开始了吗?》争论。后者认为，乌斯宾斯基不再把人民理想化，而此前的俄国作家德·瓦·（接下页）

和皮谢姆斯基[①]先生认为农民是愚笨的……据说他们两人不带着什么先入为主的观点去看人民，所以农夫愚笨就说他们愚笨。不过，在我们看来，像乌斯宾斯基先生《大车》这类的小说，是对人民的诽谤，这难道还不是先入为主的观点吗？要知道这种小说背后总含有别的什么用意，有时会显得极不恰当。《现代人》对此有种说法，但也不能给我们安慰。它说，人民在哪里都是愚笨的，太像一群牲口，无论在法国、英国、德国都一样；因循守旧已经深深印在他们脑子里，干什么他们大多是机械地行动。既然他们愚笨，机械地做事，又何苦为人民操心呢？如此等等。可惜的是，在这里理论家们没有把自己的结论贯彻到底……

读者啊，您可知道，我们总觉得这一派理论家的观点，表现了可怕的贵族派头。他们似乎自认为是启蒙的贵族，是我们地方自治机构应该尊奉的中心……理论家的这种见解，难道不是常产生于古罗斯的大贵族与地方自治机构之间斗争的一个标志吗（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标志）？这一事实难道不可以称作是我们的官宦阶层对人民的某种侵犯吗……可这事只有天知道……

还有另一派理论家，他们为了彻底性，同样否定了许多东西。我们指的是在莫斯科办《日报》[②]的斯拉夫主义者。过去斯拉夫派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接上页）格里戈罗维奇等总是把人民理想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皮谢姆斯基的民间故事与乌斯宾斯基相近，所以一起提到他。

① 阿·费·皮谢姆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著作甚丰，当时颇负盛名。

② 俄国文学和政治周报，1861—1865年在莫斯科出版，斯拉夫派的机关报，出版者、主编是伊·谢·阿克萨科夫。

他们展示了俄罗斯生活的许多方面，指出了地方自治机构在我国历史上的意义以及它的直接表现——村社的日常生活。直到今天，斯拉夫派仍对我国的文学助益不小。《日报》是去年 11 月 15 日才创办的，时间不长却赢得了我国读者群的关注。我们应该说，公众关注《日报》是有道理的。《日报》有力量，自然就吸引读者。您不能不同情《日报》如此努力地探索真理，对谎言和虚伪的愤怒，虽然有时不太公正。它对时局的反应很尖刻，从中听得出某种对清新气息的向往，希望消除影响俄国生活自由独立发展的障碍。在《日报》的声音里，包含许多正气。它希望能有助于我们的地方自治机构，它主张维护地方自治机构的利益，所以它才不遗余力地否定现存的社会制度……而且它的否定大部分变成了行动。它不白白浪费力气，它不肯无的放矢，像一些廉价的否定者那样，这些否定者同样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崇拜者。《日报》能触及我们俄国生活的最本质的方面。它的否定是朝深层发展，可说直逼问题的中心，而不是在空中飘浮，不是同想象中的罪恶作战，不是做堂吉诃德。它把地方自治机构的利益（尽管是根据它自己的理解）看得最高，生动而有见地论及了农民问题，以及与此密切相连的贵族问题，还有它所广泛理解的资格问题……为了俄罗斯民族的利益，它也谈到了波兰问题，这在目前情况下是个异常重要的问题……要知道这些现在对我们来说都是血肉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决定着整个我们的未来，决定着俄国进步和文明的进程。我们不打算分析《日报》提出的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异常重要，需要极其详尽的讨论，我们无法在一篇有限的评论文章里做这件事。其中每个问题都需要立即进行专门的研究，我们对此绝不想回避。我们还要补充一句：《日报》的声音依我们看来在我国文学中是很重要也很需要的，特别是

因为生活中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倘若在解决某些问题时我们竟同它产生分歧，那么对问题的争论越多，效果也就越好。不过，从《日报》想要在罗斯找到的真理这一角度看，我们不能不说它的无情否定有时过于无情，因而也就不够公正了。它在主张俄国的地方自治机构时，对我们这个所谓有教养的阶层却不公平。它只承认民众的生活，而准备否定在文学和社会中的任何实际情况——我们这里指的是后二者的好的部分。在这方面它是极端的严厉派。它在一篇社论中说："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虚伪。社会整个内在的发展，社会的全部生活，都被虚伪感染，犹如得了麻疯病。教育中有虚伪……艺术灵感中有虚伪，文学中也有虚伪……"我们明白，这个声音可能是真诚的，但同样明显的是，这是狂热病的声音。《日报》不愿意从它那彼得大帝之前的高处走下来①，以不屑一顾的态度环视现在的俄国生活，透过自己那莫斯科的夹鼻镜片，看不到任何一点儿可以寄予同情的东西……

大约两个月前，我们问过《日报》：

难道在一百五十年间、即使是 quasi② 欧洲生活中，我们没做成任何好事，而只是内在地堕落了，耗尽了一切，丧失了任何生机吗？

难道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果戈理这些俄国文学的骄子，这些使我们有资格实际参与全欧生活的名字，这些更新了俄国生活、照亮了俄国生活的一切，全

① 指斯拉夫派着眼于彼得大帝改革以前的观点。他们对彼得改革持否定态度。下文"一百五十年间"指的就是彼得改革后至当时的一段时期；所谓"莫斯科的眼镜"也就是上文说的"老莫斯科的理想"，因彼得于1713年迁都彼得堡以前，旧都是莫斯科。

② 拉丁文：假的。

都等于零吗？

难道近年来文学迅猛地趋向进步文明，强烈地希望竭尽可能改善俄国生活，在外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关注社会问题，还有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不满，难道所有这些都等于零，都是谎言和虚伪吗？

难道我们非得把全人类因素（它从西方引入俄国生活，其中文学总是尽可能担当媒介的角色）看做谎言和虚伪的来源吗？看做分裂我们社会的根源吗？……

一切是谎言，一切是虚伪——《日报》反复对我们说。正是在这个声音里，我们认出了莫斯科的斯拉夫派理论家。他们同西欧派一样，也不懂得生活，也在侵犯生活，也要无情地贯彻始终。尤其可悲的是，《日报》一股脑儿地责备整个社会虚伪，而其中隐藏着《日报》同自己的深刻矛盾。试问办这报的目的何在？当然是想给社会带来一些益处，为社会指出走向生活的途径，当然也消除分裂社会的谎言。假如虚伪浸透了我们的社会，以致一点儿生机都不存在了，那又怎么会出版《日报》呢？对死人用不着多操心。为丧失生机的尸体张罗，并非要使之复甦，而是尽快抬出住宅，免得传染了健康的活人……如果一切如它所说全是谎言和虚伪，这《日报》又何必操劳要恢复我们社会的生机，要返回到人民中间去呢？

理论家的毛病恰恰出在要么完全不想理解生活，要么理解得很差……我们想起了《日报》社论里有一段话，是反对某些爱好的。《日报》自己有了权利，可以生动有力地反对社会上的谎言和虚伪，但它却否定年轻人有这种权利。它抨击一切濒死的东西，呼唤生机，却藐视年轻的生命……这些斯拉夫派大讲人民的无穷力量，人民的生气和强大，却不许初涉世事的强壮的年轻人干任何事情……他们要倾听人民的声音，他们期待着

还没有为恶行诱惑的人民结出善果，但对肩负着社会美好期望的年轻一代却不愿听到他们的任何声音……如果《日报》不是按照自己莫斯科的理想来判断事物，如果它不是用理论衡量生活，而是用生活衡量理论，那它便不会刊登这么一篇文章。而这篇文章，我们将永远将其看做《日报》编辑部的一个污点①。

《日报》最具批判性的部分，由于下述的一个情况，在我们眼中失去了某些力量……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的思想。有一个人走近一大堆垃圾，里面除了沙土、乱布条之外还藏有许多值钱的东西……这人开始挑拣垃圾，把布屑、沙土、破烂东西使劲儿甩到一边……你们如果站在一旁，不能不同意他所称的破烂儿的确是破烂儿，你们甚至会惊讶他说得多么准确……但问题是这位拣垃圾的人不找什么贵重东西能为自己所用，却是找穿旧了的破皮鞋……你们会奇怪他为什么不找你们估计他一定要找的东西……结果你们看到，他那甩掉破烂儿的无情之手，以同样的力量和讥讽也甩掉了你们视之为黄金的东西……这就是说在你们面前扔掉了沙土、布屑，并非为得到夹杂其中的贵重物品，而是为的穿旧的破皮鞋……这时不由得会产生一个想法：为了旧皮鞋把好东西坏东西全都抛弃了，那么这旧鞋真的比垃圾堆里的破布屑更好些吗？……于是你们不能不感到遗憾，人一旦盲目，便无法在一堆破烂儿中看到真正好

① 指伊·谢·阿克萨克夫在《日报》10 月 28 日社论中强烈谴责彼得堡大学的“学生闹事”（1861 年秋季）。此举他认为是彼得大帝改革后“虚假”的教育成绩所导致的直接结果。他说：“社会盲目崇拜欧洲的先进人物，青年则找到了更为先进的人……社会从西方搬来时尚、服装、纪念日，官僚主义、贵族作风；青年从西方搬来示威和民主……”

的东西……这个比喻似乎可以用在《日报》身上。它具有否定的一面一如上述无疑是好的……可是它为了什么在今天的俄国垃圾中既否定好的东西，也否定坏的东西？……我们说过，它维护地方身治机构的利益……不过对地方自治机构的意义，这一基础保持活力的条件，它有着自己的理解。它讲到地方自治机构，不是指我国历史上开头的六个世纪里广泛存在的那种健康的自由的地方自治机构，而是以 16—17 世纪[①] 莫斯科生活为依据，指那时地方自治机构会同其他方面的关系，而那时中央集权早已大大侵犯了地方自治机构的权利和自由。一句话，《日报》是从莫斯科的理论出发而否定当今的生活的……

不过要知道，这理论也是书斋的产物，是幻想和头脑发热的想象的结果……总之，理论很像一双穿旧但还没全坏的皮鞋，有时还可使用，不过得加点新东西改善一下。彼得大帝之前的罗斯吸引着我们，让我们感到珍贵，什么原因呢？因为那里看得见生活的完整性，看来那时全靠精神来统帅。那时的人不像今天这样强烈感到内心的自我矛盾，或者最好说他根本没感到这种矛盾。那个罗斯似乎是和平与宁静的……糟糕的也正在于彼得之前的罗斯和莫斯科时期只是以假象吸引我们的注意和同情。如果仔细看一下这幅似乎很美妙的图画，我们想象中的遥远的图画，我们便会发现那里闪光的并非都是金子……它所以好，就因为离我们远，处于人工的光照之下。但近处一瞧便会发现，油彩涂得粗糙，人物线条也不清晰，而且总的看来有些不自然，免强而不真实……真的，在彼得之前的罗斯，特别是莫斯科时期，谎言和虚伪是够多的……社会关系中有谎言，人们尽是装腔作势，表面谦和，甚至奴颜婢膝。信教也有

① 指彼得大帝迁都彼得堡以前。

虚伪，暗地里纵使不是什么信仰都没有，至少也是冷漠无情或者假仁假义。家庭关系中有虚伪，因为妇女遭受屈辱如同牲口，被视为东西而不是人……在彼得之前的莫斯科的罗斯，有许多亚洲习气[①]，东方的懒惰，装模作样，不讲真话。彼得之前罗斯的这种无为主义，单调无聊，反映了某种内在的软弱无力。假如莫斯科的生活很好，请问人民为什么拒绝了莫斯科的秩序而转向另一方？一句话，是什么导致我们俄国的分裂[②]？要知道事情的结果是，不可能使莫斯科同人民结合到一起，不可能把彼得之前的莫斯科生活看做人民生活的真实体现，最好的体现。《日报》说，在彼得之前的罗斯只有罪恶却没有谎言[③]……这个说法太模棱两可了……家庭关系中和社会关系中的罪恶……请问，有了罪恶，谎言还算什么？谎言不正是制造罪恶吗？而在彼得之前的罗斯，罪恶可不在少数。

斯拉夫派正是想按照这种莫斯科理想改造罗斯……我们的一切发展，就算不大吧，总归也是发展，而在他们看来，从彼得大帝时代以来的一切发展，全等于零……他们拼命骂彼得，用阿克萨科夫的话说，彼得把水搅得太浑了。[④] 他们自己呢，

---

① 这里指彼得改革前俄国的统治方式，也指彼得大帝的专横。这一批评与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 9 卷）中的下列见解遥相呼应："莫斯科时期的蒙古因素扭曲了俄国人的斯拉夫性格，赤臂杖笞的不人道做法扭曲了彼得大帝时期……"

② 伊·谢·阿克萨科夫认为莫斯科时期的俄国是和谐一致的，在彼得大帝改革之后才出现分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与之辩论，强调彼得之前的人民生活并非是最好的生活，俄国那时已经出现分裂，而分裂是人民对专制主义的抗议。

③ 是伊·谢·阿克萨科夫在《日报》一篇社论（10 月 14 日）中说的。

④ 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记错了。说"彼得把水搅浑"这句话的不是伊·谢·阿克萨科夫。此语出自 A. K. 托尔斯泰在《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在搅浑水上也不逊色。在他们身上也看得出彼得前时代那种对生活的粗暴无理态度……对斯拉夫主义来说，这理论同任何别的理论一样，对一切都是无情的急躁的……然而，自彼得时代起，斗转星移，时间已过了很久，绝无可能再返回过去，或者完全毁掉过去的一切……比方说你们想让一潭死水流动，为此开始挖条水渠……过了许久你们已挖了好长的沟，但进展不顺利，太慢。你们修的渠过浅，往后也不可能挖深，因为人手太少，也得不到补充……于是你们去了解失利的原因。原来，出乎你们的意料，水渠选的走向不对。你们的主要劳力，你们所依靠的主要力量，能把你们的整条渠道挖长、挖宽、挖深、挖好的主力，落到了后面，挖好自己一段沟渠，却朝着另一方向向前挖去。你们怎么办呢？把已干完的活放弃不要了？可你们感到已挖的沟虽不够深，终归是干完的活；你们意识到你们已经完成的工作会对主力有所帮助。因此，回头已不可能，因为走得太远了……但又不可再往前挖，不然将同主力越来越远，也会更加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更需要同主力汇合一道……那怎么办呢？最好是既不放弃自己的工作，又得与主力联系起来，明确自己挖沟的取向。主力如能看到你们是真心想汇合一起，便会不由自主地向你们靠拢过来。要是说主力此前对你们将信将疑，那是因为它没有得到你们的任何帮助。要知道只有你们汇合一起，只有你们把已取得的经验总结起来，并为自己共同开辟出前进的道路，你们的事业才会兴旺……可正是这一点，斯拉夫主义者不愿意理解。他们只希望一点：把我们在一个半世纪中取得的一切全都毁掉，把我们的社会拉回过去……这可能做到吗？这难道不是很少关注生活的理论吗？

这就是理论家的两个阵营。一派原则上否定民族性，由此也否定我国纯粹的民众基础——地方自治机构。另一派对我国

地方自治机构的意义有自己的理解，而为维护自己的理论，对我国有教养的社会未能给予公正的评价……如上所见，两派都是按照理论去判断生活，在生活中只承认、只理解与他们的出发点不相矛盾的东西。其实呢，两种观点中都有部分的真理……而离开了这些部分的真理，就无法解决我们需要什么，往哪里走，怎么办等问题。

有一点是无疑的，彼得的改革使一部分人民脱离了另一部分，脱离了其主体部分……改革是从上而下进行的，而不是从下而上。改革没来得及达到人民的底层。当然，以彼得所采用的改革方式而论，改革是不可能让全体人民参加的。改造人民是非常困难的。要做到这一点，光靠一个人铁的意志是不够的。人民的发展，需要几百年来实现，消灭人民积累起来的东西也只能是数百年间才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彼得的失误就在于他想立即（在他有生之年）改变俄国人民的风气、习俗、观念。专制性的改革方式只能激起民众的反感。德国人对人民的民族性侵害越甚，人民就越强烈地保护自己免受德国人的影响[①]。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为彼得的改革给我们俄国大地带来了主要属于全人类普遍具有的西欧因素，那我们也大错特错了。开始我们这里只见民风极度败坏，弥漫着德国的官僚习气，官吏大行其道。人民感觉不到改革的好处，在新制度下看不到自己实际上得到任何改善，而感到的只是可怕的重压，当自古以来习惯认为神圣的东西遭到作践时，内心无比痛苦。因此人民总的说依然是改革前的样子。如果要说人民对改革有什

① 彼得大帝进行改革时，在许多方面学习德国，甚至是照搬德国的东西，并引进许多德国词汇（直接译成俄文），因此德国当时对俄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么影响的话，那远非有益的影响。我们这样讲，绝不是想否认彼得改革具有全人类意义……用普希金的精彩的话来说，这次改革给我们打开了通向欧洲的窗口，它为我们指出西方的道路，在那里可以学会不少东西。但问题就在于它也只是个窗口而已。透过这个窗口，公众中一些优秀分子观察西方，却主要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而学的又不是应该学的东西。因此彼得的改革，带有背离我们的民族性、背离我们的民族精神的性质。一个民族的生活中，往往有这样一些时代，人民特别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对当前有某种特别的不满，要求某种新东西。毫无疑问，在临近彼得的时候，人民已经感到生活的贫瘠，表现出抗议当时的现状，试图走到空气清新的氛围之中……至少我们这样理解历史的事实——我们的分裂。彼得这样的历史现象，出现在俄国土壤上当然并非什么奇迹。它无疑是时代促成的……在俄国的空气中，已经弥漫了改革风暴的气息，只是到了彼得才在他身上集中了这一炽烈的共同愿望——给我国的历史确定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不过，一切过渡时期都有这样一个特性：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强烈希望摆脱鄙俗的秩序，但怎样摆脱，朝哪里走，却不很清楚，不很理解……彼得的问题就在于，他对罗斯改革更新的愿望作了自己的理解，而实现这一愿望也采取了自己的方法，即专制地向生活注入了它所不需要的东西。所以，如果称彼得是个人民现象，那也只因为他反映了人民要求更新的愿望，开拓生活天地的愿望，仅此而已。说得更准确些，只是彼得的一个思想具有人民性。而彼得作为一个事实，却是极端反人民的。第一，他以专制手段推行改革，使改革没有成为全民的事，却成了自己随心所欲的事，这样就背离了人民精神。专制主义可绝不符合俄罗斯人民的精神……俄罗斯人民爱好和平，喜欢用和平途径逐渐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彼得却使用了火刑和断头台来对付不同情他改革的人。改革主要涉及的是外表，这一点已经背离了人民精神……俄罗斯人民不喜欢追求外表，他们最看重的是精神、思想、事情的本质。而改革的结果，扩展到衣着、胡子等等。人民所以远离了自己的恩人、改革家，当然不是因为喜欢留胡子，追求穿着，而是因为这样的改革办法远远不符合他们的精神。于是，来自上面的对他们的侵犯越厉害，他们就越发抱成一团、凝聚一起。胡子和衣着成了某种口号。或许正是在这些情况的影响下，我们的农民才形成了如此固执、坚忍、强硬的性格。

无论如何，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人民拒绝了自己的改革家，走了自己的路，同上层社会分道扬镳了……地方自治机构与官吏阶层分了手。继彼得时代之后的历史条件，只是加剧了社会同人民大众的分化。人们时常忘记了人民，忘记了主要的东西，更多地是想到自己。官僚机构的发展，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上面的压力日益沉重，在人民中激起更大的反抗。农奴制强化了①，人民的教育只有少数头脑发热的人② 在操心。官吏生活的发展，危及底层阶级。上层阶级很快丧失了民众用以讲话的那种语言。外国来的成分空前膨胀，无论在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上都是如此。他们拥有物质力量，极力控制视为异己的人民。利益的分化达到如此程度，以致非人民出身的人表现出

① 这里指的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

② 据研究者说，很可能是指俄国作家尼·伊·诺维科夫（1744—1818）和亚·尼·拉季舍夫（1749—1802）。前者积极从事启蒙活动，曾被叶卡捷琳娜二世逮捕。四年后获释，最后死于贫困。后者积极反对专制农奴制度，他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因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引起叶卡捷琳娜二世大怒，认为他是“比普加乔夫更坏的暴徒”加以逮捕，并拟处以死刑，后改为流放西伯利亚十年。他最后于1802年自杀。

对人民利益的真诚同情，都会引来人民的不信任，甚至招致不满，因为人民无法理解，老爷怎么会关心起农夫来了。痛苦的现实几次教育了农民：在表面的关怀下有时隐藏着许多谎言和欺骗，以及狭隘的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

很久以前就分道扬镳的这两股力量，在今天几乎仍处于同样的相互关系中。在今天，也有许多旨在维护人民利益的美好意图纷纷碰壁，正是由于人民不相信它们是真诚的。这里怪罪人民愚昧，不知好歹，以此责难人民自己，是最不公道的。您不能不承认，有时我们对人民表现的好意，只有我们自己看起来是好意，事实上却常常要帮倒忙。应该说实话，我们不善于接近人民。在这方面可从来没有过中间状态。我们要么很粗暴，无以复加，要么像马尼洛夫① 那样甜得发腻，只能坏事。试想，我们要戴着细软的羊皮手套去看人民，对他称呼“您”，他会理解我们吗？这自然怪我们自己。所以很少有这种情况，说人民信任我们并采纳我们的建议。比如，出于对人民利益的关心，我们去给他顾问一下，对他们的农事出些主意。我们口头说，也专门为此写小册子。可是人民读它吗？甚至偶然拿到这书的人，会去读吗？人民会听我们的讲解吗？好啦，就算他们也读也听，那只是出于单纯的好奇，像听前所未闻的新鲜事。他们兴致很高，好似在读叶鲁斯兰·拉扎列维奇② 的故事。但他连想都没想要把我们讲的话用在正事上，因为他们会说：这不是我们的事，这是老爷的事。这些小册子不是给我们写的，是给老爷们写的。倒不是民众不理解我们，而只不过是不相信我们的书，不相信我们的努力对他们有利。不是出身人

① 果戈理《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形象。

② 俄国童话中的一个大力士。

民的人，要想把一些道德观念和宗教观念传播给人民大众，也是很困难的。可是您看看，人民静悄悄听一个识字农民在讲话，又是多么好奇，多么聚精会神，多么如饥似渴。再如，有这样的事实，在我们的法庭上，一个农民会故意讲出许多谎话，故意心口不一。他偶尔还可能找机会从老爷口袋里掏走一个戈比。其实这心口不一的说谎者倒常常是个老实人，在自己的村社、自己的米尔[①]面前是诚实的，从不想欺骗自己的农民弟兄，或者对米尔耍什么滑头……这是因为米尔的审判是最高的人民审判，欺骗自己人那是一种耻辱……对我们这类人他们没有任何好感。我们同他们之间不存在联系的纽带，没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在人民眼里我们就有些像鞑靼人、没良心的人，同这种人打交道比同自己人机灵一点儿，算不上罪过。有我们在场时，农民就同在自己人面前不一样，他们拘束，变得很正经，想看起来像样些……请看我们的社会同人民分裂到了什么程度！

因此不能说，干吗要把上层社会，确切说是受过教育的阶层，同人民大众分隔开来。从概念上来说好像是这样，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的麻烦在于，人民实际上拒绝我们。正是这一点令人难堪，这个原因我们应该找到。我们生在罗斯，是我们祖国大地的物产养大的，父亲和祖辈都是俄罗斯人。倒霉的是，这一切还不够让人民喊我们一声“咱们的人”。所以，俄罗斯先进分子最大的虔诚愿望，自然永远是同人民紧密结合，使人民不把有文化的人同自己分隔开，而是视有教养的阶层为自己人……但这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现已脱离了根基的社会

① 意译为农村公社。

最终结合一体的美好时刻，还在未来。在那之前称自己是 de facto[1] 的人民，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的一部分，是地方自治机构，那将是一种自我陶醉。要知道我们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我们找不到能同人民真诚亲切交谈的语言呢？为什么人民那么厉害地疏远我们？为什么我们如此难以（如果不说“没有可能”的话）了解人民的精神、观念和需要？为什么人民本能地、如此固执地不愿视我们为自己的朋友？当然，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同人民隔绝了，历史在他们和我们之间挖出了一条鸿沟……

我们要再次说，不可责怪人民，说他不很理解我们，说他落后，说他疏远我们……我们仍要说，对人民落后，我们自己也有罪责[2]。为什么整整一百五十年间我们忘记了人民，没有关心他们的发展，让他们听天由命（这可是艰苦不堪的命运）呢？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可以要求他们道德高度发达吗？首先，就在我们当中也有不少人，凭其道德观念不仅不比农民高，甚至还要低下得多。不正是在这个有教养的阶层中，隐藏着那么卑鄙的谎言，那么猖狂的欺诈，道德上那么下流，甚至都难以名状吗？有文化的扯谎，在生活中总是表现得更加无耻。谎言越是用有教养的外表和先进的名词厚厚地包装起来，人们在道德感情上就越发感到厌恶。如果您从市场上找来一个三弦琴工匠，而他不懂得莫扎特或贝多芬迷人的和谐奥秘何

---

① 拉丁文：事实上。

② 这里对人民的落后，对知识分子与人民的脱离，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现出根基派思想，要求知识分子应理解人民，回归根基，意识自己的责任。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不是转变的开始吗?》一文中，通过阐释尼·乌斯宾斯基的作品、涅克拉索夫的诗作表达了另一种观点，面对人民的贫穷落后呼唤革命性的变化。

在，您会去对他苛求吗？为了理解音乐的高度和谐，需要有非常发达的听觉。您有什么理由要求一对不很发达的耳朵能完全理解高度和谐的音乐呢？这不是等于要求苹果树长出橙子来吗？这里还要指出一点，像乌斯宾斯基和皮谢姆斯基先生①对普通人民所作的观察，并非总是可信的。大家知道，对我国普通农夫所作的观察，是非常肤浅的；对他们的内心深处往往忽略不计；甚至看来十分接近人民的观察者，常常并不了解农民的内心。这又是因为农民不喜欢在老爷们面前把自己全部袒露出来。所以，对于说农夫不真诚、农夫愚笨的说法表示怀疑，不仅是有益的，甚至是必须的。可惜我们的怀疑主义者对一切都持否定态度，为何不把否定态度用在我们说的这件事上呢？

人民分裂为二的结果，两部分都遭到可怕的损害。社会的上层与底层，没有了共同点。历史条件造成的利益对立，迫使上层社会敌视人民。人民没有时间向前迈进，因为同上层社会处于目前这种关系中，时间全用在如何维护现在已有的东西上。他们得不到别人的关注，在愚昧无知中日益僵化，根本不能接触欧洲文明取得的人类普遍成果。其实，即使知识阶层也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这些成果。所以人民自称是倒霉的不幸者，因为觉得自己很难找到出路，摆脱历史条件给他们造成的可悲处境。他们很少能为自己找到这样的领袖——这些领袖能给民众指出新的道路，能够团结起人民分散的力量，能够有力地推动人民奔向一个目标。而现在，这里白白浪费了多少力量啊！这片肥沃的本可丰产的土地，只能空荡荡地躺在这里，

---

① 参阅上文注。指尼·乌斯宾斯基和阿·皮谢姆斯基写农民的落后的一面。

或者结出一点儿与它潜力极不相称的果实……

同人民脱离，使上层社会也深受其害。他们的力量与人民的力量相比，即使不说微不足道，那也是极其有限。

上层各阶级与人民分离后，得不到新力量的补充，日见委靡而无所作为。他们因没有牢固的支点，也就没有明显而准确的目标；他们的存在仿佛是盲无目的的。他们既然不把自己的事业同地方自治机构的事业汇合起来，就不得不为自己仅仅设定狭隘的目标。也因此，我们这个阶层一切向上的美好追求，不可避免地带有生气不足、委靡不振的特点……人们说我们俄国没有发展起科学来……究其原因，是国家拥有的有利于科学的新生力量太少。与此同时，在这不爱科学、甚至没听说过科学的四千万人中，蕴藏着多大的力量啊。这里可能出现多少富有才华的科学劳动者啊！只需所有的人们焕发出生命力来，只需给蕴藏其中的才华卓越的人们打开科学之门。上层各阶级如果不同人民结合起来，恐怕永远也不能改善我国的社会生活状况。我们社会中的有教养阶层的思想范围，本身就受了某种限制，因为他们不会从人民大众中吸收新鲜的思想，因为没有新战士登上思想舞台。只有当科学不仅为一个或几个特权阶层所掌握，而是全体人民都可参与，那时科学在我国才会牢固地站稳脚跟。只有那时才能形成我们所需要的社会生活方式，也就是上层阶级不仅只依靠自己，也要依靠人民。只有那时才能消除我们社会生活中的极端委靡和了无生气的状况。

要是等到那么一天，我们这里不再是在口头上而是事实上出现统一的人民，而我们讲自己和人民大众时可以用“我们”这个词，那时候我们的进步就不会像今天这样，缓慢而且时断时续了。要知道只有到那时，我们才可能为人类普遍的东西而操劳奔走，也才可能发展起自己民族的东西……在理解人类普

遍的需要之前，自己应先弄明白什么是民族的需要，因为只有仔细研究了民族需要之后，方有可能区分和理解纯属人类普遍需要的东西。在费心划定全世界整个人类的需求之前，首先需要在我们自己家里划定我们的需求。否则，很可能什么都抓、却哪件事也做不成。不过当我们讲到民族性的时候，我们不是指那种时常与全人类需求相矛盾的民族特殊性。不，我们这里指的是真正的民族性，它的作用总是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的。命运在各国人民之间作了分工：即发展共同之人的这个或那个侧面……到那时人类才会完成自己发展的一个完整循环，也就是说每个民族根据自己物质环境的条件，各自完成自己的使命。不同民族间的任务，没有显著的差异，因为作为各民族的基础的，是一个共同的人类理想，只不过各自带些地方的色彩。因此，在不同民族间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出现对抗，只要每个民族都理解自己真正的需要。不幸的正是达到这种理解的时候极少极少，于是各民族总是寻求高于邻国的毫无意义的优先地位，并以此为荣。各个不同民族实现人类普遍的使命，可以比作科学家们的工作，其中每一个人都在研究自己的对象，对这个对象较之他人更加感到特殊的兴趣。可实际上他们从事的是一个共同的学科。而一个学科怎样才会更好地向纵深发展呢？当然是把学科对象分解为专门化的研究，各部分由个别的专家分别进行。

这样一来，无论我们自己的需要，还是人类的需要，都要求我们以实际行动回到人民性的基础上来，同我们的地方自治机构结合起来。但理论家们又要问：这种同人民的接近应该体现在哪里呢？为了就这个话题不说得过多，我们简单地指出有教养的社会要同人民接近必须做到：

（1）在人民中普及识字。我国人民之所以贫穷和饥饿，绝

不是因为他们缺少谋生的手段。土地我们很多，挣钱也不难，也不因为缺乏劳动力。人民之所以贫穷和饥饿，是因为他们由于特殊的情况，精神发达的程度很低，不会利用手边的巨大天然财富来为自己造福。这就是说，首先应该关心他们的精神成长。

(2) 通过消除阶层壁垒（它阻碍人民去许多地方），改善我国农民的社会地位。这一点同阶层权利和阶层特权的问题密切相关。

(3) 为了接近人民，我们自己在精神方面也应有所改变。我们必须放弃我们的阶层偏见和利己主义的观点。不久以前颇为流行的挥拳打人，对人民来说是极为痛苦的，但他们同样也无法忍受令人屈辱的法国客套。必须热爱人民，但绝不该是书生气的爱心，多愁善感的爱心。

是的，应该也为人民敞开大门，给他们的新生力量以自由天地。这就是我们理解的同人民接近。读者可以看到，这绝非空话，它在我国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怀疑论者要对我们说，问题在于我们同人民都不能造就任何美好的未来。在上千年的历史中，无论我们还是人民，都一事无成。如果把孟德斯鸠[①] 的名言“任何人民都对得起自己的命运”用到罗斯身上，我们能说我们自己和我国人民做出什么好事呢？就这个问题，我们要说：

第一，俄国的分裂给我们指出了什么？可怪的是，无论斯拉夫派或西欧派，对我国历史生活中这个重要现象都没能做出

① 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作家、启蒙主义哲学家。下面引的话出自他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凭记忆引用的，因此引文与原作颇有出入。

应有的评价。这个原因，自然是因为他们都是理论家。按照他们的理论，的确不可能得出结论说分裂还会带来什么好处。斯拉夫主义者内心只珍爱东正教罗斯的莫斯科理想，所以不可能怀着同情心对待背离东正教的人民……西欧派是根据德国和法国的书本来判断俄国生活中的历史现象的，他们在这一分裂中只看到了俄国的任性，俄国人的无知，只追求颂扬上帝，用两个手指画十字，如此等等。他们不懂得在这激烈的否定后面，是热烈的追求真理，是对现实的深刻不满。这并不奇怪，因为按照理论来判断事物，有许多方面极易忽略，很容易使自己变得视而不见。俄国人任性和无知的这一事实，在我们看来是俄国生活中最重大的现象，也是俄国生活期望美好未来的最好保证。

第二，怀疑论者忘记了，人民在所有不利的条件下至今仍保持了村社的生活方式，在不了解西欧的组合原则的情况下自己先有了劳动组合。西方政论家经过长期探索，最后才找到组合形式，认为这是从资本的专制下解救劳动的办法。不过在西方生活中，这一村社原则还没有施行，真正实现还有待将来。[①] 在罗斯，它的存在已是生活的现实，只是期待有利的条件求得更大的发展。这里值得注意的主要是，人民以极顽强的精神在数百年间捍卫了自己的社会结构，而且终于做到

---

① 指法国的路易·布朗（1811—1882，空想社会主义者），德国的拉萨尔（1825—1864，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舒尔采-德里奇（1808—1883，政治家、经济学家，拥护“合法化社会主义”）等人的主张。他们认为由政府资助的工人合作组织和生产联合体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有效手段。陀思妥耶夫斯基坚信，与西欧资本主义不同，俄国的农民合作社是俄罗斯特有的社会组合形式。《时代》杂志 1861 年第 9 期上一篇匿名的书评就阐述了这一见解。

了……这一现象难道不正好证明我国的人民是有能力参与政治生活的吗?

第三，你们看，这个人民没学过任何法律，不知道罗马法，可在议论中有时是多么讲究分寸，多么富于实际的理性，语言又多么准确精当。2 月 19 日的立法，给了人民生机，使人民处于新的环境中，结果表明他们绝不是不会认清自己新处境的价值……如果您在关注农民的事，您就不能不承认，他们的行为中可不仅仅是无知和愚笨……

最后，在罗斯竟能如此无情而严厉地自我谴责，仅仅这一点难道不就可以证明：自谴者是富有生命力的吗?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时常见于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身上，但却不是俄罗斯人的性格。比如，我国人民对自己的习俗、信仰、生活方式，是像英国人对自己所服务的机关那么忠心吗?……俄国人固守自己的东西，倒不是因为这东西是自己的，而是因为他们没听说过更好的东西，因为别人给他们推荐的其他东西在他们看来是更糟的……他们坚守自己的东西，是由于在他们所闻所见之中他们感到这东西最好。可是您看一看英国人是如何固执地维护自己的大学，尽管他们意识到这制度远远不符合现代的概念。[①] 他们珍视英国的教育方法，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在他们所知的范围内属于最佳情况，而是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东西。再看德国人讲起自己的警察或自己的 Rath'ax[②]，要么说

① 《时代》杂志 1861 年第 11～12 期刊出 M. И. 弗拉基斯拉夫列夫的一篇书评，就阐述了英国大学制度不符合现代观念的见解。文中指出英国大学的古典式教育、学监制度、小团体结构都不符合现代化要求，而学生的学习方法完全不适应系统性原则，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此不能称之为自由学术的场地，而只有利于权威的统治等等。

② 德文：议员。

到德意志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性，是那么动情而令人作呕。还有法国人，总是谈民族的光荣，谈民族的建树，谈自己的军功，原因只有一个，如果不这么说就是背叛自己光荣的民族。但狭隘的民族性不符合俄罗斯精神。我国的人民能无情地暴露自己的缺点，能向全世界讲自己的痼疾，无情地揭露自身。有时他们对自己甚至不很公道，因为酷爱真实、真理而义愤填膺……例如果戈理、谢德林和整个批判的文学，在谴责、自我鞭笞方面表现出何等巨大的力量！而这种文学更能持久不衰，更具有生命力，远胜过奥恰科夫时期和征服克里米亚时期① 的肯定性的文学。

难道人意识到自身疾病，不就是他康复的保证吗？不就是他能战胜疾病的保证吗？……大家都看得见、大家都能了解起因的病，并不是可怕的病。可怕的病，是那种深藏不露、毒害体质的病，由于病因不明而长期不为人察觉。社会也是如此……自我谴责的力量，首先是一股力量。它证明社会上还存在有力量。谴责罪恶，内中必定包含着对善良的热爱；痛恨社会痼疾，前提便是强烈盼望获得健康。

难道我们的否定，只是以破坏告终吗？难道在大厦倾倒的地方什么也没有建设起来，只有空荡荡一片瓦砾吗？……难道我们窒息了，惊呆了，再无复原的希望？如果生命在我们心中窒息了，它一定还活在人民的完整无恙的根基上，这是我们神圣的信念。

---

① 引自亚·谢·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第2幕，第3场）。按：奥恰科夫，公元16世纪时为土耳其城堡，1787—1791年俄土战争期间被俄国军队包围，并于1788年12月6日攻克。克里米亚曾是一个汗国，于1475年起成为土耳其附属国，1783年在俄土战争中失败，被并入俄国版图。

我们承认人民有许多缺点，但永远也不会同意某一阵营理论家的观点：人民愚笨得不可救药，他们一千年来在生活中一事无成。我们不会同意是因为绝对的严厉主义在任何地方都不适宜……假如友好者对人民尚且如此看法，那么对他们不怀好意的人又会如何呢？

斯拉夫派、黑山人与西欧派，最近一场争吵

是呀，又是一场争吵。出现了一个情况，突然间我们的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一齐拥了上去。两派都以纯粹的状态出现！（天哪，甚至是最为纯粹的状态，不断爆发狂热的激情！）一拥上去，不由自主地就得彼此说些什么，摆出各自的全部见解，这么一来自然也就发生了争吵。我们得赶快把这场新争吵报道出来，它蛮有意思的。

仇敌交锋的起因，是黑山人[①]。大家知道，今年很早的时候，斯拉夫人包括黑山人在内，同苏丹打了一场大战[②]，甚至到现在事情还没了结。黑山人竭尽了全力，殊死拼搏，痛击了

---

① 黑山（11 世纪前称都克利亚，后称泽塔，15 世纪起称黑山），12 世纪末至 1366 年属塞尔维亚王国，1499 年隶属奥斯曼帝国。1796 年实际上独立，1852 年起为公国。自 7 世纪起斯拉夫人在此定居，故黑山人属于斯拉夫民族。因此斯拉夫派的《日报》认为他们是自己人，而对《现代言论》抢先为黑山人募捐而大为恼火。

② 指黑山和土耳其的战争，始于 1861 年秋。1862 年秋以黑山人的失败告终。

苏丹军队，不过自己也挨了打。不仅如此，他们遭到焚烧、抢劫、凌辱、强奸，一句话，对方是用土耳其的方式对付他们。正在这时，如同斯拉夫人总会发生的那样，黑山人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了内讧。这一下子他们可就惨了。一切全被击溃，全被烧光，抢光。他们自然需要帮助。不能用行动，那就用金钱。有时金钱几乎就等于行动。但由于我们从来为任何事都难以收集到钱，自然只好拿残羹剩饭来支援。在这方面，荣誉要属于那些首倡者，他们不怕钱少，不嫌弃小钱，率先签名捐助。小钱总比没钱好。如果我们谁都不行动，等着天上掉下一百万，免得我们这些有身份的人拿几个戈比丢脸，要那么我们就永远连一个卢布也弄不到。要是不嫌弃，从小钱开始，也可以搞到一百万，今天做不到，往后则会做到。第一步总是最重要的一步。要紧的是将这介绍给社会，教给社会，形成风气，引起兴趣……

就在这个时候出了麻烦。事情的发起，应归功于《现代言论》报；更加光荣的是，这《现代言论》报从各方面看乃是纯粹西欧派的机关报①。要是深究某些事实，还可说这是狂热的西欧派。就连停刊三个月后突然出现的《日报》，也为《现代言论》的壮举感到惊讶。《日报》没有想到《现代言论》有能力宣布为黑山人募捐。人所共知，《日报》是出了34期后在夏天突然停刊的②。我们大家（“我们”指整个文坛）内心深感

---

① 关于为黑山人募捐而征订的启事，最初刊于1862年的《现代言论》报（第63期，第249页）。之后很快又重刊于《日报》、《现代纪事》、《莫斯科新闻》等刊物上。

② 《日报》这份斯拉夫派办的周报，始创于1861年10月15日，至1862年第34期（6月2日）因皇帝命令而被禁止出版。当年9月复刊，最后至1865年停刊。

遗憾，原因第一是从道理上说是件憾事，第二也为《日报》惋惜，一个很好的出版物，办刊的人献身于自己的事业，大公无私，能够直截了当、坦率而又清晰地表述自己的见解[1]。而清晰的表述，意味着绝对不怀疑自己的见解。我们过去也曾在自己的杂志上触及到《日报》，但向来是相信《日报》出版者的真诚和善意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同意《现代言论》，它公开表示在一定程度上不太相信《日报》编辑部发表见解时是真诚和善意的。而像《日报》这样的编辑部，是无法怀疑它言不由衷的。我们尊敬它，尽管至今想起《日报》谈论犹太人可能出任教会协商会议首席检察官的问题还忍俊不禁（我们想读者还记得是否能让犹太人出任这个神秘的首席检察官之事。当时讨论的是在俄罗斯给犹太人和俄罗斯人同等权利的问题。“如果权利是平等的话，那么有的犹太人就会当上教会协商会议的首席检察官。到那时我们如何是好?”《日报》这样惊呼，于是从可能当上首席检察官引出结论说，有些权利不可赋予犹太人!)[2]。不过要知道，我们杂志与《日报》的这类交锋，绝不会动摇我们个人对它的尊敬。好了，现在回到正题。刚刚重新出版的第1期《日报》，亦即第35期，就为黑山人募捐一事向《现代言论》激烈开火。当然，《现代言论》在此之前，第一次宣布募捐时，就已触犯了斯拉夫主义者[3]。不过我们觉得，从《日报》这方面说，除了屈辱感还夹杂着对《现代言论》的小

① 《日报》是由伊·谢·阿克萨科夫出版的。该刊因政府不许设政治栏，因此它主要是文学和社会性质的。

② 指1861年11月颁布的一项法律，允许获得博士、硕士或副博士学位的俄国犹太人在各机关中任职。

③ 《现代言论》在为黑山人募捐的启事中对斯拉夫派是出于真诚，而对爱斯拉夫人（黑山人）表示怀疑。它责备斯拉夫派爱斯拉夫人主要在口头上，而不是在行动上。

小妒忌："为什么是你第一个发起募捐而不是我们，我们斯拉夫派才是斯拉夫人的真正朋友！是我们发现了斯拉夫人，我们发明了斯拉夫人，甚至因此招得大家都厌烦，所以光荣属于我们！"在个人的这种妒忌心理外，一定还有另一种高尚的妒忌，也就是信念上的妒忌："什么？让那下流肮脏的西欧派来染指？"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可是《日报》对这行为不夸赞两句是不行的，事情终归是件大好事，黑山人也能受益嘛。不过有一点十分讨厌，《现代言论》对事情的看法很不对头。没有诚心，对高尚的东西不存敬意，竟也要来凑热闹。他们是在帮助黑山人，但绝不是因为这些人是黑山人，是信东正教的斯拉夫人，是同自己血肉相连的亲兄弟，将来要同俄罗斯大地融合；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是被压迫的人民，他们在保卫自己的独立，在为自由而战，在为民族的原则而战。结果就是：两个仇敌在同一件善事上感情走到了一起，但又同样为了一件善事互相动了气，甚至都为这件事感到害臊。对一些情况、一些行为，要作一定的解释和辩护，这本身至少就意味着为这些行为感到羞愧。这么一来便出现了十分可笑的场面。我们不能不通过人物角色来展现这一场面。这里一方是《日报》，另一方是《现代言论》，中间站着黑山人。《日报》和《现代言论》都满脸怒气，以致黑山人有几分惧怕。

《日报》说："这是给你们的，黑山人啊！看在上帝的分上，收下吧！助贫嘛，一点儿兄弟情谊！我们太爱你们了。你们可要记住我们为什么爱你们，千万别忘了：就因为你们是黑山人，不是随便的什么维护自己独立的别的民族。我们可不像《现代言论》那样，只为这个才爱你们。这就意味着它根本并不爱你们，因为它爱的纯粹是一种抽象概念，爱的是你们身上那个维护独立原则的人民（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当然喽，

维护独立是好事。我们同意这一点，而且为你们高兴，因为你们有这种精神。不过你们假设一下，要是你们不是黑山人，亦即不是斯拉夫弟兄，不是我们将来要与之融合一起的斯拉夫弟兄(《日报》继续说：不论《现代言论》怎么讲，融合这事总是要发生的!)，那样你们对我们来说会意味着什么呢？只不过是某个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民，仅此而已。那时大概我们也会夸赞你们（但有一个条件，你们不能是德国人)，不过要像现在为你们这样辗转反侧，这样不遗余力，那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的。别的民族对我们来说算得什么呢？一个抽象概念！这个还是让《现代言论》去说吧。请相信我们，黑山人，《现代言论》这报纸太那个，太那个，简直……"

"黑山人呀!"《现代言论》打断说："不要听《日报》的！他是狂热分子，他在毒害你们！请拿去吧，这是我们所能募到的全部了。用不着感谢。说实在的，我们与你们没什么关系。我们看重的是原则。是你们所捍卫的原则。请记住，我们帮助你们，是因为你们捍卫民族性原则，而主要是独立的原则，帮你们绝不因为你们是黑山人。在目前这种情形下（因为我们同这个发了疯的《日报》冲突起来）我们甚至因你们是黑山人而觉得有些遗憾。多少有点儿不快。哪怕你们是黑人呢，那看来也要好一些，对我们来说，是你们还是黑人都一样，这点请你们记住。我们珍贵的是原则，原则！啊，当然，种族嘛……还有，就是所谓你们是我们同欧洲之间的中介人……① 总之，这一点我们自己也还没有完全弄明白，你们怎么成了中介人。

---

① 见《〈日报〉的复活》，《现代言论》，第 86 期。文章说"同情'所有的斯拉夫人而无一例外'"，说希望斯拉夫人都联系在一起，希望这些斯拉夫人作为俄罗斯人与欧洲的中介者。

好了，你们就做我们的中介人……这些自然全是瞎扯……反正得说点什么来咒一咒这个出身皇室的拜占庭人，也就是《日报》……啊，假如你们（哪怕就这一次）不是黑山人，而是什么瑞士人、蒂罗尔人①、巴登-巴登②、英国人，那该多好。其实对我们都一样。原则是最主要的！别再迟缓了，快些文明起来吧！早点把你们的孩子送到欧洲去求学。我们当然很主张民族性原则。可要知道，难道能认为民族性就在于种族、信仰、语言、民俗、历史等等之中吗？只有《日报》才这么看。依我们看，民族性这就是……就是欧洲；这就是变得与大家一样，要一点儿特殊都没有，无论在哪个方面。当然了，这也就是欧洲的自由，欧洲的进步；不是一般的自然的进步，而是欧洲的进步。听见了吗，是欧洲的进步！自由也须是欧洲的自由！哈……哈……你们要都快些成为大人，那才棒呢！不用要你们的大山了！……说实在的，把它们铲平就完事了！你们要这大山干什么？倒是，瑞士也有山，蒂罗尔大概也有……这不就特殊了吗，这好像是个烙印，这妨碍全欧的发展。原则，原则，第一位的是原则！你们要全成了大人，那卡特科夫会夸奖你们的③。得到卡特科夫的夸奖，这岂不是很光荣的吗？他也是个欧洲人嘛！……好了，好了，不要皱眉头，别以为说卡特科夫是讥讽。我们只是顺便提一提……是呀，是呀，是呀，很遗憾你们是黑山人！甚至令人沮丧。甚至是要让这个《日报》难受一下，整整它！

---

① 蒂罗尔州位于奥地利西部、阿尔卑斯山区，面积一点二六万平方公里，人口仅数十万。

② 巴登-巴登在德国西南部，人口才数万人，以黑林山矿泉著名。

③ 米·尼·卡特科夫（1818—1887），《俄国导报》和《莫斯科新闻》的主编。他崇拜英国，因此下文说他是欧洲人。

黑山人站着沉思，大张着嘴，两手摊开，他们甚至有点愧疚。对《日报》嘛还没啥可惭愧的。他们想："的确，我们是捍卫自己独立的人民，这一点无法隐瞒，不过我们也还是黑山人呀，这一条就全都弥补了。可说到《现代言论》，真有些愧疚，黑山人在这里就怎么也弥补不了。不错，我们真是维护独立原则的人民，但民族问题怎么办呢？你没法躲，没法藏，不管怎么折腾还是黑山人。唉！你们最好在家里先打够了，准备好再来我们这里。那样就好了。还说自己是兄弟呢，弄得人们四分五裂！去你们的吧。"

当然，黑山人可能把话说得礼貌些，头一次不会讲"去你们的吧！"他们还是山地民族，不很开化，还不习惯使用我们圣彼得堡文学中和我国文明刊物上那种西欧式的放肆语言。他们那里暂时还不会拿人家的姓氏乱解释，提出这样的建议：例如建议拉津先生不要长得那么高，建议别斯图热夫-留明先生洗完澡用车轮润滑油擦身；或者刊登这样的俏皮话：沃多沃佐夫先生需要运水①。他们的报刊上还不使用书面的反驳形式，例如《经济学家》刊出的对该刊一编辑的反驳："如果把不成样子的答复视为作者大脑机能不正常，那么给他的病理诊断便接近于白痴。如果我们的巴什基尔人② 没有交几个铜币跟伊斯兰教士学习的话，就会是这样。逻辑如此糟糕者，都送往疯

① 俄国姓"拉津"与法语的"根"谐音，而植物之根是不能向高处长的。下面的"别斯图热夫-留明"与擦车油，沃多沃佐夫与运水，都是靠谐音编出的俏皮话。三人分别是时评家兼教师，历史学家，教师兼翻译，当时均为各杂志撰稿。

② 居住于乌拉尔山脉以西的一个民族，公元 9—10 世纪初次见于史籍，13 世纪时，其领土为蒙古和鞑靼人所侵占。1557 年归属俄罗斯公国，17—18 世纪多次起义。

人院。来自别列别依[①]的巴什基尔人就可能如此。为使其清醒，不能用报刊文字，而需别的更有刺激性的手段。”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不过成为我们圣彼得堡西欧主义时代的一种遗迹罢了。就在这个时代，《现代言论》责备《日报》，说《日报》以民间的方式同它吵架，同时指出堪作教养楷模的是“Journal des Débots”[②]。“欧洲人会怎么说我们呢？难道《德·杰巴》里是这样吵架的吗？”当然，《现代言论》从我们的欧洲文明报纸上能够得知，不用民间的方式竟也骂得出奇，让民众连做梦也想不到。至于在巴黎，虽然现在不用我们的办法骂街，却有自己的骂法，比我们的还好。而且除了骂街的话，那里的报纸就是不用骂人话有时也令任何正派人作呕不止。其实，黑山人怎么讲话与我们何干？巴黎的报讯又与我们何干？我们有自己的事要说……

自己的事还真不少。请问，干吗要自愿地让抽象理论和特殊性捆住手脚？双方干吗死抱着过了时的守旧思想？两个刊物都是受人敬重而且值得敬重的，最好的一点更都是有见地的，可现在双方搞起了跳背游戏。恕我用这个词儿，这的确是精神上的跳背游戏，仅此而已，好像是说：“我爱这个人可不包括皮肤，而我爱这皮肤却不包括这个人。”等等等等。然而你想，社会管这些干什么？当然，对西欧派你是怎么也讲不清这个非此即彼的排他性的，只能招来一通骂，不会有别的。同斯拉夫派同样也无法辩论，那是白费工夫。我们今天责怪他们，并非针对这两种古老理论的含义。我们相信，这两种目前世界上最

---

① 巴什基尔的一个城市，该市设立于1781年。

② 法国巴黎的一份报纸，出版于1789—1920年。

幼稚最肤浅的理论，最后会自然消亡，就如同两个爱唠叨的老妪，面对着年轻的一代，面对着新生的民族力量。她们至今不相信这新生力量，而且出于一切老妪的习惯至今还把这新生力量当做没成年的小孩。不，在今天这件事上我们担心的不是这些理论，是这个坏榜样令人不快。出现了一件事情，比方说这个募捐，马上就意见分歧，马上就把社会弄得四分五裂，马上就援引理论，而其实需要的是更好地团结起来……

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译文前言

"Le laid, c'est le beau"① 这个公式，三十年前自鸣得意的墨守成规者②，想用它来概括对维克多·雨果才赋的倾向性的看法。其实这是错误地理解、并错误地转述雨果本人为解释自己思想所说的话。不过应该承认，他招来自己敌人的讥笑，也怪他本人，因为辩解得非常含混而且傲慢，解释自己思想时又相当凌乱。然而，攻击和讥笑早已销声匿迹，维克多·雨果的名字却没有湮没无闻。而且不久前，在他的小说"Notre Dame de Paris"③ 问世三十多年后，出版了"Les Misérables"④。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这位伟大的诗人兼公民展现出如此巨大的才华，用如此完美的艺术表现了自己诗思的基本内涵，使得作品传遍了世界，人人传阅。小说那摄魂夺魄的影响，是充分而普

① 法文：丑就是美。按：这句话出自雨果的剧本《克伦威尔》(1827) 的序言。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可能不仅指法国和俄国浪漫派批评界的代表人物，而且还涉及别林斯基。后者于 1864 年关于雨果一个剧作的书评里也谈到，雨果在出现于文坛时，就提出"丑就是美"的口号……

③ 法文：《巴黎圣母院》。

④ 法文：《苦难的人们》。按：该书中译本易名为《悲惨世界》。

遍的。人们早就想到，维克多·雨果的思想，不是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那个笨拙可笑的公式所能概括的。他的思想，是19世纪全部艺术的基本思想，而维克多·雨果作为艺术家，几乎是第一个宣示了这一思想。这是基督教的思想，是包含崇高精神的思想。它的公式就是：因受环境、世世代代的停滞、社会的偏见等不公正的重压而被毁了的人能得到新生。这一思想是为社会上受屈辱者和被所有人遗弃而毫无权利者伸张正义。当然，像“Notre Dame de Paris”这样的文学作品，不可设想是一种讽喻。但又有谁不会想到，卡西莫多[①]就是遭受压制和鄙视的中世纪法国民众的化身呢？他又聋又丑，只是膂力过人，但最后，爱情和对公正的渴求在他心中苏醒，同时他也开始意识到真理在自己一边，意识到自己还潜藏着无尽的力量。

维克多·雨果几乎是主要的预言者，宣告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中“新生”思想的出现。至少他是第一人以如此巨大的艺术力量，在艺术领域展示了这个思想。当然，这一思想并非维克多·雨果一个人的发明，我们坚信这思想属于19世纪不可分割的部分，也许是19世纪的历史必然。虽然人们一般习惯于责难我们这个世纪，说它在过去时代的伟大典范之后没有给文学艺术带来任何新东西。这么说是极不公道的。你们考察一下我们世纪的欧洲各国文学，就会在所有文学中看到这一思想的痕迹。也许到世纪末时这一思想最终会全面完整、清晰有力地在某一个伟大的艺术作品中得到体现，从而充分而永恒地表现出自己时代的追求和特色，就好像《神曲》表现了自己中世纪天主教信仰和理想的时代。

维克多·雨果无疑是19世纪出现在法国的最杰出的天才。

① 《巴黎圣母院》中的主人公。

他的思想广泛传播，甚至现代法国小说的形式几乎全都属他一人。甚至他的重大缺点，都几乎重现于所有后来的法国小说家的创作中。如今，当“Les Misérables”获得普遍的、几乎是全球性的成功时，我们不禁想到小说“Notre Dame de Paris”由于某些原因至今未有俄译本，虽然已有很多很多欧洲作品译成了俄语。毫无疑问，在我国，人们过去就用法语读了这本书。但是第一，依我们想，读过的只是懂法语的人；第二，懂法语的人未必都读过；第三，是很早以前读的；第四，即使从前，三十年以前，能读法语的人数也不很多，而想读却不会法语的人要多得多。如今的读者群，可能比三十年前要增加十倍。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所有这一切都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时下的一代人未必再去重读旧书。我们甚至认为，如今这一代读者很少知道雨果的这部小说。所以我们才决定在我们的杂志上译出这天才的力作，以便将当代法国文学最杰出的作品介绍给我们的读者。我们甚至还想，三十年是不小的距离，那时读过的人即使重读一遍，大概也不会厌烦。

总之，我们希望读者不至于责备我们把书名早已尽人皆知的作品再次奉献出来。

一个微妙的问题

（文中有口哨声、变形与乔装）

在我们文坛上不久前出现了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谁的过错？"① 这是不久前《现代言论》喊出来的，并且立刻同无数声音汇合一起。那些声音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不分场合地议论着：谁的过错？到底是谁的过错呢？《现代言论》的文章连载了四期②，许多人争相阅读。我们也怀着极大好奇心读完了，却还没明白：谁的过错？不仅如此，我们还觉得，问题提法含混，事情反倒弄不清了。先声明一点，我们绝不想攻击《现代言论》。问题当然提得不准确，不过我们了解这样提的目的是什么。这里故意牺牲了准确性，为的是达到一定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一切都很清楚，但问题在于，是否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去达到一定的事先设定的结果呢？最后，这篇文章是否能够达到某种结果？这个问题我们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权衡、推断并解决它，现在则想把一部分结论告诉我们的读者。不

---

① 《谁的过错？》曾是俄国作家亚·伊·赫尔岑小说的书名，中文本译为《谁之罪？》。

② 《现代言论》第99～102期。——作者注

过，先要引述一下《现代言论》文章的内容。

最近一个时期，到处响起一片喊声，责备我们的青年，至今不绝于耳。糟糕的是，在提出很认真很关切的问题同时，还常常有些危险的、荒谬的、有害的说法，它们对发难者本人的害处，要大于对被责难者。类似的责难之荒谬性的日见明显，最终会昭然若揭，而发难者的荒谬性将成为历史。成为历史当然不坏，可仍然出现现代的见解，现在就有。某些人甚至乐于把一切罪过都加给青年人，自然不肯就此罢休。于是很快在整个社会上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问题："谁的过错？谁教坏了青年，使他们离开正道？"这些问题也进入了文学，愤怒的责备和揭露纷至沓来。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愤怒的人们中，最厉害的正好是感到自己手脚不干净的人。他们到处寻找有过错的人，在近处和远处找，骂人，发火，喊叫得嗓门儿几乎在巴黎都能听到。文坛上越来越多的人追随他们（有什么办法呢？这很时髦！）。就在不久前，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帕夫洛夫①针对所有这些人，整个这股新潮流，这些新言论，发出自己痛苦的诅咒，抛出自己的"充满苦涩和愤恨"② 的诗。当然这里并不真是诗而是散文，但这散文称得上是诗。他在关于63年将出版报纸《我们的时代》的启事中说了这样的话："在文学中和社会情绪中发生了变化，各种社会问题都显露出来。如今在这方面出现那么多的声音，我们担心落在后面，担心热心的程度比他们逊色。"③

尼古拉·菲利波维奇的这种激愤是意味深长的。人们指摘

① 尼·菲·帕夫洛夫（1803—1864），作家、批评家、新闻工作者。
② 这是引自莱蒙托夫诗作《一月一日》中的一句。
③ 引自《我们的时代》，1862年10月4日。

他是顽固落后分子①。我们觉得这个称呼对他不合适，张冠李戴。就算他真是个顽固落后派吧，倘若拿今天的他同五年前年轻激进的时候比较或许可以这么说，那时激进派的角色既光荣又有利②。可是他对人家指责他顽固落后好像毫不在乎。有一种人，受到指摘不但不畏缩犹豫，面色反倒更要好看些。至少责难他一听就过去了，好像水落到鹅身上全滴到地上一样。自然，他的辩解只有一条，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全是如此说：我这样讲，因为我坚信是这样。我们不想争论帕夫洛夫先生是否坚信，我们也绕开另一个问题：他坚信什么。要知道帕夫洛夫先生和他的见解，与我们个人毫无关系。我们感到兴趣的，只是他如今很有意思的处境。像他这样一个人，突然间发觉有许多人，甚至不久前还傲视他、朝他发泄怒气、狠毒和讥笑的那些人，如今争先恐后地学着他的腔调和精神来讲话写文章。而且他们是那么卖力，弄得他担心这伙突然拥来的人群，会夺走他用文学天赋取得的利益和成果。他为自己的文学思想、自己的文学个性担忧，人们会利用它、剽窃它，因此他才不得不带着苦笑来证明：他本人害怕落在新生的文学天才的身后。居然是他，居然落后于人!!! 这难道还称得上充满苦涩和愤恨的诗吗？难道这不是来自莫斯科的魔鬼的笑声吗？难道这不是莫

---

① 尼·菲·帕夫洛夫和他的报纸《我们的时代》，被《现代人》等刊物视为顽固落后，因为在俄国政府趋向反动的时期（60年代后），他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使自己的报纸具有了半官方性质，并得到政府的资助。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帕夫洛夫不满，还因为后者把反动贵族看做是俄国唯一的领导力量。因此，帕夫洛夫与保守的政论家米·尼·卡特科夫一起，被人戏称为爵士、侯爵。

② 一般认为，帕夫洛夫在那时候的活动，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一评价可能过于苛刻。

斯科式的哈姆雷特面对国王的弄人郁利克的骷髅所说的独白吗？

“啊，可怜的郁利克，霍拉旭，我认识他，他是个最会开玩笑、非常富于想象力的家伙”……①

小丑郁利克在这里自然代表的是俄罗斯文学。快活的人！聪明的人！就连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自己，这个最无可指摘之人，这个从来不算快活的人，不算……如此等等吧②，就连这个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也在关于《呼声报》的启事中，一则尖叫烦人的启事中高喊：他拒绝共和，他不愿步法国后尘再犯错误③。他好像说：摩尔根-弗里④，如今你可别想哄骗我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了！似乎他从前被骗过，似乎从前有人真正主张过共和制，似乎法国在48年⑤就已在寻找和争取共和，似乎到今天还有人希望实行共和。好个无可指摘！真是保守又保守！不过……这且不说。前面我们讲到，随处都可听见这样的问题：谁的过错？接着是开始寻找罪魁祸首，而后便开始指指点点，然后是指名道姓，再后是揭发暴露。愤怒扩散得越来越广，有些人不等找上门来，自己主动参加进去；有些遭

① 见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5幕，第1场，译文引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朱生豪译本。

② 这当然都是指他的文学活动。我们从来不敢涉及我们这些文学家的私人生活，因为它在我们眼里是神圣的。——作者注。按：对安·亚·克拉耶夫斯基的这种讽刺，在60年代的政论文章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几乎是众口一词的。

③ 他的启事发表在《圣彼得堡新闻》上（1862年8月30日），他宣称自己甘愿绝对服从地为最高当局效劳。

④ 不详。

⑤ 当指法国1848年的二月革命，巴黎六月起义。

到责难的，特别是那些由于某种原因无力自卫的，更是大受斥责，甚至挨人谩骂。在这方面表现最凶的，是《俄国导报》的文学教授以及它的主编卡特科夫先生。《现代言论》致力于最终弄清和解决这一问题，如今得出了一个极其有趣的结论：我们这里一切有害时尚的鼻祖，正是卡特科夫先生。他是对一切有过失之人的最主要的迫害者，是所有思想不良者的所谓涅墨西斯[①]，是针对引诱我国青年脱离正路犯错误的人们的密探和揭露者。这位卡特科夫先生本人恰恰便是主犯，他是始作俑者，又以自己的榜样引出许多后来人，全是他掀起了这场风波，如此等等。应该为《现代言论》说句公道话：卡特科夫先生这事的过程，在此讲得非常清楚，令人满意，而其揭露又十分惊人。有一点得到异常清晰的说明：如同在古代，在神话时代一样，特洛亚被围困[②]之后，噢，说错了，是塞瓦斯托波尔被围困之后，《俄国导报》便在莫斯科出现了。[③]所有俄罗斯人那时普遍的精神，曾达到了极度的紧张和失望。人们都要求改革，人们都开始议论营私舞弊，要一下子解决种种巨大问题，要追究弗拉基米尔·佐托夫先生[④]，决心刨根问底，挖出这个根子来，可结果什么也没挖出来。正是为了挖出这个根

---

① 希腊神话中最古老最受崇敬的女神之一。她惩罚女神，惩罚破坏秩序者，后来渐渐起了复仇女神的作用。

② 特洛亚战争发生于公元前 12 世纪。特洛亚为希腊人包围达十年之久。

③ 米·尼·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出版于 1856 年，塞瓦斯托波尔失守是在 1855 年。下文所谓“英国原则”，因为卡特科夫是英国迷。

④ 弗·拉·佐托夫（1821—1896），俄国作家。这里指 1858 年下半年报界的一场激烈辩论。在弗拉基米尔·佐托夫的纵容下，他主编的《插图》周报上发表了数篇排犹的匿名小品文，引起轩然大波。进步报刊几乎都著文抗议和驳斥。

子，才出现《俄国导报》带着英国的原则和式样，在莫斯科

……仿佛一个预言家
预示着莫斯科思想和英国原则。①

《现代言论》以异常的坚持不懈的精神，讲述了《俄国导报》如何先用英国式堕落图景引诱整个青年一代，而后则开始宣传莫斯科思想。接着《现代言论》转入莫斯科思想的发展史，同时深入分析事物的神秘本质。不仅如此，他又进行考古研究，钻研尘封的古代羊皮文稿，引述古代哲人的话，这可说是《俄国导报》的戈斯托梅斯尔们②，亦即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帕夫洛夫、列昂季耶夫先生、巴伊波罗德先生等人。他甚至动用了尘封的已然安息却叫人难以忘怀的文章，如格罗梅卡先生的《论警察外的警察》③。他也引用了《传记作者兼东方学家》、《官吏》等文章中的话。这些都是极有价值的轰动当时世界的文章。可惜的是有这么好的机会却没有引用同一作者另一篇精彩的文章，它讲的是七月里在莫斯科人行道上铺沙石的勇气和荒唐。如果能引用一些，那两篇佳作真可谓珠联璧合了。最后，为了完成这幅图画，并且广阔而又同样惊人清晰地

① 引自涅克拉索夫和杜勃罗留波夫合写的一首讽刺诗《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友好争吵》，引文稍有出入。

② 戈斯托梅斯尔，相传为公元9世纪上半叶诺夫哥罗德的伊尔门斯拉夫人的首领，第一个大公或地方长官，以非凡的智谋著称。此处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此讽刺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同仁的手法，他们都在自己文章中引用或提到《谁的过错?》一文。

③ 这里列举的，包括格罗梅卡在内，都是卡特科夫《俄国导报》的撰稿人。他们的文章反映了卡特科夫的观点和立场。巴伊波罗德是卡特科夫、德米特里耶夫和列昂季耶夫三人合用的化名。

描绘出卡特科夫先生——他是如此关心维护青年学生的精神纯洁，如此关心培养青年人尊敬教授和权威，而且到处揭露那些只不过被怀疑危害青年纯洁的人——描绘出这样一位先生如何仅仅为了打击克雷洛夫教授的一时快意，就在自己刊物上登载和鼓励了一系列文章①，它们恰恰鼓动了年轻人反对自己的老师，这样便在年轻人本来纯真的心中播种了怀疑主义、寡廉鲜耻、虚无主义。如此等等，这里就不赘述了。总之，从四期《现代言论》看，已是洞若观火：如今自诩为我们保护神的卡特科夫先生，罪过要大于古代犹太人的那只山羊，开始人们骑着它做忏悔祈祷，后来让它驮着自己的罪过上了路去草原②。一切罪过和过失的元凶，所有我们进步派和虚无派的鼻祖，《现代言论》都归之于卡特科夫先生，同时却大度地原谅了他的同志和同事列昂季耶夫先生。到此，问题的答案就清楚了！问题是：谁的过错？答案是：卡特科夫。

以上我们不偏不倚而又尽可能全面地引述了《现代言论》上的一篇文章。

读完这篇文章我们产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已经说过，自己也开始对多种问题发生兴趣，并从这许多问题中选择了一个：这样的文章能够取得什么结果吗？实际上是什么动机

---

① Н. И. 克雷洛夫为莫斯科大学罗马法教授，被卡特科夫等人在《俄国导报》上多次攻击为无知，因此在学生中声誉遭到破坏。

② 指圣经中犹太人找替罪羊的故事。《旧约全书·利未记》（第16章，第20～22节）："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

左右着作者呢？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呢？难道就为的出个丑吗？那不成了为艺术而艺术吗？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是为艺术而艺术，简直是最大的耻辱了。

我们不想再说问题本身欠明确，提法含混，这在第一页已经提及，尽管这个话题不是很有意思的。的确，既然提出“谁的过错?”就一定承认存在“过错”。而如果承认存在“过错”，便意味着可能有一个人是有过错的人。《现代言论》正是这么做的，它认为存在有过错的人，并要点出此人姓名。然而这是办不到的。这样提出问题，是难以找到有过错的人的。这里也可能不是过错而是恶行呢，所以是找不出最早的祸首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卡特科夫不是罪人。不论卡特科夫先生，不论别林斯基，不论是谁，都不是罪人。在这一点上要说有过失，那连普希金、冯维辛、康捷米尔、罗蒙诺索夫等，过失也不比他们轻。说得再远些，拉普拉斯[①]、伽利略、哥白尼也都有过失，只多不少。这种事就像一团乱麻。事情的确可以追溯到阿耳戈船英雄[②]，或至少能追到三个瓦兰公爵[③] 的说法，他们的

① 拉普拉斯（1749—1827），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彼得堡科学院国外名誉院士（1802），有概率论和天体力学等方面的经典著作。

② 或译亚尔古船英雄，据荷马时代以前的希腊神话，这批乘坐阿耳戈船的英雄（据说是 50 人）远航科尔喀斯寻取神羊的金羊毛。

③ 据俄国编年史记载，这是留里克王朝的奠基人。留里克，原为瓦兰部队统领。传说中说，他应伊尔门斯拉夫人邀请，同其兄弟西里涅斯和特鲁沃尔一起来诺夫戈罗德任大公。他们就是所谓的瓦兰三公爵。这与当时关于罗斯起源的争论有关。在当时，俄国历史家、作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米·彼·波戈金（1800—1875）与人辩论这个问题（在 1860 年 3 月有过讨论会），但问题始终没有弄清楚，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认为波戈金的见解是不科学的。

来历至今还不清楚。

我们也许非常乐意多谈谈这个题目，但在这一次种种因素不允许我们这样做。再说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上面提出的问题，即《现代言论》的文章目的何在，对此我们已经开始讨论了。我们讲到了可能为了出谁的丑，但又首先排除了这个原因，文章写得那么认真那么尖锐，必有别的目的。但是什么目的呢？难道《现代言论》意在给卡特科夫先生本人施加影响，作用于他的意识、良心，责备他说服他，把他拉回到正路上来吗？不对，这样的目的也显得荒谬。像卡特科夫这样的先生们，是不能用这种办法拉回到正路上来的。方法完全不对。既然如此，是不是《现代言论》想用自己的论据影响别的专家，帮助他们、指导他们来解决一些别的问题呢？不过据我们的判断，专家们不会把这种通告似的东西，当做行动的指导，任何时候也不会受它们的约束。总之，我们不想一一分析我们的猜测，只说一点：我们找到了唯一可能的原因，《现代言论》的目的是向公众告密。这是一种形式上的告密，为了充分认真地揭发真正的罪魁祸首，当然是《现代言论》所理解的那种罪魁。这样的告密和通告，本身当然是可以允许的，因为它们是向所有的公众公开。这是公诸于世，这是揭露，有时是必须这么做的。这里暴露了知名人物活动的性质和方式，准确地描述了这种活动，揭示出这一活动的荒谬和可耻。而且这一切能尽量用蓝焰烟火① 照亮，让人们易于识别。

假如真是这样，那又说明什么呢？《现代言论》辛苦一场，难道真的只为揭露卡特科夫先生其人，戳穿他的本质吗？要真是那样，我们觉得倒是帮了卡特科夫先生的忙。现在问题的提

① 即孟加拉烟火，燃烧时能放出闪烁的火花。

法恰是这样，卡特科夫先生可有很好的借口来以绝对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回答，这也是因为给他提的问题过于极端了：

“你是有过错吧？承认了吧。”

“谁？我有过错？”卡特科夫先生会问。“有什么错？是我引起了风波？好吧，就算这样。可我已经悔过了呀。是我现在追剿追随我的人？可我只有这样才能表现我的悔过，表现我的改变了见解呀。我追剿罪恶，就意味着我仇视罪恶；我追剿我的追随者，就意味着我追剿我自己，自己以前的活动。是我改变了信念？可这……”

这时，我们突然又看到了另一幅画面。那是幻像、是梦境、是理想，不管说是什么，反正确实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面前出现了建筑式样宏伟的一个房间，灯火辉煌。这是哪里呀？是俱乐部？练马场？议会？不，这不是议会，人们又吃又喝，而在议会里是只讲话的。屋中长长的一排桌子，两边坐着数百位客人。这定是一个什么订办的午宴，一次隆重的活动，一个聚会。饭吃完了，但依照英国习惯还在饮酒。忽然杂志的出版人站起来要求讲话。他希望面对尊敬的来宾讲讲自己的事业，他愿意解释一下。他说是那些责难他的人（听听！）逼得他要这么做。他总结说，责难者就在客人中间也不少……（席上哗然）整个莫斯科以及整个地球，都在关心这个问题怎么了结（听听！）。他希望能发个言……（太棒了！）响起一片赞同和兴奋的叫声。于是连忙指定主席（不讲话却维护罗马古风的人[1]），布置讲坛。演说人庄重严肃地登台，他挺精神，眉宇

① 暗指与卡特科夫志同道合的、莫斯科大学罗马语文教授帕韦尔·米哈伊洛维奇·列昂季耶夫（1822—1874）。他于 1856 年起任《俄国导报》的第二主编，是卡特科夫的助手。他的反动观点曾于 1859 年引起大学的抗议（即所谓列昂季耶夫事件）。

间有一种自信，嘴角浮着微笑，带些讥讽却十分得体。他不失礼貌地眯起眼睛，细心环顾四周听众，静静观察达数分钟。由于主席和一些绅士即他的助手们的努力，几分钟内终于恢复了沉默和肃静，人们的目光贪婪地投向演说者。他开讲了。

“诸位阁下和先生们！

“我打算讲讲自己。是责难者促使我这么做的。不过不要以为我想自卫，想辩解。我只是想在饭后品着酒，说一说自己的事。在这么可敬的人们面前讲一讲自己是十分惬意的事，但别以为我特别爱讲自己。我不隐讳，我自尊心强，有时很喜欢想想自己的意义和荣誉，但要说讲自己……那只是在个别的情况下，需要放炮的时候，需要压倒、击溃、消灭对方的时候。那时我真的去压倒、击溃、消灭对方，这没必要隐瞒。我完全可以说，既然现在我登上讲台，宣布要讲我的事和我本人情况，那我就一定有把握可以为所有尊敬的先生们提供不同寻常的享受（喧哗声）。我还要更进一步说，我坚信自从世上有了种种会议、俱乐部、议会、集会之后，还没有过、今后也不会有什么话题，能比我马上给尊敬的诸位讲的话题更有意思，更吸引人，更重要，更高尚的了。

（爆起一片喧嚷，几百人破着嗓子喊叫。主席摇铃无济于事，人声不肯平息。此刻演说者高傲地站着，摆出一副高姿态，体谅地微笑着。他对喊叫非但不生气，反倒很欣赏。他有把握获胜。他左手撑着讲台，右手伸进坎肩里。人群中有太多的演说者的拥护者和崇拜者。他们逐渐占了上风，喊声停了下来。左面有几个狂热的进步派还久久不肯安静。表现特别激动的，是一个虚无派绅士，头发蓬乱，是个极端的左派分子。他说什么也不肯静下来。演说者把一个镜片贴到一只眼上，足足

有两分钟直盯着他看，就像观察一个小甲虫。看来这使反对派忍无可忍。他们大骂“顽固分子！背叛分子！阁下！”最后终于又恢复了安静。演说者继续讲下去，心里充满必胜的信念。）

“阁下们！先生们！我早料到你们会因为我的话而大嚷大叫，但我并不生气。我不认为，我绝不认为自己会以任何方式破坏议会形式的规则。它们对我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请你们仔细想想，我不过承认自尊心强，并认为自己的利益高于世上的一切。难道在这里可敬的人们中间，可能找到谁不尊重自己、不视自己的利益高于世上的一切吗？此外我还承认，不仅爱自己、尊敬自己，甚至有点崇拜自己，可那又有什么了不得呢？再往深里说，我甚至希望大家都崇拜我，而且觉得这是我应得的。我要再次问在座的先生们，这里可有哪一个不希望自己同样如此呢？差别仅仅在于我公开说出来了，而别人却没有，因为不善于公开地讲自己。但是第一，为什么不公开地讲这种事呢？任何一个不列颠人都有权表现独特。我喜欢讲我心里想的话，而且相信在我申说我个人与我的需求有多么重要的时候，我不仅不是轻视在座的先生们，反倒因我热忱坦诚而让人们觉得脸上有光。”

右边一个声音（含糊地说）：说得挺巧妙，……也挺有趣。

另一个声音：这是纯正不列颠人的感情。

（演说者脸上露出扬扬自得的神气。在座大部分人显然倾向于他，可左侧却有越来越多的嘟哝声。人们喊了起来：“别说废话！不要夸夸其谈！快讲问题！”）

演说者：我先作些必要的说明。我甚至还搞过文学。我翻译了《罗密欧与朱丽叶》，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好像是讲普希

金的[1]。我还写了……哦，我真给忘了写过什么。尽管如此，我十分想成为名人。何必假惺惺呢！我过去和现在都坦率地认为自己高过所有我的同代人。我希望这话没有侮辱在座的任何一位。但是我过去没有机遇。当我们获得普遍复兴的时候，机遇才会到来。我于是办起了我这惊人的杂志[2]，并推行起英国原则来。很自然，我立刻赢得了意义、金钱和不朽的荣誉。可是现在有几个奇怪的绅士（我不称他们是可怜的绅士，虽然我可怜他们）出来发启事，搞暗示……总之是打算向公众告我的密，说我最近在一些问题上办事不很……怎么说能更明白些呢？（一句话，提高嗓门儿）：是不很诚实！

左边怒气冲冲的虚无主义者（大声地）：很不诚实！

（全场一片嘀咕声。这种高声直率的表态，弄得演说者有些不知所措，但笑容还未从脸上消失。愤怒的先生觉得自己立下了大功，发狠地直视演说者。出现了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紧张地等着看这场争论到底怎么解决。）

演说者（沉着却极其威严地）：我没听清，希望这位可敬的先生重说一遍自己的话。

虚无主义者（惊雷般可怕地）：您避重就轻地说“不很诚实”，我反驳说“很不诚实”。您对这有什么好说的？

演说者：要这样我不得不求我们的可敬的议长，委托议长去问这位尊敬的先生，他说的话对我是否具有侮辱的意思。

虚无主义者：这由每个人随意理解好了。

---

① 米·卡特科夫曾译过《罗密欧与朱丽叶》，也写过论普希金的文章。他的《普希金》一文是在帕·瓦·安年科夫编的六卷本《普希金文集》出版时（1856）写的。文章对普希金的评价有可取之处，但他最后却指出普希金许多短处。

② 指米·卡特科夫自1856年1月起创办《俄国导报》杂志。

演说者：我再怎么尊敬这位先生，也无法满意他的答复，所以不得不再次劳驾高贵的议长。我希望肯定地知道，这位可敬的先生说的话是否带有侮辱的含义？

虚无主义者（眼放凶光，以拳击桌）：有侮辱的含义！我遗憾没找到更有力的字眼！

（一阵大骚动。虚无主义者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仿佛惊呆了。演说者虽然脸色有些苍白，却又一次平静地转向议长。）

演说者：既然如此，我要特别请求我尊敬的朋友转告这位先生，我非常遗憾地立刻得提一提在编辑部桌上突然消失的一枚二十五戈比硬币①。

（场上哗然。反对者处于盛怒之中，人们设法使他安静。四面都有人喊叫，说他是捣乱，要把演说搅没了，让他滚蛋。“叫他滚，叫他滚！”这一次进步派让步了。演说者尊严地审视四周。）

虚无主义者（装出厌恶、激动的神情）：我的话不是侮辱的意思，是一般的意思。

演说者（连忙地）：那我就向这位先生宣布，我这方面愿意收回关于硬币突然消失的问题。

虚无主义者：别拿你的硬币来烦人了……我讲的不是侮辱的含义，是一般的含义……您满意了吧！

演说者获胜了，他宣布已完全满意。他甚至提议与可敬的反对者共干一杯。反对者嘟哝了几下算是同意。两人举杯喝了酒。场上完全恢复了肃静。演说者威严地继续讲下去，每个词

---

① 普·亚·库斯科夫在一篇小品中讲到嗜酒者为抢一枚二十五戈比的硬币而杀人，受审时审判官问他值得为一枚硬币杀人吗？他回答：抢一枚硬币和抢一千卢布都一样。米·卡特科夫引用此事，后遭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复挖苦。

都加重了语气：

“我刚才说到，有些奇怪的，说得重些是可怜的（狠狠地盯了一眼虚无主义者）、有害的、发了疯的饶舌家（我希望那位可敬的先生不至于把我的话当成对个人的侮辱），竟然坚持说我的行为不很诚实。是的，是不很诚实，我同意这个说法，虽然这个说法也还得不到那位可敬绅士的欢心。那么，他们的责难是根据什么呢？第一，即便我鼓吹过英国原则，谁又能保证说我的行为也遵照这些原则呢？（笑声）这个先不说。这只是个人自由和行动自由的问题。我承认，我非常蔑视我的责难者，包括现在的和将来的，我绝不在他们面前为自己辩解，不给他们这个荣幸。现在我站在这些可敬的人们面前说话，唯一的原因是我自己想找点儿乐子。我们的聚会像是家庭聚会，我相信这里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传到门外去。其实对我来说无所谓……（有人赞同地喊叫“听他讲！听他讲！”）

虚无主义者低声嘀咕：“这不是假面舞会吗……我们是在英国吗……简直是小丑！”

演说者：我要十分尊严地讲下去，是我自己赢得了这尊严。首先，有人断言，仿佛表述英国原则因而毒害了社会，特别是社会的青少年，引诱了他们……如此等等。我觉得这很可笑。先不谈引诱社会，先说说青少年，就是中小学生们。似乎谁都不了解青少年，谁也没经历过青少年，也不记得他们是怎么长大的，特别是在我们的土壤上！试问有什么能瞒得过我们的青少年吗？瞒得过这些没有定型但却机灵、好奇、爱怀疑的头脑吗？显而易见，我们的青少年对什么全都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权威。这大概是我们这种土壤上的一条规律。然而，谁要能信任，谁能得到他们的尊敬，他们就会热情地跟谁走。说实在的，我没有时间去争取他们对我个人的热情，这有损于我在

世上的意义和我的尊严。再说那样就得使用一些有损我身份的不体面的手段。亲昵不拘之类的做法我无法忍受，而一切精神平等、称兄道弟等等，全都是亲昵姿态嘛。尽管如此，我却希望别人的崇拜，即使是这些不纳税的孩子也好。凡是崇拜我都喜欢，哪怕来自我极不尊敬、极为鄙视的人。我这人太高傲了，所以在诸位可敬的先生们面前，此刻我难以隐瞒我的想法。

虚无主义者：我们可不是在英国呀！您扯些什么呀。简直是忘乎所以！

演说者（向虚无主义者投去蔑视的眼光，同时又故意装出抑制着讥讽的冷笑）：我继续讲。我以前希望自己有足够的智慧，可以不费气力地控制住我们的青少年。但他们的兴趣转向了另一边，跟着我的追随者走了。我立刻感到这种力气白花了，带来的利益并不多。控制小学生任何时候都能办到，哪怕是用树条抽打呢（太棒了！太棒了！）。我那位反对者看样子是不喜欢抽打的①（朝着虚无主义者瞪了一眼，那人也回敬了一眼），所以，我便来抓一抓社会本身。现在我就向尊敬的各位讲一讲这个方面。就算我用英国原则来影响了社会吧。可第一，到了一定的程度我就停止了。不言而喻，过去到现在，我的行动一直是非常精明的，所以开始人们都以为我永远不会在进步派的路上停下来。让人们随便想去吧。当时出现了各种社会问题。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问题，并以一定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理想。我们知道我们有可能做这件事，便利用了当

① 隐指“虚无主义者”的不妥协立场。“虚无主义者”，亦即平民知识分子阵营的代表人物，他们反对在中等学校中实行体罚。杜勃罗留波夫就曾为此发表过论争性文章。

时的形势。我们说的这些事，任何时候都是能说的，这一点我们清楚。不然就得消灭数学，消灭铁路，消灭工程师，消灭一切。这样，我在某种程度上讲解了某些共知的东西。至于他们更往深处钻，是谁的过错呢？这件事上我算什么罪魁祸首呢？我到一定的地方就止步了，其他的一概不知（太棒了!）。谁命令过我再往前走呢？与我有何相干？我们是旁观者。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追究他们，责备他们，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为了自我保护。这总是有利的，不管从哪方面说。而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喜欢有利可图的，在任何情况下首先看重的是实际的方面。（掌声惊人。左边的人们感到非常不安。）

演说者（津津有味地继续说）：刚才我讲到实际方面。实用主义是任何一个真正的大不列颠人的特性。不过我要骄傲地承认，在某一点上我是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有机会可能牺牲事情的实际方面。这就是我的自尊心。这方面我奉劝人们别激怒我。这里我可不管什么利害，我的手虽说随时准备与我的崇拜者友好相握，却也随时随地遇到不尊敬我人格的人。他就是入地漂洋，我也要抓回来痛打一顿，让他终生难忘。正是这种自尊心，才是我所有文学活动的根由。出于自尊心我创办了杂志。我想要出人头地，想要显示，想要征服人心。

我引进了英国原则。我坦白地给大家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对我们来说，英国原则好就好在这里面什么都包括了，有了这，有了那，还有别的，有了议会，有了报刊，有了陪审员等等。而这些东西，当时因为不习惯，显得特别有吸引力，人们是念念不忘，要从这里起步。我那时就明白人们会有什么结果。

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坐在自己座位上说）：不如说什么结果都不会有。

演说者：我完全赞同高贵的二等男爵的见解，非常感谢他的插话……当时我十分清楚会有什么结果，那么干吗不利用这个机会呢？再说啦，英国原则对我们这些不太能适应的人（我自然讲的是公众，我自己可是能适应的）来说，是非常难以捉摸的东西，非常有弹性的东西（它既带有自由的气息，又向贵族分子献媚），又是非常善于在极端情况下（即当被逼到墙角时）变成空洞的清谈，所以不能错过机会，失之交臂。最后还有，就是这些原则完全能够使社会摆脱人民的因素，民族的因素，对后者我如今是无可忍耐了（太棒了！好！yes，yes！[①]）。不止如此，我仇视它！我已经讲到一次，我甚至连人民性也不承认[②]。所以，当彼得堡的先进人士与我一起高喊那些维护人民承认他们独立性的人是保守顽固分子时，我感到很高兴。这些人承认人民的独立性，也就是希望让人民摆脱未来的第二次的精神上的农奴地位，摆脱将来外国书籍的影响，摆脱那些事先剥夺了人民独立自由而却企图造福人民的一切空谈家。所有这些小彼得大帝们，只能引起我捧腹大笑，不过我倒替他们高兴：让他们往前走吧！我心里想，让他们走吧，让他们走吧！(笑声和赞同的呼喊声)

虚无主义者：一派胡言！尽是废话！

演说者（扬扬得意。故意不睬虚无主义者）：不过我扯远了。我讲到英国原则自有它诱人之处。在莫斯科它们是广为人知的。尊敬的绅士们，你们之中有的人还会记得格里戈里公爵

① 英文：对！

② 大概是暗指当时唯美主义批评家斯·谢·杜德什金等人否定普希金创作中的人民性。

吧？就是一位诗人在自己的喜剧里[1]通过列佩季洛夫与那个胡里胡涂的恰茨基对话中（不过恰茨基倒是个优秀的真正的绅士）提到的：

首先，格里戈里公爵总是
同英国人一起，整个地英国派头，
同样地咬着牙讲话，
同样地清一色短发。

我认得这位令人难忘的优秀的格里戈里公爵。他还从我这借走了一本书，忘记还我，不过我早已原谅了他。他也主张英国原则。那些比他走得更前的人，后来走得太远了[2]（笑声，“太棒了！”“太棒了！”）。格里戈里公爵吓坏了，就回到自己的乡下。我到后来在乡间看到了他，在他乡下那幢倾倒的木楼里。他破了产，穿件绗过的棉袍，抑郁寡欢，无精打采，常在马厩里惩治自己的仆人先卡，仆人的晚礼服肘上穿了洞。那时，什么英国原则在他身上几乎毫无痕迹了。整个英国派头也永远消失了。人们在这之后居然责备我腐蚀了社会。我本来就很清楚，在我们莫斯科，英国派头一接触到实际，便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我自己对待事情却是十分认真的……的确我是一贯尊敬大不列颠的（太棒了！太棒了！yes，yes!）。我刚才说的意思，只是不可以因此就责难说腐蚀了社会。既然英国派头雅而无碍，为什么不可以拿来自娱一番呢？当然，社会

① 指亚·谢·格里鲍耶托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恰茨基是剧中主人公。
② 暗指十二月党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要求的是认真的革新。不过开初阶段，英国热也能有助益。我就把这英国热利用起来了。英国热还具有一个可贵的特性（请看，它的可贵特性何其多也!），那已是现成的、早已定型、完成了的东西。① 你可以讲它，宣传它，同时丝毫不必从自己的信念上让步（因为已经无可让步，无可改变，一切在我们之前已然做完，我们不过是拿着现成的东西炫耀显示一通罢了。总之，这已是现成的办妥的事啦）。而您这样立时能获得两个好处。第一得到信念坚定不移的好名声，因为没做丝毫的让步；第二可以没完没了地去宣传，而实际上……

虚无主义者（从左侧发话）：还在原地踏步!

演说者：正是在原地踏步！我完全同意这位绅士的见解。

虚无主义者：进两步退三步，那才更好呢!②

演说者：（有些气恼）：我双倍赞同尊敬的绅士，谢谢这位爱经常打断我发言的人插话!

一位可敬的富贵人士（从右侧发话）：进两步退三步，这恰好是退一步。

演说者（不耐烦，稍带讥讽）：我完全赞同高贵的侯爵的说法，感到他的推断十分机智。我要继续说……

主席（打断演说者）：因为快要休息了，我要说一点意见。高贵的勋爵，我可敬的朋友，大概能察觉到他多少是在中伤自己。刚才他喝了几杯酒，于是摆出来上流社会的派头。他显然

① 这段话和卡特科夫同虚无主义者的对话，主要是以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巴维尔和巴扎罗夫的那一场对话为基础，加以夸大和作讽刺性的模拟。巴维尔也是英国派头的绅士。

② 显然指当时的民主派刊物《火星》周刊（1862 年 10 月 19 日，第 40 期）扉页上的漫画。漫画上一个人物说到“进三步退两步”。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时稍作变动，以此讽刺自由主义贵族刊物无耻地转向保守立场。

在向你们炫耀自己，结果把自己说得比实际要差许多。我希望可敬的朋友不因我这话而生气。我举杯祝他身体健康，并很荣幸地向大家宣布：这位高尚的勋爵在创办刊物时立志寻找真正的效益，并已多次以各种有益活动表现了自己（感动得啜泣起来）。

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在自己座位上发话）：我想要就有益的社会活动问题，做一个比较。我想，我们在童年时，大家都喜欢同小猫玩耍。要用根线拴在纸片上拽它走，小猫就会跑来捉它，然后气急败坏，玩得上瘾就真把纸片当成老鼠了，它又捉又咬，还用爪子撕它。在社会利益这个问题上，我们也正是这样。我们大多是利己主义者（这很好），是好人，有自尊心。我不只是说我们自己，我指的整个世界，所有人无一例外，甚至包括我们最先进的进步人士。事实上我们中间谁最能热心于社会利益呢？要我说，我甚至坚信世上没有任何人会关心社会的利益，从来也没有过。这一切全是欺骗和吹牛。不过吹牛也很好，很需要，这是个自然的规律。尽管如此，一有机会，我们还真会热心表演一通，就像小猫那样。每次我们发起做什么事业的时候，都向公众保证，我们追求公众的利益，甚至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由于我们总是有竞争对手在，有时就气恼之极而玩得忘乎所以，最后连自己也相信是在服务于社会利益，只是为此操劳，似乎社会利益成了我们一切愿望的顶峰。我说的大概不错吧？现在我要诉求在座所有尊敬的先生们的良心，问大家一句：世上可还有哪一个绅士不是这样干的吗？不过我先得声明，如果谁都不公开说出同意我的看法，那我反而更高兴。这样就会雅观得多。而雅观体面的形式，才是最重要的呀！要知道，我们大家全是这种败类（我是指所有的人，可说是整个人类），要是没有这种救命的形式，那我们马上会相互

扭打起来，相互咬了起来。所以一个社会要是寻到了这些形式，利用它，善于维护它，这个社会才会是幸福的。我赞成有形式。糟糕的是我们俄国人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至于说我对社会利益的见解，那我是完全坚信不移的。

（人们高声喊叫赞同。但进步人士跳起来强烈抗议。许多人叫嚷说：甘愿马上为自己的信念去受火刑。右侧有人回答他们说："火刑算得了什么？赴火刑也是为的自尊心，全是出于自尊心！"长时间喧嚷之后，主席努力渐渐恢复了表面的平静。）

演说者：大人们，先生们，我庄严宣布：完全同意可敬的二等男爵关于纸片和小猫的聪明见解。的确，公众利益向来是以我们自己的利益为基础的。这完全符合个人的原则，亦即西方的原则，当然也便是英国的原则，它同群居原则、村社原则（这个我永远也无法理解）是相对立的。讲到纯粹个人的利益，我现在想起了我的论敌加给我的一个毫无意义的责难。他们说我在对一位教授发泄愤怒和讥刺时，努力要破坏他在讲堂上的威信，这样就使大学生们不再尊敬教授。但这是胡说，完全是胡说。难道我追求的目的，就是要根除大学生对教授的尊重，对一切教诲者威信的尊重吗？我只不过太迷醉于自尊，也许是令人讨厌的眼光短浅的自尊（我的高傲使得我不能隐瞒这一点不讲）。我要把怒气发泄在教授身上，因之面对讲堂我也没能打住不讲，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什么都不在乎的。他们说我连青年人也不肯怜惜。当有人侮辱到我自己时，青年人对我又算得了什么。谁让他们自己赶上了呢（yes，yes，太棒了！太棒了！）？什么腐蚀呀，蛊惑呀，唆使呀！这多可笑又让人恶心！此外，你们已经知道我对年轻人的看法，我认为他们不须我们的蛊惑和腐蚀就全看到，全明白得一清二楚。另外，最后

我再问一句：难道我曾想过蛊惑他们吗？我当时无非要制伏教授，也果然制伏了他（又一次鼓掌）！

左侧有人说：这实在让人受不了！尽是讲自己！谈正经的吧！

演说者：提到蛊惑，顺便说一句。一个多月前尊贵的安德留沙侯爵刊出了出版新报《温和的低音》的启事[①]。照这么说，这位尊敬的勋爵也在蛊惑社会了？请看启事是怎么说的：

“我们相信，好的书报会在社会上促进公民精神的成长。但同时我们也坚信，如果社会本身对各种社会事业漠不关心的话，再好的文化设施也是一纸空文。社会本身的积极主动是必不可少的。

“有鉴于此，我们将从自己这方面不断地顽强地激起社会的主动精神，发挥在法律为其规定的那些问题上”，如此等等。

听见了吧？他想要、而且是不断地顽强地想要蛊惑社会起来行动！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现在，是如今，可如今我们简直不知怎么躲开这些活动家和活动的激情。而他还要再加以激励呢(笑声)！就算是可敬的侯爵写这些话时是出于天真吧……

右侧发话：等等！尊贵的勋爵可能忘记了，可敬的侯爵大人讲的是法律允许的活动。所以要说蛊惑也是另一种蛊惑。

演说者：我什么也没忘记。但还是无法理解这个启事。

尼古拉·菲利波维奇：我完全可以理解他的意思。侯爵讲的当然是文官和武官，想要唤起他们从事更好的活动，也就是忠诚勤奋地服务，诸如此类吧。这段话是为充实启事加上去的，否则就无法解释了。

---

① 影射安·亚·克拉耶夫斯基出版《呼声报》。克拉耶夫斯基的名字是安德烈，而安德留沙是安德烈的小名。

演说者：总而言之，我是想指出，“蛊惑”一词是很容易被滥用的。这个就不说了吧。我……

左侧数人愤怒发话：您还没完吗？总是我长我短的，实在叫人受不了！讲问题嘛！

演说者：诸位绅士们，我认为我讲的正是问题的本质所在。我在为自己辩护，或者最好说我在练习分析一切可用于自我辩护的方法。这可称为一种游戏……既然这给我带来乐趣，我想在座诸君也一定高兴听我讲的（yes，yes!）。我现在正想再研究一种自卫方法。我的笨拙的论敌，如今拿我的武器反过来对付我，想以用心不良的罪名打垮我。既然说到这里，那我在这方面的辩护手段是很高明的：朋友们，你们证明我如今又是这样又是那样，说我存心不良，说我蛊惑……我的天哪，过去有过，现在可没有了呀！现在我一片好心，不再蛊惑啦。我改了主意，我回头了（其实我从来没走回头路，一直站在原地，同现在一样。谁让他们自己开始时把我抬得那么高呢！不过这也只是我辩解的一种方法）。最终我带回了丰硕甜美的果实：

塔夫尔带来一篮甜蜜的果子。①

最后我……

尼古拉·菲利波维奇：我也带来了果子。凭这个甜果，我能指望一顿午餐了。②

演说者：有人叫嚷，为什么我没宣布改变了信念？问题很

① 引自俄国诗人格·罗·杰尔查文的诗。
② 影射尼·菲·帕夫洛夫要求政府更多地给他资助。

可笑。如果您就这样已经发现我改变了信念，又有何必要宣布一番呢？不过，我到底改变了什么？在什么时候呢？我再次重申，我依然是过去的我，同开始时一样。让我们再一次假设是我变了。有人叫喊说我在打击比我走得更远的人。可是，第一，要是我不如此，怎能表现出我有了新的信念呢？第二，我追究他们，正是因为他们走得比我远。

众人：太棒了，太棒了！真聪明！好！很好！

演说者：我一直是讲这些信念，各位阁下。说实在的，有时这弄得我要发疯：谁都有信念，谁都讲什么时尚，都热衷什么信念。可这一切全是假的，全是胡说八道！

左侧人声：不是胡说八道，不是胡说八道！

虚无主义者（从左面发话）：受不了，这里没法再待下去。我要走了。

演说者：还有，我打算给尊贵的先生们再说件有趣的事。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位侯爵，伙同一个十分可敬的贵族，还刊出了另一份启事。他们两人一起过去和现在都在办一个相当古老的大杂志《老妪纪事》①。在关于这份杂志明年出版的启事中，有这么一段，现在一字不差地引述如下。这都是同信念有关的。

"社会问题，对外政策，文学与历史，这便是所有刊物通常关切的主要对象，无论是月刊还是日刊。如果说报纸主要关注的是每日的问题和瞬间的新闻，那么杂志据我们深刻的信念，主要应该是研究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是比较详细而从容的探讨。不然的话，既有日报很早就掌握了事件和事实，杂志还能追求别的什么目标吗？"

---

① 影射安·亚·克拉耶夫斯基的《祖国纪事》。

这难道也算信念吗？两个人想了整整一年，才想出这条惊人的新闻：报纸只讲当天的新闻，杂志则是讲一个月的。还说什么这是他们深刻的信念（笑声）。这是追求信念的一种时尚，是某种嗜好……

尼古拉·菲利波维奇：我看很简单，这是讽刺。两位贵族想讽刺地模拟现代的启事。

可敬的贵族（在右侧发话）：肯定是这样……那个尊贵的侯爵有愿望的时候……是很机智的，能出语惊人。

演说者：完全同意这位可敬贵族的见解。既然讲到例子，我现在也举个精彩的例子来说明我们论敌的笨拙。在杂志界有一位绅士……

左侧发话：您在滥用我们的耐心！快讲正题，快讲正题！

演说者（懊恼地）：绅士们，我坚信我正处于问题的中心，所以要继续说下去……

右侧发话：yes，yes，这一切太有意思了！

演说者：我知道这很逗乐。我想讲的这件事，同我自己的处境有几分相似（太棒了！太棒了！）。接着说，杂志界有位绅士，其实是非常可敬的先生，办了个杂志，刊物倾向却相当悲观。他为人很机灵，所以就利用清白可靠这一点。他的敌人发现了他曾与一个名叫卢尔丽娅的有染，当年他给这个乳房发达的女子写过小诗① ……

某人说：啊，这是那个……叫什么来着？是个爱折腾的人。

演说者：完全不是爱折腾的人。诸位先生想错了，他完全

① 影射《家庭恳谈》的创办人维·伊·阿斯科琴斯基（1813—1879），他年轻时曾发表过诗作，遭人诟病。60—70年代鼓吹蒙昧主义，遭谴责和讥笑。

不是好折腾的人，也不是胆小鬼。他正是用清白可靠来给自己辩解。我想讲的是，他的敌人恰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支点。他们发现卢尔丽娅后欣喜万分。“好哇！你大讲品行端正，自己却有过一个胸脯丰满的卢尔丽娅。”倾向悲观的报刊的发行人会回答说：“有过又怎么样？从前有过她，现在可没有了呀！这么一件事难道能动摇我们杂志的方向不成？再怎么说，这是过去的事啦。这样更显出我得救了，从前陷进了泥坑，如今醒悟了，焕发了精神。这样一来，我的转变的影响更大，过错也就更可原谅了。你们如今干吗拿这个卢尔丽娅来指摘我呢？啊，我的罪孽呀！啊，魔鬼的深渊呀！就算我迷恋卢尔丽娅的丰满胸脯同她鬼混过，可现在没有了呀，难道你们看不到我因得救而增添光彩了吗？……

右侧一人说：是呀，的确……

山羊般衰老的声音（是个镶着假牙的衰老绅士）：还……还是个丰满的胸脯？

演说者：在这点上，很遗憾，我不能给尊敬的子爵提供最精确的情况。不过，诸位阁下，各位绅士，这个故事不是有点像我的情形吗？我也可以这样来为自己辩解。你们拿从前的事来责备我，我要对大家说，过去的事早已过去，如今我不仅带来了果实，而且如你们所见，我还花力气写了《关于尘雾》①等文章。在编辑部的公文包里……

虚无主义者（由左侧发话）：不过是文件柜里，哪有什么编辑部的皮包！……

① 《俄国导报》刊出的一篇编写的文章，讲某些自然现象的起源。此类文字与该刊的声明宗旨不符，代表着该刊的脱离文坛实际、学究气十足等弊端。

演说者（微带挖苦）：我觉得尊敬的先生还不习惯议会式的表达方式。

虚无主义者：要仅仅是表达方法，那倒谢天谢地了。不是什么方式问题！依我看在议会里也得敢讲真话。

演说者：讲真话？那二十五戈比的硬币呢？

虚无主义者（狂乱地）：听着，如果您再提这讨厌的硬币一个字，我就……就……

演说者：就怎么样？

虚无主义者：我就……不知道那时会干出什么事来！

尼古拉·菲利波维奇（刻薄地）：尊敬的先生虽说不喜欢议会形式，不过看来还是遵守它们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虚无主义者：胡说！我没有遵守什么……我要求，坚决地要求演说人立刻就这讨厌的硬币问题做出解释！这硬币与我毫不相干！与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相干！……我的整个生活都是有目共睹……我要求，我坚持……我向主席提出……

（掀起一阵非同寻常的喧嚷声，反对派全体同时站起来，这次可不肯善罢甘休。主席在他们的要求下，被迫表面上提出了丢失硬币的问题。演说者开始拿议会形式搪塞。但反对派这回可不接受这议会形式了。演说者一口咬定，他的话不含侮辱的意思。反对者们喊叫："瞎说！这全是形式，我们要的是真实情况，要实情！"最后演说者承认，他自己也不清楚是指什么说的，硬币应是表某种寓意，字面的意思是那些起哄的人想出来的。这下子进步人士满意了。受了侮辱但却感到满意的虚无主义者高声说："这是一场梦！这叫人无法忍受！快躲开这个野兽待的地方吧！"说着就愤愤地走了出去。人们都激动起来。人们显然在互相争吵。演说者几乎觉得自己受了侮辱。）

演说者（挖苦地）：这一切全是由信念引起的，这就是很

好的例子！……方才我们的绅士心情还那么好，讲话自由轻松，而结果如何呢？……

左边人们高喊：不，不，您推托不了责任。您攻击信念，您居然不承认信念！

演说者：相反，我要求的正是尊重信念。如果说我改变了信念，那么您可以不尊重我的新信念，却不可把改变信念的自由看成是罪过。

左边人们高喊：自由是应该有的。不过难道任何的信念都是值得尊敬的吗？而且，您是自由地改变信念吗？

演说者：绅士们，我甚至弄不懂你们要想怎样。我完全不予理睬。说到底，我只信一条：我自己好了就行；要是让别人也好，那得有个条件，就是不能妨碍我。

右边人们高喊：Yes，Yes！太棒了，太棒了！这是真正英国人的感情。

左边人们高喊：胡说！胡说！不是这样……

尼古拉·菲利波维奇：绅士们，我相信，我完全相信，你们宣传的也是这个，有何不可呢！

左边人们高喊：胡说！只有真诚的信念才是可敬的！走吧，走吧，我们可听够了这一套。assez causé.①

（一片从未有过的喧闹声。主席被迫中断了会议。绅士和贵族们呼叫一通之后，终于纷纷抓起手杖……）

尼古拉·菲利波维奇：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为了信念大打出手！糟糕透了！天哪，快拔腿跑吧。

莫斯科呀，俄罗斯心爱的女儿，

---

① 法文：够了。

到哪儿去找比得上你的地方！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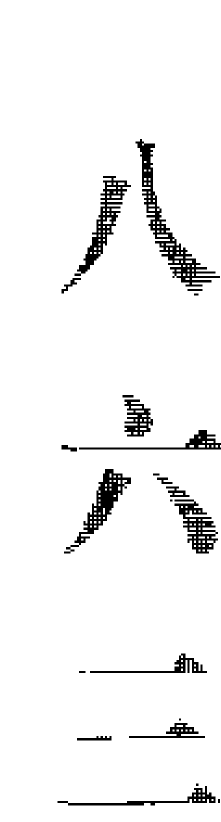
（他一边引用这诗句，一边悄悄穿过扭打的人群，诡笑着走出去。）

演说者（在讲台上惊慌地看看乱糟糟的一团）：没达到能理解形式的水平！不成熟呀！这样太令人恶心了。本来可以好好地美美地聊一聊，哪怕通宵达旦也行（痛苦地走下讲台）！

接下去是一个可怕的荒唐场面，只有在睡梦中才可见到。这让我想起，我也许真在做梦。那些手杖、主席、议会形式、尊贵的侯爵、卢尔丽娅、大人阁下们等等，都变得苍白，面孔不断变换，模糊，直到自己消失不见。我使劲挣扎一下，就完全醒过来。这时已是午夜一点，蜡烛将尽，桌上是开了头的文章和第102期《现代言论》，上面印着一个问题：谁的过错？

我不可能是看《现代言论》的文章时睡着了，因为这文章十分有趣。我是靠催眠才入睡的。然而如果不是《现代言论》登了这篇文章，我是不会做这样的梦的；即或做了这个梦，大概也不会把它记录下来。

① 引自伊·伊·德米特里耶夫的《莫斯科的解放》一诗。



一八六三

对种种牟利问题和非牟利问题[①] 必要的文学解释

最近一段时间里，文坛上出现了许多声音和见解，针对我们的杂志而来。去年9月关于63年出版《时代》的启事发表后，立刻响起了一片特别一致的攻讦之声。有些攻击纯粹是出于竞争，考虑的不过是征订。这是商业行为。比如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这位俄国文学中的坦贝利克[②]，通过自己新的《呼声报》[③]（他估价自己的《呼声报》的所得要远远超过坦贝利克的专场），在报刊征订时期向我们大举进攻。订阅期相互攻讦，

---

① 牟利和非牟利问题暗指A. 列尼弗采夫（真名A. B. 艾瓦里德）在《没有说尽的话》一文（《祖国纪事》，1862年，第10期）里所讲的“牟利的吹口哨者”。“口哨”是《现代人》杂志上一讽刺专栏的标题。设立并主持这一专栏的是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

② 坦贝利克（1820—1889），意大利戏剧男高音歌唱家，1862—1863年至彼得堡演出。

③ 安·亚·克拉耶夫斯基是《祖国纪事》的主编（1839—1868）。1863—1884年间，他又在彼得堡创办《呼声报》。这里说的他攻击《时代》的征订启事的文章，刊于《祖国纪事》1862年第10期上。

是老杂志的老习惯，而丢弃老习惯，众所周知是不好的……不过对这些攻击，我们今天不想作答。现在我们考虑的是另一些攻击我们的人，就是对我们启事中一个词儿特别感到恼火的人。他们怒火填膺已经有四个月了，我们却至今完全没有回应。在刊物开始新的一年时，我们觉得有必要从年初就对所有愤怒的先生们说几句话①。这倒不是我们对他们为自己辩解，而是总结点教训。再说有机会解释几句也并不坏……

我们刚刚提到的词儿，他们至今不能忘怀。这个词儿令他们厌恶不安，如坐针毡。这就是在启事中我们讲的："我们憎恨夸夸其谈的饶舌家，牟利的吹口哨起哄者"。看来他们把这话揽到了自己头上。其实，我们讲了什么坏话呢？是因为我们说憎恨"牟利的吹口哨起哄者"吗（不是所有的吹口哨起哄者，而只是那要捞油水的）？可有谁喜欢这种人呢？有什么比这种行为更卑鄙呢？当一个心安理得、饱食终日、怡然自得的目光短浅的人，常常也是极俗的低能者，臆想以进步为时髦，从中捞取好处，于是又是揭露，又是吹口哨，又是为真理而捶胸顿足，实则全是看行市、赶时髦，遇到这种情况，难道能不气愤吗？我们认为，这种行为对共同的事业是极端有害的，有施展机会时就尤其厉害。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才尖锐地指出了这种行为，并且觉得我们的思想表达得很成功，很贴切。我们关注的正是整个进步事业和各种良好创举的声誉与成功。

① 在《现代人》杂志1862年4月号上，革命民主派马·亚·安东诺维奇撰文说，《时代》既无坚定的纲领，也无明确的方向，并质问"你们有怎样的根基呢"？与此同时，一个批评家列尼弗采夫在《祖国纪事》上（1862年，第10～11期）发表文章批评《时代》说"根基是什么，你们并不清楚……"又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不知何故宣称自己是斯拉夫派"。

实话实说吧，我们讲“牟利的吹口哨起哄者”时并没有觉得，现在也不想认为，在我们中间存在着绝对纯粹的“牟利的吹口哨者”，也就是其中最糟糕那种类型。不过，这种心态和倾向的某些迹象，当时我们就有所发现。虽说是初露端倪，却确已存在，既然存在有迹象……我们便讲了几句揭露和警告的话，此外也希望表明：我们与这一倾向过去、现在、将来都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我们那时便预见到了这一牟利倾向的进一步发展。结果如何呢？突然间敌人铺天盖地向我们袭来。他们中的每一个，甚至根本不是“牟利的吹口哨者”，都把我们的话当成是针对自己说的。我们认为，正是牟利者诱使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非牟利者来围攻我们，说我们破坏共同的大业。一般说来，我们这里的非牟利者，虽然有时是极好的人，但大多是轻率急躁的人，是轻信的人。最极端的牟利的吹口哨者对他们一哄骗，他们就会信以为真，就会吸收他作办刊物的同事。甚至还常有这种情况，不管办刊物的编辑是什么样的人，哪怕他们明知这是个牟利的吹口哨者也成，也无所谓，只要能跟着他们的声音来吹口哨就行。这虽也是种理论，是种原则，但实际上是极其错误的。对任何好事来说，做事的应该是好人才行。不然的话，他马上会发出不对头的声音，弄坏了好事，由于他的参与而在公众中败坏事业名声。等情况有变化，行情上涨，所有这些牟利先生就会抢先把自己的“天赋”拿到旧货市场，谁出高价卖给谁，也就投给别的编辑部去。他们称这是高尚地改变自己信念。这样的作者在哪里也不会得到很多油水，但我们想正是他们通过自己母鸡般叫声诱使所有的人，把我们关于牟利吹口哨的说法揽到自己身上。由于我们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歇斯底里地易受委屈，都小心翼翼怕受责备，就像名声不可受

任何怀疑的凯撒妻子[①]，事情也就平息了下来。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这里高尚人士是绝大多数，但又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他们之中许多人都是平庸之辈。于是这些平庸之辈便一个接着一个，全都向我们发起攻击。其实我们并不想把这些受到我们"侮辱与损害"的人叫做"牟利的吹口哨起哄者"。攻击者中甚至有一些最最无可指摘的人士，他们把漂亮的词句当成了真事；也有廉价的揭露者和蹩脚的诗人，有带偏颇的现代幽默诗的作者，有准备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家，思想和科学上的迫害者；有小写的彼得大帝，他们实际上是些行政官僚[②]，连高兴时也是冷冰冰的官腔（有的却不会高兴），但却天真地自认为是进步的代表，而绝不怀疑自己其实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对这种愤怒并不感到奇怪。所有这些十分高尚但不很深刻的先生，其中大部分人攻击的东西，恰是他们自己所信仰的；他们很盲目，认不出这是自己所信仰的东西不过采取了另一种形式；他们鼓吹进步，但常常是在维护极其野蛮的东西；而当他们竭尽全力保护文明之时，却不自觉地在推行德国方式和种种戒律。俄罗斯精神在这里是踪影全无的。俄罗斯的辨别力，连做梦也梦不到。例如，爱国主义在这里会被毫不客气地赶走，因为爱国主义是一种排他性，因此要导致顽固落后。艺术是无用的。最优秀的艺术作品是《伊利亚特》，但《伊利亚特》里面是各种各样的天神和迷信，而天神和迷信要导致顽固落后。不讲笑

① 凯撒（公元前102/103—前44），罗马的终身独裁者、统帅。据当时历史学家普卢塔克等说：凯撒深信自己的妻子的贞操，虽则她已经与人有染却说："凯撒的妻子是不容怀疑的。"莎士比亚在自己剧作中也曾让凯撒说这句话。

② 影射谢德林，因他曾担任过各种公职，直至梁赞与特维里的副省长。

话了！尽管并没有提到《伊利亚特》，但所有这些艺术家对艺术的理解，恰可以归到上述关于《伊利亚特》的公式里面去。切尔沃诺罗斯人① 是顽固保守的，因为他们敌视异族的信仰。在我们这个容忍信仰和进步的时代狂热地坚持自己的信仰，用不着对他们讲，对切尔沃诺罗斯人来说一切全集中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所有其他的民族问题历史上数百年间都归结到这一问题上来，这个问题在人民历经四百年苦难之后② 变成了一个模式、一个旗帜，这一问题意味着要解决一切屈辱、一切其他的民族误会，体现着民族的独立。所有这些都是历史上发生和形成的，切尔沃诺罗斯人的命运根本不同于我们的命运。讲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全无必要，反正是顽固落后！没有别的，就是顽固落后，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作为进步和信仰自由的时代，不可能……如何如何，因此便……如何如何。

是的，这些思想家当中许多人早就不思考任何东西了。疑问、痛苦，他们好像从来没有过，可却有着非常强烈的自尊心，发展成了妇女般歇斯底里地容易恼火。自尊心就是他们基本的信念，而为了自尊心他们中间许许多多人准备坚决牺牲一切，也就是牺牲任何的信念。他们的信念惊人地有限而且稔熟，他们因之也不会产生什么疑问……在他们看来，生活是很渺小、空洞的东西，不值得去深思。那些真正永恒的问题，人类为之承担了痛苦而且今后还将长期承担痛苦的问题，在他们那里只能引起讥笑和对苦难者的蔑视。正是这些苦难者过去和现在为解决永恒问题受尽苦难，可在他们眼里却是顽固落后分

① 乌克兰西部加里西亚的居民。16—19 世纪被外国称为“红罗斯”人。

② 指乌克兰自 14 世纪起受波兰封建主的压迫。

子。在他们那里，一切都已解决，而且是突然之间。“我这是突然之间”，赫列斯塔科夫[1] 这么说过。比如提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下个星期使全人类得到幸福。对他们来说，这问题解决起来也易如反掌，就像擤个鼻涕一样。对于外国书他们相信到了狂热的程度。实则他们中间许多人连书都不读，只是从读过的人那里了解些皮毛罢了。偶尔听说了约翰·罗塞尔勋爵，听说了科布登和粮食法[2]，听说这在当时是自由的主张，于是便以为在今天这也是自由主张，谁也不许怀疑。人们就敢这样弄出自己的见解来。这是顽固落后呀，书里正是这么写的！就这样，所有这些迫害者一下子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十分恼火，因为我们不想回答他们，而只是偶尔揭露他们一下，目的在于用个恰当的例子暴露出他们行动的性质。不仅如此，为给我们造成更大伤害，他们看来想方设法歪曲我们讲的“牟利的吹口哨起哄者”这话的性质。他们听信真正的“牟利的吹口哨者”的话，把这说法揽到自己头上，而大为恼怒，现在便极想展示和证实：我们攻击他们，便是攻击进步，便是维护黑暗势力，他们要借此直接把自己打扮成进步的代表。正是针对这一点，我们现在想做出回答。“牟利的吹口哨者”问题，我们马上便可结束。我们觉得已经做了足够的解释。先生们，支持这种吹口哨起哄者是很可恶的事。你们是知道的，这种人确实存在，至少有人很想如此。诸位先生，或者说你们中的大多数，

---

① 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人公，一个空虚、浅薄而又夸夸其谈的人。

② 约翰·罗塞尔（1795—1878），英国政治家，辉格党领袖，两次任首相。理查·科布登（1804—1865），英国政治家。两人均主张取消“粮食法”，即取消农产品的高额进口税，以利资本主义的发展。

不要把这个称呼揽到自己头上。再说牟利之徒最近在我们报刊界，表现得已十分鲜明，从各方面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表明了看法，我们相信，你们多数不是为牟利才吹口哨的。你们是出于诚实，是要成为一种代表。我们就想谈一谈做代表的事。请问先生们，你们是什么代表呢？你们与进步，或者说你们与年轻一代，有什么共同点呢？请说说看！恰是这一点，使我们每次看到你们都禁不住从内心深处发出大笑。你们喜爱的习惯，是以公正的思想做掩护，以作家的文学声誉做掩护，也就是借助于受到特别崇敬的权威。"敢于攻击我们，是吗？这就是攻击进步。说我们是牟利的吹口哨者，是吗？这就是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也是牟利的吹口哨者。"① 可是先生们，我们根本没把你们看做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至于你们用以做掩护的公正的思想，应该承认这是我们文学中最常用的一种手法。人们都罩上一层多多少少有点公正的思想，要别人相信他们是根据信念行事的。有些确实是按照信念行事的，这是他们的荣誉和光彩。另一些人则是要滑头，装做有思想，而思想背后原来是"打官腔的启事"。我们假设你们根本不是要滑头，而认为自己是献身者，是代表，是启蒙者（是不是这样，请你们中许多人扪心自问吧）。请你们说实话，当你们喊叫"我们主张进步，我们在工厂工作，你们却只是碍事"等等的时候，难道能认真地相信你们吗？请注意，正是你们在妨碍一切！我们恰恰觉得你们无能而屡屡坏事。我们如此向你们直说，希望你们原谅。这么做只是因为用别的办法根本

① 杜勃罗留波夫是《现代人》上"口哨"专栏的创办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是《现代人》政治栏的负责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此文发表时（1863年1月），杜勃罗留波夫已逝世（1861），车尔尼雪夫斯基已被捕入狱（1862年7月）。

无法与你们交谈。这一点你们自己清楚。我们讲这些其实也不是为了你们，而是为了公众。你们不能容忍议论，有人打断你们、不同意你们时，你们就生气，歇斯底里地感到委屈。只要有人要求你们有鉴别力，要求有俄罗斯精神，有人道主义，有良心，有逻辑，你们便狂怒起来。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还要什么逻辑！“我们的时代，是干进步的事业，而不是讲逻辑。去你们的逻辑吧，assez causé！……”——你们当中有人读了会这么说或这么想。对此我们打算向你们做出明确的回答。

请你们不要把我们讲到逻辑的话，作字面上的理解。走向进步的任何行动，都不排斥逻辑。我们很清楚，你们谁也不想直接这么说：“我们的时代，是干进步的事业而绝不是讲逻辑……”正好相反，最狂热的进步派最大的期望，就是有逻辑性；这正是他们的狂热达到高潮的时候，真的已经顾不上逻辑性了。我们讲这个话，只是想表现出进步派的盛怒情形。主要是青年进步派，他们愤恨那些应该干事时却议论不休犹豫不决的人。这种愤怒，这种对抗，在年轻的和成熟的两代人中间，过去和将来总是存在的；在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民族中也总是存在的。不仅如此，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进步派中急不可待的那部分人，事实上是不会变得有耐心的。他们连脉搏也跳得快些，看待事情同样匆匆忙忙。他们满足于泛泛的议论，因为不知道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在以后的生活中学习。对他们来说，只要思想是豁达的，并能促进发展，还需要什么别的呢！如果缺了这些没有耐性的先进人士，世界也无法支撑了。不仅如此，假如所有的人全是耽于议论、犹豫不决、谨小慎微的人，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了。社会上有先进的一部分人，是合乎规律的，就像需要有谨小慎微者一样。不过，自命进步派代表、先进思想代表的人们，随时应该能够回答一些问题，至

少是对自己，对自己的良心。他们应该知道人们在向哪里走，应该能指路、能引导，而最主要的是，指引方向应该本着良心。现在我们再重复一下问题，我们能否承认你们是先进思想的代表和引路人呢？我们敢打赌，你们一定在想我们此刻要责备你们热情太盛，匆忙大意而不够谨慎。不要这么想吧！我们认为你们没有能力，没有本领，恰恰是因为你们死气沉沉，十分冷漠，你们缺乏热情，缺乏精神；信念不是自己的，是借来的，即或有点自己的信念，却轻举妄动，说明太缺乏责任心；你们没有公民精神，不然便会知道朝哪里指引，可你们在这方面一错再错；你们迈不出步子，却要别人相信你们在前进；你们经常地把自尊心与利益和共同的事业联系起来；最后，如果从整体上看，那你们对这一切都起着妨碍作用。而主要的危害，在于你们在社会的耳目前面，把最好的思想和创举歪曲得庸俗不堪。你们把伟大的思想平庸地在大街上拖着走，本该是以此激起热情，却招致公众十分厌烦；而此刻使公众感到厌烦，是极大的罪过。正是对你们的这种平庸无能，我们产生了怨恨；每当你们把事弄坏，我们都非常痛心。一年前你们输给了皮谢姆斯基先生，那是在尼基塔·别兹雷洛夫的小品文问题上①，我们十分痛惜。实际上，你们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情况是不应该输的。你们攻击了自己人却没意识到，现在你们也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尽管社会对你们的看法早就产生了动摇，

① 当时保守的作家亚·费·皮谢姆斯基化名尼·别兹雷洛夫，在《读者文库》杂志上发表小品文，遭到民主主义作家格·扎·叶利谢耶夫的激烈批评。皮谢姆斯基则回答说：“不懂得开玩笑纯是先天的缺憾，如同不会品尝食物的美味。”他以此否认了自己的小品具有反对民主的政治含义。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些作品并非没有政治含义，只是同其作斗争时宜采用同样的讽刺和幽默手法，而不应进行政治性的揭露。

但不断地把不该庸俗化的东西给变得庸俗不堪，终归是会带来很大害处的。而你们正是这么干的，时时刻刻在这么干。社会若抛弃你们（它的确在抛弃你们），绝非因为要抛弃你们为之服务（似乎如此）的那个思想，而是因为你们本人太差劲了。请相信我们的话，人们早就看到，早就明白，列夫·坎别克以及涅瓦大街上的椅子①，绝不能概括最近我国面临的所有任务、问题、疑虑。要认真地说，你们此外也就一无所有。你们天真地以为，实质就在列夫·坎别克身上。我坦白地对你们说，当我突然听到列夫·坎别克离开文坛时，不由得大吃一惊。我痛苦地想，我们那些蹩脚诗人，小品文作家，所有自诩为进步领袖的人，可去做什么呢？要知道《世纪》和列夫·坎别克曾养活了许许多多我们的进步派和他们的孩子，这已有很多年了……可是一年半前（曾几何时！）《世纪》消逝了，是被一些掘墓的编辑们给埋葬的。如今第二个又要消逝：坎别克。“椅子撤掉了，老天啊！在这之后你们还留下了什么东西能推动进步，有助于我们成功呢？”我痛心地感叹着。“只剩下了永远年轻永远站得住的阿斯科琴斯基，再有就是印防己② 了。此外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先生们，可别以为我们是装腔作势或者讥讽取笑。我们直截了当地说，除了列夫·坎别克可用作印防己之外，你们什么都没有，过去、现在、将来一概都没有！

请别对我们说，你们也写过市长、县警察局长、吹管号的

① 列夫·坎别克，新闻工作者，《彼得堡导报》主编。在1861—1862年间他曾揭露一些细小的、无关紧要的舞弊勾当。当时有诗人对此加以讥笑，诗名为《关于涅瓦大街上的椅子之歌》。

② 印防己（кукельван）——热带树，其果实有杀虫作用。文中喻指浅薄、敷衍。

海军少尉，写过索罗金，甚至涉及到妇女解放。先生们，我们敢说，不论你们讲到什么，全都是列夫·坎别克和印防己那一套。请你们明白这一点。

写一写印防己，我们说是可以的。写一写像法杰伊·布尔加林一样在莫斯科活动的卡特科夫先生[①]，也是可以而且应该的。甚至写一写列夫·坎别克，有时也还可以原谅。即或写出某一市长在某省某县，某年某月欺负了某女人，这全是允许的也是必要的。可要知道，讲话应出于自己的主动性，要有意思，要有道理，而不能鹦鹉学舌。在你们的揭露中，有时分不清谁对谁错，因为你们自己常常弄不清谁对谁错。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在这揭露的神圣事业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你们自己感到珍贵的。你们为着什么揭露？由于什么原因？这连你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一切全是从别人口中鹦鹉学舌得来的。要是问你们，原因何在？症结何在？此事的奥秘是什么？这是件好事还是坏事？它意味着什么，是怎么发生的？对这一切你们连一点暗示都提供不了，或者干脆一甩手不予理会。你们没有任何观点。别人怎么告诉你们，你们就怎么学着说。比如人家对你们说，某个方面藏有些什么名堂，你们马上便想，问题就在这个方面，整个问题、全部症结全在于此，别的都用不着考虑。由于你们毫无分寸感，在你们那里讲市长和印防己连续写了一年半之久。在这期间，你们所不理解的俄国发生了许多事情，出现了许多问题。读者要求你们写出鲜明的思想，解释事实和产生的原委，指出解决方法，哪怕仅是一些暗示也好。可

① 米·卡特科夫曾是自由主义派，同别林斯基一起。自1863年起创办《俄国导报》，政治上转向反动，维护专制主义。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他比作法杰伊·布尔加林（参阅下文注）。

你们的 premier Petersbourg[1] 却谈起了妇女解放。想想看吧，什么都是在适宜的地方和时间才好，不然伟大的思想也立即会变得庸俗，你们的幽默作家只知插科打诨而不务正业。这一切才叫做因循守旧，是最严重的墨守成规。这里没有公民的辨别力，而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应该完全为了神圣的事业，没有必要躲躲闪闪。伟大的思想也不必要什么掩饰，它总会透露出来，让人看到。揭露要做到真正有效，必得让人们先尊敬自己。怎么做到这一点呢？首先，自己须要当一个公民。公民的识别力有助于区分说什么，指出什么，什么对，什么不对。要让人们看到你对事业的热爱，看到你的热忱。可我们是什么样的公民呢？我们大家实质上全是愤怒的利己主义者，自己的事、家庭的事比任何公共事业都更重要。就这样还硬要充当导师，天真地以为现在只有我们才能做新生力量和社会创举的领导者。这无异于一个盲人领着另一个盲人，这种想法实际上也是极其可笑的。我们虔诚地信任我们的青少年。首先他们具有真正的天然的青春活力，具有真正的创新素质，是我们迄今所不具备的。他们应该有也确实有追求，有强烈到废寝忘食的愿望，这些激励着他们年轻的心。难道他们能满足于列夫·坎别克吗？我们可是满足于此了，看来是皆大欢喜。这是事实，没什么好隐瞒的。至于我们做了揭露的事，这又有什么不可呢？要知道布尔加林[2]也写过道德讽刺性的东西。你们不要生气，听我说完。你们也曾想揭露，可你们做的结果都成了诽谤。你们想来个机智的取笑，结果却像阴郁沉闷的醉话，生硬乏味令

① 法文：彼得堡报纸的社论。

② 法·韦·布尔加林(1789—1859)，俄国作家、新闻工作者，他早期曾与十二月党人交往，十二月党人失败后(1825)，他创办并主编反动报纸《北方蜜蜂》，他还曾向政府当局写过有关俄国作家的告密信。

人不快，又很平庸单调，好像背后戳人脊梁那样无聊。有时需要表现愤怒，由于愤怒是最神圣的一种东西，因为愤怒需要发自心灵，因为当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有愤怒的时候不能制造愤怒或假装愤怒，于是你们便用气恼，用降低你们自己身份的凶狠，用妒忌来搪塞。谁知道呢，可能你们真的把气恼当做了愤怒。你们有过这种情况。你们不是曾贬低自己，竟去责备《时代》编辑办烟厂，以此来讽刺我们羞辱我们。你们对《时代》非常气愤，这可以理解。因为《时代》不愿屈从你们，不愿承认你们是活动家，可突然间这个大不敬的《时代》却获得了成功。尽管你们曾大喊大叫地反对，说不定多少靠了你们的喊叫，甚至准是由于这个缘故。顺便说一句，你们出于仇恨不止一次责备我们不履行我们纲领中的诺言而去崇拜权威。我们读到这只是微笑而已。你们大可不必如此。开始《时代》只是不同意，甚至攻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这两人那时可是天神。《时代》也不同意你们，对你们那种官方的自由主义很愤怒。它好像穿着制服系好纽扣，在懂得事理的人们那里随处可见，但却起不了什么作用。要知道你们那个时候就颇有影响了。《时代》揭露过卡特科夫先生，并且预言他要走新的布尔加林的道路。那个时候你们所有人对卡特科夫先生正佩服得五体投地，至少在预期他将在进步道路上取得伟大的成就。我们也明白自己在干什么，明白是冒多大危险去攻击权威。自然，你们还不那么可怕，但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却另当别论了。特别是杜勃罗留波夫，因为这是个有深刻信念的人，充满神圣正义的思想，是争取真理的伟大斗士。车尔尼雪夫斯基同他一起工作。我们不赞同杜勃罗留波夫的某些偏向，以及他这一派的理论化倾向。他不太尊重人民，因为他在人民身上只看到了坏东西，不相信人民的力量。我们反对了

他，要知道他那时可是天神一样呀。这才是真正的权威呢！你们那时以为，我们同你们一样，会去攻击那些谁都敢碰的人。试问，要不是《现代人》发了话，你们敢去攻击屠格涅夫吗？[①] 你们正是这么想的，以为我们的打击要从右翼开始：普希金、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屠格涅夫、皮谢姆斯基。事实上你们也正是只攻击了这些人，就是按照上面的指点，并看你们是否觉得有危险而定。说到烟厂[②] 的时候，我们都替你们脸红。请问你们是什么贵族吗？自由主义的刊物这么干可不体面呀。这叫人想起从前有人攻击拿破仑，说他是商人出身。这种做法既可耻又低能。你们还说过，出版《时代》是为了投机，为了改善某种经济状况。要这么说，每个破产者只须创办个刊物，经济状况就会改善，就将财源不断了。你们这办法真是太简单了。可我们亲眼看到，有人曾经创办过许多报纸和刊物，渴望有很多订户，但都纷纷停刊了。另一些报刊至今没有足够的订户可以收回成本。而我们为什么做到了呢？是由于幸运吗？你们看，头一年是幸运，第二年又是加倍的幸运，第三年是更大的幸运，随你们怎么说，这么经常的幸运，“总得有点儿脑筋吧。”[③]

你们攻击我们，还因为我们维护根基，维护人民的本原，主张联合与和解。不过，关于这些我们不准备和你们谈，因为认为这是很严肃的事。关于这些，我们将去同别人谈。再见吧。

---

① 《现代人》1862 年第 3 期刊出马·阿·安东诺维奇文章，评论刚问世的小说《父与子》，责难屠格涅夫对追求民主的青年人采用否定的态度。由此引起了一场围绕《父与子》的争论。

② 当是指时人攻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兄米哈伊尔曾是烟厂主。米哈伊尔是《时代》杂志名义上的主编。

③ 据说，俄国大元帅亚·瓦·苏沃洛夫（1729/30—1800）曾说过：“今天胜利，明早又胜利，得了吧上帝！总得有点儿脑筋吧！”

杂志评论：新的文学刊物和新的理论

我们想简单谈谈我们这里新出现的和更新了的定期刊物，主要是报纸。这一次我们不准备细说每一种刊物，只是努力捕捉我们新的文学刊物中的新思想、新意所在，而这种思想的特征，新意和新倾向的特征，是确实存在的。我们同所有读者一样（至少得这么设想），从秋天起就惊讶地发现我们报纸的种类在猛增。一些新刊物的出版者坚定地宣称自己将在 1863 年元月 1 日前面世，并表示他们有话应该说，甚至必须说。大家都问他们到底想说些什么，能带来什么新的思想和新的奇闻，将宣传什么东西。显而易见，他们中有的人觉得某些话没有说完，无论如何要把它全说出来。另一些人（属于以前的活动家）顽强地打算继续因情势影响而中断的工作。再有一些人极力想呈现为所谓废墟上的常春藤，旧瓦砾场上的新生活，或者像迦太基城邦废墟上的马利亚。他们似乎相信，他们讲话的时机终于到来，I'abomination de la désolation[①] 结束了，俄罗斯世界应该听到清醒、稳重、正派的人士的声音了。这些人实际了解事物的深奥所在，早就该由他们掌握俄国文学的权柄，但

① 法文：荒芜的蔓延。

直到目前他们还没有这么做。克拉耶夫斯基、斯卡里亚京[1]、卡特科夫等诸位先生，在极其冠冕堂皇的启事中，表现了自己和自己的意向。就连罗森海姆先生也以其《芒刺》，将自己归入这些明察秋毫、更主要是讲求实际的人士之列。在这群著名的新的或最好说自我更新的台柱中间，甚至预感到会有伊里亚·阿尔谢尼耶夫[2]。不仅如此，不知从哪里还透出杜德什金先生本人的味道[3]……不过在最后这一点上，我们可能上了文学嗅觉的当，这里我们预先就承认。总之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刊物的突然大增和自我更新，尽管自然有投机成分，却也并非仅仅是投机。我们感觉得到，这里有人由于某种原因确实想说点什么。即使这种办报热，这种夸张了的“想说点什么”，后来证明好像我国语文资料上的肿块，像牙龈脓肿，但我们认为也并不错，因为就连肿块、脓包对受病的肌体也不无益处，通过肿块、脓包能排出一切脏东西……但我们再重复一遍，主要是预感到了某种新意，呼之欲出的新意。这一预感没有欺骗我们，后来真的有点新的见解。

先生们，你们见过没有，如果见过是否还回忆得起来这样的景象：一大群母鸡，如通常那样跟着一只公鸡，突然受惊，因为旁边走过行人，某个老太婆或者小男孩，也许是个小狗追赶一只凤头鸡取乐。鸡群一下散开，咯咯叫着惊慌地四处飞奔。鸡向来如此，一直到被宰杀煮汤为止，一生都处于惊慌之

① В. Д. 斯卡里亚京为《俄罗斯小报》主编，立场接近卡特科夫，曾著文攻击革命民主主义。

② И. 阿尔谢尼耶夫（1820—1887），杂志工作者，与 М. П. 罗森海姆共同创办了《芒刺》，后任该杂志主编。文坛上都知道他是第三厅的密探。

③ 斯·谢·杜德什金（1820—1866），评论家，当时纯艺术论者的代表人物之一。曾著文论普希金，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驳。

中。等一场雷雨、往往是狂暴的雷雨过去之后，凤头鸡又聚成了一堆。它们继续不安地使劲叫唤，说明仍处于惊惧之中，但已经听不出绝望的声调了。那沮丧的揪心的嘶喊，竟变成了某种稳重的呼唤。这已是新鲜的自负的叫声，其中感觉得到委屈、傲慢、愤怒、屈辱的味道。好像听到在说："啊！居然敢惊扰我们！这是谁呀？怎么能这样？咕——咕——咕！"在这咕咕叫声里，已透露出自尊感，同过去利益的一致性，似乎还有些道德的内容，甚至像说到了家庭，说到了个人财产，最后还表现了学理主义。结束时发出的是骄傲得意的呼喊："我们说过了，我们预言过了，这就是结果！咕——咕——咕！"自然，我们把我们的刊物粗鲁地比作鸡群，绝不是针对任何个人说的。我们只是说我们刊物上新的语调、新的思想、新的原则、新的情绪；而且这一切全是在最抽象的意义上说的，毫无恶意在内。我们所以采用了这个比喻，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很贴切。

比如说，受惊的母鸡会把一切都夸大。新刊物也全都（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如此，一切似乎都是夸大了的。它们心情激动地咕咕大叫，说什么有的东西丧失了，有的东西输掉了，而社会在某些方面竟是无能为力的。它们重又聚成过去的一群，不安地重复说："我们说过了，我们预言过了，这就是结果……"等等。它们似乎坚信，或许是让自己坚信：发生过某种战斗，某种灾难，"如今再用共和国是蒙骗不了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①] 了；又说有什么衰落了，有什么毁灭了……实际上可什么也没衰落，什么也没毁灭，什么也没消

① 即安·亚·克拉耶夫斯基。他在《呼声报》上撰文称：以欧洲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均不适宜施行共和制。

失。一切照旧，全是老样子，什么特别的事也没发生，无法画上一条线，在下边写上一个“Finis…”[①]。斯卡里亚京先生（《俄罗斯小报》，第1期）甚至暗示有地下的文学，暗示火灾[②]的红焰，而且用惊人高昂的笔调把这一切描绘出来。显然，其他新办的和更新的刊物，部分地也同斯卡里亚京先生相一致，至少在倾向上是如此。但我们看来，这样混淆事实是不对的。社会整体的进步运动，与一群无名者的暗中散发的传单有何共同之处呢？把两者混为一谈，意味着直接责难整个进步社会，故意地极力贬低我们社会整整六年间所表现出来的一切有用的、严肃的、神圣的、无可争议的东西。说民众把火灾直接归罪于青年，也是不对的。尽管斯卡里亚京先生补充说在青年中没找到肇事者，对民众谴责青年表示遗憾、同情，但看来仍然暗示民众不可能不谴责青年。至少他在长篇刻薄的发言中，以火灾为口实最后证明我们进步运动的不能成立，而且他谈到火灾看来也不只是为了制造效果。同时，讲到民众同样不对头，完全不对头，是公然的诽谤。民众确实谴责过青年，但是谁怂恿他们干的呢？谁提示的呢？风头鸡那时便已经惊慌乱跑了吗？是它们首先叫唤起来的吗？一切过错，是不是全在那些如今混淆事实吹嘘胜利的人们身上呢？……

当然，我们本可不牵涉到斯卡里亚京先生个人，这位发明奇妙的事物和格言的人，不过我们想重申，这种咕咕啼叫的倾

① 法文：结束。

② В. Д. 斯卡里亚京在《俄罗斯小报》上暗示1862年春季火灾是青年人受传单《年轻的俄罗斯》（或译《青年俄罗斯》）蛊惑而纵火。按：《年轻的俄罗斯》是俄国雅各宾派于1862年5月间散发的革命传单，号召推翻沙皇专制制度。而这传单竟成了反动当局大规模镇压的借口。

向也还见于其他报纸上，有新办的有更新的。就连《日报》在头两期中也有很尖刻的责难文章，攻击我们的社会，责备它在大事面前无能为力。不过《日报》至少是贯彻自己一贯的思想。为此它需要责怪社会无能和无能为力，而这一切源于脱离了根基。我们完全同意它的看法，我们的社会脱离了根基，迟早自己会发觉无能为力。一旦发觉它也就显示自己了。它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它开创了一切能够开创的事业，它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如果有的事还没有做，就意味着它本来就不能做；如果有的事做得不好，那自然也不能责怪它，因为它连本来要纠正自己错误的时间都没有。否定这一点，意味着有意歪曲事实或故意无视事实。可《日报》就是这么做的，我们很遗憾，它在这一点上同咕咕的合唱走到了一起。首先应该做到公正，在这里，歪曲事实是有罪过的，因为歪曲事实会搅乱社会意识。

然而《日报》责怪社会至少是有正当的根据。而其他刊物责怪社会，好像自己也不知为了什么，轻率得惊人。简直难以想象，怎么能如此很少地深入思考事实，怎么能对人人皆知的事视而不见。他们认为，现在场地重又清理干净，为什么不试着唱一个新调呢？可是，先生们，这只不过是过分陈腐的老调！它就是那些女食客和老太婆的旧调，她们一直沉默到发生第一次灾难，一边织袜子，一边悄悄地对骂。等到一有机会，她们突然站起来，冲着自己的恩人地主婆大叫：“看，我们说过了，我们预言过了，你们不想听，结果怎样呢?”其实，他们根本没有预言过什么，只是在那儿打哈欠，还凭习惯在嘴上画十字。

当然，所有新刊物都提出了口号：“温和与认真”。这无疑是个很好的口号，但也不可滥用。然而，先生们，你们一齐喊

叫，孩子般轻率地责备社会，说一切全是它的过错，说它懒惰，缺乏主动精神，说必须唤起这种主动精神，说孩子要是不哭，妈妈就不明白，说社会在所有方面都没有能力，如此等等，这不是滥用又是什么呢？

你们这么说公道吗？你们可曾认真思考过以前的事实？难道这些事实在你们脑子里只是一闪而过，没有触及你们的思想？要知道我们不愿相信你们缺乏关注或缺乏理解。因为这些都再明显不过，并非发生在角落里。要说不理解，那比理解还难呢。假如真的缺乏关注，缺乏理解，那么就不该办什么报刊了。盲人是不能领盲人走路的。

请诸君深思并做出判断。

你们责备社会没有能力，懒惰，缺乏主动性等等。但我们要向你们重申：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展现了自己，而且是随时随地，谁不记得这一点呢？这种展现恰恰达到了它可能的极限。请回忆一下，社会施展自己涉及到推广戒酒协会问题，普及识字问题，教育问题，公开性问题，还有农民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社会组织了代表大会、委员会，发出了贺词。这些代表大会上的多数派和少数派都表了态，印发了自己的意见，报送给上级。后来又召开过另一些代表大会和另一些会议……此后，特别是在城市，社会的积极分子开办了周日学校，征集了教工、资金、签名。在教育方面，只消举出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及其助手的活动就够了……我们不清楚所有这些举措、个别的见解、贺词对政府能有多大的助益。但它们无疑是有益的。就连我们可怜的文学，也组织过会议，就书刊检查问题给上级打过报告。文学界发表并上报的意见，后来对最高层核准的书刊出版事务委员会多有帮助，这一点委员会自己在其书刊出版法新草案中也有所说明。总之，社会做了它所能做的一切，显示

了它所能显示的一切。如果问社会有什么愿望和渴求，那就正是希望现在也有可能做事和显示自己。这一切你们是知道的，但你们却来兴师问罪。假设你们现在仍不死心，还要问罪，你们会说:“既然这样，我们社会的这些显示、这些首创活动都已告结束，那么这可是社会本身的过错，因为是它自己不再这样做了。不仅如此，它还太热衷了，缺乏秩序，缺乏理智，表现出了疯狂的热情，表现出了轻举妄动……它没有倾听理论大家的声音。社会的年轻成员追求赴汤蹈火。激情无法遏制。到处显现出没有本领、笨手笨脚、匆忙浮躁、激烈……激烈……总之……”

先生们，这一切现在说起来很容易。事情已然过去，现在可以讲得头头是道。尽管如此，你们的这些说法并无补于事，纯粹是废话。正因为你们只是在讲废话，到现在也还不能教给人们当时应该怎么做才对。即便是教给人们了，那你们的学问同样是毫无用处，因为那还是一种纯理论，而我们这里各种理论够多了，我们面对的是实事。而做实事除了通过实践以外谁也学不会，通过实践正是通过一系列错误，甚至可能“腰上挨了重创”。这就是说，如果你想干事，那事情就无论怎样也不能停顿下来。不过，让我们解释得清楚些吧：

你们怪罪社会，说它没有那么做事，说它缺乏理智和对自己需要的实际理解，说它热衷于轻举妄动，如此等等。不过，请问先生们，你们在何地何时，在哪个梦里，在哪个宏大理论中看到过，一个数百年间不务实事、最终完全不会做事了的社会，没有科学，从迈出第一步起马上就能毫无错误地行动，不摔跤，稳稳当当，不出偏差吗？在全世界可曾有过这样的社会？你们随便翻开一本什么历史书查查看，不管是法国史或英国史。只有一个卡特科夫先生是从来不摔跤的，那是他手里有

《泰晤士报》。可我们是普通人，平平常常的人。最开初，也就是六年前①，取得了一个辉煌的成果：全社会苏醒了，掀起一个伟大的进程，并且怀着信念和希望开始申明自己的要求。孩子伤心地哭起来，慈爱体贴的母亲开始倾听他的话。我们再说一次，这个成果是了不起的，应该利用它。理论家先生们，那时你们干了什么呢？你们张大嘴望着，等那炸鹌鸟和炸沙鸡立刻自己飞进你们嘴里。唉！都是你们把事搞坏了，笨拙无能，开始是你们喊得最响，后来你们又是第一个咕咕叫唤起来。是谁让你们，谁怂恿你们坐等即刻飞来的鹌鸟和沙鸡呢？是哪个装疯的先知，哪个老太婆使你们虔信一切的进展会毫无差错，稳稳当当，没有狂热，没有轻举妄动？你们为什么会相信这个呢？莫非你们真的没有想到，不管何时何地，不管是哪个民族，自开天辟地以来没有人能立即毫无错误地行动，特别是在反对成见的时候，因为成见几百年间已在土壤中生根，而且成了社会的一种习惯。正应该准备犯各种错误，摔各种跟斗，出现各种轻率行为，同时不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表示惊讶和害怕。可你们在惊惧之中，把鸡毛蒜皮的小事说成了洪水猛兽，拿它来吓唬社会。这样一来，六年间你们一边工作，一边极力要阻止前进的行动。如果你们不是生性冷漠无情，如果你们热爱共同事业并盼望它成功，那你们是会相信哭泣的孩子的天真和真诚的。可你们什么都不相信，竟从一开始就阻止并勒令一切停止。固然，是有过困窘、莽撞，缺乏做事的能力。但又得附带说明，也有过许多好的事情，不仅是这些莽撞之人提出来

① 本文写于1863年，六年前即1857年，该年1月，新皇亚历山大二世成立了一个整顿地主与农民生活措施的秘密委员会，7月，一个委员提出了改革原则的方案。

的，甚至是他们已经做了的，而其成果你们现在也正在享用。不过我们不谈这好的一面，只看一看莽撞、无能和轻举妄动。先生们，请再回答我一个问题：不下水不沾水能学会游泳吗？可你们正是这样要求的。我们还是要说：应该预见到可能犯错误，应该耐心沉着地对此做好准备。你们当时就该明白，这可不是搭个纸牌房子。当时就该想到并且相信：由犯错误可以走到不犯错误，至少可以达到某种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际上的结果，是真正体验出来的结果。当时就该想到并且相信：社会不可能有意识地去反对自己的利益；当事情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社会不会自觉地轻率从事；社会不会去吹哨嬉戏，因而它自己不靠任何外界帮助也会遏制急躁坏事的激烈分子和轻举妄动的人。它所以如此，正因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成为自身利益的反对者。那么，由此看来你们当时应该怎么办呢？应该支持社会的行为，鼓励公众，而不是在惊慌中发出咕咕的鸡叫。应该尽一切努力不让社会已开始的主动行为以任何方式停顿下来。此外，要设法使这种主动行为有可靠保障能继续下去，充满信心地等待成绩。否则结果怎样呢？社会的行动由于你们的惊慌失措和咕咕大叫，刚开始便停止了，这样一来，你们自己给了进步派和活动家们权利，使他们可以当面对你们说："是你们不让我们把事情做完，所以你们也无权谈论结果如何。"是的，正是你们和你们这一类人，一劲儿咕咕叫唤，把左右着社会行动是否继续下去的人们弄得头昏脑胀。而荣誉和光荣只应属于这些人，因为他们在许多方面没有听你们的话，坚定相信能够成功，终于把改革和不少好事做完，直至结束。

而今天，先生们，今天照你们说，需要通过理论来理解实际的含义。得了吧！在理论方面我们早就远远超过老师了，强得很！比如你们就在教别人嘛，可是尽人皆知你们自己还什么

都没做成。那么，你们关于实际活动的理论表现在哪里呢？就在咕咕的鸡叫，在不断地点头称是，最后是照下面规则办：抄手坐着，尽可能闭塞自己的五种感觉而寄托于希望。不过这样的行动我们早就实践过了。据你们的看法，是不是《俄国导报》以其英国原则而来得比较实际呢？我们指出《俄国导报》，因为我们认定它是你们鸡群里的公鸡，是首领，尽管你们并不追求你们中的每人都有自己的见解。你们不必担心，你们在咕咕而鸣这一点上是全都一致的。《俄国导报》有英国原则，它是理论大家，人们都听它的。其实据我们的看法，与其推广身居莫斯科而代表泰晤士的卡特科夫先生的理想，不如在我们这里推行傅立叶的体系。卡特科夫先生仿佛看到了对勋爵的膜拜，以个人为基础的财产分割，侯爵勋爵的 l'anglais①，而非我国贵族的派头，教育为贵族的特权，大学生学费增加等等，他有这种种感觉难道是我们的过错吗？最后一项即教育问题，是《俄国导报》对俄国人民一个最珍贵权利的侵犯；这权利还是彼得大帝赐给人民的，也可能是彼得大帝改革中唯一无可指摘的事。他把这项受教育的权利建立在最民主和最富成效的基础之上。在这个问题上彼得大帝自觉地蔑视门第的权利，抬高了有教养人士的地位，把他们置于贵族之上。他希望所有人都受教育。后代懂得这一点，支持俄国的教育，也正是按照彼得这一民主的原则。《俄国导报》不希望这样，英国不是这样的……不过，讲起《俄国导报》和莫斯科的泰晤士们，又有什么好说的呢！纸牌搭屋的游戏，在我们社会里早就令人厌倦了。我们只是要指出《俄国导报》是咕咕叫的理论家们的实际代表……现在我们回到中断了的话题上吧。

---

① 法文：英国派头。

假设我们的社会没有停止自由表达自己的需要，也没有停止寻找迅速的手段来满足这种需要，那它大概也能达到《日报》通过坚定信念所取得的认识，也就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脱离了根基和人民。而最主要的是意识到必须回到家乡土壤的根基上，同人民的基础相结合。那样《日报》就用不着忧心忡忡，对我们社会发出痛苦的非难之词，就像它现在所做的那样，而且往后还要长久地写下去，因为事情一落到文字上便没完没了，会延续到永恒。由于这个缘故，《日报》就应该支持社会实际的自主活动，并且相信这种活动定会带来善果。怎么可以不相信这一点呢？我们这里只要一出现社会利益与人民利益在实际上自由的冲突（最近到处进行的改革必然引起冲突），各地马上也就会出现人民与社会的接近，马上又会自觉地出现人民与社会必须结合的思想。这是一眼就看得到的，用不着什么证明。只有瞎子现在看不见这一点，而且越往后就越明显。我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开始出我们的杂志，宣布社会必须与人民本原相结合，而且至今仍然尽可能申明和阐释这一思想。我们承受了所有我们文学阵营的诸多讥笑和凶狠的叫喊。但现在尽管讥笑有增无减，甚至转为谩骂，我们却高兴地看到，文坛上有许许多多的声音开始同我们合谐一致地歌唱。有的刊物上重复了我们的思想，几乎连用词都准确无误。不过我们将永远坚持正确的方面。应该承认，我们的社会显示自己，提出自己的需要和要求，有时也的确失于轻率，盲目地展示西方文明，傲慢地看待人民。即使如此，我们也感到遗憾，咕咕鼓噪的一派已经危害了我们刚刚开始的自主生活。他们吓得晕头转向，竟把私下的文学同整个社会的普遍活动混为一谈。请相信一点，自我发展的社会自身便有力量制止私下的文学。它不会轻率地牺牲自己的利益，也不会容忍自己的轻举妄动，因而也就不会

容忍私下的文学，这样私下文学就根本不可能存在。

先生们，你们干吗在把一切破坏殆尽之后却叫嚷什么社会懒惰，没有主动精神，不关心自己的利益？你们还要责怪社会吗？这不是嘲弄人吗？得要说明的是，我们不是怪罪你们中间的某一个人！但是现在你们刊物的倾向，也同样是那种学理空谈派，它就在不久前以其影响毁坏了许多天资和潜力。因此，不管你们个人如何，我们现在就是要责备你们，因为你们也属这种倾向。关于社会的懒惰、缺少教育，先生们，我们想说点话，但不加议论，简要地开个头。新报《随笔》登了一篇相当机智的小故事：《戈罗欣村史的续篇》，这个村史还是普希金开头写起来的（顺便讲讲《随笔》：我们多少把这份新报纸区分在其他新刊物之外，对它的看法有些特殊。这份报纸上有时能出现相当正确的思想，蛮不错的文章。而出于沙波夫先生手笔的文章，都是极好的。只有一点很可惜，它有一个根本的看来是无法改正的缺点：这不是报纸。你拿起某一期报，想了解现代的、昨天的、此刻的事，可读到的是俄罗斯生活习俗和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代[①] 俄国妇女的命运文章的五续或是六续，其后是恰克图贸易，接着还是类似的史实，再有就是官职升迁，而别无其他。一期报就这样挤得满满的。不行，报纸是不能这么办的。这好像是随兴之所至，任意刊出什么。既然出版者从一迈步，自开头几期起就没有想到和体会到不能这么办报，我们也就很遗憾地认为《随笔》的这个缺点今后也难以改正。）。《戈罗欣村纪事》中写了村里农夫开始不信任中间

①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1629—1676），俄国沙皇。在位期间（1645—1676）加强了中央政权，确立了农奴制度。

调停官[1] 说的：他们已经完全解放了，听调停官讲他们应该完全自主地行动，也半信半疑。一个农民来请求允许给他儿子娶媳妇，善良高尚的调解人简直要把他赶出去："你自由了，你自由了，该明白这一点了，你这糨糊脑子！这种事你也来求人！想娶就娶嘛！"这以后农夫才终于开始相信，高兴得很。突然调停官召集开会，大家挺乐意地集合一起。调停官建议米尔开办学校。农夫们搔着头说："不，我的爷，我们这儿自古就没学校，我们的爹爹爷爷全不识字，现在也用不着办学校。我们不同意。"（我们想在括号中说明，自2月19日以来，也就是从打自由谕书颁布[2] 起，俄国的学校增加了三倍。这是官方数字。因此，《戈罗欣村纪事》展现的事实完全是个别现象。不过这也无妨，无论如何既然给了自由，就不该妨碍米尔大会作决定的自由。）调停官说服大家，但农民们坚持自己的看法。这时调停官就喊叫起来。农民搔着头，看事情闹到要动用权力了，便都同意了。过不多久，调停官又召集开会，要给村长规定薪水。米尔大会又是不同意，调停官又喊起来要动用权力。最后的结果，是戈罗欣村农民全体以米尔名义去找调解人，请求调停官像从前一样来管理他们。调停官叫道："愚昧！懒汉！你们是自由的了，你们完全自由了！我这费尽力气要使你们有文化，要恢复你们的主动精神，可你们……"但戈罗欣村民跪到地上，坚持自己的要求。调停官双手一摊，心里自然就想：我们的社会还没准备好，农民懒惰、粗鲁、荒唐，不懂得高尚的感情，习惯了棍子，不愿意维护自己的利益，逃避自

① 或译调解人，俄国19世纪60年代后农奴制改革时，由贵族中选出调解农民和地主纠纷的中间人。

②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3月5日颁布《1861年2月19日法令》，实行农奴制改革。

我管理和主动行为，没有文化。甚至坏地主也比农民好得多，因为受的教育多。农民首先得受教育，才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可为此又得把他们管起来，再套上农奴的枷锁，并得好好地教训，甚至得用棍子，好让他们明白别人是在关心他们，明白人们想恢复他们的高尚感情……

令我们吃惊的是（所以吃惊，是因为几乎我们所有的其他刊物都不会这么做），《随笔》竟为戈罗欣村民辩解。既然给了他们自由，他们也就有不办学校的自由（可怜的然而精神高尚的进步派调停官，只知空谈道理而没想到，五年后戈罗欣村民看到邻居和普遍的情况，自己就要在家乡办学了。他没想到这个，仅仅为了开学校就破坏了最基本的原则。而一切正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这是今后一切发展的源头，维护这个原则比世上所有的学校都更有价值。）。《随笔》要人们相信，上个世纪各日尔曼国家情况就是如此，那时也刚开始自主的活动。戈罗欣人的表现比较起来甚至更合乎情理。理论家先生们，假设你们是调停官，我们是社会亦即戈罗欣人，现在你们号召我们自主行动，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觉得答案是清楚的，用不着解释。因此，你们关于自主行动的一切号召，在我们看来全是在开玩笑。

上面我们表示了惊奇，《随笔》怎么会站到了戈罗欣人一边。我们也表示相信，所有我们的理论家，甚至极差劲的进步派，都要采取另一种立场。如果他们还没决定，那也应该取另一种态度，以便忠于自己的原则。对我们的惊奇，请你们不要惊奇！我们绝不是在夸张。不过这还算不了什么，而现在竟出现了一些迹象，有人对我们的农民心怀恶意，由于迄今为止大家一直都为农民说话、为农民出力，而竟想要报复农民，甚至看得出有些敌视农民。这一点我们特别是在新刊物《俄罗斯小

报》上感觉出来。在所有新报刊中这是最任意妄为的刊物，不过在道义方面也是那个鸡群中的一员，虽努力想学公鸡啼叫，仍然落得个普普通通的惊慌的母鸡。关于农夫，我们是从斯卡里亚京先生的文章里读到的。要声明一句，我们并不认为斯卡里亚京先生醉心于种植场主那种庸俗的报复。我们对他的情感有不同的解释。我们的想法很简单，他是厌腻了老一套的对农民的同情心。平庸在我们这里是司空见惯的，进步的思想与平庸结合，有时也会走向极端的荒谬。不仅如此，这些平庸者把最神圣的思想长久地拖在大街上，弄得肮脏不堪，以至于跟着他们重复自由的、进步的一般词句，有时都感到厌恶。我们觉得这样一来，斯卡里亚京先生的审美情感也蒙受了侮辱。尽管如此，这并没有给他权利可以唾弃逻辑。逻辑可不是老一套，也不是老一套的进步主义。没有必要多谈斯卡里亚京先生，不过随便引他一段名言，你们以为怎样：

> 在许多人眼里，只要是农民就是没有过错的；只要是地主就是有罪的人。然而大家知道，我们的农民不仅不比地主好，反而比他差，*因为受的教育少*。如果说地主经常侵害农民的权利，这话是有道理的，那么更有道理的是说农民不放过机会捞别人一把，如果这么做不受惩罚的话。

《俄罗斯小报》第1期

这是什么意思呢？把地主和农民拿来审判。很好。问题是：两者谁好些？斯卡里亚京先生说地主好，*因为他受的教育多*。就算如此吧，这一点无疑是不错的。往下呢？往下说，如果地主确实经常侵害农民的权利，那农民也不放过机会捞别人

的财物。

换言之，如果农民捞别人的财物，那么就不能否定另一事实：地主侵害农民权利，亦即拿了农民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因之也是捞别人的财物。

其结果，一个地主一个农民，两人都（根据斯卡里亚京先生的说法）捞了别人的财物。但地主比农民好些，因为他受教育多。

请问斯卡里亚京先生，既然如此，您还怎么理解受教育多？是穿时髦的燕尾服还是胡子刮得干净？依我们看来，如果一个人受过教育，他就是得到了精神上的成长，对善恶有了尽可能正确的理解。因此，可以说他在精神上得到武装，用自己受的教育抵制罪恶，结果就握有比农民远为强大的击溃罪恶的手段（我们且不说地主在物质上总比农民有保障，他比农民很少挨饿，只是玩纸牌会输点钱，可从来不必为了交租交税，把最后一匹小马牵到市场去卖。）。

既然是这样，既然地主在道义上、物质上比农民更有保障远离罪恶，尽管如此地主还是犯了与农民同样的罪，也就是捞别人的财物，那么出于公正和逻辑的考虑，他俩之中谁更道德些，谁更好些呢？

您自己也会同意，农民由于无知和缺乏教养，他的罪过多少总得加以减轻。

斯卡里亚京先生，您是咎由自取。是您自己提出的问题并引出了它的答案：必须责怪的是地主。结论应该是这样：地主比农民坏，因为他虽然受教育多而且物质上多有保障，却与农民犯了同样的罪过。

这是根据您的说法，根据您的说法得出的结论，斯卡里亚京先生！然而您却提出了另一个答案。这已经是胡闹而不是逻

辑了。

由此看来，您连自己的思想都不能适当地表述出来，干吗还要拼命地好为人师呢。

杂志评论

一　答“吹口哨者”

《随笔》报第40期刊登了一封关于我们的外稿信，是一位局外人士投寄该报社的。

编辑先生：

我希望您会在贵报上给我的评论一点篇幅。此文目的在于揭露《时代》编辑部明显的不负责任和前后矛盾，在于给俄国文学和报刊将来的史家提供一个有代表性的特征。

《时代》编辑部在今年1月号杂志上，对1863年杂志出版启事中攻击吹口哨者一事做出了解释，同时从这些阴险的人中举出去世的杜勃罗留波夫加以袒护，承认他是“有深刻信念”，“充满神圣、正义的思想”，“是争取真理的伟大斗士”。接下来可敬的杂志编辑部说，以在文坛上的力量和意义而言，杜勃罗留波夫是位天神；它又夸奖自己同杜勃罗留波夫斗争，反对他不尊重人民，不相信人民的力量。

最后这一点是否公正，留给评论家去评说。至于前面一点，为了尊重死者，应该打断《时代》编辑先生的话，向他指出他的杂志去年第3期有一篇指导性文章，那是杜勃罗留波夫去世不久的事。

《时代》的声音在这里是颇为尖刻的，最后归结为32页上对杜勃罗留波夫的如下见解:“我们感觉到有种轻视杜勃罗留波夫的愿望，因为我们发现了他有明显的缺点，各种过失，不确切、不审慎、琐碎、错误的思想，尖锐矛盾和老生常谈，结尾与开头脱节，开头没有贯彻到结尾，等等。这一类错误，这种种杂乱脱节的例子，可以说举不胜举。”如此等等。

请《时代》编辑部对比自己从前的见解和最近的看法，解释一下通过怎样的逻辑和怎样的感觉而得出它对死者的看法，亦即对它认为是充满神圣正义的思想，是争取真理的伟大斗士的看法?

敬礼，等等。

吹口哨者

下面是我们的答复。

吹口哨者先生：

我们决定答复您，虽然您的信不是写给我们而是写给《随笔》的编辑的。因为事情直接牵涉我们，而且信里只讲到我们，所以您当然不会因我们承担复信的愉快任务而感到惊奇。我们决定复信是由于下述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根据您致信《随笔》报的语调，我们相信您，先生，完全是个局外人，也就是说您不属于对我们个人怒火填膺的那些编辑和出版家们。另外，您责骂我们也不是出于任何利益的考虑。请原谅我们如此坦率。您没有署名，而每天写给我们的谩骂、龌龊庸俗的话不可胜数，我们不由得产生怀

疑，要对我们的反对者加以区分。如果答复有些人，那将是过分抬举他们。而在您的信中我们没发现任何影射，任何弦外之音。您纯粹是关心事情本身，想解决我们杂志上让您惊异的矛盾之处。看来您苦恼不安，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凭自己的力量解决难题。我们真诚地尽快帮助您，您这位高尚的人（因为您关切真相），极善良的人（这看得出），又是无私而又高尚地热爱祖国文学的人（这已是显而易见了）。

第二个原因：除了一句非常尖刻的话“揭露《时代》编辑部明显的不负责任”之外，信中没有特别谩骂的话。这意味着同您还是可以交谈的。现在我们只需指出您对事情还不很了解，您作为首先要寻求真理之人，大概立刻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收回说我们不负责任（这是信中唯一侮辱我们的说法）的话。

第三个原因：我们所以要回答您，先生，还由于您在信后署了“吹口哨者”而没加上“牟利的”。相反，如果您署上“牟利的吹口哨者”我们就不会回答您了。

其实我们丝毫不反对吹口哨。这不过是表现思想的一种特殊形式，近来在我国文学中运用得很成功。我们自己有时也吹吹口哨[①]。所以您署的“吹口哨者”，是很好的署名。可是牟利的吹口哨者却出卖自己的口哨，主要是自己吹口哨的目标在于金钱，谁给钱多就为谁效劳，因此根据订货可以为任何人吹口哨。您也会同意，同这类先生共事是不体面的。再说其间常碰上无可救药的醉鬼。难道能回答他吗？现在我们结束了开场白，又几乎是掰着指头细数我们回信的动机，先生，我们要请您原谅我们有点啰唆，显然让您失去了几分宝贵的时光（因为

① 首先是指《一个微妙的问题》，此文发表后招来《现代人》编辑部马·阿·安东诺维奇的讥讽。

时光对握有真理者，总比对只有谬误者要宝贵得多)。这些我们是很理解的。不过这也没办法，尊敬的先生。有时您把自己思想讲得够明白了，可是一看，人家当着您的面就给改得面目全非，连您自己都认不出来，不胜惊讶。您不就是这样吗，先生！您这位祖国文学可敬的爱好者就是这样呀（我们说这个话是痛心的)。本来觉得我们讲杜勃罗留波夫的话，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呀。可您就是没有理解！……所以请您原谅我们现在讲话繁冗，因为我们就采用了这种风格，干脆把东西嚼烂了给送到嘴里去，像喂吃奶的婴儿或没牙的老人。多说一些，好像就要清楚一些。

好了，讲正题吧。

请问，尊敬的吹口哨者，我们哪里有矛盾呢？您想证明，我们一方面把去世的杜勃罗留波夫说成是“有深刻信念的”，“充满神圣正义的思想”，是“争取真理的伟大斗士”，称他作天神（自然不是对我们来说，是对他那些狂热的追随者，您忘了讲清楚这一点)。在讲了这些褒奖之词之后，据您说我们又夸奖自己同杜勃罗留波夫斗争，反对他不尊重人民，不相信人民的力量。

但我们在另一篇文章里（从前写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又说发现了他有“不准确、不审慎、琐碎、错误的思想，尖锐矛盾和老生常谈，结尾与开头脱节，开头没有贯彻到结尾，等等。这一类错误，这些种种杂乱脱节的例子，可以说举不胜举。”云云。

我们且不说这两段话都是您从我们文章中间抽出来的，尊敬的先生。这两个片段与上文没有连贯关系，显得特别突出，它们之间显现的矛盾也变得十分突兀，实际上并非如此。不过这些我们都可以向您让步，不想做琐碎的辩解，因为根本不需

要辩解。我们只是想给您解释一下，而且仅是给您个人，因为我们对您怀有特别的好感。

尊敬的先生，如果您肯费点儿神深入到我们思想中，同我们一起研究，立刻自己就能明白一切。实际上，我们对杜勃罗留波夫的第一个见解与第二个见解的矛盾在哪里呢？问题全在于您无论怎样也不能想象，一个“有深刻信念”，“充满神圣、正义思想”，“争取真理的伟大斗士”，有时也会犯错误，会说一大堆胡话。但是，这种情况不是到处都有，每天都有吗？请环顾一下周围。举例说，您面前站着个人，生活方式几乎是个信徒，神圣地坚信真理。他尊敬您，而且您也喜爱他。可突然这位杰出的先生在一个早晨，完全为了达到自己极高尚的目的，竟当着您的面以头撞墙。先生，您此刻说什么呢？您这时能够否认他精神高尚，充满神圣正义的思想吗？显然不能。因为他准备牺牲自己，牺牲自己的脑袋。所以这一切，即深刻的信念、神圣、正义，都仍然存在于他身上。您能否认是争取真理的伟大斗士吗？显然不能。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才在您面前以头撞墙，并且流了血。这全是为了真理呀！难道您没有见过这样的斗士吗？那么，最后您在哪里发现了这位先生的错误、缺陷、荒谬呢？显而易见，是在他为达到自己目的所使用的手段上。他错在手段上，也仅仅在手段上，他看对象的方法不对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您自然在他的行为中发现了“杂乱和脱节，举不胜举”。

可是，您如果说，您那位杰出的人是个疯子，是个傻瓜！这不对，先生！他不仅可以不是疯子，不是傻瓜，他甚至可以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不过犯了个错误，如此而已，难道聪明人就不犯错误吗？就连天才的人也常在贯彻自己思想的手段上犯错误。而且常常是越富有天才，犯的错就越大。有的是墨守

成规，可那些人很少犯错误。您如不信，那您打开历史著作，看看四周，您每一刻都可找到一个极聪明的人，他为了最高尚的目的，用额头去撞击墙壁。只要有眼睛就一定看得见。举历史人物为例吧，像彼得大帝，或者小一点儿的像斯佩兰斯基①，难道他们不是既犯错误而同时又有着最高尚的目的，为祖国争得幸福。再以其他欧洲人士为例，如罗耀拉②，他为了什么投入那么多高贵的精力，那么多心灵力量和顽强精神？就为的是他的崇高目的——人类的幸福。那么他想用什么手段达到目的呢？是加强天主教，这意味着他是以头碰壁。

“是这样。但杜勃罗留波夫不可能像他们那样犯错误。”您这么说，这也是杜勃罗留波夫所有追随者的声音。“他是没有错误的人，他不可能犯错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您有分歧，先生。我们不会有这种孩子般的可笑的崇拜，尽管这个分歧并不构成真正矛盾的内容。请不要忘记这一点。那么现在的问题只剩下您所责难的我们前后不一，缺乏逻辑，不负责任。至于说到杜勃罗留波夫，他即使是最好的天才，也可能犯错误，至少像我们所举出的那些伟大人物一样。而杜勃罗留波夫却远不是天才，恐怕只是个聪明人。他与那些天才一样，会对

---

① 米·米·斯佩兰斯基（1772—1839），伯爵、国务活动家，1808年起为亚历山大一世的亲密顾问，主张宪政的君主制。1812年失宠，被流放至下诺夫戈罗德，1819—1821年任西伯利亚总督。1826年后实际上掌管第二厅，主持编纂俄罗斯帝国基本法(1832)。

② 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1），他于1534年在巴黎创立耶稣会（天主教修会），制定耶稣会规和道德准则，耶稣会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工具。该会的主要组织原则是严格的集权制，地位低的必须服从地位高的，总会长具有绝对统治权。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了对天主教的否定评价，在以后他的创作中有进一步的发挥。

自己的时代犯下类似的错误。当然，有过一些聪明人在当时并没犯错误，不过我们相信杜勃罗留波夫不在其列……

显然，我们所说以头撞墙的粗俗例子，整个用在杜勃罗留波夫身上是过于尖锐的，但部分地还是可以的。您现在就设想我们真的深信杜勃罗留波夫不了解人民，在人民和社会中间主要只看到了一个黑暗王国；他把粗俗的偶然沾染的现象，可说是皮相，当做了本质；有时甚至对我国人民间最光明最可喜的现象，他出于不理解而归之于最卑污的事；他怀疑人民的力量，只看重欧洲模式。就算我们对这些都深信不疑吧，这也恰恰就是他用头撞墙的表现。这么说又有何妨呢？难道我们这样看，就是动摇我们的下列信念吗：杜勃罗留波夫同时也是位高尚的活动家，他一往直前地追求真理，亦即要使社会摆脱黑暗、龌龊、内心和外在的奴隶状态，热烈盼望未来的幸福和人们的解放，因此是我国文学中极高尚的一位活动家。甚至他的错误有时可能正好起因于过分强烈的精神高涨。杜勃罗留波夫如果还活着，甚至可能在许多方面改变自己对事物的看法，改正自己的错误，找到通向自己目标的另一种真正的道路，只有自己高尚、正义目标他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目的与手段，这是有差别的，尊敬的先生。别林斯基是俄国最高尚的活动家中最高尚的活动家，一生中却三次从根本上改变过自己的信念。唯有真理他从未改变①。这是十分鲜明的例子，尊敬的先生，

① 在 1860 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里经常提到别林斯基。他在国外时（1867）曾写过《我同别林斯基的结交》（文稿已佚），显然，他在文中不仅叙述同别林斯基几次会晤的印象，也评价他的信念。该文中的想法大概在某种程度上见于 1873 年与 1877 年的《作家日记》有关的文字中，其中有否定的评价。不过所谓别林斯基三次改变信念，不太确切。他只是在 30 年代末在三篇文章中表现了与现实妥协的倾向。

您为什么没有记起他呢?

我们曾与杜勃罗留波夫斗争过，并坚信做得是对的。而追随他的平庸之辈，有些现在把蔑视人民和怀疑人民力量的观点，发展到了十分荒谬的地步。恐怕唯有那无以复加的荒谬、鄙俗和平庸，才能使他们名垂千古。可这又会很快使他们成为笑料，必然如此，因为现在就已见到苗头。而与此同时，这些平庸之辈，靠了杜勃罗留波夫深受青年人怀念，以他的权威为掩护（其实他本人如健在一定会抛弃这些人)，毕竟对青年还有些极其有害的影响。对此应进行斗争，我们就准备这样做。

最后再补充几句，以结束杜勃罗留波夫的话题。我们从来都承认他的才华，此外，在许多方面是同意他的，也就是在他没有犯错误的地方。这里他是很有吸引力，天赋极高。因此，如果我们有能力发现和珍视这一点（强过其他许多人)，那么也有权利夸奖他。可您却责怪我们夸赞他。下面回来谈我们的主要问题。

这么看来，尊敬的先生，矛盾在哪里呢?问题的产生，完全是由于您根本不想知道，一个聪明而酷爱真理的人也能犯错误。对权威干吗要这么无限的崇拜呢?在我们尊敬和崇拜的人面前，为什么像祈祷似的呢（我们有意选了比较委婉的词)?依我们之见，尊敬并不需要祈祷。尊敬的吹口哨者，这一切只能暴露出您有些笨拙、草率、思虑不周……倒不是不负责任。尊敬的先生，您定会同意，把这么厉害的罪名加给人们，是应该慎重些，本着良心，不要先就扬扬得意，当然这需要您自己是个好人……

哎哟，尊敬的先生!您无法相信我们有时处境多难呀!我们觉得已经磨破了嘴皮，觉得已经讲得够清楚了。不行，有些人真没法办，脑子就是不开窍。不光是您。这种事例我们经过

有数百起了。许多人找上门来不是为的真理，而是想侮辱您，数落您一通。自尊心在他们身上达到了病态，可以把亲爹在市场上出卖，只求能够掐您一把。对这种人当然不能给他答复。而且还愚笨得很……我给您讲个笑话，是我们经历过的数百件事里的一个，让我讲给您听，再说这极像您的来信（情节是另一种，但思维方式是相同的，逻辑也是一样的）。而且这件事里绝不包含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阴险和恶意。这不过是一点儿意见，给我们提出的是位祖国文学的爱好者，同您一样的无私而善意的真理探索者。意见登在《祖国之子》[①] 去年 11 月一个周日号上。请您听一听吧。

同现在的情形真是何其相似！

《祖国之子》评论家分析了 10 月号的《时代》。我们《时代》杂志在 8 月号上刊登了罗杰维奇[②] 先生的文章《关于社会道义》，10 月又就同一题目发了另一篇文章，作者是索卡利斯基[③] 先生。下面则让评论家自己来说吧：

> 评论过上述文章，我们可以结束对新出版的《时代》（10 月号）的分析了。最后我们只想指出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我们分析的一期杂志里，刊载了索卡利斯基先生的信《社会道义问题短评》，是由罗杰维奇先生的相关文章引发的。短评的出现本没有任何奇怪之处，奇怪的是编辑部在信后加的附识："虽然这篇文章同我们杂

---

① 《祖国之子》是俄国政治科学和文艺的周刊，1856—1861 年在彼得堡出版，1862—1891 年成为具有自由派和斯拉夫派倾向的日报。

② 米·瓦·罗杰维奇（1839—?），50—60 年代的时评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继子（他的妻子与前夫之子）的老师。

③ 尼·彼·索卡利斯基（1834—1871），50—70 年代的政论家，《现代人》、《时代》等刊物的撰稿人。

志不久前发表的罗杰维奇先生的文章有矛盾，但由于这是一篇进步的人道的文章，且有自己独特的视角，所以我们认为这类矛盾有助于将来解决问题。”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如此，编辑部是否认为罗杰维奇先生的文章本身是进步的和人道的呢？

我的天哪，为什么不这样认为呢？好像进步的人道的人就不能犯错误。我们可以设想，罗杰维奇先生和索卡利斯基先生走到了一起。他们两人都很进步也都讲人道，两人追求同一目标。但对事情的看法，达到目的的手段，两人截然有别，于是就争论起来。难道其中一人非得马上变成不进步、不人道，只是因为他不同意对方，与对方有矛盾。矛盾与矛盾不同。要知道他俩的目的是一致的。其实两人都可能既犯错误又仍然是进步的和人道的。在议会里有时是上千人都同意或者互相争论。有的时候一个人反对全体，后来证明正是这个人正确。那么，难道其余九百九十九人全是坏蛋和傻瓜？或者全都不进步、不人道；难道就该直接作结论说进步的人道的人们永远不犯错误，永远互不矛盾。这不显然是荒谬的吗？特别是在我们的现实当中。怎么会不理解这是谬论呢？怎么会想不到这一点呢？可此人就是没理解，就是没想到！您想想看，尊敬的先生，怎么能让人回答这种问题呢！可几乎尽是这类的问题。请替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当然，我们没有回答《祖国之子》，现在是联系您的来信想起了这件事……这同您真是太相似了。

不过，先生，您并不令我们感到受累，希望今后也来找我们，把您看到的矛盾写信寄来。我们一定为您尽一切的可能，因为非常珍视您对真理的高尚追求，还有您对祖国文学的真情热爱。再一次请您原谅我们的啰嗦，可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总得磨嘴皮呀……

二 年轻的笔杆子[1]

——关于文学署名。《现代人》第1、2期。

布拉姆别乌斯[2]！绝对是布拉姆别乌斯！我读得很带劲，笑破了肚皮，呼哧呼哧地，气都喘不过来，浑身是汗。嬉笑顽皮，年轻的笔杆子，一个才子！他讨伐罪恶。是俄国的希望。是个顽主、吵家，蹦蹦跳跳！大有前途。好样的。

事情全是由两位斯卡弗龙斯基先生引起的。A.斯卡弗龙斯基先生在12月号《时代》上发表声明，说他的签名被莫斯科的另一个H.斯卡弗龙斯基先生非法地利用。A.斯卡弗龙斯基先生担心人们把他同H.斯卡弗龙斯基先生搞混。好哇，A.斯卡弗龙斯基先生怎么敢一怕之下就登报声明他是A.斯卡弗龙斯基，而不是H.斯卡弗龙斯基？他不过是个普通的一般的写作者而已。至少说，文坛如果有个将军，那也应是某个卡特科夫，这却冒出个A.斯卡弗龙斯基，也想当将军！得揭露他，快点揭露，刻不容缓。文学在警惕，社会在警惕。必须讨伐，必须吹口哨，必须吐唾沫！甚至还看得出对长者的不恭。要是这些全放过去，那后果会怎么样呢？

其实事情很明显，这是年轻的笔杆子。总得给讽刺的头脑

① 指谢德林。虽则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比他年长五岁，但以此讽刺谢德林，说他缺乏阅历，幼稚可笑。在《谢德林先生，或虚无主义者的分裂》一文中更加尖锐。

② 这里是善意地模仿布拉姆别乌斯男爵的风格，但并非毫无目的。——作者注。按：“布拉姆别乌斯男爵”是俄国作家奥·伊·先科夫斯基（1800—1858）的笔名。

提供食粮吧。为艺术而艺术。的确，这文章写得很俏皮（载《现代人》，第1、2期。总的说《现代人》好像重又开始为艺术而艺术，是一种新的可喜的潮流）。我确实笑了一通（不是开玩笑），因为写得非常非常好笑，而且无疑极具才华。只是整个看来我觉得并不公道。请您原谅，年轻的评论家，我很痛心。您是初露头角的才子，才华横溢，这不假，可您听我们老人一句话：不要白白浪费青春的活力，热情稚嫩的力量。科尚斯基就曾说过，好的思想优于华美的风格。风格可说是外衣，思想是身体，掩蔽在衣服里面。您看一看老来俏的女人，服饰十分华丽，戴着玫瑰花，麝香扑鼻。可是服饰里面呢？假的牙，假的发辫，假的……再细说下去就危险了。总之，年轻人，您会厌恶而恐惧地躲开这卖弄风情的老妇人。同样地，您应该避开外表的文采，不受华丽风格的诱惑，把您眼前的布拉姆别乌斯的影子吹走，因为它引诱您追求虚名。这样它就会像军人烟鬼吐出的烟圈，一下子消逝得无影无踪。您应该抛开这一切，多多关心内容、思想。年轻而出色的作家呀，您仔细想想吧。要知道您在犯错误呢。

试问为什么A.斯卡弗龙斯基先生无权对另一作家使用他的署名感到气恼？因为他不是将军，不是伟大的作家？可要明白，每个人都有他所珍贵的东西呀。如果是您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并且获得了声誉，却有个淘气鬼在莫斯科到处使用您的笔名，还上了《俄国导报》，那么您会说什么呢？自然，您也会立刻揪住他不放。难道不是这样吗？那令人难以置信！现在您就是揪住了尊敬的A.斯卡弗龙斯基不放，仅仅是由于您觉得他庸碌无为。但他没有您那么大的名气，又有什么关系呢？说不定将来他也有您那么大名声呢。您还记得老年的安尼巴尔和年轻的斯齐皮翁相见时的对话吗？

安尼巴尔：我出名的时候，你还没生下来呢。

斯齐皮翁：我出名的时候，你就死了。

这不是说得很冠冕堂皇吗？故事取自古代史。所有这类罗马笑话，好就好在能贴切地用在现代俄国文学身上。我再重复一遍，年轻人，每人都有自己珍视的东西。如果A.斯卡弗龙斯基珍视自己的劳动（而这是高尚的品格），那他也就不准他人染指。您说他怎么敢以将军自居？可他也许根本没以将军自居，只不过要求属于自己所有的东西。谁知道呢，说不定假使您把自己光辉的名字送给他，他还不肯接受呢。他就说，我珍视的是自己的东西，别人的东西我不需要。年轻的诗人呀，我没见过您的作品，只知道您现在这篇登在《现代人》上的文章关于《文学署名》。文章无疑是俏皮的，但也许A.斯卡弗龙斯基并不愿意在您这文章上署名呢。谁都是只要自己的东西。打个比喻，年轻却富有才华的评论家呀，您设想有一座豪华的房子，在涅瓦大街上或在某处沟渠附近。房子类似宫殿、别墅，富丽堂皇。过路人都赞美这座宏伟的建筑。有一个俭朴甚至饥饿的官吏，腋下夹着很旧的皮包，上面连锁也不见了，因为钥匙十年前被七个孩子弄丢了。他跑着去上班，路过这里，偶尔抬头看到了房子，心里一动。建筑物产生了作用，因为艺术是不能抗拒的。他感到了快意，怀着新的热情赶忙上班。在这栋豪宅里住了个富翁，自然是欢天喜地。可在豪宅旁边又有一座小木屋，只有一层，窗户不过四扇，窗口长着小白桦树。这屋里住了个穷人，享受着良心的平静安宁。他没有那些大理石，那些大柜高架，但他也不想这些。他有好书，挚友，总能吃到现成的肉饼，人世间的幸福还需要什么呢？可有一天早晨，年

轻人放火烧了富人的豪宅。两小时之后只剩下了灰烬（当然宅主人得了救，这样才好作比喻，详见下文)。第二天早晨，年轻人又烧了俭朴的有福人的小木屋，半个钟头后，已是荡然无存。自然，富翁和穷人都要痛哭流涕，谁敢保证说穷人不比显贵的达官哭得更凄惨呢？……现在我们来看事情的另一面，解释一下其中的寓意。假设说富有的达官是您，是将军和出色的作家，而穷人是 A.斯卡弗龙斯基。两栋房子的质量差别可视为是你们文学才赋的高低。才赋在这里以房屋形式表现出来，这在文坛上是有例可循的（如克拉耶夫斯基的房子在利杰伊街，斯塔尔切夫斯基的房子在莫伊卡[①])。这么一设想，您马上就可明白：对 A.斯卡弗龙斯基来说，他的有限才能也是十分宝贵的，甚至比您的出色才赋都更宝贵。

年轻的评论家，您可能也不赞成这个比喻。您也许会说，A.斯卡弗龙斯基的行为太可恶，以公众瞩目的将军自居太可笑，对这类社会弊端必须讨伐。这本是杂志的神圣事业，是它的方向和责任。A.斯卡弗龙斯基自尊心强，但他不应该自尊心这么强。我不禁要叹口气，啊，年轻的笔杆子！年轻的笔杆子！我赞成，我赞成，文学界一切可笑的事都该根除和追究，可是文学界种种现象无奇不有。不仅有可笑的事，还有可憎的事。您只注意到 A.斯卡弗龙斯基，选他作为自己写出色文章的对象，却漏掉了可憎之事。其实这里只是搬弄是非，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这算什么杂志的神圣事业呢？算什么方向和责

① 安·亚·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9)，《祖国纪事》杂志和《呼声报》的发行人。阿·维·斯塔尔切夫斯基（1818—1901)，《祖国之子》杂志的发行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暗示这样的事实：这些既无文学才能又无信念的人也在从事出版工作，并借此发家致富。

任呢？算什么弊端呢？这里不过是年轻的笔杆子玩弄的文学花样而已。最后还有，您为什么仅从可笑的一面看这件事呢？也不妨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一看嘛。我们这里对文学劳动是要付报酬的。如果一位先生用您的笔名写出不好的文章，人们一定会想这是您写的坏文章，杂志上也就不再用您的东西，不去区分是哪一个。这岂不是坑人吗？而 A.斯卡弗龙斯基先生是有名气的。他确实有才华，不管您怎么说。可惜我没读过您在出色的评论中提到的他写的《小俄罗斯的穷人》。不过我倒是读了他的《新俄罗斯的逃亡者》，确切知道这部小说有许多读者，给作家赢得了很大声誉。所以，A.斯卡弗龙斯基也便很珍视这一声誉。即便他有些夸大自己的意义（说实在的，他在《时代》上的抗议，丝毫不能证明这一点），那也是常有之事，并不妨碍任何人。并非每个人都可能有这种情况嘛。比如说您，说不定您就会揪住我不放，因为我不赞成您的评论文章，而您又那么敏感，那么器量小而不能容忍他人的自尊心……告诉您，年轻人，您这是故意把《新俄罗斯的逃亡者》写成了《小俄罗斯的穷人》，为的是强调自己多么机智。像是说把小说的名字给忘了，因为这名字并不值得去记它。好个年轻的笔杆子！说实话，我很心疼那么多机智用在了转瞬即逝的目标上。年轻人啊，多关注些思想吧，再想一想我用卖弄风情的老妇人打的比喻！

知道吗，这还像什么？这像是一种闲散的文学，犹如穿长袍敞着怀（Vous comprenez?① “没关系，没关系！不要出声！”②）。

---

① 法文：您明白吗？

② 引自果戈理：《狂人日记》（1835）。

不，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只有将军们才能做出自己的声明？为什么是您专替将军们说话？为什么您那么喜爱他们，请问您这位出色的卓有才华的贵族！哎呀……我这是怎么了……是的，我的老天啊，我说走了嘴。您对文坛上的将军，也是毫不客气呀！虽然，这位将军已经不是将军了，而是一篇完全特殊的作品。您曾写到：

“例如可有谁敢相信，一个文学家不久前突然毫无来由地在《北方蜜蜂》上宣布说，他是那么伟大，甚至另一个文学家在睡梦中都见到他。读者读多了类似的表白，该怎么想，又有何感触呢？”

这说的是屠格涅夫，指他去年秋天在《北方蜜蜂》上那篇有名的文章①。另一个做梦的文学家，当然是涅克拉索夫先生。这些现在都已公开，所以不妨直呼其名了。不过，年轻人，您在这里又说亏心话了。屠格涅夫根本没讲自己“很伟大”，像您说的那样；也没讲因此别人在睡梦中都见到了他。他就从没有过这类念头，所以要说搞错了是绝不可能的。事情的原委再清楚不过了：杂志在聘请一个人，担心失去此人的合作，极力奉承，所以给他写了动情的信，提及过去的友谊，说现在甚至做梦还梦见他。可是当这人没有为情所动，不相信以致拒绝杂志之后，杂志上便开始散布说，因为不赞同此人的倾向，几乎是把他赶出了杂志。您看，不仅在梦中，就是在现实中，实情也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您又亏心了，年轻人！这一切您是知道的，明明清楚却说成另一个样子，这可不太诚实（自然是在文学上）。您在树立先科夫斯基、朱里-雅南、德鲁日宁

① 屠格涅夫在此文中证明，是自己主动脱离《现代人》，涅克拉索夫曾极力挽留。谢德林的解释与事实不符。

的声誉[1]，这值得赞赏，努力去做吧，但是：

从年轻起就得爱惜荣誉。

谚语是这么说的。莫非您已全部陷入《现代人》编辑部的利益之中，把过去的事都丢到了脑后[2]。当然，有才华的年轻人，您是在保卫您的新朋友，友谊是神圣的、美好的，但您不要以为屠格涅夫先生写了涅克拉索夫先生每天的梦就是重重地侮辱了他。因为梦见不在的朋友，依我们看是件值得赞赏的事，如果这是真诚的，而且白天里也同样想念，就用不着感到害羞。可是屠格涅夫先生证明：白天里并非如此，于是才发表这封信。当然，如果完全不讲这些信的事也许更好些，因为涅克拉索夫先生真的很可能梦见著名人物，甚至毫无利害的考虑。既然白天里完全是另一种情况，那又有什么办法呢。忍耐是有限度的呀。年轻人，您的一个想法实在太可笑了：把一个人弄来又拧又揪，推来搡去，掐他脖子，可不许他吭一声：抱起胳膊来笑脸相对吧！说一个人被赶出了杂志，一连讲了两年，可这人手里握着实据却沉默了两年，没有公开实情。如今他刚开始说出实情，自己反倒成了罪人。于是一个年轻却很有才华的笔杆子，刷刷地写给全世界，讲他的新罪行。好个调皮鬼！

① 这里指主要关心自己文章形式的那些作者。亚·瓦·德鲁日宁是当时纯艺术论的代表人物。朱利-雅南（1804—1874），法国著名的剧评家。

② 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指谢德林于19世纪50年代末同《俄国导报》和1862年同《时代》的合作，借此表示自己知道匿名作者是谁。

又是“年轻的笔杆子”[1]

答《现代人》文章：《〈时代〉的担心》

还是揪住不放！刚受到攻击就挺不住了！我预言过他会揪住不放的……啊，真是年轻的笔杆子！人家踩一下您的脚，您就这么尖声大叫。可您想一想，年轻而卓越的才子啊，二月里您是如何取笑 A.斯卡弗龙斯基的《文学署名》[2] 的呢？这会儿当一碰到您自己，您就大吼大叫，让整个宇宙都听到了：

Remplit les bois et les campagnes

Du cri perçant de ses douleurs.[3]

因此现在也可看出，确实还是个年轻的才子，没经过任何锻炼，却又抱怨人家说他“年轻”！

您对《时代》上的文章大为光火。在《〈时代〉的担心》一文中，您说走了嘴，提到了这篇文章。其实不该点出它来，不该讲受了它的气，所以您很愤怒，直想骂街，要不然就会大发脾气。您的文章好像是医生给您开的药方，弥漫着药房的味

① 载《现代人》，第 3 期。

② 参阅本卷前面《年轻的笔杆子》一文。

③ 法文：受难者让自己的呻吟声，回荡于整个森林与山谷之间。

道，散发着消毒水、醋、桂樱水的气味。这就叫做递过脸去给人打。实则这里正应当装出样子，好像对敌人的文章既未见到，又未听到。要是有人问：您读到了人家怎么整您吗？您就说：啊，胡扯蛋，有什么好读的，我哪有工夫去读这样的文章呀！A propos mon garçon①，“倒是西班牙公使昨晚好像举行了招待会?”②这样借西班牙的事就把话岔开了。

那时应该显得神气些、庄重些，有点上流社会的漫不经心的样子，而不是大叫：哎呀，好疼呀！现在倒是该表现出疼痛来。于是出现了奇文：《踩疼的脚。或称：报复的A.斯卡弗龙斯基》。疼点儿又怕什么，慢慢会好的。

我说这些是为了您好，教您学好。太没有经验呀！

您总的说来过于急躁。年轻人的麻利劲儿！您急于为自己辩解，越快越好，快点让公众相信：“我可不是这样。这全是由恼怒引起的。我是最杰出的才子。”当然，您的处境可以理解，我打内心里同情。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一个人用那么多时间在相当苛求的俄国幽默领域里效力，那么多年受到定期刊物的夸赞，那么多年过着快乐生活，所谓“采摘玫瑰花，浇灌紫罗兰”，突然一下子挨了骂。而且骂得很凶，什么“年轻的笔杆子”，什么“年轻人”(还有比这更可怕的骂人话吗?)。还把他与A.斯卡弗龙斯基等量齐观，说他模仿布拉姆别乌斯、德鲁日宁③（您

① 法文：顺便说说，我的小伙子。

② 这句话不是我们说的，而是30年代旧刊物《读者文库》上一个近卫军军官写的中篇小说的开头。我们在这里引用这句话不是没有意图的。——作者注

③ 布拉姆别乌斯男爵，是俄国作家、新闻工作者奥·伊·先科斯基（1800—1858）的笔名，他一般写上流社会生活，并批评过自然派（现实主义）。亚·瓦·德鲁日宁（1824—1864），俄国作家，评论家，纯艺术论者。

定会承认,正是说"德鲁日宁"对您刺激最大。不是吗?我还是了解人心的嘛)。最后,还说您的评论文章,全是为艺术而艺术,是享乐之花朵,是闲适之作,是年轻的笔杆子因一时兴至倾洒下来的珍珠。

喷水池溅起一颗颗珍珠①

一片文字的喧嚣,灵活的军人烟鬼② 喷出的烟圈,(更糟的是)在文坛上的左摇右摆,还有对《残疾军人报-现代人》③的所谓文学的补充。就补充问题人们竟向您这位进步人士提出了各种主意,况且您并非是个普通的进步人士,不久前由于编辑部的需要还转换成了虚无主义者。在玩弄廉价的戏谑文学那么多愉快的年头之后,这是您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们如此看待。试问怎么能不怒火中烧,怎么能不爆发出来,怎么能不爆发出来呢?啊,我的 du lendemain④ 虚无主义者呀,请您相信,我真太理解您的处境了……

我们暂停下来解释一个微妙的问题。

---

① 这句诗是俄国作家弗·克列斯托夫斯基(1840—1895)写的。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喜欢这首诗,但谢德林曾在评论克列斯托夫斯基的《诗集》(1862)时,说后者是"二流"诗人,是诗人阿·迈科夫的模仿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感到不快,此处引用此诗,意在讽刺谢德林的评价。

② 不明所指。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利用《〈俄罗斯残疾军人报〉文学增刊》的报名,旨在强调从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和杜勃罗留波夫逝世之后,《现代人》杂志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已丧失其主导作用。——俄编注。按:此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巧妙地把《现代人》杂志与《残疾军人报》连缀一起,似说《现代人》已经是"残疾人",因此,不能再具有过去的主导作用了。

④ 法文:来日的。

您痛苦地抱怨说，我们总是叫您“年轻人”，年轻的笔杆子，年轻而出色的才子等等。全是年轻的。您觉得这不礼貌，很气愤（如果您不感到痛苦，就不会这么表白了）。噢，是缺乏经验呀！您的抱怨本身就是年轻的最好证明。哪个青年听人叫他年轻人不感到受辱呢？哪个青年不用铅笔刀刮胡子，好让胡子长快点呢？我同意，这些都标志着温情美好，标志着春天和青年的愿望……尽管如此，您还是彻底暴露了自己。不过您放心，我郑重地说，当我暗示您的年轻和阅历不足时，我不是直接指您的年纪，我用的是借喻。实际上我根本不关心您年龄的大小。在《年轻的笔杆子》一文中，我说的只是您在俄国报刊界的幼稚和缺乏经验，所谓初出茅庐。我的话也不带任何恶意，绝对没有！我看着您，真诚地欣赏您，欣赏您的灵巧麻利，青春的活跃和古怪的作风，这可说是文学界年轻才子第一声高兴的尖叫。我喜欢这第一声尖叫，年轻人！我觉得您在某种意义上是俄国文学界的骠骑兵，是祖国文艺界中年纪小、红脸蛋的骑兵少尉（好像在《烧焦的木头》里提到的“吹管乐器的骑兵少尉”①）。所以请您放心。您失策了，您没能隐藏住自己的脚给人踩了一下。大胆些！以后您会改正的。哪一个士兵不希望当将军呢！

然而（我仍不能忘怀此事！），又何必如此狂怒呢？何必如此神经质呢？何必弄得如此满嘴吐沫呢？为什么闹到非用药水不可的地步呢？要知道您骂起来好像《烧焦的木头》的编辑，而这对一个搞文学的人来说是再糟不过的了。您这样就离指责

① 1862年10月19日《火星》周刊发表一篇讽刺小品，讲一个无知的高官误把一种吹奏乐器的名字据谐音解释为“吹管的骑兵少尉”。此处是戏用这个故事。

人家办有烟厂只一步之遥了①。您的全部作品，不过是《烧焦的木头》的翻版而已。而且据说《烧焦的木头》现在还如持斋般节制自己，从打征订以来一直在节制……（Vous comprenez，n'est ce pas?②)

年轻而缺少阅历的才子呀，我现在仿佛真切地看到您收到《时代》2月号时的样子。有人把杂志送来并说里面有篇文章反对您，题名是《年轻的笔杆子》。您不屑地一笑，傲慢地打开杂志。这一场景如画一般展示在我眼前。如果当时您家里有客人，或者您在别人家做客，您读完文章自然极力控制自己。可是您那神经性的战栗，嘴唇的抖动，脸上一块块紫红，全都明显暴露出您那渴求赞扬的心里一时充满无限的愤恨。您也试图装出笑脸说："一点儿也不尖锐……"可您没有成功，说出的话显得十分可怜。起码客人们都大感窘迫，不敢正眼看您，想赶忙讲点别的。这一切您立刻就发觉了……但您会记得回家后痛苦的一刻，您单独一人，把憋在心里的怒火尽情发泄出来。您还记得是怎么砸坏了椅子，摔碎了您的桌上的茶杯，在盛怒下攥起两个拳头拼命捶墙。您满嘴吐沫，发誓要写出这样的一篇骂人的文章，它像宇宙那样亘古长存，在世上和文学中都是前所未有的！于是便出现了您的《〈时代〉的担心》。噢，请您相信，我没有必要去买通你们印刷厂的排字工（您责怪我们这样做)，我知道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亦即打碎茶杯，用两个拳头捶打墙壁等等。我光是根据想象，根据您回敬文章的精神和语气就知道一切。要不然怎么解释您的这样的文章呢？哪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兄米哈伊尔是《时代》杂志的发行人。他曾是卷烟厂的工厂主，《火星》周刊多次利用这一点讽刺《时代》杂志。

② 法文：您明白吗，不是这样吗？

里来的那么多狂怒和肝火呢？在这篇文章以及同一期《现代人》3月号上其他攻讦《时代》的文字中，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谩骂，那么多的对个人的谩骂呢？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用不着找什么排字工人。

说到此，您知道吗，我完全相信是您亲自写下了《〈时代〉的担心》，您却称文章是您的朋友，某个年轻的虚无主义者寄给您的。换言之，您躲到了桌子底下，用一个虚构的朋友名字打掩护。手法太幼稚了。好像说：科斯坚卡躲起来了，保姆来找吧……可您还怪罪我们给自己写信。不仅如此，我甚至完全相信：您那文章后的编辑部附识中，关于隆吉诺夫先生身材肥胖的莫斯科信息①，这一切都是您的，是您的手笔。当然我没有任何亲自触摸到的事实，但我坚信这一点，我有这种感觉。既有这种信念，您又能奈何它！其实还是您的错，为什么要隐瞒呢？您是不是还有什么特殊的目的？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您谈起了印刷厂的排字工人。这见于在您的文章后面《现代人》编辑部的附识之中。原话是这样的：

> 这一见解惊人地确切。《时代》在第2期中为了欺侮我们的一位编辑，就《现代人》第1卷里对斯卡弗龙斯基先生《文学署名》所作的评论，刊登了一篇文章《年轻的笔杆子》。文中首先把我们的编辑比作布拉姆别乌斯男爵，其次与他打交道时一直称他是“年轻人”。两年前《俄国导报》丝毫不差地也曾这样相比，也用过这个称呼，《时代》全是由此借用的，当然又加进了自己的胡说八道的话。这就是说什么我们这位评论家“陷入了《现代人》编辑部的

① 这里指的是谢德林以笔名“K. 古里”发表的《莫斯科来信》中的一段话。

利害关系之中，把过去的事都丢在了脑后……”读到这些话，我们久久地惊愕不止。这是什么话呀？要知道那篇评论是没有署名的。《时代》的问罪，是针对谁的呢？再说《时代》怎么能知道到底是谁写了令它如此激动的评论文章。也许，《时代》习惯于向印行《现代人》的印刷厂排字工打听消息？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要告诉您，《时代》啊，给您讲了对您有用处的消息的排字工人，其实骗了您。您轻率地以过去的事兴师问罪的那个人，已有四年经常地而且也仅仅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作品。如果说去年《时代》上也刊载了他的几个短篇小说，那只是因为《现代人》停刊了，而保持缄默对文学家来说并不总是那么舒服。所以，《现代人》的利益对这位评论家来说一向是很亲切的；所以，谈不上什么陷入利益之中；所以，您的话以及一切您的言论，实际上无非是在荒漠里议论荒漠。至于您在同不相识的评论家辩论时引用了成语“名誉得从年轻时起就爱惜”，应该说这可鄙的行为是您一时忘乎所以，今后当不会再发生了。——编辑部

好哇，这回我可捉到您了。您知道我想怎样么？我想揭穿您，我想向全世界表明：您是什么人，在我国文学界是怎样的活动家。揭穿之后我要给您本人提个问题：能够同您认真地干点什么事吗？问题全在于您以为我不会揭穿您。

首先关于排字工。您觉得奇怪，我怎么能知道您的名字，就估计我一定是买通了排字工人。尽管您这里藏有恶毒的念头，即向公众表明我们是那种收买排字工对别的杂志进行间谍活动的人，也就差不多是偷拆别人信件，然而我把这些全都看做小事一桩。您被深深刺痛，再加上生性好斗，巴克莱·德·托

利[1] 终于活动起来了……一句话，作为头一遭，还是可以原谅您的。况且您自己也知道，这事细究起来是很丑的。您隔洋呼吁[2] 人们参与《现代人》的工作，当然意在抬高《现代人》，这一点编辑部在启事中已经讲得很多，从而认出您来是很容易的。所以这件事是搞清楚了的。可问题不在这里。主要在于我如今可以面对公众直呼您的名字，同时揭发您故意伤害我们，在一件小事上歪曲真相。请听我讲来。

您要让人们相信（也就是《现代人》编辑部要让人们相信。我认为这两者是一回事，我也有权利这么想。我肯定地知道，您同编辑部的利害是一致的，因此编辑部在您文后加的附识，不可能绕过您。您知道这个附识，很可能是您自己看的校样。这不可能不通过您的手。还有可能，这是您自己写的，如同文章一样，文章我坚信是您写的。因此，对附识中写的一切，您就应该负责。为什么我如此激烈地讲自己有说出一切的权利，如此不客气地当众抨击您无数的化名，这一点您稍稍往下读就马上明白）……在您的文章附识里您要人们相信："我们（据您说）轻率地以过去的事[3]兴师问罪的那个人（也就是您），已有四年经常地而且又仅仅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作品。如果说去年《时代》上也刊载了此人的（也就是您的）几个短篇小说，那只是因为《现代人》停刊了，而保持缄默对文

---

① 巴克莱·德·托利（1761—1818），苏格兰人，俄国公爵。1812年卫国战争时期，任国防大臣及第一集团军司令，旋任总司令。以军事行动缓慢，遭到社会非议，因此他的姓氏成为标志任何延误时间的代名词。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用"隔洋呼吁"一语，明显暗示谢德林曾是官僚，后者从1862年初才从特维里省副省长离职，回到彼得堡。他曾多年投身于写作与编辑工作。

③ 参看《年轻的笔杆子》，载《时代》，第2期。——作者注

学家来说并不总是那么舒服。”

您先记住这一点。现在看《〈时代〉的担心》一文的另一处，您写道：

> 你们还夸耀说，公众喜欢你们，你们有许多订户。你们知道这该感谢谁吗？你们在这点上得感谢《现代人》，它有段时间错以为你们能够做成点事，就着手引导你们如何走上正确的道路。你们在这点上还得归功于《现代人》的暂时停刊，从而所有的文学力量一时间都集中到了你们那里。在这里助你们一臂之力的也不是你们自己的胡说八道，而是别人的挫折。

简而言之，要是《现代人》不出事，也就是它不被迫在6月停刊，那依您看来，文学家们就不会把自己文章拿给我们。您去年把文章给我们发表，唯一的原因是《现代人》不出版了。这一切都很清楚，因为我们的杂志本身太无足轻重，毫无价值，所以能在《现代人》发表的时候，连您这样年轻而出色的才子也不肯来我们这里。这一点很明显，有一次《随笔》报上也讲得非常好，在那儿有位先生已经接受了您的思想，写了一篇长文恶毒地骂我们。下面这段引文就证实了您的想法：

> 《时代》的成功，有赖于某些在杂志上发表的小说，可它们的性质和倾向与《时代》的关系，犹如鲜花与严寒的关系。这里登过奥斯特洛夫斯基、谢德林、波米亚洛夫斯基①的一些作品。这里也刊出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其中有那个甜腻腻的主人公瓦尼契卡，还登过《死屋手记》。总的说，《时代》的

① 尼·格·波米亚洛夫斯基（1835—1863），俄国作家。

小说栏有时办得相当好，但这不是编辑部的功劳。火灾帮它把杂志美化了许多。在彼得堡火灾之后在《时代》登过自己文章的作家们，如今公开声明，他们是痛苦无奈才被挤到这个杂志上去（见《现代人》，第3期）。

《随笔》报上这篇文章最后的署名是伊·德米特里耶夫。我们在此向公众声明：就是这位伊·德米特里耶夫先生亲自将一篇名为《外省报刊》的文章送到我们杂志社，我们因它没有分量退了稿。现在这文章出现在《现代人》（第1、2期）上，而作者本人在各报刊上骂我们，却声明说作家们被挤到我们杂志里是出于痛苦的无奈，也就是由于《现代人》的被查禁。

当然，《时代》拒绝刊登伊·德米特里耶夫先生的文章，这一情况必须考虑进去。不过，有一点令我们感到特别奇怪，《现代人》停刊后，为什么伊·德米特里耶夫先生偏偏找上了我们的杂志？难道除了《时代》之外，没有《祖国纪事》、《读书文库》、《俄国导报》以及其他许多周报吗？为什么这些出色的才子（即德米特里耶夫先生与“年轻的笔杆子”）自己拥向了《时代》，而如今却说是出于无奈，即因《现代人》被查禁而给挤到我们这里来的？

这是该放在括号里的话。现在对您说。

假如我立刻把您揭发一下，您怎么办呢？我可以证明您没说真话，我能指名道姓，讲出您在《现代人》停刊之前，也就是不存在无奈的情况下，在我们杂志上发表了哪些文章。我有这个权利，尊敬的先生！您既想破坏《时代》这个刊物，就给了我们这个权利。而您破坏刊物的愿望，是再明显不过了。您敢说不是吗？您的模仿者已经在其他报刊上学您的话大喊大叫，说“火灾帮它把杂志美化了许多”。因此，我们此刻最合

法的辩护方法，就是依据事实充分揭露您的假话。

难道真可以假设，当您公开讲了假话的时候，您指望不受惩罚？也就是说您以为：人们不会知道是谁说的，因为没有署名嘛，所以也就揭露不出来。我就咬定只是出于无奈才被挤到他们杂志上去的，别人也定会跟着说，事情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尊敬的先生，我不相信这个，也不愿相信。您想损害我们，这的确如此。然而，难道您真想从暗处放冷枪吗？真想用化名隐藏起来，希望不被揭露吗？我不相信这个，所以再一次同您好言相待：尊敬的先生，我不会说出您的全部真名，也不会说出您的文章的标题。

由于这个缘故，我现在只想说明，第一，《时代》去年4月号登载了两篇您的文章。

第二，您自己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去年4月《现代人》还在出版。而且，无论是《现代人》或世上别的什么人，都还没想到杂志6月要停刊。因此，尊贵的先生，您是自由自在地，完全自愿地向我们杂志提供了文章，尽管《现代人》还在出版，尽管谈不上是痛苦无奈地来找我们①，而不是找《现代人》。

① 《现代人》暂时停刊，并没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这没给我们添任何一个重要的新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波米亚洛夫斯基、谢德林诸先生在《现代人》停刊前很久就给我们撰稿了。《现代人》的撰稿人中，更没有任何人参与杂志第二栏的写作，这也罢了！在去年的四千三百个订户中，四千个是《现代人》停刊前就已经订了的。“年轻的笔杆子”知道得很清楚，征订工作到夏天就几乎停止。从7月到年底，我们的订户未必能增加三百个。所以，《现代人》的停刊，也没有使我们增加订户。——作者注

如今倒要请问，对这一切该作何感想呢？请问现在我同您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呢？

我知道您有个托词：这一切全是《现代人》编辑部登出来的，不是您干的。算了吧！您试试否认参与《现代人》编辑部给《〈时代〉的担心》添加附识的事，那样我们就会被迫进一步揭发您，公开讲出来我们是从谁那儿详细了解到您与《现代人》编辑部的亲密关系，看一看这个编辑部在《〈时代〉的担心》一文后加的附识，能够绕过您吗。不过请注意，您现在也还有权刊登这些东西，因为您怀疑我们收买了排字工人，其实您明知我们是从谁那里知道了您要为《现代人》撰写小品文。您关于收买排字工的诽谤，使我们有充分的权利为自己辩护，因之也使我们有充分揭发的权利。

这很自然也很合理。

现在，让我再揭发您一条。

在您文章的附识中讲了这么一段话：

> 至于您在同不相识的评论家辩论时，引用了成语："名誉得从年轻时起就爱惜"，应该说这可鄙的举动是您一时忘乎所以，今后当不会再发生了。

您看，话说得那么凶，实情却隐瞒起来了。您为什么要向读者隐瞒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您如果把一切全讲出来，您的读者定会明白我们的举动绝不可鄙视，却是十分合理的。事情是因屠格涅夫而起的。您在自己的文章《文学署名》中，提到屠格涅夫不久前在报上说过，他伟大到了别的文学家做梦也梦到他的地步。我在《年轻的笔杆子》里揭露了您，并向您证明了屠格涅夫从没在任何地方讲过别的作家因他伟大而梦见了

他。他针对涅克拉索夫先生的揭露信，无论字面上还是内涵上，都不能说含有这个意思。我澄清了一点：这个话和这个意思是您自己加上去的。您要知道，问题完全不在于屠格涅夫作为一个作家您是否喜欢，或者说他是顽固落后派还是进步派。这里的问题很简单：您用有害的不实之词诽谤一个人，而且是不在场的人。是您把自己杜撰出来而他本人从未说过也没想说的话，强加给了他。因此您就让他的性格具有了您臆想出来的可笑又可鄙的特点，从而有意地损害了他在公众眼里的形象，而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现代人》编辑部的利益。这一切难道不是昭然若揭的事实吗？恐怕您也不好意思否定这一切，因为事实俱在，谁会相信您呢？您记得吧，正是这个《现代人》被屠格涅夫彻底揭露，通过在《北方蜜蜂》上公开涅克拉索夫先生的信，证明他对屠格涅夫的攻击显然是不公正的。您对此十分了解，却还决心维护《现代人》。依我看这是很糟糕的。不过我郑重保证，过去和今后我都坚信，您干了这不光彩的事，并非出于某种粗俗的个人利益。这件事在我看来所以可笑，就因为我觉得您完全无私，心地太善良，强烈希望《现代人》满意。您陷入《现代人》的利益之中，坚决做出这些事来，哪怕可能谁都不肯原谅您。在这件事上您可谓 plus royaliste que le roi①。这是我深信不移的，直到现在仍然这么看，所以我才用了成语：

名誉得从年轻时起就爱惜。

① 法文：比皇帝本人更像保皇党。按：这是法国作家弗朗索瓦·勒内·夏多布里昂（1768—1848）说的话，后来成为名言。

这意味着，如果我不假定您有名誉，也就不会在文章中跟您说，应该爱惜它。因为既然无所有也就无可爱惜了。而且我对您的议论品评，也只限于您作为一位文学家。但尽管我们有这些考虑，您还是有亏心之处，就是出于败坏人的目的而做了“文学性”的补充。您把这种补充同我们上文揭露的“痛苦无奈”的补充比较一下，看看能否说我的揭露是可鄙的行为？可您在《〈时代〉的担心》的附识中却当面违心地这么说！①

在申说上述种种看法之后，现在我想讲一讲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我是怎样看您的。

您的气质是以艺术为主，您在文学中所做的一切，都不外乎为艺术而艺术。您依附《现代人》不是出于信念，而是想为艺术而艺术（因为《现代人》自己现在几乎就没有了信念，要求您有信念未免太过份了。再说您从青年时起也就很容易满足）。您在这杂志上起步，便是通过为艺术而艺术。您马上为一种新的魅力所吸引。想助您的杂志一臂之力的十分美好的愿望，由于您的诗人气质，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您从一个普通的自由主义者，一下子变成了虚无主义者。可是天知道，您算个什么虚无主义者呢？要知道您的虚无主义，也无非是讥笑隆吉诺夫先生身体肥胖而已（您对他直呼其名，真妙！）。可是您的

---

① 我说是“当面”，尽管在《〈时代〉的担心》附识后署名的不是您，而是《现代人》编辑部。但因为附识的写作不可能不通过您，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再说一遍，您大概很不满意，为什么我总是十分肯定地把您同《现代人》编辑部混为一谈。我也再回答一次，我所以肯定地这么说，只是因为您诬蔑我收买《现代人》的排字工，从而自己给了我这个权利。想想看，为了反驳您的诬蔑，我当然必须说出是从第一手消息知道你们的情况和动机的。那么，既然我一切都了解，有什么必要去收买排字工人呢？——作者注

整个虚无主义，也无法告诉您，您的身材细瘦可有什么特殊的优越性。而由于缺少信念，您如今只能在两个矛盾中间游移不定，并且十分满意。至于您如何力量微薄，从您至今还惧怕卡特科夫就可以看出。您对我们说："他要是打您一巴掌，您连吭一声也不敢！"拿莫斯科这位活动家来威胁我们。这话是意味深长的。您甚至不相信（而且您从来没想到），谁说假话谁就软弱无力，就算他有三俄尺高的个子。当您写您的揭露文章时，您也并非从某种义愤出发，或从某种信念出发，而只是因为揭露是所谓的时髦风气。作为文学家，您比纳吉莫夫[①] 高在哪里呢？纳吉莫夫断言，就是该喊叫得全世界都听到等等。我要让您相信，我觉得他还比您高些，因为他尚有某种天真的社会目标。可您呢？只是为艺术而艺术，别无其他！为艺术而艺术似乎不可能是揭露性的。我向您保证，您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您龇牙大笑，却像在表演龇牙咧嘴，因为您的描写根本不真实，为爱艺术而加以歪曲。在这些现象中您大概忽略了并不可笑的一面。因而您的揭露肤浅得令人吃惊。虽然无疑是很俏皮的。此外，读起来总觉得有些必要的东西还没有说到，意思还不完全。再往下想，则又打心里谅解您了，不由得想您哪里是什么虚无主义呀！您作为文学家，生性就好斗，又深信自己有揭露的权利，可您能够否定什么呢？比如说，您既然如此莫名其妙地独立不羁，又能否定自己身上的什么东西呢？当您写作自己的揭露作品时，我相信，您从未想到您自己也很像您的主人公，从而感到痛苦，实则任何一位揭露者都必然会有这

---

① B. A. 索洛布剧本《官吏》中的主人公，主张用大喊大叫来根除舞弊。谢德林曾讽刺这一主张过于肤浅。此处则借此讽刺谢德林本人。

种想法。您有的仅仅是冷漠的笑，当然是在您的自尊心没有受到刺激之前。而到那时可就不得了啦，一切都见鬼去吧！恨不得生吞活剥（您反对我们说过的话）。您的创作不是讽刺，而是龇牙咧嘴，所以您的活动不是一种事业，而是为艺术的艺术。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真诚地从内心深处原谅您对“文学的补充”的爱好，也绝不认为这是什么很坏的超出文学的举动。您做这类“补充”是极其天真，十分幼稚，纯粹出于善意。您的狠毒、气恼、俏皮，同样是天真无邪的，因为这一切全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您是位艺术家，所以技痒难忍，抓到什么都要当做珍宝。

您受到虚无主义者的吸引，甚至不怀疑这是否真的是虚无主义者，是否有这样的虚无主义者。您归附他们，真心实意地相信他们比一切人都强。您至今没有发现，这一切浸透着那么多漂亮的陈词滥调，反映着那么多的沾沾自喜，那么害怕否定，那么虚弱而不能独立存在，非得拉某种社会思想、某种漂亮的盖子作遮掩。需要遮掩——这就是我们文学界虚无主义者的特征。此外，您还得恭敬对待“烧焦的木块”，要尊重它以便找到一个伙伴。您不可能像我们那样行动，您不敢大胆地反对那些圆滑狡诈而本身糟糕透顶的人。您不像我们那样不怕招来众多敌人，您说我们干什么都只有点滴的东西。倘若我们像您一样，倘若我们只希望听到掌声，像您那样盲目相信，那么我们会立即归附您，无疑会给自己找到一个轻松的前程。照本宣科是很容易的呀。某个“专事揭露的诗人”[①] 在文坛上游

① 指Д. Д. 米纳耶夫（1835—1889），他曾多次用讽刺诗攻击《时代》杂志。

荡，犹如某个不眠的神女在彼涅河岸上徘徊[1]，而一旦投向《火星》周刊漂亮的陈词滥调，便成了一位伟大人物。我们挺身反对牟利的吹哨者，我们说出了神圣的真话，您为此盲目地谩骂我们，说我们是脚踏两只船。唉！真是年轻缺少阅历呀！是《烧焦的木块》里哪个虚无主义者教会了您这样呢？请您相信，正是由于这些牟利的吹哨者（您也靠近了他们），神圣的真话才败下阵来。这正是应该千方百计加以根除和消灭的。社会已经厌恶他们，视为累赘而要抛弃。您会看到，当神圣的进步思想摆脱现有的可憎阴影，以新的面貌显露时，您可能认不出它来而当做是顽固落后。您以连篇累牍的俏皮话要我们相信，人们并不是骂我们，这纯是我们臆想出来的。您说："凭什么不喜欢你们呢？"您的话我们只当做开玩笑，不过您得承认，您的笑声里也藏着狠毒。用不着您来指点这个指点那个。我们向来是首先发难来进攻和揭露的，所以对别人骂我们毫不感到奇怪。要是真如您所说，没有谁骂我们，您为什么又冲着我们怒气冲天呢？这已经连着有三期如此了。开始还是在去年，在《现代人》停刊之前，因为这个杂志当时对自己过去广泛的影响，感到严重地担心。您还记得安东诺维奇先生的文章《论时代精神》吧。文章暴露了自己。于是您便开始了斗争。秋天又有《祖国纪事》参与，之后是《读者文库》，是《随笔》。《随笔》已是第四次攻击我们，意要把我们吞掉。还有《火星》周刊，还有《俄国言论》，后者是《现代人》在一面小镜子里的映像。您回想一下，他们反对我们是那么疯狂，那么仇恨，以致因为我们而夜里连觉也睡不好。假如能睡着，我相

① 神女，古希腊以来神话中体现自然力和自然现象的神，数目众多；彼涅河不详。

信也会是天天夜里梦见我们（既然说到了做梦，我们也讲一次吧）。要知道，是我们养活了我们这所有的拙劣诗人以及他们的孩子。可为什么会是这么个结果呢？就是因为只有我们有勇气尖锐地指出这些进步派的无能、庸俗、懒惰和恶劣的全部真相。您会说卡特科夫、斯卡里亚京、阿斯卡琴斯基都做了同样的事。不对，不是一回事。他们是鼓吹黑暗，我们是鼓吹光明。他们的话没有人要听，我们的话却有人听。您不要说我们脚踏两只船。无稽之谈！这恰恰是一条道路！您一直就坐在地上，所以想不到这里。也许您能够想得到？不，您永远也想不到。要知道我们的预言应验了，“牟利的吹哨者”果然冲着我们大喊大叫，说我们攻击他们就是攻击进步。可他们代表什么进步呢？这只是把伟大思想在大街上拖着走的平庸之徒。我们只凭一点就比他们进步一千倍，这就是我们没有偶像崇拜，我们不把进步同这些愚钝的代表们混为一谈，我们不断把他们当做一群蚂蚁驱散开来。我们乐于看到他们如何地蠕动爬行。很快我们又要把他们驱散开来。我们说的是实话，还要说得大家都明白。所有这些勤劳的蚂蚁都不懂得我们在进步方面远远走在他们前面。您说我们不理解什么是权威，把他当成一般人。噢，这可是二年级小学生的怨言！我的虚无主义者呀，您凭这个得了多少分呢？我对您说个权威的思想：牟利的吹哨者自古以来到处都有！平庸就是进步停滞不前了。凡是有前进运动的地方，头脑中便不该有平庸。什么地方要是为了牟利和文学官衔而出卖进步，那里就是一片荒芜。这可说是进步派官僚势力的进攻。您正是投靠了这股势力，以为它很强大……

够了，看来全说完了。我与您聊起没个完！其实我不打算在您面前为自己的方针辩护。有什么必要呢？只是顺便又想起了点事。有一个情况需要提一下。您讲到我们写道：

“不仅如此，我甚至想，如果承认布尔加林传统是有力的，那么这一传统也涉及到了你们……自然，目前还仅说到无可厚非的方面。”

您看，虽然我觉得您的话毫无价值，但对“目前”一词却不能放过而要加以说明。我要对您讲，我觉得布尔加林现象的最本质的特征，是发展到畏缩不安的自我保护。虽然您也责怪我们有布尔加林倾向，然而我们不曾理智到如此过分地自我保护和畏缩摇摆（如布尔加林那样），也就是“让别人完蛋吧，只要我没事就行”。这才是布尔加林之流的真正的座右铭。您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证明我们内心遵循着这类的座右铭。谢天谢地。我们的名声是干净的，而您用的那个词儿却是无的放矢。

到此全已说完。自然，我曾考虑给您写首诗，作为对您的诗作的一种 pendant①。您在自己的诗中把我们比作鸭子以及其他禽类：

他们在幽僻处和静湖上游弋，
生下了斯特拉霍夫和灰暗的科西钦，

生下了灰暗的科西钦，白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他们平和地过活，在林丛中闲聊。

可是没有办法，您的诗我也觉得很蹩脚，而我又什么都没

① 法文：补充。

写出来。您知道吗，我写来写去总是扬抑格，真有点难为情：

《世纪》啊《世纪》，还有列夫·坎别克，
列夫·坎别克，还有《世纪》啊《世纪》。
吹着考涅特乐号的，
是斯特拉霍夫“星球的居民”。①

我就杜撰了这些，不过好像还有两行：

噌、噌、噌，噌、噌！
年轻的笔杆子！
哦、哦、哦，哦、哦！
好哇，如此壮观的鹅！

这是对您写的鸭子的补充。不过我的诗也好，您的诗也好，全都不怎么样，好像在破三弦琴上乱弹一气。其实我的诗需得拖长吟诵，才能出点味儿。必得两手插腰，绕着屋子大跺其脚。这样也许听来不错，谁知道呢。其实，随您怎么看了，悉听尊便。

我还想问一个微妙的问题，您在《〈时代〉的担心》里讲到P.奥莲卡和H.马申卡，是怎么回事?② 我百思不得其解，但

---

① 作者写此诗，是讽刺性模拟《火星》周刊的讽刺诗。尼·斯特拉霍夫曾撰文《星球的居民》，受到《火星》、《现代人》的讥笑和批评。

② 谢德林在针对《时代》的文章中曾写到：“你们何必用假名字呢? 你们同读者交谈，干吗采取某个马申卡给某个奥莲卡致信的方式呢?”他意在讽刺《时代》不具编辑真名而伪托读者来信。这里是《时代》反唇相讥。

很感兴趣。我琢磨了许久，莫非这是一种隐喻，又想不对，是要显示一下知情吧，哪有什么隐喻呢。显而易见，这是好斗性的表现。其实天晓得您要说什么，弄不明白！还有，您该写得轻松些，我这么说，因为知道您有才气，能写得有趣些。干吗要扯到非用药水不可，不对吗？不过偶尔你也有令人开心的想法，比如您说：

> 如果想要，这样的诗我可以马上写出五个印张。如果想要，像《时代》1863年第1期这样的书，我每个月都可写出一百本。

哎呀，太可怕了！骠骑兵大砍大杀的劲头！立即看得出是典型的军人！……不过到此为止，再见了。

P. S. A propos[①]：请向P.奥莲卡和H.马申卡问好，如果她们实有其人并非虚构的话。这么一来，结尾倒还满有趣的……

> 怎么能不爱骠骑兵！
> 这可不成……

① 法文：噢，对了。

《时代》编辑部[①] 答《莫斯科新闻》的攻讦

《莫斯科新闻》第109期上有一篇反对我们的文章，针对我们写的《一个不祥的问题》[②] 一文，其中充满了诽谤和……影射，署名是彼得松。

---

① 我们收到此文时还收到了下面的信：

尊敬的瓦连京·费奥多罗维奇先生！（按：瓦连京·费奥多罗维奇——B. Φ. 科尔什（1828—1893），《圣彼得堡新闻》的主编。——译者）

《莫斯科新闻》第109期刊登了一篇反对我们的文章，需要立即回答。文中责备我们维护波兰的利益而损害俄国的利益。除非对俄国期刊一无所知，才会把这类罪名加在我们身上。倒不如责备《时代》有极端的俄罗斯民族的倾向，当然在波兰问题上它也不会违背自己三年来的活动方向。

由于《莫斯科新闻》的文章需要迅速地回复，而《时代》的下一期还需几日才出版，如贵刊能刊登我的回应，我将非常感激。

尊敬的先生，请接受我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

（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即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兄，当时为《时代》名义上的发行人与主编。——译者）

② 作者为尼·尼·斯特拉霍夫。《时代》杂志因发表此文而被停刊。

此文是这样写的：

“像《一个不祥的问题》这类文章，发表时不应没有作者的署名，只有匪徒才戴着假面去袭击。Quand on a son opinion，il faut en avoir le courage.①

整篇文章建立在虚假的证据上，因此结论自然是虚假的。难道拿波兰上层阶级的文明与整个俄国人民的文明相比较，这不是虚假的吗？难道声称波兰人是怀着普及文明的目的占领了乌克兰和莫斯科，这不是谎言吗？奇怪的是，波兰人对异国人民怀有如此高尚的追求，可对自己的农民却如对待牲口一样。莫非他们认为让犹太人操纵小罗斯的教堂是取得文明的手段？波兰作为一个整体从未行动起来。行动起来的只是小贵族和天主教教士，而人民群众亦即农民，从来不同情地主，因为奴隶不可能同情自己的压迫者。整个波兰历史表明：这个文明的人民向来不讲究政治上的分寸，而野蛮的俄罗斯早在1612年就证明自己能高度地掌握政治上的分寸。那么，国家智慧上的优势在哪一边呢？现在起来造反的只是波兰的一小部分，而俄罗斯却全体一致地给予反击。是不是别人会想，文章署名中“俄国人”一词包藏有阴险的意图。很自然，波兰人会急于把这篇文章译成所有欧洲语言，并对人说：“你们看，俄国人自己是怎么想的。难道我们说得不对吗？”以后如何纠正欧洲人的看法呢？欧洲本已向我们身上泼脏水，诽谤中伤了。

《时代》杂志编辑部有充分的权利刊登《一个不祥的问题》一文。不过，刊登这篇作者不详的文章时，它最好是说明一下，自己是否同意作者的意见。这位作者的姓名如果为人知道，任何一个真正的俄国人都会怀着蔑视来念作者的名字。

① 法文：如果有自己的意见，应有勇气捍卫它。

我们当然可以不回答彼得松先生，甚至也不回答《莫斯科新闻》。很久以来我们便努力丝毫不谈《俄国导报》和《莫斯科新闻》了。可是……形势所迫，需要防止糟糕的后果。

彼得松先生，您说：第一，我们的文章建立在虚假的证据上。什么东西虚假呢？这虚假的证据是什么您没有加以解释。您只是说："难道拿波兰上层阶级的文明与整个俄国人民的文明相比较，这不是虚假的吗？"

这话是什么意思，这里有什么虚假？为什么是虚假的呢？

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所以重要，就在于波兰人及其自己全部的（毫无疑问的）欧洲文明，"从根本上说带来的是死亡"。在我们的文章中，这一点是讲清楚了的，极其清楚，而且指出为什么是这样。原因就在于"这一文明不是人民的文明，不是斯拉夫的文明，它没有任何独特性，所以不能与人民精神结合成稳固的整体。"这里就不能不加以比较：波兰的文明是上层社会的文明，失去了平民因素，脱离了人民精神，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

整整三年里我们在自己杂志上宣传了什么呢？正是：我们（今天的俄罗斯的）的借用的欧洲文明，在其不同于广泛的俄国精神的方面是不适合俄罗斯人民的，这叫做削足适履。而我们有着自己的因素，自己的本原，人民的本原，这些都要求独立自主，要求自我发展。俄国大地会讲出自己的话，这是新的话，这新话可能成为全人类文明的新话，并表现出整个斯拉夫世界的文明。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过去也是这么说的。在我国人民的文明中，我们总能看出平民的标志，而在欧洲文明中却是贵族的标志，特殊地位的标志。不仅如此，我们承认：我们这些接受欧洲文明的俄国人，全都脱离了根基，丧失了俄国人的辨别力，以至于不再相信俄国自己的力量，不相信自己的

特点，在彼得大帝时期的荷兰面前像奴隶一般屈膝下跪，讥笑“人民的本原”，视之为保守落后，视之为神秘主义。

您也是这样，彼得松先生。我们在自己的文章中触及您连做梦也不敢碰的东西，触及了连亚历山大一世皇帝都认真而诚心尊崇的东西。正是出于对波兰文明的崇敬，他给了波兰人高于俄国人的地位[①]，认为俄国人远远低于受到教育的波兰人。

就这样，我们甚至触动了这一点，触动了他们的欧洲文明本身，触动了他们的教养，他们的骄傲和荣光。彼得松先生，如果对波兰人和对您来说，这种文明还是骄傲和荣光，我们则认为它一钱不值。正是因此我们才写了这篇文章。您根本就没想到吧。告诉您，为什么您没有想到。就是因为您本人崇拜波兰文明，因为您妒忌它、羡慕它。您感到委屈，“我们不也是受过教育的吗。”您为什么委屈呢？因为您的头脑里从来没有过另一个标准来衡量俄罗斯人的长处和发展，quand même[②]只有一个欧洲文明。您只承认这个标准。您不承认民族的发展，您不承认俄罗斯族有其独立的人民本原，于是出于您的英国化了的爱国主义而深感屈辱，怎么波兰人竟比我们更有教养，欧洲意义上的教养。换句话说，就是俄国人顽固地希望保持当俄国人，而不要听从命令变成德国人或法国人。其实，这样才好呢！正是这种文明坑害了波兰人。虽然他们还以这种文明为骄傲，却被坑害得连星期天也没有了，尽管政治上获得了独立。

欧洲文明是欧洲的产物，本质上是在欧洲本土的产物，它

① 指亚历山大一世给予波兰的相对自由的宪法，自1815年施行到1830年。

② 法文：无论如何。

在波兰（也许正因为波兰人是斯拉夫人）却培养出一种反人民的反文明的反基督的精神。它在那里主要发展了天主教、伪善和贵族作风，如此而已。再说，天主教在任何地方恐怕都没有像在波兰那样，达到如此笃信的程度。您写道："难道声称波兰人是怀着普及文明的目的占领了乌克兰和莫斯科，这不是谎言吗？"不然又怎么说呢？您真的至今不明白这件事吗？他们的整个文明全变成了天主教；他们为了天主教而烧死、折磨俄罗斯人，难道干得还少吗？他们为难我们，轻蔑我们如奴仆，不把我们当做人，难道这种情形还少吗？为什么会如此，您是怎么看的呢？原因正是天主教的宣传，拼命地网罗信徒，拼命地把人们波兰化，要人们信天主教。事情很明显，不把其他信仰的人当人看，那就一定把自己和自己的信仰尊为最高的东西，也因此不惜一切手段把所有的人都纳入自己的信仰中来。改变了信仰的俄国贵族立刻成了老爷，其他的则只是奴仆。自然，波兰人当时不仅认为这是高尚的事，甚至还视为神圣的事业，以此为荣，至今夸耀不止。可您现在认为这是高尚漂亮的行为，即认为这种天主教宣传高尚而且漂亮，却不是从波兰人的角度出发，而是自己就认定如此。这在您的文章里说得很明白，彼得松先生。

我们在自己的文章《一个不祥的问题》中站到波兰人的立场上说，笃信自己文明（贵族文明和天主教文明）的波兰人会为此骄傲，会在我们面前（他们至今视我们为奴仆和野蛮人）引以自豪。而且他们越是在我们面前蒙受屈辱，就越是高傲，认为我们领先是一种极不公平的命运，要起来反对这个命运。请问，从他们的观点看，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是事实呀，而事实是不能藏到口袋里去的。恐怕问题就在于此，全部原因就在这里。他们怎么可能相信，俄国大地有着自己的平民原则，这

种原则丝毫不低于西方文明的原则。这一点连欧洲也是不肯接受的，所以总是不喜欢我们，甚至对我们不能容忍。我们在欧洲从来没有引起好感，欧洲只要有可能就很乐意攻击我们。欧洲不能不承认一点，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这种实力，物质的力量（欧洲至少应该看到我们的这一点），总是激起欧洲的愤怒。其实也不光是欧洲。您对俄国人的看法，不是同欧洲的看法完全一致吗？早在两年前，我们就批评《俄国导报》，说它不承认俄罗斯民族性。如今莫斯科的新闻可大为光火，却没觉得这是对英国新闻界的讽刺性模拟，它的爱国主义本身就是英国化了的爱国主义。无论如何我们能把《莫斯科新闻》的爱国主义，主要是它的俄罗斯主义，同莫斯科高尚而真诚的爱国主义区分开来。我们绝不会把他们混为一谈。不相信俄国能独立发展的爱国主义，可能是真诚的，但终归是可笑的。而您的逻辑却是这样的：

波兰人不会以自己的文明驰名世界，因此他们也确不以自己的文明著称。

这能算是逻辑吗？

我倒是找不出波兰人可以驰名的任何东西。但悲剧在于波兰人盲目相信自己这个有毒的文明，视此为自己极伟大的荣耀。这您怎么解决呢？

我们文章的署名是“俄国人”。您说：

“是不是别人会想，文章署名中‘俄国人’一词包藏有阴险的意图？”您又补充说：“很自然，波兰人会急于把这篇文章译成所有欧洲语言，并对人说：你们看，俄国人自己……”如此等等。

我们的回答是：非常可能，波兰人急于翻译这篇文章，况且他们终究是波兰人，而您是俄国人，竟也没有读懂我们的文

章。

说到署名，这文章的确是俄国人写的，正是我们的同仁尼·尼·斯特拉霍夫。我们宣布这一点，是得到斯特拉霍夫先生同意的。同时我们要补充一句自己的话：俄国人斯特拉霍夫至少不次于俄国人彼得松。这已经是我们自己的看法了。

不言而喻,《时代》编辑部完全赞同自己同仁的文章。这一点我们要向公众明白宣布。

最后需要总结一下：

彼得松先生说："这位作者的姓名如果为人知道，任何一个真正的俄国人都会怀着蔑视来说出作者的名字。"

我们要回答：

彼得松先生，您的名字我们不觉得有任何意义，您的文章从文学角度看也是极其空洞无物。如上面所说，我们本来绝不打算回答您。问题是如果从文学以外的另一角度看，您的文章不是一篇好文章，正因为它不由得要求人们回答。它甚至算不上是一篇文章，而不过是一件坏事，彼得松先生！是件很坏的事。所以我们才劝您要多关注自己的名字，要爱护它。真的，这样做不会错的，彼得松先生！

谢德林先生，或虚无主义者的分裂

在我们的文坛尤其是杂志界，接二连三地出大事故，简直就像演绎长篇小说。这不，比如说，最近刚发生了一件莫名其妙的怪事：激进派虚无主义者的杂志《俄国言论》向温和派虚无主义者的杂志《现代人》发难，痛心疾首地数落了一顿《现代人》。从这些责难中可以看出，《现代人》目前已经不是现代人，而是顽固落后分子，因为它竟允许自己的编辑谢德林先生写什么“迟钝的”、懵懂无知，破坏一切的毛头小子们，写什么“被苍蝇弄脏”，甚至于，我的天啊，差点没写美学。显而易见，《现代人》是顽固落后分子。“这可是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工作过的刊物啊！”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因此，据说连《现代人》也害怕了，吓得干涉起谢德林先生的“创作”自由，禁止他继续与《俄国言论》论战下去。这一切不过是些传闻，可是谢德林先生在 4 月份的《现代人》上表现出明显的畏首畏尾[①]，这无疑又加剧了传闻的力量。终于出现了更加骇人

---

① 在《现代人》第 4 期上只发表谢德林的四篇书评，而他从 1863 年至 1864 年初一直在《现代人》刊出的《我们的社会生活》，在第 4 期上竟没有连载，而且原因不明！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谢德林畏缩了。

听闻的消息：风传谢德林先生被扎依采夫先生[1]完全劈成两半……紧接着又一个令人瞠目的传闻说，在谢德林先生的两半身体中文学自尊心觉醒了，他不愿意再束手束脚，不想把拥有和表达自己信念的权利出卖给编辑部，他似乎和《现代人》大吵了一通，即将离开编辑部，打算和另一个讽刺家合伙到莫斯科去创办自己的讽刺刊物。只因为不知道到哪儿去拿派遣证，所以暂时耽搁了行程，一旦拿到派遣证，他们马上就离开彼得堡去莫斯科。可是，真是怪事，第 5 期《现代人》出来了，谢德林先生居然并未出走，只不过显得精神委靡，有点儿不安，有点儿不自然，而且只字未提《俄国言论》的事。不过毕竟谢德林先生还在《现代人》。虽然没有直署其名，但是有几篇小文章，每一行都露出“希腊人梅花”的笔法，每一个想法都有一股“黑桃”的味道[2]，如何不是谢德林先生？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所有那些传闻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在看来，要么是《现代人》甘当顽固落后分子，继续留用谢德林先生；要么是谢德林先生承认了错误，向编辑部保证今后将会听话，不再胡来。二者必居其一。最近谢德林先生（天知道是何缘故）确实在《现代人》上发表了一些直接与《现代人》近些年的基本信念相抵触的信念，难怪被《俄国言论》抓住谢德林先生，用他来耻笑《现代人》。更何况现在《俄国言论》断言，谢德林先生完全不是表达信念，而是在释放“某种黄色液体”。由此可见，既然谢德林先生还在《现代人》，那么他一定是请求过谅解，否则怎么可能留下呢。要知道真要让《现代人》真正愿

① 瓦·亚·扎伊采夫（1842—1882），俄国批评家、政治家。1863—1866 在《俄国言论》杂志任编辑。

② 参阅下文作者注。

意违反自己这些年来所宣扬的一切东西，或者用他们的说法——愿意变得“顽固落后”，这是绝不可能的。或者只不过是《现代人》在损失了所有主要的同事之后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搞些什么。而且，这后一种情况完全有可能。这简直太有趣了。为了或多或少地解决这个“问题”，应该真正严肃地审视这个完整的故事，并且出于对俄罗斯文学的热爱，从头观察这一切。不过坦白讲，尽管我们挚爱俄罗斯文学，可是要我们的编辑部以此建立无聊的功勋，我们可无论如何也下不了决心，但是，我们编辑部收到一份手稿，是内容与此极其相似的一部小说……这些“现代的”小说正大肆泛滥着。寄来的这篇手稿是个新手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寓意。我们“不好坦言”，但是我们认为，这位年轻的小说家在作品中所指的差不多就是几乎包容了谢德林先生《外省散记》中所有“梅花和黑桃”的《现代人》杂志。以下就是从这新的《试说新花花公子》中摘引的片段。

长篇小说《谢德罗达洛夫》片段

一、谢德罗达洛夫进了《及时》杂志当编辑[1]

……于是谢德罗达洛夫被录用当上了《及时》杂志的编辑。这件事发生在一年半之前，当时谢德罗达洛夫还在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及时》编辑部里可是乱成了一团。老的、资深的作家都消失了：普拉夫达留勃夫已经谢世；其他

① 很明显，谢德罗达洛夫指谢德林，《及时》指《现代人》。

人又不在[①]。编辑部成员和亲近的撰稿人立即聚集一堂商讨大事。也许他们当时还围坐成一圈，但为了避免提及个人，在此我们一概略去这些细枝末节。

“我们的事情不妙呀，”一个编辑首先开了口：“先生们，诸位都知道普拉夫达留勃夫去世了，而其他人……”

“哪能不知道呢。”众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现在就剩下我们这些人了，力量太单薄，而且我们之中文学家又寥寥无几。在开始，当然了，我们得重复以前的东西……”

“重复以前的！重复以前的！”众人又同声应道。

“……但是光靠老一套也支撑不了多久。生活在进行。出现新的问题，新的事实。关于这些我们也总得说点什么，可是在没有以前这些主要的编辑的情况下，我们会出差错的。该怎么办呢？”

“首先是刊出长篇小说《怎么办？》！”撰稿人们回答。

“这自不用说，那以后呢？”

“至于以后嘛，我倒是有一个好主意。”有人答道：“要是谁把我们逼得没了退路，或是在所有需要确切、完整地表明观点的情况下，我们就宣称：‘等到新的经济关系到来时’一切就都明朗了。然后再补充几点，便大功告成了。用这个法子足够对付一年半左右，甚至两年。”

“好！是个好主意，关键是在所有情况下都适用。您说，

① 普拉夫达留勃夫暗指杜勃罗留波夫，“其他人”虽为多数，但似指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此文发表于《时世》，1864年，5月号（在7月后出版）。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62年7月被逮捕，1864年5月被处假死刑，之后即被押送至东西伯利亚服苦役，所以说他“不在”。

还有什么不取决于经济关系呢？这样一来，连最平庸的想法都像个真正主张了。甚至越是经常重复，它在不学无术的人的眼里就越意味深长，同时也免除了我们做事的烦劳。不过我觉得这还不够……”

“不够，不够！……”

“诸位有目共睹，在我们杂志圈里，谁要是安安静静地坐着，不同人斗嘴，也不攻击别人，就免不了被大多数订户认为是又软弱又愚钝，再怎么兢兢业业地实干和精通业务都没用。谁要是又叫又咬地首先攻击别人，厚颜无耻地对最切合实际的要求置之不理，反加以唾弃，对它们吹口哨，将其漫画化，而且跳将出来，不分青红皂白谩骂所有的人，那他倒会在墨守成规者和大多数人心目中显得有才能和聪明。我们一定也要如法炮制，更何况以往我们也是经常这么做的。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条小狗，一条能叫能咬的小狗。希望诸位明白，我用‘小狗’这个词是取它最高尚、最崇高的文学意义。确实，小狗哪一点比其他任何一种走兽飞禽差呢？当然，最重要的不是狗本身，而是狗的那些特有习性。只要我们对它吆喝一声，它就立即抛下一切，跑过去，扑上去，一口咬住我们给它指的目标，不断撕扯这个人，直到我们吆喝它停下为止。当然啦，我们的这只狗是越没头脑越好。可是它应该有手段，会写，有狠劲儿，有强烈的虚荣心以及……用文学语言说，它应该是天真单纯的，从而它什么也觉察不到。我认为，谢德罗达洛夫先生这位著名的幽默讽刺家，如果我们能邀请他加入我们的编辑部，他能在这方面成为我们的长期合作者……”

“对呀，对呀！”大家嚷了起来，只有一个反对者站起来说：

“我承认谢德罗达洛夫先生没有自己的思想是他十分出色

的优点，我也承认他爱慕虚荣，可是除了这两个优点之外，他还有什么呢？他只会写‘梅花和黑桃’。他也只满足于此！”

大家一起反驳他：“这不假，可是他有办法，会用词儿，他坐不住，总是毫无目的毫无来由地生气，为生气而生气——这有点像为艺术而艺术。这股恶气缘何而起他自己也弄不明白。而仅此一点就极其可贵……只要把这股恶气稍加引导，我们就可以随心所欲，随便让它咬谁都可以，因为对它来讲只要能咬就成。这位先生，请您读一读一年半之后将出现在《国外言论》杂志上的斯克里勃夫先生评论他的文章。那里有对他这位幽默作家一个很中肯的评价，并且也提到了‘梅花和黑桃’[①]。但这些

---

① 显然，年轻小说家在此指的是皮萨列夫先生发表在《俄国言论》上的文章。下面就是其中的一个片段：

“谢德林先生不知不觉在愚人城的一个场景中精彩地描述了自己幽默所具有的典型特征。愚人们正在玩牌。

‘希腊人梅花！’他（步兵军官）说着出了张梅花。我们全都大笑起来，尽管每次我们玩牌时这个梅花都准保会出场，还是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有同样的效果。

‘黑桃’，他念念有词地又出了张黑桃。

‘我的天啊，快住口吧，淘气鬼！’笑得前仰后合的戈卢布奇科夫将军说：‘我都被你逗得没法玩下去了。’

亲爱的读者，当您读完以上这些，难道您不觉得是谢德林先生在对您说‘梅花’和‘黑桃’，而您自己却像戈卢布奇科夫将军一样，笑得前仰后合无力地挥着手说：‘我的天啊，快住口吧，淘气鬼！我都没法玩了’……但是这个铁石心肠的爱说俏皮话的人并不住口，而您就真的弄乱了牌局，也就是说被搅糊涂了，错把爱打诨的蠢人当成俄国的讽刺家。当然啦，‘希腊人梅花’还比不上‘小猪的秘密风流事’，‘老的不可吸收性的新堵塞性’，尤其是‘狗崽子爱司’。谢德林先生的笑话比步兵军官的俏皮话更大胆、更出乎意料、更奥妙奇异。可是讥笑谢德林先生俏皮话的不止一个愚人城的戈卢布奇科夫将军，而是咱们所有读书的人，包括咱们聪明伶俐、朝气蓬勃、活跃热情的年轻人。”——作者注

缺点我们正好可以利用。梅花明摆着，确实是熟套路，然而却谁都看得懂。这样做是走老路，效果维持不了多久，很快就会过时，不过却会飞快地流传，何况我们需要谢德罗达洛夫也就是两三年的事。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要是谢德罗达洛夫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又怎么办？他可能会大发议论而不听话。而重要的是，据我从他的作品看来，这个人一点儿公民责任感都没有。除了自己，其他一切他都无所谓，只要让他的虚荣心得到满足，让他干什么他都会同意的……"

"可以奉承一下，但也不要过分，"有个人说："严格些也不妨。"

"那当然了。要严格，甚至要格外严格。不过只消吸收他成为编辑部成员，就足以收服他了。那么是不是就这样决定了？"

"真是预见不到的情况！如果他最终明白了，他身上作家的自尊心觉醒过来，那怎么办？"

"这个嘛，我们到时候再说……"

"最后还有，您怎么对他讲呢？说'你是小狗，所以就吠叫吧！'我觉得这未免太不文雅了吧。"

"啊，这是小事一桩，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比如可以用'发出自己的叫声吧'或类似的话而不说'吠叫吧！'。不用担心，他会明白的，况且他自己需要的正好就是这个……怎么样，就这样决定了吗？"

"决定了，决定了！"

如此这般，谢德罗达洛夫先生就加入了《及时》杂志的编辑部。

二、条 件

编辑部吸收谢德罗达洛夫，给他定下了十分苛刻的条件。可因为他正在兴头儿上，所以什么也没有察觉，这个倒霉鬼！他只是糊里糊涂地听了一遍，未必听懂了其中的意思。当刻意打扮了一番的谢德罗达洛夫到编辑部来时，编辑们立刻召开全体大会，向他提出了所有条件。以下就是其中的几条：

第一点。年轻的笔杆子！您要知道，您到这儿来是为了发出声音，要撇开《骄傲城》。所有那些“梅花”等等都是胡说八道。当然了，您现在可以用它们来填充我们的小说栏，然而您还应该向其他的、更高的理想努力，也就是要借助中短篇小说的形式普及自然科学。这是所有艺术家、诗人的最高目标。不过这得慢慢来，目前您只需要发出声音来。请注意，我不是对您说：“吠叫吧”，因为这种说法不文雅，而是说“发出声音吧”。希望您明白其中的意味？

“这还用说，”谢德罗达洛夫一脸庄严地回答道。主编扫视了一遍所有与会的人，他的眼神仿佛在说：“我说了他会明白的！”

第二点。年轻的笔杆子！从现在起您要熟记并无条件地遵守我们的策略。您要尊敬、包容、保护一切标榜进步的人士。哪怕他们名不副实，哪怕他们只是中学二年级的学生，哪怕他们实际上简直是在胡闹，但只要他们当众讲过哪怕只是四句进步的话或者两年来只写过两句例如下面的打油诗：

《世纪》啊《世纪》，还有列夫·坎别克，

列夫·坎别克，还有《世纪》啊《世纪》①。

他们对您来讲都是神圣的。甚至如果他们开始过分出格地胡闹或胡说八道，使您实在无法赞扬他们的话，那也应该干脆默不作声，无论如何您都绝对不能对他们发出声音。如果他们中某人在诗歌或散文中提到“公民的眼泪”② 并且当众宣讲，对这样的人您无论如何是不应该侵犯的。哪怕他出现在您面前时甚至是……

“甚至是醉醺醺的，”谢德罗达洛夫幽默地插话，期望大家因高兴而赞赏他，像听到“黑桃”那样放声大笑起来。可是他又僭越主人自作主张了。这是一些对幽默无动于衷的阴郁的人。被打断的发言人皱起了眉头，一字一顿地严厉地说：

“甚、至、醉、醺、醺、的，先生。”

谢德罗达洛夫感到害怕了。

第三点。年轻的笔杆子！您将参加评论栏工作，因此请您记住这样一条原则，即现实的苹果比画的苹果好③，现实的苹果可以吃，而画的苹果是不能吃的。因此，艺术是胡扯，是奢侈品，只能用来哄孩子们玩。这一简单而重大的“新思想”从今以后就要取代您现有的全部美学思想，并且帮助您在评价一切所谓的“文艺作品”时能持有正确的观点。明白吗？

谢德罗达洛夫一方面得意忘形，另一方面又开始胆怯，一句反对的话都没敢说。其实，首先，实际的苹果和画出来的苹果是根本不可比的两类事物；其次，实际的苹果是供人们吃

① 参看上文《又是“年轻的笔杆子”》注。
② 参看下文注。
③ 这里用苹果打比方，暗指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艺术抱有实用主义态度，不承认艺术的价值。

的，而画的苹果画出来就是让人们看的，而不是吃。总不能无论是什么东西都拿来就吃，不能仅据可食性一点来评价事物和作品的优劣。不过由于以上提及的原因，谢德罗达洛夫闷声不响。

第四点。年轻的笔杆子！从现在起您要给自己定下一条原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靴子都比普希金强，因为缺了普希金无所谓，而没有靴子就无论如何都不成，普希金是奢侈品，是瞎扯。明白吗？

谢德罗达洛夫又闷声不响。他甚至不敢问，例如：已经有靴子的人该如何看待普希金呢？

“荷马、亚历山大·仲马以及其他作家也同样是瞎扯。因为荷马有无数偏见，因此，他写灵魂，还相信奇迹和神灵，他这些偏见很毒害青年。所以消除偏见的启蒙的库罗奇金[①] 无论如何高于蒙昧的荷马。我们之所以还在刊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因为他批判莫斯科的商人，除此之外他没有丝毫别的优点。不过，他有名气，所以还可以刊登他的《米宁》[②]，而且只是在那些订刊的月份。

甚至连莎士比亚的作品都是奢侈品和瞎扯，因为他笔下甚至还有女妖，简直是落后到极点了，对俄国青年尤其有害，没

---

① 瓦·斯·库罗奇金（1831—1875），俄国诗人。1861—1863 年为“土地和自由社”领导人之一，讽刺性《火星》周刊（1859—1873）的主编和发行人。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处看来是依据批评家皮萨列夫的一篇文章，它不同意杜勃罗留波夫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和其女主人公卡捷琳娜的肯定评价，并且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米宁》（1861）并没有什么高于俄国作家涅·瓦·库科尔尼克（1809—1868）的剧作《神手拯救祖国》（1834）之处。按：两者均为历史剧。

有莎士比亚他们本来就已经从奶娘那里听了许多女妖的事了。关于这一点一定要留神，年轻的笔杆子！不过对于莎士比亚可以缓一缓，所以，不用出声，因为（鬼知道因为什么！）比希纳[①] 在《Stoff und Kraft》[②] 中突然想起来赞赏他了，我们要支持一切进步人士，更何况是比希纳，所以可以饶恕莎士比亚，当然是暂时如此。”

发言人又补充道：“不过这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我没有把它单列一条，而是把它归入第四条，也就是讲靴子和普希金的这一条。”

第五点。年轻的笔杆子！我们会给您指出五本“智谋之书”，为了向我们看齐您一定要用心研读。半年后务必接受全体编辑成员和主要撰稿人的考试。

第六点。年轻的笔杆子！您必须透彻领悟我们流派的宏伟的指导思想，即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同样也为了每一个人，先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应该是肚子，或者说腹部。您笑什么，尊贵的先生？

谢德罗达洛夫连忙支吾着说他根本没笑。

“我只不过想起了‘地球的肚脐’，老百姓因为受到有害偏见的影响，荒唐地信赖这个。”他含含糊糊地说，指望着逗笑大伙儿，从而原谅他。不过又没有成功。

“‘地球的肚脐！’尊贵的先生！”发言人提高了声音：“您竭力把您这个毫无意义的‘地球的肚脐’与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经济思想，同实用科学、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相提并论！

---

① L. 比希纳（1824—1899），德国医生、博物学家和哲学家。他在其论著《力量和物质》的“物质不朽”一章引用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第5幕，第1场）哈姆雷特的话作为题词。

② 法文：力量与物质。

您要知道，肚子——这就是一切，而其他的东西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奢侈品，甚至是毫无用处的奢侈品！如果肚子吃不饱，什么政治、什么民族、什么毫无意义的根基、什么艺术、甚至科学，都何用之有？填饱肚子，其他的一切自然而然就好应付了，即使应付不了也无所谓，反正其他的一切都是奢侈多余和毫无用处的。蚂蚁，渺小的蚂蚁为了生存，也就是为了吃饱肚子团结到一起，发明了蚁穴，这是能想到的社会结构方式的最高理想①，人应该为此感到惭愧。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人又做了什么呢？整个地球上十分之九的人经常食不果腹！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愚蠢的，看不出自己真正的利益何在，反而去追逐幼稚的玩具，追逐什么艺术和一无是处的东西，沉溺在偏见之中，不动脑筋、随心所欲地混日子，不理会智谋书籍的指导，因此就贫困、分散，不会做什么。一旦达到了人人都吃饱这第一步，那么在十分必要的时候人连月亮都摘下来。您懂吗？”

谢德罗达洛夫本想提出异议，先吃饱肚子再完成其他目的固然好，但本着这样的思想可以在愿望和愤恨的情绪中停步一千年，不但得不到一点儿现实的成果，反而错过生命和毁了一切。他还想补充说，这一切也许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如果硬要以遏制人的多方面才华为手段，来达到填饱肚子的目的，那么相比之下，也许还是征服月亮要容易些。可是谢德罗达洛夫已经又累又怕，再加上他又不善于作类似的回答，所以就驯顺地沉默着，只盼着讲话人早点结束。

“因此，”演说家继续说道：“比如说您偶然需要写一篇关于斯拉夫问题的政论文章，那您就可以直说《日报》在胡说八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主人公对此有过激烈的议论。

道，什么斯拉夫人的痛苦呻吟呀，什么要摆脱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的统治，全都是胡扯。这些愿望是奢侈的，甚至是不能容忍的奢侈。不管是独立也好，还是被奥地利人或土耳其人统治也好，斯拉夫人都应感到无所谓。因为他们首先应考虑的是吃饱肚子的问题，然后再考虑驱逐土耳其人也不迟，即使这样也还是奢侈的，明白吗？

如果有人对您说：我想思索，我被尚未解决的永恒问题所折磨，我想去爱，我因为不知信仰什么而痛苦，我寻求精神理想，我热爱艺术之类的话，那您立刻就果断、勇敢地回答他，这一切都是胡扯，是形而上学，这一切都是奢侈品，是儿童的幻想，是无用的东西。告诉他最首要的东西是肚子。最后，如果这个人实在想得心痒难耐，就建议全拿起剪刀剪掉这个发痒的部位。想跳舞——就砍掉腿；想画画——就砍掉手；感到痛苦，喜欢幻想——那就砍掉脑袋。肚子，肚子，还是肚子——尊贵的先生，这就是我们的伟大信仰！明白吗，年轻的笔杆子？”

年轻的笔杆子本想指出，其他都砍光了，仅剩下一个肚子也活不成呀。但是他没这么说，因为他不能。其所以不能，是因为他的脑子没有能力想到这一点。因此他只是眨巴了几下眼睛，感到无聊得要命。

“我从您的表情看出您没有完全听懂，”发言人继续说：“您还不够老成，等您看完了这五本智谋之书，考完了试，到时候我们再看看。”

“我还没有自己的思想。”谢德罗达洛夫驯顺地点头称是。

“我们知道。但是您有手段，有文笔，要是五本智谋之书起作用的话，您会发出好听的声音来的。我们对您寄予厚望。至于《骄傲城》嘛，应该立即抛开。‘梅花和黑桃’也是无稽

之谈。”

听了这话，谢德罗达洛夫不大高兴。他也是个有自尊心的人。

“我不光只有‘梅花和黑桃’，”他谦虚审慎地说：“在一个地方我曾写过《司法稽查官咬伤了市长的肚子》①。”

“什么？真的吗？写在哪？”发言人愉快地、惊奇地问道。

“在某个中篇里。”谢德罗达洛夫回答，他也快活开朗起来了。

“……这个，当然了，还不错。但这还远不够。”

“真的吗？我还以为这就差不多了呢。”谢德罗达洛夫满怀诚意地回答，他由于受到赞赏而马上变得异常和善。

“确实如此，年轻人，”发言人富有感染力地说：“好了，再见，带上发给您的这几本智谋之书，再见，去发出声音吧。这么说司法稽查官把市长……您那儿是怎么写的，咬伤了肚子？”

“对，肚子。”

“我喜欢的恰恰是肚子。这容易使人联想到我们的理论，区别只在于我们不想咬伤而是填饱肚子。当然了，您这里也有新的思想，但这还不够……那么，我们就再见吧！看得出，您已经累了……去吧，去发出声音吧。”

三、谢德罗达洛夫的反抗

谢德罗达洛夫在差不多一年多时间内不断地发出声音。他对谁没有发出声音呢！他真诚地忠于创造幽默的职守，无缘无故地攻击人们。有时候他也能得到夸奖和赏识。《及时》杂志

---

① 指谢德林所作短篇小说《钦差莅临》中的故事。

认为他还有些用，就是那些准备对重复百十次的“黑桃”报以笑声的因循守旧的读者（这类人很多）也对他表示满意，还奢求什么呢？而且谢德罗达洛夫除了确有才华的作品之外，还能写一些大篇幅的幽默作品。虽然不管编辑部也好，读者也好，甚至包括作者本人全都不知所云，但似乎又有一些神秘的、聪明的、机灵的暗示。总而言之，恰恰符合编辑部的风格。于是，心地单纯的读者完全被征服，不禁暗自叹道：“好家伙！”真的，他没有公民感，因此他不停地叫，为了幽默，他不惜把最诚实、最理智的人连同最卑鄙下流的人一起嘲弄、辱骂一番。只要幽默就行。他骨子里是一个奉行为艺术而艺术，为幽默而幽默的人。只要有类似“梅花”这样的笑料，管它是针对谁，全都无所谓。

可随着时光的流逝他读了一些东西，在他那从未关心什么问题的头脑中不由得产生了一些想法。他读着那些他受命要施以嘲笑的作品，却不自觉地受到启发，一道新的光芒不知不觉地开始照亮了他。当然了，这种状况并不持久，不过一种类似意识的东西渐渐在他身上觉醒了。不是说他身上产生了什么公民责任感的征兆，由于轻浮和经常感到委屈的虚荣心，使得他对今天思想上同意的东西，明天就为了尽职尽责而“发出声音”。总之，他开始感到不安。他开始想说些什么，表达些什么。他东抓西抓！截然不同、极端矛盾的见解甚至理论涌上他的笔端，幸亏读者一股脑儿地把这些全都当做“幽默”，不然的话，有些时候就不能不令人十分惊异。至于编辑部呢，则完全寄希望于他，最终也不太干涉他出声的事。编辑部只要听到他有“声音”，就放心了。当谢德罗达洛夫糊涂得连自己也忘乎所以的时候，就跳将出来对公众写出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公众笑了，他就很得意，他的艺术天性也暂时得到安慰。可好景

不长。他大笔一挥，在《及时》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关于毛头小子和新思想的蛀虫的文章①，这就违反了《及时》吸收他的第二个条件。这与其说是被断断续续进入他脑中的新思想激起了他的虚荣心，倒不如说他对《国外言论》的小品文作者克罗利奇科夫的妒忌② 在此起了更大的作用。

斯克里博夫和克罗利奇科夫勃然大怒奋起反抗，雄辩地揭露了《及时》的落后守旧，从而引起了《及时》编辑部里的恐慌和混乱。编辑们神色慌张地跑到一起，就像房子着了火，决定立刻传讯肇事者。而谢德罗达洛夫早有准备，他不卑不亢地走进门来，额头上闪耀着个性解放的光芒。他在门口停了步，手往门框上一支，眼睛斜睨向窗外，好像根本不关他什么事，对众人看都不屑看一眼。编辑们在恐慌中面面相觑。

四、杯水里的悲剧

“看您都干了些什么！看您都干了些什么！倒霉的人！”编辑部成员和撰稿人齐声质问他。

“我干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干。”谢德罗达洛夫回答，那意思就是：“你们现在休想再吓唬我了。”

“什么也没干！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没注意您，您就捅出乱子来了！”

“什么乱子也没捅。是我有了自己的思想，就这么回事。”

“可是，倒霉的人，您没有自己的思想，从来就没有过。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决定录用您，您只需要发出声音，而

① 指谢德林的《我们的社会生活》一文，它在《现代人》杂志，1863 年，11 月号；1846 年，1、3 月号上连载。

② 指皮萨列夫在《天真的幽默之花》和扎伊采夫的《来到〈现代人〉的愚人们》两文，二人均在《俄国言论》杂志工作。

您……"

"但现在我有了自己的思想。Que diantre![1]《日报》有自己的思想，连《呼声报》也宣称有自己本身的思想，为什么我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呢?"

"倒霉的人，可这是另一码事。您现在能从哪儿弄来自己的思想呢？您是从《时代》上看来的。看呀，这就是《国外言论》，请读读吧。这有从62年的《时代》上摘录下来的反对毛头小子的演讲稿。请听：

'然而，我们痛恨那些头脑空洞的大嚷大叫的人。无论什么事，一旦有他们参与，便会立即蒙羞，任何纯洁诚实的思想也立即会被他们玷污。我们痛恨那些为了挣得面包而吹口哨的人，他们只是为了吹口哨而吹口哨，他们自在得意地运用从别人那儿剽窃来的字句，并用守旧的自由派的小鞭子驱策着自己。'

听见了吗？倒霉的人，《国外言论》直言不讳地说您抄袭《时代》，说甚至在表达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请听，这是关于您的幽默作品的：

'毫无疑问，某些迟钝的、疯疯癫癫的人对迷惑公众起着最为厉害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蛮横放肆地掺和青年一代的事业……对与他们沾边的一切事业，他们都以自己的参与弄得它变得面目全非，就像夏天苍蝇在片刻间玷污任何东西，哪怕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东西也难以幸免……没有一个思想不被我们这些迟钝的人玷污，没有一项事业不被他们弄得声名狼藉。'"

"怎么不是从《时代》上抄来的呢？连表达方式都一样!"

"就算是借用了《时代》的又怎么样，"被围攻的谢德罗达

---

① 法文：真见鬼。

洛夫回答道："我承认这个思想像许多别的思想一样是借用了《时代》的，因为这是一本好杂志，就算你们迫使我冲着它发出声音也改变不了事实。况且我不是剽窃《时代》，而只是与它见解相同……当然，我可以有相同见解……我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我有这么一句：'像苍蝇一样玷污思想。'这一句妙极了，遗憾的是你们不能理解！"

"可是，倒霉的人，要是您为我们使用这句话就好了，可您用这句话来反对我们。反对我们！听见了吗？"

"可我只是写了写毛头小子，并没有反对你们。"

"写毛头小子！这与举手打自己毫无区别！吸收您加入编辑部时是怎么教导您的？他不明白！他不明白！再说《时代》的订户够多的了，而他还去支持它！"

"你们冲我嚷什么！"谢德罗达洛夫生气地叫道："干吗你们老是《时代》长《时代》短的！再跟你们说一遍，这是一本好杂志，我从中吸收了很多东西！你们迫使我嘲笑他们，冲他们吐舌头！由于你们的关照，譬如说，我嘲笑过《日报》。在《日报》工作的是些严谨的人，那里有科学，那里有积年累月的连续性的研究。他们想干点有益的事。谁也不能指责他们没有公民责任感。他们的思想越来越风行，甚至连最怀恨的宿敌都不得不心悦诚服。可以不赞成《日报》的见解，但对这本杂志不能不心怀敬意。而我呢，由于你们的吩咐对它百般羞辱，差点没把它和阿斯科琴斯基相提并论。这就叫做发出声音！"

"谁吩咐您如此卖命地行动的？您完全是自己给自己找乐趣。"

"你们为什么因为毛头小子这么攻击我？听我说，是他们把什么都给玷污了，给毁了。《时代》当时只是说这些人是骗子，而且很公正，要知道最近这些人在我们中间无非是在贩卖自由主义和进步思想。我呢，只提了一下他们是迟钝的人。他

们之中即使有几个诚实的人，也是把什么都毁了。我们倒希望能有正面的结论，可它们在哪呢？就因为你们这一套理论和这些迟钝的人，我们把什么都耽误了！什么叫‘公民的眼泪’？要知道他们只是纸上谈兵，说自己流着这个眼泪，可拿些真正的东西给我看看。哪怕是一滴真的眼泪也好——他们把它也玷污了，早已千方百计弄脏了它。如此下来，一切终究会被庸俗化和玷污，让纯洁的人感到厌恶。[①] 我们这是在推走自己的人。

“公民的眼泪！这只是一句漂亮话，官场的漂亮话！我钦佩那些真正流下公民眼泪的人，——不过对那些把公民的眼泪当做时髦来追求的做法却不敢恭维。须知有了“公民的”眼泪，就会出现什么公务员的眼泪，私人的眼泪，委员会的眼泪，脱水食品生产协会的眼泪——难道这一切都值得钦佩吗？Морген–фри，je tantipathe![②] ……”

“什么口气！他这是什么口气！天啊，他在说些什么！”撰稿人一齐恐惧地叫道。

“什么口气？什么口气也没有！倒是你们的《及时》上却登着：

身后是平淡无奇的
往日的平原，
在那里沉睡着驯顺的

① “我们认为，年轻的小说家塑造的谢德罗达洛夫这个形象不是很成功。第1章里写的那个谢德罗达洛夫，不会如此讲话，这是违背艺术原则的。不过，这是一部讽刺小说，漫画式小说，这一切从这一点看又是对的。”——编辑部注

② 摩尔根–弗里，我……（下为扭曲的法语词表揶揄）。

公民的眼泪……①

这写得简直可笑！眼泪如何在平原上沉睡？而你们却对此崇敬之至。”

这时连编辑部成员也怒不可遏了。

“怎么，尊贵的先生！您居然敢这么说！这可是公民的眼泪！它在平原上沉睡关您什么事？随它安安静静地去沉睡，随便它被叫做什么，毕竟这不是普普通通的眼泪，而是公民的眼泪。请注意，您看，这写着‘公民’两字。我们的信念……”

“我现在不相信你们的信念了。”

“我们的信念就是肚子，尊贵的先生！我们关于肚子的信念！肚子，肚子——您听见了吗？”

“让你们的肚子见鬼去吧，我早就听够了！我现在不相信你们的肚子！为了填饱肚子，以四肢和肌体的其他功能全部瘫痪为代价——简直是荒唐！而你们正是如此，对肚子顶礼膜拜，以致把除肚子之外的四肢和肌体的全部机能通通当做无稽之谈。你们以这样的态度对待艺术，精神理想，事物的历史进程和全部生活。这样做实际的意义何在呢？你们是与生活背道而驰。不是我们该给生活制定规律，而是要研究生活，从生活本身引出规律。你们是一群空头理论家！”

“这完全是《时代》的话！他都背下来了！”

“确实如此，《时代》上的许多话我都背下来了。尽管我冲《时代》发出过声音，但是我对这本杂志感激不尽。我不懂怎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引用 И. И. 果里茨-米列尔的诗句（载《现代人》，1864 年，2 月号），但将末尾“理想”一词改换成“眼泪”，以表讥讽。

么能脱离脚下的根基而悬浮空中。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的强大在于他们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在于首先是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而不是抽象的一般的人。要想做成什么事，首先需要成为自己的什么，需要具体体现，成为你自己。只有那时您才能说出自己的话，提出自己的世界观形式。而你们是抽象的，你们是影子，你们——什么都不是。从虚无中什么也生长不出来。你们是别人的思想。你们是梦幻。你们不是脚踏实地，而是悬在空中。你们脚底下空空如也……”

“这么急急地滔滔不绝地说话，这么急急地滔滔不绝地说话!”

“是的，就是如此急急地说话！‘当新的经济关系到来时’——这个话我自己也写过十次了，可又有什么用处呢？自己都觉得可笑。它何时来临，又如何来临呢？从天上掉下来吗？这只是一句空洞的漂亮话！靠这句漂亮话可以坐等千年，而任何事也做不成……”

“他是一个自由思想者!”所有人都围着谢德罗达洛夫叫起来：“您怎么敢这样呢!”

“不对。我只是一个极端的虚无主义者，而且想真正成为有益的人。我渴望拥有自己的思想，而你们对我的努力毫无觉察。2月间我特意去了一趟农村，理理自己的思想（请读读我在2月的《及时》上发表的才华横溢的小品文)。在那里我遇到了农夫，并惊讶于他的贫穷。此前我也见过农夫，不过我从未深入思考过他的生活。当然了，读者对于我的无知是不负有任何责任的。我是如此惊讶，以至于把这当成了‘新思想’。除此之外，我还实行过‘新的经济关系’……”

“什么，您，您实行过‘新的经济关系’!”所有人都惊异得叫起来。

“正是，我，我自己，moi-même！因为我也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我得出以下的结论，如果您在莫斯科雇用一个车夫，那么就请您不要跟他讨价还价，因为他很贫穷，如果他向您要二十戈比，就不要只给他十五戈比，刚好相反，如果他要二十戈比，您就给他二十五戈比……当然了，这就是新的经济关系，当然了，比得上你们所有的……”

“而这时爆发了一阵哄堂大笑，谢德罗达洛夫被弄得莫名其妙。他本来已经因这个场面很紧张了。他惊诧地看了看狂笑的同事，然后突然用手捂住眼睛像小孩儿一样号啕大哭起来……”

这就是节选的几章。其余的不想再引用了。我们认为这不是文学作品，而是漫画化的小说。众所周知，所有的漫画都对事物可笑的一面加以夸张，同时包含有某些真实的基础。依然是“我们不敢直言”，然而我们确实觉得，我们的小说家指的几乎就是《现代人》。比如，在“条件”这一章中就有某些相似之处。当然了，事实不会像在这里描写的这样荒唐，但是无论表现什么都得用适当的词汇与形式呀……至于小说家所描写的编辑部混乱的几章，至于“杯水中的悲剧”，我确实不清楚此处是否有确凿的根据。这些传闻（它们为小说家提供了构思）全是可信的，因为我们（再一次重申）完全确信，谢德林先生在最近一段时间写的文章确实严重违背了《现代人》的精神与方向。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当然了，传言就有了很大的根据。两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现代人》改变自己的信念；要么是谢德林先生保证改过。不过，这还用说吗？没必要急着哭。大自然会使一切朝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的小说家也许以过分鲜明的色调去刻画谢德林先生的

轻浮。但想到一切确实发生过，甚至与我们有关，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小说家是有几分真实根据的。我们不能肯定谢德林先生确实把《时代》上的整段文章都背下来并且在自己的文章和实际生活中应用。我们认为这是某种夸张。然而不是我们首先证明谢德林先生从《时代》上引用了关于“用墨守成规的自由主义的鞭子驱策自己的人”的整段文章（毋庸置疑，这是辞藻华丽的句子，可我们根本不想拒绝它）。关于这一点，与我们观点相悖并且不赏识我们的《俄国言论》早有证明。我们还记得，当谢德林先生刚刚开始在《现代人》做编辑，当他玩着、耍着，幽默地出现在小品文里时，他确实做出过对我们不利的越轨行为，完全是轻举妄动，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为了（依他看来）贬损我们当时的杂志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彻底表示自己对它的轻蔑，谢德林先生特意在《现代人》上发表声明，说他虽然从前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过文章，但那只不过是因为《现代人》恰好停刊了几个月，而写好的文章放上几个月可没什么好处，因此也就是说，谢德林先生是迫不得已才投稿给我们的。我们立即戳穿了他。有数字为证，当谢德林先生向我们投稿时，《现代人》尚未停刊。不仅如此，在当时，无论是《现代人》，还是谢德林先生，任何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料到《现代人》会停刊。这么一来，如果谢德林先生早在当时（也就是他作为编辑参加《现代人》之前）就对我们的杂志极端厌恶和鄙视的话，那么对他来讲最简单不过的办法莫过于投稿给《现代人》，而不是我们了。于是当时我们指责谢德林先生“有意歪曲事实”。谢德林先生没有任何反应。当然了，在数字面前他还有什么话可说？

人们一直要使我们相信《现代人》第 5 期上的《文学琐事》这篇文章出自谢德林先生之手，尽管没有署名。其实我们

自己也能从文章里识出这个“年轻的笔杆子”，因为我们对他的伎俩了如指掌。这篇文章写得透着那么一点哀伤，流露着某种沮丧和不安，还有某些怨言。快活劲儿是故意做出来的矫饰，仿佛只不过是为了职责而应付差事。文章里几乎没有任何与《俄国言论》作对的东西。这一切都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传闻，另外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我们的长篇小说家有利。顺便提一下，这篇文章里有针对我们的不太体面的东西：暗示我们开始出版《时代》时在某些方面背弃了自己的信念。由于篇幅有限，我们不能在此多说以驳斥此文作者。但是他在发表关于我们背弃信念的观点时，一定事先就完全料到我们不会戳穿他。他很了解这一点。这既确实又十分明显。现在有一个疑问：这么一来他是靠这一点来为自己打掩护？果真如此的话，他这个把握究竟从何而来？事情很是蹊跷：《现代人》以往从来没这么做过。以往它是不会允许这样的越轨行为的。因此，《现代人》确实背弃了自己的倾向。

提到第 5 期上这篇小品文里透露出的忧郁与沮丧，我们就以第 2 页开头的地方为例。这个片段甚至使我们感到沮丧。

“何为破烂儿？这个词在俗语中绝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无一例外是用来指称物质世界的现象的。所有物质，因其腐烂变质或因掺入杂质而丧失自然、健康本质的，均被称为‘破烂儿’。‘别动，宝贝儿，这是破烂儿’！当幼儿因为好奇，想要用手摸烂泥或发霉的东西时，奶娘会关心地对他说。不管奶娘的这个词用得多么贴切，她还是没有充分阐明所指事物的实质。‘破烂儿’这个词的概念极其广泛，很容易从物质世界引申到精神的、理性的世界。如果奶娘知道她所认识的某个彼得·伊万诺维奇或者伊万·彼得诺维奇完全像她现在正指着的这个发霉的东西一样，完全是个‘破烂儿’,那么她也一定会警告自己看护

的幼儿:'宝贝,别碰彼得·伊万诺维奇,他是个破烂儿'!"……

您一定会同意，这一切可不那么有趣。这里提出了这样一个看法：不仅堆在后院的东西叫破烂儿，而且还有些人也是破烂儿。可谁不懂得这个道理呀？您自己也会同意，用一句话就可以把这个意思表达清楚。您自己也会同意，甚至对此只字不提，也不会有人不明白。先生们，发过誓的幽默作家责任不轻呀。没什么可写的，尽是各种讨厌的事，愤恨，没有头脑，没有思想，可是不成，一定要写，要像狗儿在晨祷前盼着出门那样兴奋起来，哪怕是写无聊的空话也成，哪怕只有一点儿幽默也好，写吧，于是幽默作家又打起精神，把用两句话就足以说清楚的事足足写成整整一页。真是苦役般的差事！

当然了，即使是在这样一个小的片段里，也不无幽默。请听一句："可是无论奶娘的用词多么贴切，她还是没有充分阐明事物的实质。"……听吧，听吧！对傻乎乎的奶娘，连句像样的话都不会说的毫无头脑的娘儿们，突然用起没有充分阐明事物这样的词来了，倒像是在说学者、教授之类的人！犀利！谢德林先生不愧是位犀利的讽刺家和我们社会时弊的伟大揭露者！此后，您难道还能说他只会上百遍地重复写"黑桃"？

不过，到底是有些不同了。和以前不一样了，不一样了……有时候作者甚至也想快活起来，但是突然，隐隐的忧伤不由得引起他沮丧的念头。他实在支撑不住，于是就痛苦绝望地抱怨起来。例如：

"关于事物也应该这么说。有的处于凶险的状况，有的是愚蠢的状况，而有的状况只能用'破烂儿'来形容。凶险愚蠢的状况背后总有某种原故，可以解释原因，所以也可以给予抵制。而破烂儿状况与此相反，其特点恰恰在于它没有任何道理，让你说不清是赞成还是反对。因此比凶险、愚蠢的状况就

顽固得多，这恰恰是那种人人都不满意，却由于害怕陷入险境或蠢态而不得不忍受的状况。这里有独特的尾巴和耳朵，乍看上去很是诱人，当然了，此处的魅力是有害的。如果我们一时被破烂儿人所迷惑，那么需要做的只有一点，就是一旦认清了他的破烂儿本质，就立即离开他。可一旦我们迷恋于破烂儿状态，哪怕只是暂时的沉迷，也比个别的破烂儿人的影响可怕得多，具有不可比拟的腐蚀破坏力。”

是啊，若不是在实践中透彻了解到什么是糟糕的状况，怎么能如此鲜明地描绘出来！并且请注意，他甚至对这个状况怀有爱慕和某种绝望的忧郁。他对这个破烂儿状况加以钻研、挖掘和阐明，并且好像从中得到享受。他嗅着、闻着这个破烂儿气味，还怡然自得。“本已可厌，那就让它更可厌些！”他不无讽刺地使自己谨记这样一条原则，即应该“耐心对待这种状况，总为其中也包含了乍一看很诱人的头和尾”。我认为，作者在此走得太远了。讲到尾巴嘛，不好说，而耳朵能诱惑谁呢？这简直就是咬牙切齿！太可怕了！作者在此描绘了一个着实可怕的状态！

这当中还包含了不少内心的忧伤。这可不是莎士比亚式的热情得出格的炽烈之情，正如一个法国人评价的那样，莎士比亚的每一句诗都像“用心爱姑娘的泪水炼成的宝剑”。不，事实上，这只是小声的抱怨，是一个年轻人的低声的嘀嘀咕咕，是柯里佐夫笔下《糊里糊涂把我嫁了人》一诗里那个被迫嫁给一个不爱的人的乡下姑娘的无济于事的低声诉苦：

没头没脑地
让我发了婚誓，
金色的发绺

被强行剪短……

说真的，如果人们突然对我们的讽刺家说，是不是可以把这篇植物学编入下一本《外省散记》，这位艺术家会作何感想呢？那时将如何是好？

这个我们确实不知道。我们认为，只要传闻里有一点真实性的影子，只要确实有一个局外的讽刺家，何不同他一起到莫斯科去出版自己的杂志呢？至于说到难以选择办刊的方向，那这也不足以成为阻碍。可以随便出本什么杂志，只要在每一期上都能声明："我是完美的文学天才。"这一目的当然不够崇高，却还有趣，还能给谢德林先生带来些许愉快的时刻。

关于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①] 的几句话

7月10日《时世》杂志的出版人兼编辑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病情（胆汁充溢）出人意料地急剧恶化而溘然长逝。作为死者的弟弟和最亲密的同事，我认为，现在谈谈他的文学和出版活动是应该的，决非多余的。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早就萌生了出版杂志的想法。出版一种不受一般杂志成规限制的全新的文学刊物，它要完全独立，不属于任何党派，完全没有近乎下意识的夙怨，它要不畏权威和绝对不偏不倚。另一方面，它要重视人民性和民众的基础，要激起脱离根基的社会来研究我们的人民并相信他们生活中的基本原则的正确性。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确信，是我们的腐化、懒惰、冷漠的世界主义导致了俄国社会的所有挫折和俄罗斯民族某些阶层的意志薄弱。是这种世界主义使得我们

① 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兄。他于1864年去世。他们兄弟于1861—1865年先后创办《时代》与《时世》杂志，米哈伊尔是两刊名义上的主编（主要负责人），而费奥多尔则是实际上的主编。

脱离根基，漠视根基，对立足的根基无知得近乎可笑，有些人物甚至把不了解、完全不承认根基当做必须的、几乎是值得夸耀的原则。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思想尤其强烈地反对最后一种情形。青年时代曾是最热情、最忠诚的傅立叶主义者①。从无根基的抽象的信仰转变到对纯俄罗斯的关注、对自己本国的信念，这一过程像在真正富有生活睿智的人身上常常发生的那样，是完全自然和正常的②。他非常清醒地懂得，根基的思想、人民性的思想不是新产生的，不是谁发现的，也不是哪个幻想者一时兴起凭空杜撰的，它或早或晚会成为每个俄国人作为国家一员所必须具有的思想。这个思想没有起点，它一直在我国社会中那些健康的、反对世界主义的阶层中承传不息。这个传统可追溯到彼得大帝时代。这位俄国的伟大改革家对莫斯科帝国的强大产生怀疑，于是也对人民的力量产生怀疑，便用强制的手段遏制它们的发展。他相信新的目标会给国家带来好处，可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付出了也许是过分昂贵的代价。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清楚地懂得，他和他的同事也许并不比别人更适合保护和捍卫根基的思想和人民性的思想，要想成为真正的俄罗斯人我们自己尚需学习很多东西。他懂得，恢复地方自治的思想，需要以平和的态度，而不是毫不客气的、傲慢的态度来对待。他切身体验到当今的生活中教育、成长和美好的回忆是最根本、最神圣的东西，这一切在某些社会阶层中主要表现为西方的科学艺术、学说和观点，而那些本

① 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的亚·伊·帕尔姆小组，他是温和派，只信仰傅立叶，反对激进的主张。彼得拉舍夫斯基案发后，他也曾被捕，两个月后获释。

② 根基派思想最早见于米哈伊尔的文章，并且是在费奥多尔的参与下形成的。

国的、根基的、传统的经验在每个接受现代文明教育的俄罗斯人心中只占一个极小的角落，有些人则几乎完全遗忘了。所有这些，加之对杂志出版人兼编辑的使命满怀近乎幼稚的深挚敬意，使他曾长时间地犹豫不决，迟迟没有着手实施自己的想法。

同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更擅长当一位编辑。这是一个对自己的工作兢兢业业、孜孜不倦的人，他事必躬亲，从来不把自己的编辑职责哪怕是暂时地托付给别人。他受过教育，思想成熟。他尊重文学，同时自己又是文学家。他酷爱诗歌，自己也是诗人。① 他带着追求理想的热忱和道德信仰的需要，独立地、深思熟虑地、有机地形成自己的思想。

对于生活现象的洞察与深思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不至于犯错误，并且使他的观点得以时刻保持清醒。他热情、积极地关注当代社会生活的动向，并且，据我回忆，他总能持有正确的意见。他通晓欧洲的语言和文学，博览群书，总是能猜到读者需要什么，此时此刻俄国读者对什么最感兴趣。杂志的编排、文章的选择、确定当前哪些问题具有现实意义，而且杂志又需要表态——这一切几乎全都由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负责。他在许多方面都不把自己看做是仲裁者，乐于听取并亲自征询建议。但这并不妨碍他自主地采取行动。这是一个谦虚，甚至是过分谦虚的人，同时又高度自尊，关于这一点和他最亲密的人了解得更清楚。然而，只有很少的人成了他的密友，而与密友他是完全推心置腹，坦诚相待的。但他从不轻易付出，那些得到他友情的人知道他是多么懂得爱人。他谨言慎行，不

---

① 米哈伊尔在少年时代，醉心阅读茹科夫斯基、席勒、歌德和德国浪漫派的诗歌，自己也模仿喜爱的诗人写过一些诗篇。

喜欢无休止的争论。他能敏锐地识别严肃的信念和信口胡说或假装的迷恋。他差不多总是一下子就能准确无误地评价与他合作的人。我提到过，他自己也是诗人和文学家，在青年时代他曾从事过文学创作，写过几个中篇和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受到好评，其中确实有才华的显现，尤其是那篇发表在48年的《祖国纪事》上的短篇。然而，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并没有被这些最初的成功所迷惑。他对自己一向苛刻严厉，不承认自己有创作能力，于是就此搁笔。这种对自己的作品的清醒甚至有些高傲的态度，在我们刚刚开始创作生涯的年轻作家身上是极为罕见的。据我看，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于自己的创作是过于严格了。他对自己翻译的席勒和歌德的作品更满意一些。其中最堪称精品的译作是：首先刊登在《祖国纪事》上后又出现在格尔别尔先生的出版社的席勒的《堂卡洛斯》和三年前以单行本再版发行的歌德的《列那狐》。顺便插一句，我哥哥从不主动向别人提及他的文学创作。

他对自己出版杂志的工作也抱有同样的严格态度。他总是忙碌于出版工作，因而自己写稿不多，总共只在评论栏发表过寥寥几篇①。那些指责编辑自己写的少而总是利用别人的成果的人，不明白自己都在说些什么。倘若一个编辑确实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杂志，那么出版物的精神、目标和方向就通通取决于他。他必定逐渐在自己周围聚集一批忠贞不渝、志同道合的工作者。他会不露声色地把同事的思想引向杂志需要的方向。编辑决定了杂志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① 他的评论文章最佳的有《论晚近俄国作家》(1848)、《茹科夫斯基和浪漫主义》(1852)、《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1860)等。

不管杂志多么成功，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一直给它最严格、最苛刻的评价。一本言之有物的杂志要想站稳脚跟，全面明了地向读者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他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总是感到不满。他希望杂志不断完善，并对成功充满信心。他宁可完全不要某个专栏而出版杂志，也不随便拿什么去代替和充数。

可他的身体完全垮了，早已出现了他的致命的疾病（肝脓肿）的征兆。出版杂志的过分操劳使他疲惫不堪。从春天起他就经常生病，而且病情不断加重。尽管如此，他也从未停止工作。疾病日益影响他的精神，令他情绪不安和易怒。6月，他终于重病不起，情况危急，可他不顾医嘱，仍然不想放弃工作。直到临终前他还在工作，终致病情不可挽救……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一个坚持不懈、精力充沛的人。他办事干练，不仅能够计划、开始一项事业，而且能够不屈不挠地把它进行到底，这样的人在我们之中并不多见。遗憾的是，死者的性格极度敏感。这种易感的个性使他很少对他人袒露，感情深藏内心，极少表白，在不幸或受挫时尤其如此。当他感到痛苦时，往往独自难过，不以自己的心事加重别人的负担。只有成功和喜悦他才慷慨地与亲朋好友分享，因为在这样的时刻他不能也不想一人独处。这些性格特征的概括，几乎与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临终前医生们会诊得出的结论字字吻合。

我不是在写我哥哥的简历，我只是想讲一讲他的文学活动。

遗憾的是，关于他的个人的品格我不能畅所欲言，因为我知道自己与死者太亲密了，以至于如今不好把夸赞他的话全说出来……

必要的声明

7月份的《现代人》上登了两篇矛头指向《时世》的特别的文章，显然是为报复我的《谢德林先生或虚无主义者的分裂》（《时世》，第5期）。其中一篇叫做《是非小人的胜利》，没有署名，自然是编辑部写的；另一篇叫做《致头号雨燕——陀思妥耶夫斯基》，署的是笔名“局外的讽刺家”，下面还有《现代人》编辑部的一段十分出色的附识：

“这篇‘信文’，无论是其过分尖锐的调子，还是它这种毫无礼貌的论战手法，我们均不以为然。我们刊登它完全出于对作者的创作动机的尊重，而这个动机的实现确实需要借助本文作者采用的这些不足称道的手段。——编者。”

换句话说，就是“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这条由来已久、众所周知的欧洲派的行为准则，它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不与《现代人》的原则相悖。

在两篇文章中，作者都是靠使用毫不隐讳的、在我国报刊界尚无先例的骂人话(“啐您”、“傻秃头”等）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么多针对我的毁谤之词，令我简直无法回答。尤其是在《现代人》如此纯洁无邪地宣称“手段不足称道”的理论之后，

就更无回答的必要了①。但是我还是不能不向读者作一声明，我认为这样做完全是迫不得已。

我明白，可以取笑某个病人的疾病。确切地说，我不理解，但只是知道，智力有限的人往往为了报复而在盛怒之下这么做。"局外的讽刺家"（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谁）在自己的文章中令人深信不疑地表示认识我。他说："亲耳听到他（也就是我）讲这些话……"等等。这意味着，我和他聊过天，他曾认识我，也许现在仍然认识。那么，也许他确实详细地知道，我有病而且正在接受治疗。没准儿还了解我是在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得的病等等②。总之，掌握一切细节。于是他就在自己的文章里几次三番地斥责我有病；于是就在他一手描绘的对我进行漫画式表现的场面里嘲笑我有病。我再次重申，所有这些情况在愤怒到某种程度的某些人身上完全可能发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可他为什么大骂我的医生呢？这一点我百思不得其解，天天感到诧异。

事情是这样的，"局外的讽刺家"在自己的文章中（他整行整行地引用我去年写的一篇与谢德林先生论争的文章，却不加任何引号），直接指名道姓地对我说："您的文章就像是医生

① 在《现代人》的两篇文章中只有一个地方是严肃的，即著名的"关于天然的苹果和画的苹果"这一条，其中几乎体现了虚无主义艺术观的全部实质。《现代人》的反驳暴露了它对此问题的认识的浅薄。与此同时，这个问题又是至关重要的，使得我们不得不决定在不久的将来对它加以详细探讨——问题实在太重要了。——作者注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医生是斯·德·亚诺夫斯基（1817—1897），后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服苦役前（1846 年起）就为他治病。不过，他认为自己的癫痫病发生和发展是由于服苦役，而亚诺夫斯基则断言，他的病早在彼得堡时，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案发前得的，也就是在流放西伯利亚前三年，也许是更早就已患病。

给您开的药方”，之后又没头没脑地突然补充道：“显然，您的医生也是一个‘傻秃头’①”（《现代人》，7月号，第158页）。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请问，我的医生何罪之有？他从未以任何方式（这一点千真万确！）参与过我们的杂志论战！在我们和《现代人》以往的论战文章中也从未涉及过他（又怎么可能涉及呢？）。请注意，在“局外讽刺家”这些分外出奇的话里毫无隐讳。他在文章中直接地、指名道姓地、没完没了地攻击我，有几次对我直呼我的姓名：“您……您，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等，重复了好几次。他针对的自然是现在正给我进行治疗的医生。一个人的恶气，当然可以是漫无止境的，然而，难道它可以出人意外地如此发泄吗？

我见过，有时也知道，骂人的人如果特别凶狠，会把您连您的亲属一起都骂了。“如果有丈母娘，那就连丈母娘都饶上！”果戈理的喜剧里有这么一句，因此，如果“局外的讽刺家”把我的男的或女的亲戚连同我一起骂了，那么这多多少少还能让人明白，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因此也有过错。尽管这里面只有那么一丁点儿逻辑，但毕竟还有逻辑。但是医生呢，过去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从未提及的医生，只是因为“医生”这个称呼却就跟着倒霉了。为什么骂我的医生呢？难道只是因为我和我的家人常听从他的建议吗？这是多么幼稚可笑的一股

---

① “傻秃头”的说法是去年《现代人》用的，不知是给什么做点缀。我们的一个撰稿人 И. Г. 多尔戈莫斯季耶夫当时写了一篇反驳《现代人》的某些观点的科学争鸣文章，为了暗讽《现代人》，特意把文章命名为《傻秃头的传说》，署的是笔名伊格杰夫，发表在我们去年的杂志上。据我猜测，《现代人》把这篇文章栽到了我身上，因而在骂我的医生时用了“傻秃头”这个词而不是其他的骂人话。但问题不在于用哪句骂人话，而在于为什么骂我的医生。——作者注

恶气呀！

整个事件中，当然啦，让我诧异的倒不是怒气（什么样的怒气没有呢！），而是那些莫名其妙的毫无理由的指责。我实在捉摸不透……也许是我的医生曾在某次做客时遇见过“局外的讽刺家”，谈话中不小心得罪了他，于是现在，当“局外的讽刺家”骂我的时候，大概突然想起了我的医生，这又一个不惹他喜欢的人，为了不浪费时间或者以防忘记，就决定顺便把他跟我一起骂了。更何况，此人还在给我治病呢。简直太妙了。不过我还是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另外再写一篇文章更好些，不至于显得如此突兀和出人意外；或者至少也应该简要地解释一下，哪怕为了连贯起见在脚注里写上两三句话也好，比如说，还有一个人我也不喜欢，而我却忘了骂他，因此在这里就顺便……但却没有。“局外的讽刺家”在怒骂过后，立刻就把我的医生忘得一干二净，彻底抛开他再也不提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为什么他骂医生！难道确实只因为他给我治病吗？真是莫名其妙！

《现代人》编辑部虽然在文章后面的编者注里声明不赞成这种毫不客气的论战方式，但是，为达到目的，他们希望借助的恰恰是这种方式。难道真的有效吗？您说，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大骂一个完全无关的人呢？他们为此能得到很多好处吗？

为了结束。给《现代人》的最后一次解释

《现代人》诸君，在我们的《时世》7月号上，我刊的同事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你们评我们杂志的两篇文章写了一篇最必要的三页长的声明。而你们却以整整四十八页的论战文字作答！[①] 在此之前就已经惊讶于你们无法控制的冗长废话，而现在我们简直陷入了困惑，因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个难以解决的疑问：如果我们写的不是三页，而是六页或八页，后果又会如何呢？或者我们冒险也写上四十八页，又会发生什么呢？这样做的后果，我们连设想一下都觉得恐怖。

每一个读你们文章的人都会说："为什么他们这么吵，这么闹，又这么激动呢？这些滔滔不绝的论战之河会流向何处？看来是有个什么东西真的令他们不安？"你们听到这话吗？的确，只有因为窘迫不安才会落入如此枯燥如此无聊的境地，居然还浑然不觉。就像一头误入铁轨被飞驰而来的火车吓得惊恐

---

① 为回答《必要的声明》，马·阿·安东诺维奇发表了《文学琐事》，共含五篇文章，长达四十八页。

万状的乳牛。这种情况虽然少见，却完全有可能发生。被吓呆的乳牛还难以相信即将发生的不幸，口中仍然念念有词：

“向前，顺着铁轨向前，快跑。”

它依然沿着铁轨向前跑，幼稚得想不到，只要稍稍向右迈一步，哪怕离开铁轨只一分钟的时间就得救了，就可以继续给人类提供奶汁了！在这幅鲜明的图画中，天真笨拙的你们恰似上面提及的这头乳牛，而你们的痴迷狂热就是那列火车。由此看来，你们是在自己毁灭自己，自己压迫自己。唉，其实，你们本来可以贡献奶汁。可惜，现代的人都既聋又瞎，漫不经心地忽略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教训！

以四十八页对付区区三页！难道诸位就没有想到这样做不仅不知分寸，而且显得平庸无能吗？难道你们真的没想到可以用两页篇幅来作答，而且（如果你们有理的话）即使只写两页也足以把对手击溃，就像三年前安东诺维奇（虽则他写了不止两页，而且也完全没理）抨击屠格涅夫一样①。你们看，现在还有谁记得屠格涅夫先生呢？相反，安东诺维奇变得何等伟大！还请你们回忆一下普希金先生的论战文章。用如此之多最刁钻的骂人话来对付篇幅仅三页的相当客气的短文，这个行为本身就表明你们已不打自招：首先，你们不会写简练的文章（这很可悲）；其次，你们论据不足，因为当一个俄国人理亏的时候，才开始用刻薄话骂人。诸位可还记得这么一句俗话：“丘比特，你生气了，所以你错了。”更何况如果生气的不是丘比特②，而只不过是你们，那可就滑稽了。丘比特还是可以得

① 指《现代人》1862年3月号抨击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的文章。

② 在罗马神话中主宰诸神和人世的最高神祇。

到原谅，而你们却就不可饶恕了。

说到底，你们是不是认为读者都很愚蠢？你们是否认为，无论你们说什么，他们都会完全相信？比如他们也会相信，“您的医生是傻秃头”这样的说法和一般情况下说的“医生”完全是一回事？再比如会相信，去年我们发表的中篇《论打碎的茶杯和打在墙上的拳头》（你们忘记提及，这篇文章是由《现代人》的一篇无礼得多的文章引起的）也可以直接叫做《废物，苟延残喘的畜生》？顺便说一下，这个关于“打碎的茶杯”的中篇（小说问世已经一年半），虽然措辞粗鲁无礼（这一点我们坦然承认），但也不应该直接以人名为题，因为天下任何一位有头脑的读者都断然不会以为，这里描写的是真实的事件，要想一饱眼福，正如你们所说，我们还得贿赂厨娘。这只不过是一幅漫画，为的是嘲笑去年我们对手[①]的过分激烈的私怨，他把最正当的争论（完全为迎合《现代人》编辑部而嘲笑屠格涅夫本人）变成了完全个人的论战。漫画是合法的，而我们的漫画的尖锐，我再重复一遍，是由我们对手加倍粗鲁的先发制人引起的。

同样读者总会明白，根本不能把我们登的（我们早就有言在先）关于谢德林先生要和一位局外的讽刺家到莫斯科去创办自己杂志的传闻叫做诽谤。这只不过是我们当时刊登的许多传闻之一，并非我们自己编出来，而是本来就存在的，况且还是被谢德林先生和《现代人》之间的分歧证实了的。尤为重要的是，我们抱着取笑的态度刊登的所有传闻，对谢德林先生的荣誉没有丝毫损害。逃离《现代人》到莫斯科去，不仅光采，而且是明智的举动。为了损害一个人的名誉而有意扯谎，或者想

① 指谢德林。

方设法使他当众出丑，亲爱的先生们，这才叫做诽谤。如果一方面加人以重大罪责，另一方面又确实知道这个人由于某些原因无法辩解和反驳，那么这就是诽谤者的耻辱，更何况事实真相早晚总会昭然若揭、大白天下的。最后，难道你们真的认为读者会想象不到，所有这些俄国语文中史无前例的骂人话，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而是隐藏着你们更深的动机？要知道，你们的狂热出卖了你们，自己却浑然不觉。

你们（噢，目光短浅的人）如此狂热是为谁服务呢！你们是否知道自己在为谁卖力？你们是一群孩子！你们是些“后生”，而不是什么“先生”！

不过，我们已经决定，为使你们完全放心起见，发表一个永远有效的声明：即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们写的关于这个题目的任何文章了，这是最后一篇。对不起，我们在此还是说了些话，因为临别不能不说点什么。在上一期《时世》里我们本来完全没有提及你们，也希望你们就此罢手。可是我们看到，你们不可能罢休，你们渴望答复，渴望争吵，你们还想写上五百页。那你们就等吧！你们再也见不到我们的答复了，哪怕你们再骂上三年。(但是你们杂志“遵循”的思想是另一码事,关于这些思想我们还是会经常有话要说的。况且思想不是骂人话,尽管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难以辨别什么是你们的思想,什么是你们的骂人话了。你们自己也糊涂了,显然把二者混为一谈了。)

临别之际，为了彻底结束我们之间的论战，我们还想再说两句——诸位认为会说什么呢？——说说雨燕①。我们早就想

① 1864年5月,谢德林在《现代人》上发表《文学琐事》,附有戏剧小品《一群雨燕》,抨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世》杂志。当年《现代人》7月号又发表马·阿·安东诺维奇(化名“局外的批评家”)的文章:《致一群雨燕,寄语头号雨燕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

就此说几句，可又一直不愿意纠缠不清。如今，事情要了结了，至少我们是这么想的。也就是说，我们再也不用回到这个题目了，那么为什么不一吐为快呢？我们认为雨燕是一种很好的小鸟：首先它们长得好看，而且它们还能预报晴朗的天气。① 记得一首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明天将是晴朗的天：
因为有雨燕唱着歌掠过。②

---

① 令《现代人》永志难忘的我们的撰稿人伊格杰夫先生，还是在上个月的时候给编辑部送来了一篇学术论战文章，是关于《现代人》最近的谩骂的，引用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而您别过分，不然我会害怕的”作为题词。我们当时之所以没有发表这篇文章，是因为它太宽容《现代人》了，因为伊格杰夫先生亲自与他们争吵，甚至对骂，而这种做法恰恰是投其所好。不过这篇文章中有对雨燕的解释，我们摘录其中的两三处：

“雨燕是一种可敬的鸟，而且，众所周知，它还预报好天气……是所谓的‘水上的燕子’(Hirundo riparia Cuv)，俄文名称——雨燕——源于词根 стри，意指迅速(参看《伊戈尔远征记》：‘像箭一样迅疾的风自海上吹来’，或者布斯拉耶夫先生对此的注释)。它因飞行迅捷而得此名，人们常说：‘雨燕一闪而过’。丘弗吐在对雨燕整个种性的描述中写道，它们的骨骼‘indiquent, même dans le squelette, à quel point ces oiseaux sont disposés pour un vol vigoureux’，也就是说，这些鸟即使只剩下骨架，也能证明它们多么善于有力地飞行。请问在‘雨燕’这个名称中有什么骂人的和令人难堪的呢？我完全猜测不出。”……

等等，等等。于是尊敬的作者就开始和他们斗嘴了。再摘录一段如下：

“……那么，雨燕有什么不好的呢？总不能怪它吃昆虫吧？真奇怪，你们居然没有想到，利用你们送给我们的绰号，我们可把你们比作昆虫，害怕雨燕的昆虫……”等等，等等。接下来又是争吵。(编者按：这个长注是作者加的。)

② 这是俄国诗人阿·费特（1820—1892）一首诗的开头两句。

预报晴朗的天气——是件荣耀的事情，尤其在现在，在我们生活的今天。更何况是你们给了我们的这个名字！有什么能比晴朗的天气，比那些明朗、安谧、祥和的日子更喜人呢！有什么能比预告、争取这些未来的日子，并且也激励别人共同争取更有意义呢……这可完全不是“把虚空当做具有破坏力的开花弹投向广袤的空间”——《祖国纪事》就是这么说你们的。我们的区别也恰恰在此：我们预报晴朗的天气，而你们把虚空投向广袤的空间。于是我们就算是雨燕吧，而你们——现在可以推测到你们究竟是谁了吧！

好了，够了！……这些材料足够你们写至少六十页或是七十页，而不止四十八页了。

尼·斯特拉霍夫的《回忆阿波罗·亚历山大罗维奇·格里戈里耶夫》一文附识

对于格里戈里耶夫[①] 的第一封信里涉及我和亡兄的情况，我不能缄口不言。信里有些失实之处，其中某些地方只有我能恢复本来面目，因为我是这些事的当事人，另一些事情我则是见证人。

（1）“本不应该像驱策驿马一样无休止地滥用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华，而应该保养、爱护，劝阻他不要再写小品文，这会断送他的文学前途，毁掉他的健康……”格里戈里耶夫的这些话，无论如何也不能用来责备我的哥哥。因为哥哥那么爱我，总是过高地评价我的文学才华，过于专注地关心我，对于我取得的成绩，他比我本人还要高兴上好几倍。这个无比高尚的人不可能像驱策驿马那样利用我为他的杂志工作。格里戈里耶夫在这封信里所指的，显然是我发表在《时代》上的小说

---

① 阿·亚·格里戈里耶夫（1822—1864），俄国批评家、诗人。他提出“有机批评”的理论。他在后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上接近，属于根基派，因此很同情斯拉夫派。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如果我写了一篇小品文似的小说（对此我完全承认），那也完完全全是我个人的错。我这一生一直是这么写的，除了中篇小说《穷人》和《死屋手记》的几章，我发表的一切作品都是这么写的。在我的文学生涯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长篇或中篇小说的开头已经付排了，而结尾还在我的脑子里呢，必须赶写出第二天的东西来。我已经习惯用这种方法写作了，因而这次写《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也是如此，没有任何人强迫我，我完全是自愿的。新创办的杂志需要一部长篇小说，而杂志的成就对我至关重要，于是我就决定为它写一篇包括四部分的小说。是我自己为了说服哥哥才对他说，小说我早就构思好提纲了（实际并非如此），写起来将很容易，第一章已经完稿云云。我这么做确实并非为了钱。我完全承认，在我的小说里有许多木偶式的人物，而不是活生生的人；是流行的人物，而不是富有艺术表现力的个性（要想塑造个性确实需要投入时间并在心灵和头脑中酝酿出思想）。因为我创作时全神贯注，当然就没意识到这一点，而只是隐隐有些预感。不过开始写的时候，我就知道：其一，即使长篇小说不能获得成功，但其中也不乏诗意；其次，起码有两三处叙述会是热情而有力的；其三，最重要的两个人物的塑造将是真实的，甚至是艺术的。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写出来的作品显得毛糙，可是对其中大约五十来页我还是感到自豪。这部作品倒是引起了读者的一些关注。我一辈子都是这么写作的，这全是我自己的错，我也承认这种习惯不怎么好，但……

我这还是第一次谈起自己的作品呢，哪怕只是由于尊重这一点，读者也会原谅我如此长篇大论地讲我自己和我的“杰出才华”。不过我再重复一遍，急就章般的写作是我一个人的错，高尚宽宏的哥哥任何时候从没用工作折磨过我……我后来和善

良的阿波罗·亚历山大罗维奇交往得亲密多了，他总是热心地关注我的创作，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他上面讲的话。他只是在这一次不了解具体情况罢了。

(2) 关于阿波罗·亚历山大罗维奇引用的那些我哥哥谈论基列耶夫斯基①、霍米亚科夫② 和费奥多尔③ 的话，虽然尼·尼·斯特拉霍夫后来在自己的文章中做过注释，但鉴于当时谈话的时候我也在场，所以我认为，作为见证人，我有必要把这些话的真实意义解说清楚。

阿波罗·亚历山大罗维奇经常在《时代》上提及霍米亚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基，并且每次都毫无忌讳，因为《时代》编辑部完全赞成他这么做。糟糕的是他谈到这些人时往往不那么得当，因为他没有例证，大部分读者当时感兴趣的完全是另一方面：读者们只知道霍米亚科夫和基列耶夫斯基是落后分子，尽管从来也没有读过他们的作品。应该让读者了解他们，不过这个认识过程要进行得谨慎、巧妙、循序渐进，要多介绍他们的精神和思想。夸夸其谈，没有根据地赞扬只会适得其反。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某位进步人士翻开杂志，看到“伟大的思想家霍米亚科夫，基列耶夫斯基，费奥多尔”这句话，就鄙夷地合上杂志不再读了，还称格里戈里耶夫是疯子并加以嘲笑。

所有这些看法，我去世的哥哥在一次完全朋友似的谈话中都对格里戈里耶夫讲了，当是我也在场，而且还参与了谈话。我哥哥最后说：“想想吧，在这种情况下，每个读者都有权问您，基列耶夫斯基和霍米亚科夫是怎样的深刻思想家”（也就

---

① 伊·瓦·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俄国批评家、政论家。他和阿·霍米亚科夫均为斯拉夫派代表人物。

② 阿·斯·霍米亚科夫（1806—1860），俄国诗人、政论家。

③ 这里费奥多尔指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

是当您只说空话而不做任何解释时）？

可是格里戈里耶夫从未理解这些要求，他完全缺乏策略和灵活性。而这些却是政论家和任何一个思想传播者所必不可少的，甚至有时、当向他作这类说明时，他觉得等于要求他背离以往的信仰。

（3）杂志刚开始办的头几年，确实曾有过些许动摇，这是事实。但不涉及大方向，只关系到具体的实施办法，在某些观念上出现过错误。然而，办刊的方向只能靠一年年积累逐渐形成。有没有方向和会不会清晰地、通俗易懂地表达它——这是两码事。后者的成功要求经验的积累、时间的付出和生活的经历，而且与社会自身的发展有直接关系。抽象的公式不是任何时候都适用的。有话要说的人都知道有时也会感到表达的困难。随便借用的千篇一律的公式，又属于马后炮，也就是当所有人都有所了解之后，当然比陌生的理论更容易成功，更容易被社会接受。只有陈旧的思想才非常易懂。我们愿意老实地承认以往的过失，但是要知道，如果有时候我们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些错误，那只是因为我们当时曾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4）至于是否提到吸收某个人为撰稿人，或者要求有新的政治评述员，那么阿波罗·格里戈里耶夫只能以此证明，他本人对出版杂志的实际操作问题一无所知。比如，杂志完全不赞同库斯科夫[①] 和米纳耶夫[②] 的思维方式，但如果他们某次投到编辑部的文章并不与我们的主旨和大方向相悖，而且文章本身又有趣、有文采，那当然可以刊登在我们的杂志上。否则，

① 普·亚·库斯科夫（1834—1909），俄国诗人、批评家、翻译家。

② 德·德·米纳耶夫（1835—1889），俄国诗人。他常以“新诗人”的笔名发表讽刺诗。

没有任何一本杂志可以生存下去。这样就不可能不出错，哪怕就一次，可能刊登了一篇不成功的剧本或小说。阿波罗·格里戈里耶夫也出过错，他提出的不出错的要求过于严格了。而要求一个新的政治评述员就更过分了。不可能要求一切都一蹴而就。后来《时代》的政治评述干得不错，这个栏目的撰稿人挺出色，即使如此，也远远未能达到透彻表达杂志思想的要求。很难为每个栏目一下子就物色到能与奥斯特洛夫斯基相媲美的才思敏捷的撰稿人，尤其是对一本刚刚起步的杂志而言。杂志清醒地意识到急需这样一些人，并正在寻找，这就够了。在类似的情况下，最糟糕的是，这样的撰稿人在当今的世界上还根本不存在。

再做一点最后的、总体的更正。在这些了不起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信件中，没有丝毫矫揉造作（不真诚）的成分，尽管尚未全面描写出当代一位俄国哈姆雷特（真正的哈姆雷特）的风貌，但相当典型。不过我要说，就连《时世》编辑部现在也不能不加任何说明地引用这些伟大信件的所有内容。毋庸置疑，每一个文学评论家都应该同时又是诗人，好像这是真正的评论家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格里戈里耶夫毫无疑问是一位有激情的诗人，同时他又像激情诗人一样任性和激烈。然而，我并不是说他着了迷，这个词已经被给他写悼念文章的人（毫无疑问，他们之中很少有人真正读过格里戈里耶夫的作品）庸俗化了。虽然格里戈里耶夫是一个真正的哈姆雷特，但他以莎士比亚的主人公始，而以我们俄国的当代的大小哈姆雷特终，他的人格的双重性较轻、反思得较少。他在很大程度上，地地道道是个接近土壤、接近根基的人，自己却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所有同时代人当中也许他是最具俄国个性的人（我是说实际，不是说理想，这自不必解释）。正是因此，他才把自己

哪怕很小的一股热情都看做是至关重要的，对整个事业来说是必不可少、密不可分的，乃至于只要这个热情有一点得不到满足，整个事业都会失败。又因为他在生活中很少出现思想的两重性，即使出现，他也不像“当代英雄”那样：一半忧郁而痛苦，另一半则只是观察、认识前者的痛苦，有时甚至还用优美的诗句来描写它，充满了自我欣赏和某种品尝美食般的满足感，所以他也就整个都染上了忧郁症，完全地，全身心地，如果可以如此形容的话。他的信就是在这种情绪下写的。

“我是评论家，而不是政论家。”这样的话他对我讲过好几次，在去世前不久还如是反驳我的一些意见。但是，评论家的职责就是：不仅要有坚定的信念，还要善于贯彻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个评论家都应该同时又是政论家。而贯彻信念的技巧则恰恰是作为政论家的一个最主要的素质。但是，格里戈里耶夫根据以往我们的某些政论家的个别例子，就对政论家这个词抱有成见。他根本不想了解，人们从他那得到了什么。或许，由于哈姆雷特式的多疑，他甚至会以为，人们希望他背叛自己的信仰。

我认为，格里戈里耶夫不可能和世界上任何一个编辑部完全心平气和地和睦相处。即使他拥有了自己的杂志，也会在创刊五个月之后亲手把它断送。

不过，我还是感到无比高兴。因为读者和文坛可以通过格里戈里耶夫的这些信件更加清晰地看到，这是一位多么实事求是、高度诚实的作家，更不用说他的要求多么深刻，他这一生又是多么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追求和信仰。

生活与文学中的双关语

在俄国文学界，关于安·亚·克拉耶夫斯基（政治与文学刊物《呼声报》的主编兼发行人）一向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我对此坚决不以为然。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甚至在久远的过去，只要话题涉及到或将要涉及到安·亚·克拉耶夫斯基的文学活动，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讽刺小报，所有的批评家，历史、小品文和幽默作品的作者，都马上莫名其妙地换了腔调，无论在此之前语气如何，也无论这些刊物和活动家们本人是何等角色，都一律开起了玩笑。尤其令人懊恼的是，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不由自主地，面带确定无误、天真淳朴的表情，仿佛他们确实有权采取这种态度。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种情况伴随了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的整个文学生涯，始自他的《鲍里斯·戈都诺夫》，直到晚近的《英雄卡斯捷利菲达尔多》等小作品为止。我认为这只不过是某种可笑的偏见，是一派胡言，应予以根除。这么说有何根据呢？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全都在于各种各样的事务①

① 安·亚·克拉耶夫斯基确实主编并发行了许多刊物，如《〈俄罗斯残疾军人报〉文学副刊》（1837—1839），《祖国纪事》杂志（1839—1868），《文学报》（1852—1862），《呼声报》（1863—1884）。

妨碍了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在他的文学活动中成为文学家！我们绝不应该因此而责怪他。再说，如果断言，谁不是文学家就无法在文学界成为杰出人物这将是可笑的。刚好相反，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在文学界完全是位杰出的人物。况且，即使是一位最了不起的人物，也完全有可能对俄国文学知之甚少。说到这里，我们只能责怪俄国文学界造成了这种状况，而不是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我们从自己的方面说，郑重承认后者在俄国文学界发出的声音。当然了，现在希望人们（不久前他亲自表达了这个愿望）尽量少订杂志（既然无法使人们完全不订阅杂志），而最好多订报纸（也就是说要多订《呼声报》，他当然不会促请人们订《圣彼得堡新闻》的）。我认为，从他个人的角度看，这个愿望是合情合理的：每个发行人都希望有尽可能多的读者，要是所有的杂志都倒闭了，订阅《呼声报》的读者自然就会多起来了。不过这么一来，就不得不承认，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出版《呼声报》的行为不仅无益于俄国文学，甚至还是有害的。因为读者在得到《呼声报》的同时，却失去了许多杂志。然而，我并无意于以此表明，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因为出版《呼声报》而给俄国文坛带来了损失。顺便说一下，尽管他在报上确实发出了有损俄国文学的呼声，这个行为本身已经证明他出版《呼声报》是对文坛有害的了。先生们，我承认我有点被这两个不同的呼声搞糊涂了。现在正好不是用双关语的时候，却偏偏事与愿违，我越是想表述得清晰明了，双关语就越是故意钻出来作祟。为了便于区分这两个呼声，我们姑且把其中之一，即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日常用以讲出各种话的、损害俄国文学利益的呼声称为他的自然呼声；而把其发行的、有益于俄国文学发展的另一个《呼声》叫做他的非自然的呼声。而且迄今为止他只不过是发行这个非自然的呼声，而从

未用它表达过什么有价值的见解。也就是说，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呼声，同时都属于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一个是他自己的自然的声音；而另一个，虽然也是属于他的《呼声报》，但已经是非自然的了。自然的呼声有损于俄罗斯文学，非自然的呼声有益于俄罗斯文学，而且自然的声音处于非自然的声音之中。也就是说，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的非自然的《呼声》中包含了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的自然的呼声。令人遗憾的是，即使区分了两个声音，还是有问题：要知道，当对俄国文学有益的非自然的《呼声》包含有对俄国文学有害的自然的呼声时，它本身也变得对俄国文学有害了。而我们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本来是为了证明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对俄国文学有害的自然的呼声完全是非自然的，是由与文学根本无关的、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的非自然的《呼声报》的利益引起的。我该如何是好呢？这些极其讨厌、极其愚蠢的双关语仿佛故意地，不断从笔尖跳出来，搞得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的两个声音都对俄国文学有害了。有什么办法呢？我觉得，在这一团乱麻中他本人也应负一部分责任，因为他平生从未把文学视为一项事业，而只是当做一些事务来应付。由于对文学持这种态度，才会导致总是出现双关语。当然了，我说这些话完全没有对那些事务说三道四的意思。换句话说，我并不想埋怨这些事务不算事业。正相反，虽然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把文学事业变成了事务，但他却弄妥了自己的一些小事儿，甚至是现在，当他在《呼声报》上表示多订报纸的愿望时，虽然说的不是事业，但当他说这个不是事业之事时，却想象着可以做好另一个更像事业的事业，并且十分确信，这个事业将使他的事情都一帆风顺……呸，糟糕透了！又是这些双关语！先生们，我相信你们一定对我很失望，不过，请给我一个辩解的机会：我

马上用最自然的方式向你们证明，由于上面已经提及的把文学事业当做事务来做，所以只要一提起这些事务，就无论如何也无法避免使用双关语（这是我根本无法左右的）。请看，我们面前就有一份《呼声报》，上面登着一则启事。都说了些什么呢？是有关1865年将出版月刊《祖国纪事》的事。（请听吧！）众所周知,《祖国纪事》的主编也就是这个出版《呼声报》的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听听，听听！）启事中首先写道：《祖国纪事》以往那种每月发行一期的做法既笨拙又过时，在新的一年里将便捷、及时地一个月出两本。也就是说，由原来的每年十二本，增加为二十四本。“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当您对事情一无所知时，您会这么想。“所有实力削弱、开始走下坡路的杂志都会采取这种最简单易行的招数自救。他们幻想着不必更新内容，而只做做表面文章，或者化整为零，或者改头换面，就能挽救局面。沉重的杂志分为两本，也不会因此而变轻巧。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也太耽于幻想了，以为用一分为二的办法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抬高他那走下坡路的杂志。”您是这么想的，但只要看看事实，多多琢磨，您就会发现，关键还不在此，而在于刊登这篇启事的动机。请读读下面这段话，这可是他的原话：

每月一厚本杂志的发行模式是我们的期刊针对以前的情况确立的，当时的杂志、报纸既不涉及对外政策，又不涉及国内生活。杂志只囿于刊登艺术、科学方面的文章，而且是尽力而为，采取抽象的表述……从1834年到1856年，大型月刊基本是俄国杂志界的唯一发行形式。但从1856年起，这个状况有所好转：杂志获得了谈论政府实行的各项改革的权利；文学可以涉及政治科学和世界政治，出现了一些贴近日常生活的作品。由于上述原因，报纸在俄国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每月发行的杂志则丧失了以往的地位。道理显而易见：以往的杂志无一例外地服务于纯文学或纯科学领域，而这些领域现已退至次要的地位。同时，过长的发行周期也使编辑部无法就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进行及时报道，及时参与解决问题。一桩早已被各家报纸炒作得尽人皆知的事件，往往一两个月后才得以出现在杂志上，再加上往外地投递的时间，早就事过境迁了。这种尴尬状况导致：杂志不得不关闭那些最贴近生活的栏目，身不由己地成为文学作品的汇集或科学论文集，并且大部分是理论性极强的。杂志以往的地位是由社会上缺乏政治兴趣而文学兴趣占绝对优势的状况决定的，现在已今非昔比。幸而文学趣味不像政治、社会热点问题那样容易过时。

“这是怎么回事？”我读完这段文章，惊讶不已。“乍看上去像是这么回事，可再一想……”算了，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在此说得太过分了！首先他认为每月发行的杂志已丧失了以往的地位，而报纸却日益强大，而且这种状况始自1856年。但据我回忆和判断，结论却截然相反：杂志正是在这个时期得以发展壮大，在读者中获得了新的意义；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创办了许多新的杂志，有些还赢得了数量空前的读者群。例如，莫斯科创办了《俄国导报》，其订户达到了七千，有人说比这还要多。即使是现在，它也有六千读者。《现代人》也成长了，订户由原来的四千（历史最高记录）增加到六千。创办了《俄国言论》，至今还在发行。四年前一份全新的杂志《时代》问世，第二年就吸引了四千五百多个订户，第三年达到了五千，如果杂志继续办下去的话，这个数字还会增长。今年又有《时世》创刊了……要知道，无论如何这都是事实。杂志并没有衰落也没有失去在读者心中的地位，倒是《祖国纪事》确确实实

丧失了以往的意义。不过也许根本不是由于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所说的那些原因，而是新陈代谢的规律使然：老的在老去，新的在成长——就这么简单。或许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指的不仅是这一种衰落。他接着谈道，不知为什么，“杂志不得不取消那些最贴近生活的栏目，不由自主地成为文学作品的汇集或科学论文集，并且大部分是理论性极强的。”取消？为什么要取消？——我更加惊诧。要知道这样说不仅有悖事实，而且道理上也讲不通。报纸恰恰因其及时快捷的特征而根本区别于杂志，二者无法互相替代和兼容，报纸无法取代杂志，杂志也无法代替报纸，应该沿着各自的轨迹发展。再说为什么杂志最贴近生活的栏目应该遭到取消？为什么恰恰是杂志应该在“纯理论”的方向上发展？这是规律还是义务？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在此指的是什么？要知道，最近，自1856年以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正是在杂志中得以反映和表达，因为我们整个的文学全都集中在杂志上。姑且不论这些杂志表现得如何，总之是表现了，尽其所能地叙述了一切。而报纸，正是那些近来颇受欢迎的报纸，都只不过是初出茅庐。无论是《莫斯科新闻》，还是现在的《圣彼得堡新闻》，其现有的版式都是刚刚形成，而《呼声报》也是去年才创办的，而且据我们所知，至今也没写出过什么不同凡响的东西。不要说不同凡响了，甚至可能根本就空洞无物。不过，这倒有点像业余爱好者的水平了。值得探讨的是，《呼声报》所说的这“最贴近生活的栏目”具体指的是什么？是不是它在启事中所说的“政府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是“政治科学和世界政治”，还是“紧密贴近日常生活的作品”？要知道，杂志就是写这些的呀，也只能写这些。况且，也只有杂志才能写得像样，也就是说，善于就类似的题目发表真知灼见（当然了，是在其能力允许的范围

内)，因为它们有时间在一系列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而后得出结论。而每天发行的报纸就没有时间这么做，报纸只负责报道事件在发生这一刻的表象，有时这些表象显得相当凌乱和突兀，因此报纸只能写一些在这一刻能够说出来的东西，没有时间等待同类事件积累多了，再对其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得出正确、客观的结论。而只是罗列事实，却不对事实进行详细研究并得出最终结论，那么这些事实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团没有头绪的乱麻。总之，根本无法设想报纸能既迅速及时，又准确无误地说出令人信服的东西，因为一心不能二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而“紧密贴近日常生活的作品”指的又是什么呢？在持久贴近日常生活方面，大多数报纸是根本无法和书籍相比的。能不能贴近现实生活，关键在于内容，而不在于是否每天都发行。如果报纸企图对其每天刊登的事实进行研究和全面分析，并把分析所得的结论以详尽周密、论据充分的科学论文的形式表现出来，并设想利用报纸的优势，比任何人都快地发表这个成果，那么我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异想天开。即使报纸可以进行上述研究和分析（甚至不先于别人)，充其量也只能是编者按、结束语之类几乎是空空洞洞或是过分简短的意见。即使是正确的，也是笼统和简化的，由于受客观条件所限，根本不可能有其他的表现形式。因为报纸无论是篇幅还是时间都不够用，再说其本质也决定了它们该做的是分析和研究之外的事情。不能把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无论是什么地方的报纸，都不能穷尽人类切身生活的所有问题，或囊括此时此刻的全部生活。我在此只是笼统地讲杂志和报纸，不具体针对《呼声报》和其他月刊杂志。但如果把上面所说的一切都用在《呼声报》头上，想一想这一份报纸想囊括我们的全部生活(它说的可不是《圣彼得堡新闻》)，还在这方面极力向读者自

荐，唯一的理由就是它是分散发行的，每天一张，而不是一下子就发行三十页厚的一大本，那么从它的方面来说这就太机械了。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也太机械地理解生活了。根据他的哲学，把握生活的意义就在于把完整的物体分解为部分。果真如此的话，生活岂不是太简单了。一斧劈开，就万事大吉了。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这件事可不像劈柴那么简单。可以认为，尊敬的《呼声报》的发行人在报上登电讯，能够先于所有人报告前一天发生的事件，这一点在他看来也成了生活的意义所在。更不用说，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谁能先于他人说出来，而在于如何说和说什么。我们干脆假设《呼声报》的发行人能以第八位圣人[①]的身份讲话。而如果他真是第八位圣人，他在电讯之后立刻会做如下的补充："我说的是我现在所能说的，至于以后的事态，我们还要再观望观望。——这里给您一个讯息，这是我首先提供的，是我第一个发表了见解，这就足够了，——虽说得花上十五卢布订报上门[②]。至于这些事件将引发或可能引发什么后果，不仅现在一时说不清，有时可能许多年过后，仍是弄不明白。要知道，不是所有事件都能在两分钟之内完成。我先等一等，琢磨琢磨别人和大家的看法。头脑和生活人人都拥有，非我独享。再说，篇幅也不允许我说尽一切。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当然是在生活和科学都有了说法并给我澄清了许多东西之后，我一定就这些事实发表独到甚

① 作者在此戏谑地把安·亚·克拉耶夫斯基同公元前7—6世纪的七位希腊智者相比，他们活动于立法、政治、军事、诗歌等不同的领域，但都擅长用言简意赅的箴言表达思想。——俄编注

② 暗讽克拉耶夫斯基发布的《呼声报》征订启事，其中结尾处指出在彼得堡的订阅年价是十二卢布，送报上门则需要十五卢布。

至是权威性的见解。即便如此，我也将表述得非常简短，以一篇社论的形式，这样的社论我总是自己写。而为了使一切最终都 à la hauteur du sujet[①]，还是建议您去请教一下比我更专业、更详细地研究这些事情的人。要知道，他们可以进行更细致、更广泛的研究和解释，事件的生命力并不会因此而削弱，恰恰相反，他们也许还能找到症结所在并予以根除。关键不在于电讯，也不在于分散成单页，不在于单纯的速度，也不在于急着发布消息。消息俯拾即是，可就这消息说点什么，却真是个难题！国外广泛出版研究事实的书籍、论文、小册子，所有需要活下去和关心自己生活的人都阅读。而我们却由于根深蒂固的习惯，书出得还很少，要么是从杂志上翻印下来的，要么就是翻译作品。而整个文学暂时仅表现为几本杂志。那么，就请阅读杂志吧……要知道，不是所有的杂志都像我在启事中讲的那样'尽可能地抽象'（好像它们故意努力以抽象的形式发行，而且还是'尽可能地'，也就是说，它们自己殚精竭虑地想显得抽象一些）。要知道，政治和社会的需求也不像我在同一启事中说的那样容易过时。我是故意那么写的。你们不要当真，而且也不可相信，因为这本来就是无稽之谈。事实上，政治和社会的需求越是重要，受关注的时间就越长，就越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有些问题不消两个星期就烟消云散了，而有的却历经整整一个世纪，仍不失现实意义，还有的历经几个世纪而不衰。至少，持续一个月是可能的，总来得及等到杂志出版。总之，这后一类问题比前者更重要，其全部重要性并不在于抢先，也不在于我就此最早在《呼声报》上发表见解。再说，慢工出细活，着急办不好事。就是这样，我们还经常招人

① 法文：具有高水准。

笑话，不能自己包揽一切。再说，又不是所有最先发表见解的人都正确。有时可能急着抢先说，反倒很愚蠢。我们也听一听聪明人的见解。而最迟发言的人也许要比我讲得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更不要说由于报纸本身的特点，还有许多栏目不适于进入报纸，而关于它们总应该有人说说的……”

但是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可没有这么说，他留给杂志的是死气沉沉、毫无生气的空洞理论……自己独占了全部生活的本质……即使是在科学、文学、艺术以及对我们当前生活的最根本事实及其特色的研究中，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大概也没看出任何现代、鲜活、难忘、迫切的东西。而政府改革，我们内部生活的根本变化，我们俄国的当代生活中生生不息的重要现实呢？例如，农民改革和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当前贵族的状况等等。要知道这些问题不是稍纵即逝的，而是长期存在的，它们不只存在两星期，而是世纪性的问题。要想求得彻底解决，还需要时间，需要经过长期持久、脚踏实地的研究与观察。这些问题不是死的，而是最有生命力的。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像关于布龙坚[①]的消息，或上星期在枫丹白露[②]又有哪些娱乐活动。甚至关于死前人们一无所知，可突然所有电讯和彼得堡的名角儿都谈论起来的某位莫卡尔先生的死讯，同样不能像上述需要大规模迫切研究的永久性问题那样令我们激动。难道一旦有人就这些问题认真详尽、有根有据地发表见解，主要不是简略地，不是以每天发行的报纸的形式，而是以专门文章的形式，它们就马上失去紧迫性，而且不

① 因在尼亚加拉瀑布上走钢丝而闻名世界的大师，1864 年 8 月在彼得堡巡回演出，《呼声报》对此曾大加报道。

② 法国城市（在巴黎南），有宫殿和公园，是 16—19 世纪法国国王的郊外行宫。

值得引起读者的注意了吗？为什么一旦把自己的见解印在书上，而不是发表在报纸上，就一定会变得抽象，而且一定就属于“理论”倾向呢？我觉得，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在这个问题上简直是利令智昏，他因为过分追求订户的多少而陷入了滑稽的双关语。也许是由于事务缠身，没时间钻研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哲学问题，所以他只能就事论事。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试着帮帮他，尽量简明、通俗地给他阐释一下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哲学关系。理论倾向原来是这么回事，是指人们不切实际地行动，以自己杜撰的、多数情况下是幻想的东西为根据，在并不准确知道问题所在的情况下就不加考虑地乱说话。而实践派呢，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说话和做事全无理论指导，认为是勺子就能放到嘴里去。综合了这两个倾向的鲜明例子就是《呼声报》。虽然《呼声报》从本质上讲是属于理论倾向的，因为它经常不假思索、不动脑筋地凭幻想说话，而且多数情况下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同时它又是实践倾向的刊物，因为它追求一些微妙的、可称得上是有趣的目的。因为追求类似的微妙目的还是需要深思熟虑的，而不能不加考虑，有时就不可同时做两件事而把理论与实际混在一起。否则，就有可能南辕北辙，耽误大事。一旦《呼声报》对自己的微妙目的做到心中有数，就不会说得这么多了。有时候，还是少说为佳，不然会贻笑大方的……这就是我们关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完整哲学所作出的简明扼要、深入浅出的解释。

有人会对我说：“可是，这全都是哲学。而您答应了讲双关语的。您好像曾经想证明，只要一谈起这些事，就无法回避双关语。可是它们在哪呢？”

如果您到现在还未发现双关语，那就请您再往下读一段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启事。并请注意，在此处摘录的第二

段文字紧接着您上面读到的第一段，其间没有任何过渡，请注意从夸赞报纸到宣扬《祖国纪事》的优越性之间的急剧转折。

> 所有这一切都迫使《祖国纪事》编辑部改变发行周期，订户将由每年收到十二本杂志，改为二十四本（每本二百五十页左右），也就是说，每月两本，1日和15日各发行一次。双周刊有更多可能及时地把国外政治事件和俄国的社会生活进行分析和综述；借助于相对缩短的发行间隔，编辑部可以更快地向读者介绍具有现实意义而限于篇幅无法在报上刊登的事件。双周发行还为及时地通报文学信息提供了更多可能。在月刊上需连载几个月的长篇小说，在双周刊上的刊登速度大大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可以及时得到满足。

这怎么不是双关语呢？现在，当读完第一段之后，您知道如何真正地阅读此处了吧？应该这样读："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呼声报》编辑部说服自己的订户，同时还有《祖国纪事》的订户，再也不要订阅《祖国纪事》了，而以《呼声报》取代。因为，首先，有什么必要有一份'许多贴近生活的栏目都应该取消'（正如作为发行人的我们亲自在这个启事中证明的那样）的刊物呢？其次，要知道《祖国纪事》现在变成了'仅仅是文学作品的汇集或科学论文集了，并且常常是理论极强的'。那和《呼声报》有什么区别呢？其一，在《呼声报》中（当然只在《呼声报》中，而不在《圣彼得堡新闻》中）集中了当今俄国文坛的所有迫切问题；其二，它的方向是如此实际，以至于都令'儿子'[①] 羡慕了。也许您已倾心于我们将一个月发行两次《祖国纪事》，这样'双周刊有更多可能及时地把国外政治

① 指保守派报纸《祖国之子》，其主编为A.B.斯塔尔切夫斯基。

事件和俄国的社会生活进行分析和综述’。怎么样，先生们，难道你们不是怪人吗？想一想吧，在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一切之后，这个原因不显得可笑吗？要知道我们可不会凭白地举手打自己呀！我们把一个月的周期缩短为两个星期，又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假想一下，杂志通过这个机械的分裂确实能得到振奋并得以复生。就让它通过这个方法一举跃居我们所有杂志之首吧。可无论如何，它还是要比《呼声报》的电讯和新闻整整晚十四天，所以也就比《呼声报》更抽象、更理论化、更呆板十四倍。《呼声报》全是“声音”么！请您订阅吧！如果您有闲钱的话，那也请订阅《祖国纪事》吧，我们不会阻拦的；如果您只有订阅一份刊物的能力，却选择了《祖国纪事》而放弃《呼声报》，那就可笑了。作为《祖国纪事》的编辑和发行人，我自然不会白白地长篇大论一通杂志相对于报纸的劣势，尤其是在《祖国纪事》的发行启事里！我说这些是不无原因的，我不是为您的利益着想。最终（咱们内部讲），每十五天出一本杂志未必有什么好处。关键在于智慧，而不在于技术。有的人一整年也说不出一句聪明的话，而您想让我们在十五天之内就想出来……”①

要想不同第一段矛盾，本应该是这样写法。而实际上却出现了一个双关语：《呼声报》推荐《祖国纪事》，于是，后者大概出于感激之情就说自己理论化和呆板，并且推荐《呼声报》

① 我们根本就不希望这些话都用在《祖国纪事》上。我们真诚希望《祖国纪事》取得成功和更新，如果它确实能开拓出一条新路，我们将第一个在这条路上欢迎它。《祖国纪事》是一本历史悠久、颇有声望的杂志，在我们的文学史上拥有辉煌的昨天。怎么能对它无动于衷呢？尽管它近些年的表现平淡无奇，毫无可圈可点之处。显然，这个启事是按照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的意愿写成的。我们就是如此理解这件事的。——作者注

取代自己。这如何不是双关语呢？这一切均是因为这里做的都是事务，而不是事业。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近期的《呼声报》上，安德烈·亚历山大罗维奇甚至把杂志与报纸相比仅剩的一点聊以自慰的优越感也给抹杀了。甚至对《祖国纪事》都没有手下留情！本来说的是，把文学和长篇小说留给杂志，还说这是杂志相对于报纸的特色。紧接着在《呼声报》上就有一个“与此无关的客观公正的评论家”急急忙忙地出来阐发自己的公正观点（真是时候），说什么随着《呼声报》及其电讯的出现，整个文学和艺术都遭到了致命的一击，失去了以往的意义，再也无法复兴了，而且也全无复兴的必要了。还说，不光是屠格涅夫，或其他的当代作家，甚至连果戈理在《呼声报》面前都已是不合时宜的落后者了。不仅如此，世界上没有一部戏剧（连莎士比亚的也在内？）的意义可以和《呼声报》的电讯相提并论。这篇微不足道、愚蠢至极的文章，它之所以十分引人注目，不是以其可笑的内容，而是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事实。我们的社会在因改革而迷惘惶惑，处于独立支撑的境地，早已脱离了一切本土的和有生命力的东西。有谁看不出，最近就在我们的社会里，突然暴露出多少头脑的愚钝和智慧的贫乏，多少幼儿般的无能和软弱，多少幼稚而且也不可能成熟起来的东西，多少动摇不定的信仰和信念，多少的腐败气息，多么不善于施展自己和开发什么事业。无论我们的文学生活的某些事实多么可怜可笑，无论所有这些“自己个人的”观点、声音、方向等拙劣的附会多么无聊，我们还是认为，在我们最近的某期杂志中，详尽地把上述社会生活的哪怕一个现象加以分析也是一件有趣而严肃的大事。首先我们就撷取《呼声报》所说的“政治科学和政治生活”。题目固然庞大，但是不要害怕，先生们，我们

暂时只从彼得堡发行的政治日报入手，对其进行尽量公正客观的研究并得出结论：在我们社会生活中这个艰难的、决定性的时刻，它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包容了生活的和充满生机的内容？

德·瓦·阿韦尔基耶夫[①]《从两个彼得堡人的自白谈起》一文附识

我在瑞士[②]也见到过一个十三岁的俄国男孩儿，他已经在日内瓦的一个寄宿学校里学习了三年。他被带离俄国的时候才十岁，许多母语单词都忘了，听不太懂我的话，尽管看得出来，他很想用俄语和我聊聊天。他的发音非常滑稽。我看着他，却全然笑不出来。

---

① 德·瓦·阿韦尔基耶夫（1836—1905），俄国作家。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两次去过日内瓦，一次是1862年，另一次是1863年，不知究竟指的是哪一次。

谈瓦西里耶夫[1] 在《孰能无过，孰能免祸》[2] 中的表演

您希望我谈谈瓦西里耶夫扮演克拉斯诺夫的印象。首先（坦白讲），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他。您知道吗？我是对瓦西里耶夫抱有成见走进剧院的。我耳闻了许多看过《孰能无过，孰能免祸》这部戏的人对其表演的赞扬，反而不由得心生疑窦。“莫恰洛夫[3] 式的表演！”要知道，这有点言过其实。不过与此同时，他的表演确实令我有耳目一新之感。真的，我至今尚未在悲剧中见过像瓦西里耶夫这样的演员。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我读过两遍，还看了首演，其中扮演克拉斯诺夫的是布尔金先生。此前我通过阅读已经对克拉斯诺夫这个人物有所了解，因此不难发现布尔金先生对他所扮演的角色知之甚少，也许是心里明白，表演却适得其反。他为什么总是千方百计地抛噱头？我至今也参悟不透其中的奥秘。我

---

① 帕·瓦·瓦西里耶夫（1832—1879），俄国著名悲剧演员，他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许多戏剧中扮演过角色。

② 是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 1863 年的剧作。

③ 帕·斯·莫恰洛夫（1800—1848），俄国十分著名的悲剧演员。

想，他在排练的时候，肯定事先在最近的某期《俄国导报》上读到了这么一句警言妙语：即“这个世界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唯有一样是绝无仅有、难得一见的，那就是一个恋爱着的俄国商人”。《俄国导报》如此这般地就剥夺了俄国人几乎是最末位的人类本能——爱和忌妒，可以说这已经算是动物本能了……

瓦西里耶夫扮演的克拉斯诺夫自尊、严肃、克己，他仿佛因为爱的激情而显得脱俗，略高于周围的人们。看得出来，某种新的、某种不可动摇地控制了他的全部身心的东西，已深深地在他身上扎下了根。看来，三年来在这个人身上发生着某种非同寻常的事。三年来，他疯狂而痴迷地爱着傻乎乎的塔妮娅。一种近乎幼儿的无知妨碍着这个姑娘成为“高尚”的文明人，就像她的姐姐日米古莉娜小姐一样。她对每句话都不会大惊小怪：“我们对此不习惯，因为我们接受的完全是另一种教育。”热恋中的克拉斯诺夫被激情冲昏了头，以至于对自己的妻子一无所知，甚至至今还想在她身上发现某种崇高的东西，某种远远高于他和她的圈子的东西。并且请注意：这种情人的眼光在人身上是同强烈的自尊和对自己生活中一切真实和人性的尊重两者并存的。然而他的理智却偏于一面。克拉斯诺夫至今仍笃信不疑：妻子会爱上他的。尽管三年来的事实证明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有的时候，经过五年才能产生爱情”，他暗自思忖。他爱得热烈，尽管您永远也不会看到他像奴隶那样卑躬屈膝，但是，塔妮娅显然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成了他心目中的偶像。阿福尼亚——克拉斯诺夫病弱的弟弟证明，他哥哥对妻子言听计从，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爱还在日益加深。虽然他也招待亲戚，但更像是习惯使然，并非诚心，有点漫不经心。他从不主动提起某个话题，城里和周围发生的一切都引不起他的兴趣。他厌恶地听着亲戚自以为是的高谈阔论，然后宣

布这都是胡说八道。他妹妹喝着喝着茶，只因为说了一句挖苦塔妮娅的话，就被他赶了出去。与周围的人隔阂对他来讲根本无所谓，只有塔妮娅才是他的理想。塔妮娅什么时候才能爱上他呢？这才是让他忧心、痛苦的问题。人们是如何谈论塔妮娅的，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美人的，人们是否因为他有这么漂亮的妻子而羡慕他？这就是他当前全部的喜悦和幸福……是的，演员只不过是在演戏，但无论如何，通过瓦西里耶夫的表演我看到了诗人所创造的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并且确信，这个人物就应该是这样的。

而这时候冲突就开始了，一股恼恨和忌妒之火在克拉斯诺夫身上逐渐燃烧起来了。总的来讲，他是一个爱发脾气的人：尽管他像《水下的石头》[①] 的主人公一样是个文明人，但是他从不把属于自己的东西拱手相让，不会向任何人妥协，也不会和别人做任何交易。禀性是不会改变的，而且要表现出来。而这正是他的禀性，而不是刚愎自用。这个人不要残缺不全的东西。塔妮娅实在是太漫不经心了，她根本不理解自己引起的这份激情是多么可怕，会给她带来什么，将会有什么结局，她无法设想自己的命运中恐怖的一幕。她只是觉得烦闷无聊，别无其他感觉。“有学识”和对“庄稼汉”的鄙视，也妨碍着他妹妹看清塔妮娅的极端处境。塔妮娅由于百无聊赖，由于某种幼儿式的苦闷投入了她首先遇到的人的怀抱，而对方就是令人厌恶的瓦连京·帕弗洛维奇·巴巴耶夫。当她和这个人约会时，就不禁回忆起自己的少女时代，回忆起在富有的贵族庄园里初开

① 是俄国作家米·瓦·阿夫杰耶夫（1821—1876）的长篇小说，写贵族社会中的生活和妇女地位。虽不深刻，却涉及当时大家关心的妇女问题，一度流行，但很快为人忘却。

的情窦。那里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骑士，小姐们的装束是那么漂亮，大家在花园里尽情嬉戏，疾速奔跑，和小伙子们一起玩逮人游戏。关于逮人游戏的回忆大概至今都令她着迷，甚至比瓦连京·帕弗洛维奇本人更讨她的喜欢。这个瓦连京·帕弗洛维奇被我们的某些评论家看做性情中人，几乎是受难者，是刚愎自用的牺牲品，起码代表着对刚愎自用的一种反抗，实际却比傻瓜还不如。因为他不完全是傻瓜，却像傻瓜一样鄙俗。他俨然一只会发光的小虫，当他的仆人对一个乡下的小书记官粗暴无礼时，他会批评道："你多么粗鲁!"[①] 而与此同时，他自己却毫不受良心谴责地，甚至是天真地，也就是说下意识地勾引女人，开始和她恋爱，甚至险些直接对她本人说：这一切都是pour passer le temps[②]，只是因为没有风流韵事在一个小地方待上四天太无聊了。他这么说的时候，还认为自己是问心无愧的。

① 这句话出自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孰能无过，孰能免祸》（第1场，第3幕）。

② 法文：为了打发时间。

阿·安·戈洛瓦切夫[①]
论古典教育一文读后感

讲到传统教育和现实教育之争，应贯彻一个思想，即我们不能不保留、发展并加强现实教育，但与其并行的（用来替代古典教育的）应是（强化的）对俄罗斯的认识，了解它的历史、语言、民族，各斯拉夫人的风俗和方言，甚至包括拜占庭文化。即使我们的青少年无法在现实中成长为真正的俄罗斯人，起码可以通过学识做到这一点。总之，要不遗余力地掌握和认识俄罗斯思想和俄国发展的规律，了解其区别于包罗万象的罗马-日尔曼思想的特征和个性。而俄国人甚至意识不到这个俄罗斯思想及其规律在世界上不仅应该存在、确实存在，而且整个俄国的前途可能是同这一思想发展的情况完全一致的。

（2）我们的教育为什么缺乏生气？——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启蒙，不是工业，不是幸福，而是专制国家的中央集权，因此也就

① 阿·安·戈洛瓦切夫（1819—1903），民主主义的社会活动家、政论家。

需要官吏。

症结何在呢？恰恰是因为这个专制制度（在彼得统治时期）完全采用了欧洲的模式，却丧失了古罗斯自己与人民保持关系的思想。

国家中央集权的思想在我国做得过火，超出了正常的限度，吸取了相抵触的但却得势了的欧洲原则，于是添置了侍从，也就是官吏，以加强自我保护。而此前，国家是以轻松自然的态度对待人民的，而且也从未惧怕过国民代表会议①。

① 国民代表会议是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末俄国最高级的代表机关。由宗教界高级会议、大贵族杜马、宫廷成员和地方贵族、上层市民代表组成。在国民代表大会上研究、解决国家的重大问题。

附诗稿

有感于1854年欧洲事件[①]

世界性灾难，祸从何来？
是谁的错？谁首先发难？
你们是众人皆知的聪明民族，
可你们的名声并不善！
最好莫过于安稳居家，
操持妥自个儿的家园。
咱们恐怕用不着你争我夺，
天下之大足够大家施展。
再说也未免过分可笑，
拿法国人来吓唬俄国汉！

---

① 1854年，英法同土耳其联盟，向俄国宣战，联军在未遭抵抗的情况下在克里米亚登陆，开始围攻塞瓦斯托波尔，并在巴拉克拉瓦和因克尔曼获胜。本诗似写于英、法、土联盟向俄国宣战之际。

有什么灾难罗斯不曾经历！
它背后是你们从没有过的遭遇。
鞑靼人践踏了罗斯，
到头来自己落得双膝跪地。
那之后罗斯已阔步向前！
甚至不屑同你们并驾齐驱。
它长得高出外国人一头，
你们怎能和这斗士较力！
如若不怕被拧掉脑袋，
你们再瞧瞧今天我们的士气。

罗斯吃够了内讧的苦头，
鲜血一滴滴几乎淌尽，
同胞兄弟在争斗中煎熬，
但神圣的罗斯生命旺盛！
你们更聪明，却离不开书本！
你们更正确，只是自尊心的幻想！
可要记住，即便在这次苦难中，
我们也将坚韧不拔！
过去就是对你们的回答，
你们的结盟早不令我们害怕！

鬼怪横行的年代我们也会获救，
倚仗十字架、圣灵、信仰和皇权！
我们内心树立起这一信念，
它标志着胜利和转危为安！
我们不曾胡里胡涂丢弃信仰，

（像欧洲某个民族那样，）
靠信仰、我们能够起死回生，
靠信仰、斯拉夫人才生息繁衍。
我们相信天国的上帝无所不能，
而罗斯生机勃勃，死亡不能沾边。

你们写道是俄国人挑起争端，
是我们自己不知检点，
是我们不珍视法国人的尊严，
说你们为结盟的旗帜感到羞耻，
说你们十分可惜金角的帝国，
对这一切我们已做出严肃的回答，
如同回答小学生，叫喊的愚顽。
不喜欢吗？怪你们咎由自取，
难道非得对你们毕恭毕敬一番！

你们哪里弄得懂俄罗斯的命运！
它的使命你们是一无所知！
东方属于俄罗斯！人们世世代代，
不停地向俄罗斯伸手联谊。
而俄罗斯主宰着亚洲腹地，
给一切注入青春的生命，
于是一个时刻来临了（上帝的意旨！）：
俄罗斯复活了古老的东方。
那是新的罗斯，沙皇的臣民，
是未来的辉煌的曙光！

毁掉一代人的鸦片，
（我们不客气地叫它野蛮，）
不会推动你们民族走向复兴，
也不会让屈辱的人受你们奴役！
是英国人通过疯狂的强制，
（这帮鼓吹基督友善的传教士！）
在愚钝的人们中传布疫病，
令人厌恶地去寻求财富！
上帝走向十字架牺牲圣体，
莫非不正是为的你们！

大家来看，他如今还被钉着，
重新淌出圣洁的殷血！
可出卖耶稣的犹大今在哪里？
又在出卖亘古不灭的上帝之爱？
耶稣重又遭刑，忍受痛苦与悲哀，
眼里重又流出沉痛的泪水，
神圣的双臂重又被拉开。
天空泻下可怖的雷雨！
那是我们同教兄弟的悲苦，
是教会在残酷迫害下的呻吟！

他要他们称他为神人，
他自己是正教信仰的首领！
要亲自向异教徒宣战，
可那是不光彩的罪过的功业！
基督徒为了土耳其人反对基督！

基督徒成了穆罕默德的捍卫者！
你们可耻呀，背叛十字架的人，
你们是圣明光辉的毁灭者！
上帝与我们同在！万岁！
我们的事业神圣，甘愿为基督献身！

格杰翁[①] 之剑专救受压之人，
以色列也有强大的判官！
那就是你维护的至高的大帝，
是你亲手扶持登基的君主！
那儿有三两个人已做好准备，
上帝履约也置身他的中间。
我们千百万人在等待大帝钧旨，
上帝啊，你的时刻终于到来！
号角吹起，双头鹰呼哨着，
向君士坦丁城威武地飞去！

1855 年 7 月 1 日[②]

在 1812 年光荣牺牲的时刻，
母亲把儿子交给了沙皇，
祝福他们在战场上杀敌立功，

① 圣经中的英雄（勇士）。他曾在力量悬殊情况下与敌人战斗。格杰翁之剑一语象征为神圣事业而战斗。
② 是日为尼古拉一世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多罗芙娜的生日。

于是大地染上他们的鲜血，
罗斯焕发出英勇和爱的容光，
当俄国人民又一次遭遇这一时刻，
此时突然响起你[1] 低沉悲痛的呻吟，
它如剑锋刺进我们的心脏，
这一刻向俄国人昭示了灾难，
巨人惊悚了，头一回浑身一颤。

犹如晚霞隐没在蓝天的海洋，
你的伟大夫君与世长辞。[2]
但罗斯笃信不渝，在这悲痛时刻，
她眼前闪出金色希望的新光……
事情发生了，他人已不在！
怀着虔敬，我不敢说出他的名字。
而最好的见证，是他不朽的事业。
俄罗斯像一群孤儿号啕恸哭，
惊恐之中脊背发冷，神情凝重，
然而只有你，蒙受了最大的痛苦！

记得那沉痛惊恐的一刻，

① 当时俄国对上帝、圣徒以至帝王，都以“你”相称，以表示尊重和敬意。
② 尼古拉一世（1796—1855）于1855年2月逝世。据说他是因克里米亚战争失利而自杀的。他在位时（1825—1855），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建立了直属于御前办公厅的特务机构第三厅；残酷迫害普希金、莱蒙托夫等进步作家；他还镇压了波兰起义（1830—1831）和匈牙利革命（1848—1849），扮演了“欧洲宪兵”的角色。

可怕的噩耗传到我们耳里，
你那温情而忧伤的面容，
浮现我眼前，如悲哀的幻影，
那么平和，充满圣洁的温顺，
我望见了泪流满面的天使……
我的心飞向你，怀着热烈的祈祷，
我想用语言表白自己的心声，
我想痛苦欲绝地站到你面前，
用带血的泪水祈求你的原谅。

原谅我吧，原谅我萌生这些希望，
原谅我竟敢与你讲话，
原谅我抱有发狂般的幻想，
想安慰你的忧伤，减轻你的痛苦。
原谅我这被放逐的郁郁寡欢之人，
胆敢在这神圣的墓前大放悲音。
上帝啊，我们无时不在接受裁判！
你在焦虑不安的时刻对我降下裁决。
我的心领悟到，眼泪便是救赎，
我重又属于俄罗斯，重又为人！

我原想再等，现在说出尚早，
她心里还积着伤痛……
我是疯了还是一生未遭遇失落？
难道这样的悲哀会有个完结？！
啊，多么痛苦，失去爱和生命的支柱，
回忆往事形同面对坟墓，

把两颗心血淋淋地拆开，
用绝望的幻觉排遣自己的哀伤，
麻木不仁地打发自己的日子，
像囚犯数着悠长、忧伤的钟声。

噢，我们相信你不会如此命苦！
上天定要安排伟大的使命……
然而是否该由我揭开未来的面纱，
是否该由我向你预示你的重任？
请想想他在世时你对我们何等重要！
没有你也许他的事业不会如此辉煌！
他从年轻就受着你的影响，
你形影不离，就如他的天使。
他一生沐浴在你的光辉之中，
神圣的爱心给了他光芒。

你与他心心相印，互为知己……
有谁能比你这妻子更了解丈夫？
谁能像你一样看出他的心思，
像你一样爱他，像你一样理解？
如今你怎能忘却自己的悲痛！
周围的一切都勾起对他的怀念，
我们举目四望，到处是他的身影。
莫非他真的离去，莫非这不是梦幻？
啊，不！无法忘却，欣慰也不再忘却，
痛苦的回忆倒给人慰藉！！

天哪，为什么我不能倾诉心声，
一吐我那热情的语言？
难道不是逝者如太阳普照我们，
用不朽的事业拓宽了我们的眼界？
难道不是分裂派与盲人都敬仰他，
恶魔与黑暗在他面前全都销声匿迹？
他举剑跃起，如威严的天使长，
向我们指明了未来的久远的道路……
而我们十分险恶的敌人模糊地感到，
却用狡黠的语言加以无耻的诽谤……

够了！……上帝会在他们与我们之间明断！
而你，悲痛欲绝的你，坚强起来吧！
为我们的幸福，你要同伟大王子活下去，
如天使一样，为神圣的罗斯祈祷。
你看，他完全化入健壮俊美的王子之身，
他们崇高纯洁的心灵正是他的精神。
你要保重！作为我们伟大的榜样，
你接过了十字架，柔顺而毫无怨言……
望你参与未来光荣的勋业，
展示伟大爱国者的心胸！

再一次请你原谅，原谅我斗胆开口，
申明了我的愿望，表达了我的祈求。
历史将操起自己冷峻的刻刀，
为我们雕出你光辉鲜明的形象；
历史将给我们讲述神圣的业绩，

尽数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哦，盼你今后继续为我们的天使！
盼你保护派来拯救我们的人！
为他也为我们的福祉而生存，
像母亲一样为俄罗斯大地祝福。

加冕与和约[①]

惨烈的战火熄灭了！
残酷的斗争终于结束……
面对蛮横傲慢的挑战，
神圣的感情蒙受了屈辱，
愤怒的罗斯颤抖着起身，
投入了对敌的激烈战争，
挥舞着英雄的宝剑，
摘取了血腥的成果。
英勇战斗中的神圣之血，
浇灌了自己的疆场，
俄罗斯大地迎来了
同欧洲战得的和平。

我们面临一个新时代。

① 两事均发生于 1856 年。当年俄国新皇亚历山大举行加冕仪式（他实际上于 1855 年即位）。是年 3 月 18（30）日，俄国因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在巴黎和英法等国签订和约。作为战败国，和约不利于俄国，它由此失去了在国际政治上的主导作用。

美好希望的霞光，
鲜明地涌入我们眼帘……
上帝啊，赐福沙皇吧！
我们的皇帝走上陡峭的险路，
去创建那艰难的功勋。
劳作要坚忍，难得有休息，
这是神圣而英勇的事业，
正如过去那专制的巨人，
一生都工作劳动不息，
又如那伟大光辉的帝王之子，
两只手都长满了老茧。

雷雨冲洗了帝国，
灾难联结起人心，
谁的信仰坚定不移，
谁就会珍惜祖国荣誉。
整个罗斯将追随皇帝前行，
在血染的土地上，
收获黄金般的果实。
如果有谁在庄严的此刻，
选择错误的道路而亵渎圣洁，
像懒惰而狡猾的奴隶，
那他就不配做俄国人。

我们的皇帝行将加冕……
千百万俄国人在祈祷，
真诚地祈求上苍：

祝福沙皇吧，上帝！
哦，只要你一道命令，
可以赐死也可让人复生，
能保护沙皇也能保护
贫瘠土地上的一棵小草。
盼你给沙皇明智抖擞的精神，
激活他内心的道义力量，
实现他美好的劳作，
祝福他在神圣路途上成功！

俄国人有一个祈求：
在祖国大地上留住爱心吧！
这来自你宽恕一切的精神，
来自你圣洁的慈悲。
你能去爱折磨自己的人，
而不求任何回报；
你用四射的光芒，
照亮了那些渎神的瞎子；
你是我们戴了荆冠的帝王，
在十字架上用最后一息，
替残害自己的凶手求情，
你祝福他们，爱他们，原谅了他们！

我们要用生命和鲜血，
不愧对自己的沙皇。
盼你用阳光和爱意，
普照忠于沙皇的俄罗斯！

别以无知无识来惩罚我们。
盼你给我们智慧，眼亮心明，
并且怀着真诚的信任，
来接受上苍选中的皇帝！
求你排除恼人的疑虑，
求你以理智照亮盲人，
并在伟大的复兴之日，
为我们指明未来的道路！

戏谑诗、讽拟诗、讽刺诗

拟巴伐利亚团长

我飞呀飞，往回飞，
一心想着摔回去。
活在人世太烦心，
今天被将军，明日是输棋。

说吧，你为啥如此折磨人……

说吧，你为啥如此折磨人
是不是太早太早，
你用冷酷打了我一闷棍……

一个蹦蹦跳跳的姑娘……

一个蹦蹦跳跳的姑娘，
我看见，在别墅的屋顶……

虚无主义与诚实的斗争
（军官与一女虚无主义者）

《尾页》编辑部的话①

我们的编辑部同任何的编辑部一样，除了收到令人满意的文章外，还常常收到一些极其不伦不类的乱稿子。作者是些怪人，全都满腹委屈地要求刊登并付稿酬。乱稿子当然不能登了，可有时古怪会发展到了超凡的地步。下面我们就刊出一篇这样的文章，而且是用诗体写的，意在让读者大吃一惊。为了诚实无欺，我们同作者交代清楚而没有隐瞒，那就是：如果刊出，只能是作为绝对荒谬的作品。他得意地答应了，可见为了登出自己作品人们有时会多么情不自禁。不过也可能他指望读者不赞成我们的意见。坦率地说吧，这是很蹩脚的诗。思想有的是对的，但表现得笨拙。毫无现实感，因为哪里也没有这样

① 请大家不要把这编辑部与《时代》编辑部混为一谈。《尾页》编辑部有时（并非常常如此）是委托适合作这任务的别的编辑部担任的。

的柱廊。但与此同时又似乎有些道理。女虚无主义者的讲法虽属荒唐，却很符合达尔文思想。男军官也很符合他的性格：讲究审美，而且爱取媚女性。所以，要不是如此荒诞，倒也还算有些才气。总之，这是一篇平庸之作，但贯穿着善良的情感。下面便是整篇的诗剧，带了个落后的标题。

虚无主义与诚实的斗争
（胜过喜剧的戏）

剧中人：

男军官——已退役，来自科斯特罗马市，四十岁，面貌平常，微胖。带着佩剑，有些积蓄。希望成家。但听说了有虚无主义者，就打算在挑选未婚妻之前消灭所有的虚无主义者。为此，他来到首都。他读书不多，听力不佳。他弄不清什么是假结婚，这便成了此剧的症结所在。他因心地过于善良而吃亏，虽然又确实不算聪明。爱激动，遇事好吃惊，听到任何新思想，都呆如山羊见到了新的大门。不过一旦弄明白矛盾所在，就立刻面红耳赤，像火鸡一样生起气来。总之，是山羊与公鸡个性的愚蠢结合。喜欢甜食。出奇的善心人。

女虚无主义者——二十二岁，短发。好旅行的女性。听过讲课，回答过问题，见过世面。为人狡狯，善于钻营。性情狂热。黑发，身材修长，长相很不错而且自己心知肚明。让人想起黄蜂。喜欢喝酒。到处作宣传，甚至在楼梯上。

幕启。

破旧的砖砌柱廊，抹成黄色。十二级狭窄的木阶梯。军官举着佩剑登梯向上跑，叫喊着想要消灭所有的虚无主义者。迎面慢慢走

下来女虚无主义者。两人目光相遇。军官吃了一惊，站住不动。

女虚无主义者

你这是意欲何为呀，军官？

军官

我想解放俄罗斯。

女虚无主义者（扭捏作态）

我的可爱的“长官”，
你可是很早就迷了这一窍？

军官（严肃地）

你呢，莫非早就剪了短发？

女虚无主义者（半眯着眼）

自从听说到妇女问题，
我产生了最初的理想。

军官（又吃一惊）

我服役在乡间大地，
周围是自然的田野，
哪里能知道这些问题。
全团只有一个诺索夫，
这中尉订着一份《祖国之子》。
可它对这类问题只字未提。
我这地道的罗斯人要问一句，
妇女问题是个什么意思？

女虚无主义者

我却觉着你不很地道。

军官

我确是地道的俄国人！！

女虚无主义者

你没明白我的话，
我讲的不很地道，
只是说你涉世不深。
　　军官
你这一语双关我不懂。
　　女虚无主义者
现在我就帮你开开窍。
没想你又回到科斯特罗马，
却假装已经结了婚，
无须到教堂里去祝福，
你马上便和我一道
共同传播咱们的思想……
　　军官（高兴得浑身酥软）
什么？我和你做假夫妻？
　　女虚无主义者
为什么？为的给科斯特罗马开个先例。
　　军官（沉思）
假结婚很快就反目成仇。
　　女虚无主义者
你胡扯什么呀，我的军官！
听我往下说。
从宣传和抗议入手，
咱们第一步就多弄些……
由四面八方多弄些青蛙。
　　军官（马上脸红了。他从未听说过青蛙）
青蛙？你听着，虚无主义的家伙：
你这是对我下流的嘲笑！

你可当心，别看是“温柔的女性”……

（举拳威吓）

女虚无主义者

不要胡说八道！

军官（食指戳着太阳穴。疑惑地）

假结婚的新房

摆一大堆青蛙，笑破肚肠！……

让它们鼓噪整个夏天，

请问这可为的哪桩？

女虚无主义者（格外庄严地）

为的是把科斯特罗马城所有的人

从懒洋洋的火炉炕上唤起！

军官（再次惊讶地）

啊，原来如此！……你就该

早些把话说个清楚……

（不由得收剑入鞘）

女虚无主义者

且慢因为自己的暴躁和愚钝

弄得面红耳赤，

你得明白，让人们宰杀

青蛙以此服务于社会，

胜过坐在厨房里度日，

只知道贪吃乳酪饼。

等灌输完这个思想，

不必再浪费时光，

咱俩立刻，就在今年夏天，

便着手解散这个家庭。

军官

等等！我有婶婶，
叔叔，一大堆叔表姊妹，
我在此逗留了一番，
怎好不出席他们命名日的集会！

女虚无主义者（一脸宣传家的慷慨激昂神情，由此显得异常俊美）

真不知害羞！你干吗
自找不必要的负担！
你浪费时间在等待什么？
脑子里转的什么念头？
在自然界里你可曾见到
家庭的束缚，家庭的压迫？
谁能在鱼类、兽类、禽类身上
找到咱们人类的婚姻拖累？
请问乳牛可有它的表姊妹？
大鹅可会因为世俗的规矩
跑去参加命名日的集会？
刺猬难道有婶娘的亲戚？

军官（彻底震惊）

是呀，没错！刺猬没有婶婶姨姨！

女虚无主义者

你震惊了，你感到羞愧！

军官（极力与诚实斗争）

自由的妻子想触动我心灵
拨弄最敏感的神经——
我绝不答应。全是胡诌！

倒是你说说怎么看待婚姻?

女虚无主义者(精神大振)

你们教我们做女红,
还有跳舞,还有屈膝行礼,
这还不够,出于无事可做,
年年给你们生儿育女!
对这一切我都嗤之以鼻!
你们把我们全变成了懒蛋。
要相信自然科学,
要相信布拉戈斯韦特洛夫①。

军官

相信什么?快总结一下!
他买了套房子,还就住宅
写出一篇大文章。
我拜读了蛮有兴趣,
明白了什么是自由主义的果实……
虚无主义的文章都有利可图。
特别是论婚姻的作品,
内藏一切进步的玄机。
好个虚无派!听着,你在欺骗!
你叫我结成什么假婚姻!
难道婚床之约
加上个假字就更保险?

---

① 似指格·叶·布拉戈斯韦特洛夫(1824—1880)。他是俄国政论家、革命民主主义者。19世纪60年代“土地和自由社”成员,《俄国言论》、《行动》杂志的主编和发行人。按:当时常常称革命民主派为虚无主义者。

自由！谁喜欢就让他往里钻！

女虚无主义者

哎哟！女人可真喜欢！

军官

原来如此！那末与我何干？
我是个男子汉！……

女虚无主义者

凡是假婚姻，
一起生活有三个人。

军官

像三个狗鬼混！
够了！听着，虚无派，
你不要朝我跟前凑！
不然我抽出佩剑，
把你的心窝穿透！……

女虚无主义者（无计可施，撕下面具）

啊！露馅了，你个落后分子！
你个农奴制的马拉①，
“合法”你才觉得幸福！
“合法”才是你理想之家！
你只盼着戴上一顶花冠，
好个废物、糖块、美学家！

军官

宙斯呀，怎能忍受得了这番话！

女虚无主义者

① 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

快回家吧！到了吃饭的时候。
不过，最好再听我一句，
饭菜趁热才好吃。
哪一天你合法的娇妻，
引来个男友双双嬉戏，
那时你可会舞弄你的佩剑，
维护自己的权利？
呆子！你一定不肯信，一定泄了气。
颓然坐下自己劝自己：
你是做了一场梦，
那一男一女不是他和妻！
等两人成双入睡，你会亲自掩上门，
为了不惊醒这对情人，
你会走到屋外，不管是黑夜还是风雨，
一边幻想着合法的幸福，
驯顺地在院子里转悠……
走累了，坐到椅上歇息……

军官（声音大变）

哎呀，虚无派！快救命啊，快救命！

女虚无主义者拔腿就跑，像只母虎狂笑着从柱廊阶梯上跳下。这时军官才想到要刺死她，可是美学家的眼光又坏了事：她跑跳的轻盈身影，裙摆下晃动的美艳纤足，突然一下子吸引了他。他呆住不动，脸颊涨得红如领章。这时地平线上仿佛显露出安德烈·克拉耶夫斯基的身影。

幕落。

一路描写下来全是牧师……

一路描写下来全是牧师，
我认为既乏味又与时尚不符。
而今你写衰败的家族，
可别失败呀，列斯科夫①。

拜马科夫银行的破产……

拜马科夫银行的破产，
拜马科夫和卢利的破产，
两人凑到了一起，
这是两个破产，还将有第三！
三个，五个，八个，
接连会有许多破产，
有的在夏季，有的在秋天，
评论家斯特拉霍夫②已在撰文，
有三篇讲到招魂术，
其中两篇显得多余，
还讲到举目皆是的无稽之谈

① 尼·谢·列斯科夫（1831—1895），俄国作家。他写过长篇小说《大堂神父》（1872）等作品。

② 尼·尼·斯特拉霍夫（1828—1896），俄国评论家、政论家、哲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1890）。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友。

和多出来的十戈比硬币。

孩子是费钱的……

孩子是费钱的，
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1]，不假。
利里亚和两个男孩，
这就是咱们的麻烦！

不要蛮干，费杜尔……

不要蛮干，费杜尔，
你别破着嗓子喊叫。
虽然嘴巴鼓了起来，
你还没醉，没喝伏特加。
还有你，利留克，别吵，
当个可爱的小姑娘，
做全家人的好朋友，
可别成为凶狠的小狗。
你也别生气呀，咱们的妈妈……

① 指作家的夫人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斯尼特金娜。

附　　录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的交代和供词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交代

我被要求讲出我所知道的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和那些星期五常去他处聚会的人的一切情况，也就是要我供出事实和我个人对于这些事实的看法。我考虑了一下对我的初审情况，认为是要我明确地回答如下问题：

(1) 彼得拉舍夫斯基一般为人的特点如何，作为政治人物的特点又如何？

(2) 我所参加过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晚间聚会情况如何？我对聚会的看法如何？

(3) 彼得拉舍夫斯基一群是否有什么秘密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是否对社会有害？在何种程度上有害？

我从未与彼得拉舍夫斯基过从密切，虽然常去参加他的

"星期五"聚会①，他也来拜访过我。我与他只是一般相识，对这种关系并不格外珍视，因为我们无论在性格还是在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上都无相近之处。因而我与他的交往仅限于礼尚往来的范围内。也就是每月看一次，有时次数更少。我没有任何理由完全与之绝交，再说参加他的"星期五"聚会有时也颇有趣。

彼得拉舍夫斯基性格中有许多古怪奇特之处令我惊讶。甚至我们得以相识，也因为他一下子就以自己的一些怪异举动引起我的好奇心。但我并不常去他那儿。有时我半年多不去一次。今年冬天从 9 月份算起，我去了不超过八次。我们的关系从来不很密切，我想，从结识以来两人面对面单独在一起的时间从未超过半小时。我甚至能断定，他到我这儿来是出于礼节上的需要，但比如说要与我长谈，他会感到不耐烦。我也差不多一样。我再说一遍，因为我们在思想与性格上一致之处太少了，我们双方都害怕与对方长谈，因为说不了几句就会吵起来，对此我们都厌倦了。我觉得，我们的相互的印象是一致的。至少我知道，我之所以常去参加他的"星期五"聚会，与其说为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和这些聚会本身，不如说是为了见到一些我所喜欢的人。我虽然认识他们，但极少有见面机会。不过我一向把彼得拉舍夫斯基看做一个诚实和高尚的人而心存敬意。

认识或听说过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许多人，几乎是所有的人，都议论他的古怪和奇异，甚至凭这一点给他下结论。我几次听到这样的观点，说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才智多于理智。的

① 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每逢星期五在他家中聚会，讨论当时的重大事件，政府法令，以及各种社会思想——主要是空想社会主义。这就是"星期五"聚会。

确，他有许多古怪之处很难解释。常有这种情况，你在街上碰见他，问他去哪儿，干什么？他会回答出非常奇怪的话，讲一通他刚才去实施的什么古怪的计划。你听后甚至不知道对此事和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作何感想。为一件毫无价值的小事，他有时会忙得不可开交，仿佛这关系到他的全部财产。还有时急着去哪儿，想用半个小时结束一件须得两年才能办完的事。他是个整天东奔西走、忙忙碌碌的人。他博览群书，尊崇傅立叶[①]的体系，并作过详尽的研究。除此之外，尤其爱钻研法学。这就是我关于他这个人所知道的一切，我依据的是不足以完全确切判定个性的不完整的材料，我再重复一遍，因为我与他从来没有过太亲近的关系。

很难说彼得拉舍夫斯基（从政治上看）有自己某种特定的一套见解，对政治事件有什么特定的看法。我发现他始终只遵循一个体系，而这也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傅立叶的。我认为，正是傅立叶妨碍他以独自的眼光看待事物。并且，我可以肯定地说，彼得拉舍夫斯基远没想到能把傅立叶的体系很快运用到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去。对这一点我一直深信不疑。

每逢星期五去他处聚会的，几乎都是他要好的朋友和老相识，至少我这么想。虽然也出现过新面孔，但据我观察，这种情形很少见。这些人里，我熟识的只是极少一部分。有些人只是因为一年中有过三四次交谈才相识。还有许多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客人，我几乎根本不了解，虽然与他们在“星期五”聚会已有一两年了。尽管我并不很了解所有的人，但也留心听到一些见解。所有这些见解大多是众说纷纭，互相矛盾。在彼得拉

① 傅立叶（1772—1858），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他和本国的圣西门和英国的欧文是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三大代表人物。

舍夫斯基一伙人里我没看出任何的一致、任何的派别和任何共同的目的。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在哪一点还是在哪一个确定的题目上，都找不到任何三个人是看法一致的。因此相互之间总是争论不休，意见总是互相矛盾。其中的一些争论我也参加了。

但在说出我参加这些争论的原因和谈过的题目之前，我想就对我的责难说几句。事实上，我至今还不知道给我定的罪名。我只被告知，我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的众人交谈，言辞中带有自由思想，还有，大声朗读了文学书简《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通信》[①]。凭良心说，迄今为止世上对我来说最难的事，就是确定什么是“自由思想”和“自由主义者”。怎么理解这个词呢？是言论有违法律的人吗？我见过一种人，他们把承认自己头疼当成违法的事。但我也知道另一种人，他们随便在马路上就会把什么都说出来。谁能看见我心里想什么呢？谁能判定我是如何不忠诚，如何有害，如何反叛呢？这一判定是依据多少事实呢？很可能仅凭我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说的几句话。我讲过三次话：两次谈的是文学，还有一次也绝非谈政治，讲的是个性和人的自私。我实在想不起来，自己话里有什么政治内容和自由的思想，也想不出我什么时候在彼得拉舍夫

① 尼·瓦·果戈理（1809—1852），俄国作家。他在晚期思想转向保守，否定自己过去作品的批判倾向，在1845年完成的《死魂灵》第2部中要塑造理想化的地主形象（虽然因自己思想矛盾，终于把它付之一炬）。在1847年的《与友人书信选》中竟肯定封建专制农奴制度，宣扬基督教主义。别林斯基因此写信批判他的保守倾向。此信言辞激烈，在当时是地下传抄的反专制农奴制的违禁文件。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49年4月15日，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一次重要聚会上宣读了此信，同时也宣读了果戈理的复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组中原非最激烈分子，但他主要因读此信而被处以假死刑。

斯基那里把真实的我和盘托出。我了解自己，如果罪名是基于脱口而出、被记在纸片上的只言片语，那么我并不怕这种罪名，尽管这是最可怕的定罪法。因为抽取几句没头没脑的话，不管指的什么，匆忙间听到，匆忙间理解，而往往是根本没听懂就匆忙记下来，这样做是最有害、最草率也最不公正的。但我重复一遍，我了解自己，所以并不害怕这种罪名。

是啊，如果向往美好事物便是自由主义，便是自由思想，那么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我是个自由思想者。如果任何一个人在自己内心深处感到自己有权当个公民，有权报效自己祖国，因为他心里满怀对祖国的热爱，知道自己任何时候都不会损害国家，如果这样的人都被当成自由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也是。那么向往美好事物，究竟是可以允许的还是不能允许的呢？不妨让人揭发，看我是否挑起愤怒和仇恨，向往用暴力和革命犯上作乱，达到变天。但我不怕揭发，因为世上任何的告密都不能对我有所损益，都不能改变我的为人。我是公开谈论了那些别人认为应该缄口不谈的事，他们这样做并非害怕说出什么反对政府的话（根本不会想到这一点！），而是因为他们对于这种事已不习惯大声谈论了。难道我的自由思想就表现在这里吗？害怕讲话对我来说向来是一种侮辱，这对政府也是一种侮辱而不是一件乐事。是啊，为什么守法的人要为自己和自己的言论担惊受怕呢？这意味着认为法律不足以保护个人，为了一句闲话，言辞不慎就能丢掉性命。但我们自己为什么弄得人人作茧自缚，听到公开坦率的话，似乎是毫不隐讳地申说意见，就看成是一种怪异之事呢？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能对政府开诚布公，对我们自己有益得多。我们看到我们大家都下意识地惧怕什么，心里总是很难受。比如，在一个公开场合聚到一起，我们会相视而存有戒心，皱着眉头，左顾右

盼，提防着什么人。再如，某人谈起政治来，那一定是低声细语，一副十分神秘的样子，尽管他的思想离共和国还有千里之遥，如同离法国那么远。有人要说：“我们这儿没有人上街示威大喊大叫，这很好么!”毫无疑问，谁也不能反对这一点。但过分的沉默与恐慌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蒙上一层阴影，它使一切变得没有乐趣，没有温暖。尤其让人沮丧的是，这种阴影本是虚假的，因为这种恐惧全无来由（我相信这一点）。这种忧虑无非是我们的臆想而已，是我们自己以神秘和疑虑陡然令政府感到不安。由于这种紧张关系往往弄得小题大做。很普通的话，大喊大叫地讲，分量就重得多；而事实本身有些怪异竟会变得非常严重，也就可能归咎于不相干的（不平常的）原因，而不相信真正的（平常的）原因。我总是相信，自觉的信念要比无意识的、不稳定的、摇摆的、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动摇的见解要坚定些，好些，而思想不是沉默不语就能“等到”或“悟出”的。我们自己总是避免妄下断语，总是凑到人堆里去讨论，否则就会在离群索居中僵化。出现这种情况是谁的错呢？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我从来都这么看。

虽然我举例谈到了我们的社交谈话情况，不过我本人远不是个大喊大叫的人，了解我的任何人都会这么说。甚至与好友我也不愿夸夸其谈，我的好友也不多。在生人面前更不用提了，我素来少言寡语，不善交际，认识的人很有限。我有一半的时间用来工作，以维持生计①；另一半时间总是患病，抑郁症经常发作，折磨我已经快三年了。还剩下很少的一点儿时间，用来读读书和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留给朋友和熟人交往的时间少得可怜。如果说我现在写这些来说明，我不是经

① 他当时以写作谋生，是职业的文学家。

常一贯地以缄默达到隐瞒，那么我的目的是想说出自己的信念，而绝非为自己辩护。如今说我犯了什么罪呢？是说我谈论政治、西方和书刊审查制度吗？可是在我们这时代谁没说过、没想过这些问题呢？如果我没有权利说出我个人的意见，没有权利不同意某种自认为权威的意见，那么我过去上学干什么，科学唤起我的求知欲干什么呢？西方出现一片可怕的景象，上演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悲剧①。若干世纪以来的秩序发生了崩裂，遭到破坏，社会根基每时每刻都有塌陷的危险，并将埋葬整个民族。三千六百万人② 每天都仿佛把自己的整个未来、财产、自己和子孙后代的生存当做赌注！这幅画面难道还不足以引起关注、好奇心、求知欲吗？还不足以震撼人心吗？而这正是那个给了我们科学、教育和欧洲文明的地方，这幅景象正是一种教训！最后，这还是历史，而历史是未来的科学，在这之后，难道可以怪罪我们这些受了一定教育因而激发求知和治学欲望的人，不应该有兴趣偶尔谈谈西方，谈论一些政治事件，读点当代的书籍，关注西方的动态，并尽可能地加以研究吗？难道可能怪罪我，不该认真地看待极度不幸的法兰西痛苦面对的危机③，不该认为这一危机可能是法国人民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历史危机，是一种过渡状态（现在谁能解决它?）而最终会导致一个美好的时代。我关于西方和关于革命的自由思想，从未超过上述的见解和想法。但就算我谈论过法国的政变，就算我斗胆议论过当代的事件，是否能据此说我是个自由主义分子，说我主张共和思想，说我反对专制制度，说我在挖

①③ 指此前不久的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以及随之爆发的西欧各国革命事件。这次革命在当时俄国引起广泛的议论。

② 当时俄国人口总数。

它的墙脚呢？不能！我从来都认为，在俄国实行共和制是再荒谬不过的事。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在这方面的想法。再说，这罪名与我的整个信念和我所受的教育是背道而驰的。我或许还能说明一下西方的革命和那里当代危机的*历史必然性*。那里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以来，社会与权威，与异族文明的征服、强制和压迫之间进行着一种最顽强的斗争。而我们呢？我们国土的形成便与西方完全不同！我们历史上的事件，例如在眼前：(1) 俄罗斯被鞑靼人打败是由于权威的削弱和瓦解①。(2) 诺夫哥罗德共和国② 的一塌糊涂，这个共和国在斯拉夫土地上实验达数世纪之久。最后是：(3) 靠了权威和专制的努力，俄罗斯两次得救：第一次是从鞑靼人统治下，第二次是彼得大帝改革时，仅凭对自己伟大舵手亲情而童稚般的信任，俄罗斯便获得了向新生活剧变的机会。所以我们当中有谁会想搞共和呢？即使改革不可避免，那么就连那些向往改革的人也非常清楚，这种改革应该来自权威，甚至在那时权威更须加强，否则就会以革命的方式发生。我不认为俄罗斯会有爱好暴乱者。历史上的例子众所周知，而且至今还记忆犹新③，虽然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最后我记起了自己重复多次的话：从彼得大帝时起，俄罗斯出现的一切好东西，都是自上而下地来自帝王，而来自下层的迄今为止除了固执和无知之外，再没有别的。许多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这种看法。

---

① 鞑靼人于 1237 年进入梁赞侯国。当时分裂为各个独立的诸侯，因东北罗斯不能团结起来抵抗入侵者，以致后者势如破竹，一个月内攻下并焚毁十四座城，其中包括莫斯科。

② 原为 1136—1476 年在罗斯西部和北部的封建共和国，曾发生多次起义，并遭过瑞典封建主和立窝尼亚骑士团的侵略。后为伊凡三世征服，并入俄国版图。

③ 当指此前 1825 年的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

我谈到了书刊审查，说它现在过于严格，并对此有所抱怨。因为我感觉到这里产生了某种误会，因而产生了对文学来说太紧太严的规定。使我难过的是，作家的称号为某种不祥的怀疑所损害。书还没写出来，书刊审查就把作家看成了政府的天然敌人，带着明显的成见查看他的手稿。我痛心地听说，有的作品被禁不是因为从中找到了什么自由主义思想，什么不道德的东西，而是因为别的。比如：中篇或长篇小说的结尾过于悲惨，展现了过于黑暗的画面，尽管这一画面没有责难或影射社会上的任何人，尽管悲剧本身的发生完全出于偶然和外在的原因。可以叫人查遍我写的已发表和未发表的一切东西，可以叫人查遍已出版作品的手稿，看它们在送交审查前的原样，在其中能找到一句话是不道德和反对现行制度的吗？然而我的作品却被查禁，原因就是画面描绘得过于阴暗了。但他们何尝知道，作品被查禁的作者会陷入多么困苦的状况！他看到自己必须再苦坐三个月，比断粮的还受罪，因为苦干才能给我生存所需要的钱。而且，不仅如此，在困苦、难过甚至绝望中（撇开钱的因素不说，看到自己喜爱的、为之付出劳动、健康、心血的作品因为误会和怀疑而被禁，确实痛不欲生）还得找出许多轻松而愉快的时刻，好写出光明的，玫瑰色的，令人开心的作品来。而且非得写出来不可，因为需要生存下去。就算我说过，抱怨过（而我的抱怨其实很少），难道便可以说我是自由主义分子吗？我抱怨的又是什么呢？是误解。具体地说，我竭尽全力要证明，每个作家事先就已被怀疑，用不理解、不信任的眼光看他，我还责怪文学家本人不设法消除这种致命的误解。说是致命的，因为文学在这种紧张的状况下无法生存。一些艺术门类也一定会整个地消失了，因为讽刺、悲剧不能再存

在下去。现在这种严格的书刊审查，使格里鲍耶托夫[1]、冯维辛[2]、甚至普希金这样的作家都不能存在了。讽刺作品要嘲讽罪恶，并且往往是以善行伪装的罪恶。如今哪里可能有什么嘲讽呢？书刊审查官到处都能看到暗示，怀疑是否影射什么人，是否偏激，作家是否暗指某人，是否暗示某种秩序。我看见书刊审查官在我的和别人的手稿中找到的认为是危害社会而不能刊出的东西，常常忘记了难过反而哈哈大笑。我笑的是，除了书刊审查官以外，现在任何人都不会产生这类的怀疑了。在最无辜最纯净的话里，居然怀疑有最罪恶的思想。看来正是检查官出于恐惧和怀疑，自己编造出这种想法，自己想象出这种想法，自己给它抹上了前所未有的恐怖色彩，紧张地去搜寻他脑海里这个永恒不变的想法，而最终把它与令其畏惧的作家无辜的原话一起毁了。似乎掩盖了生活的罪恶和黑暗，就能叫读者相信世界上没有这些东西。不会的！就算在读者面前不停地掩饰掉这些，作者也隐瞒不了这个阴暗面，只会使读者觉得你不诚恳、不真实。再说，难道能写清一色的光明吗？没有阴暗，光明的一面何以见到呢？一张图画可能没有明暗变化吗？我们懂得“光明”只因为有“阴暗”存在。有人说：你只写勇敢和高尚好了。但没有罪恶我们便看不出高尚：善与恶的概念本身的出现，就是因为善与恶常是共生同在的。可是只要我打算把无知、罪恶、舞弊、傲慢、暴力搬上台去，检查官马上就会怀疑我，以为我是概无例外地否定一切。我并不主张描写罪恶和生活的阴暗面！这两者我都不喜欢。我谈到这些全出自为

① 亚·谢·格里鲍耶托夫（1795—1829），俄国戏剧家、诗人、外交家。著有喜剧《智慧的痛苦》（1822—1824）等。

② 丹·伊·冯维辛（1744/45—1792），俄国作家，著有喜剧《纨绔少年》（1782年上演）等。

艺术的考虑。

当我看到并最终确信，文学与书刊审查之间发生了误会（仅仅是误会，再无其他）之后，我抱怨过，我祈祷过，希望这可悲的误会快点过去。因为我热爱文学，而且不能不关心它的利益；因为我知道，文学是人民生活的一种表现，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随着教育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新概念，它们需要界定，需要找到俄文的名字，这样才好传达给民众。因为在这里民众不能给它们想出名字来，再说文明也并非来自民众，而是从上面推行的。能给它们叫出名字的，只有那个比民众更早接受文明的圈子，即社会的上层，受过教育而能接受这些思想的阶层。是谁能赋予新思想以相应的表述而使人们接受到呢？除了文学，还能有谁！如果人民不理解彼得大帝的改革想要他们做什么，改革就不会在民众中那样容易接受。彼得大帝时期俄语是什么样子呢？是一半俄语一半德语。因为俄国生活里掺进一半德国的生活、德国的观念、德国的习惯。但俄罗斯人民并没有说德语，所以在彼得大帝之后出现罗蒙诺索夫① 不是偶然的。没有文学，社会是不能存在的，可我看到文学正在衰落。我要再次重复说，文学与书刊审查之间发生的误解，令我不安和痛苦。我是说过一些话，但说的只是要和谐，要联合，要消除误解。我没有挑拨周围的任何人，因为我有信心。而且我只是同最亲密的朋友，和文学同事谈论过。这难道算是有害的自由思想吗?!

我的一个罪名是：有天晚上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我读了“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通信”。是的，我读过它，但可以让举报

① 米·瓦·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学者、诗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

我的人说说，我在通信双方中可曾倾心于哪一个？让他回想一下，在我的议论中（我当时没有发表议论），甚或在声调中，在朗读时的手势中，可曾表现出我在通信双方中更多地倾向某一方？当然，他说不出来。别林斯基的信是过于奇特，以至引起我的同情。责骂只令人反感，没有吸引力，整篇信充满了责骂，怒气冲冲。最后，整篇文字是一个缺乏论证的典型。这个缺点是别林斯基在自己的评论性文章里一直未能摆脱的缺点，而且随着他在病中精力和体力的消耗，表现得更加严重。这些信写于他生命的最后一年①，那时他在国外。有一段时间，我曾与别林斯基来往密切。他作为个人，是极为杰出的。但夺去他生命的疾病，甚至把他这个人也给毁了。疾病使他的心灵变得凶狠、冷酷，使他心中充满了愤怒。陷于病态和紧张之中的想象力，把一切给无限地夸大了，展现出一些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的东西。他身上突然出现了健康时绝没有过的缺点、毛病，于是也出现了极易触怒的狭隘的自尊心，在他供职的杂志社，他在病中工作得非常少，编辑部对他有所约束，已不允许他写作太有分量的文章。这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在这种心境下他写了致果戈理的信。在文学界，非常多的人都知道别林斯基去世前一年我与他的争吵和最终的分手。② 我们之间争执的原因也是人所共知，源于对文学和文学倾向的看法。我与他的观点正相反。我批评他硬要给文学安排一个微不足道的个别的使

---

① 别林斯基于1848年逝世，即彼得拉舍夫斯基案发前一年。致果戈理的信写于1847年。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于1848年断绝关系，但他们之间的不和始于1847年，主要因为别林斯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化身》、《普罗哈尔钦先生》和《女房东》等作品的激烈批评，而这是由于彼此文艺观上的分歧。

命，把文学降低到只是描写一些报章轶事和丑闻，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我反驳他的理由正是：靠愤怒不能吸引任何人，如果在街上碰到谁就抓住人家的衣服前襟，强行宣传和教训一通，只会令所有的人都感到极端厌烦。别林斯基生了我的气，最后是由关系冷淡发展到公开争吵，因而在他生前最后一年我们根本没见面。我早就想看到这些信。在我眼中，这些信是相当精彩的文学史料。无论别林斯基还是果戈理，都是很杰出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很令人关注，对于我这个认识别林斯基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彼得拉舍夫斯基偶然发现我手中有这些信件，就问："这是什么?"我当时没时间给他看，就答应"星期五"聚会把信带到他那儿去。既然是我主动答应的，当然就得信守诺言。我读这篇文章是把它作为文学史料，我坚信它不会对任何人产生诱惑作用，尽管其中也不乏某种文学上的精彩之处。至于我，从根本上就不同意其中任何的夸张之词。那么现在请设想一下，我会去读一个因思想不同而与之发生争吵（这不是秘密，许多人都知道）的人所写的信，同时把这信当做典范，当做效法的楷模吗?况且信是在卧病中，在智力和精神都不济的情况下写的。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错就错在不该宣读这篇文章，但当时我没有想到。因为根本料不到会因此获得罪名，没料到自己会有什么过失。出于对这个人的尊敬，他已去世了，曾经是个很杰出的人，许多人对他怀有敬意，因为他的某些文学美学文章，写得真是深谙其道，最后也出于我们因思想不同发生争论而引起的微妙感觉，而这场争吵是许多人都清楚的，我才宣读了"通信"，没作任何评论，也没掺杂任何感情。

我提到了我谈过政治，谈过书刊审查等等。其实我说这些是多余的，只能不利于自己。我是想表明我的思想状况。但在

彼得拉舍夫斯基处我从未谈过这些东西。在他那儿只讲过三次话，或更确切地说是两次。一次是谈文学，就克雷洛夫与彼得拉舍夫斯基争论起来[①]，另一次谈到个性和自私。总的来说，我是个寡言少语的人，在有陌生人的场合不爱大声说话。思想方式和我整个人是什么样子，只有很少的好朋友才了解。我总是远离激烈的争论，为能得到安静，我甘愿让步。那次我是被迫参加文学争论的。我这方面的想法是，艺术不需要什么倾向，艺术本身自为目的，作者只需关心艺术性就行了，思想自然而然会来，因为它是艺术性的一个必备条件。总之，很清楚，文学的方向与报纸和消防是截然相反的。许多人也都知道，我持这一看法已有数年了[②]。最后，所有当时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的人都听到了我们的争论，大家都能证明我说了什么。争论的结果是，我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关于文学的看法原来是一致的，起初我们互相没有理解。得出的这一结论，所有人也都听到了。最后我还发现，整个争论部分地是由自尊心引起的，因为我有一次怀疑彼得拉舍夫斯基是否对这个问题有清楚的了解。至于第二个题目：关于个性和自私，我是想证明，我们之间更多的是自负，而不是真正的人的尊严；我们自己由于庸俗的自负，由于自私和盲目陷入了自我贬低的境地，使人格变得卑微。这是一个纯粹的心理学问题。

我说过，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聚会的人们中，无论在想法

① 伊·阿·克雷洛夫（1769—1844），俄国寓言作家。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与彼得拉舍夫斯基争论过克雷洛夫。一次，后者否认克雷洛夫是伟大的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谢·杜罗夫反驳他。争论不止是纯文学意义的。问题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肯定他作为人民作家的意义，他的寓言为广泛的大众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② 这些观点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本的文艺观。

还是在倾向上，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整体性和一致性。仿佛这是一场大争论，只消开场就永无终结。人们来聚会就为的参加这种争论，为的争个没完没了。因为每次散会时都准备下次振作精神，继续争论；人们感到想说的很多，这次连十分之一都没说出来。若没有争论，来彼得拉舍夫斯基处会非常无聊，因为只有争论与矛盾才能把这些性格迥异的人聚拢到一起。谈话是海阔天空，却没什么专门题目；交谈的情况很平常，同任何的偶然聚会一样。我确信这一点。如果说我有时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的争论，有时去他那儿并不担心听到过激的言辞，那是因为我完全相信（至今我仍然相信这一点），一切都如同家庭聚会，都是彼得拉舍夫斯基熟人和朋友圈子里的事，并非什么公开场合。事实也正是这样。如果说现在对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聚会给予了特别的注意，那么我觉得原因是，几乎整个彼得堡都知道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古怪奇特，于是连他那儿的晚间聚会也出了名。而我肯定地知道，传闻夸大了它们的意义，尽管人们的议论中对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聚会更多是嘲笑，而不是恐惧。至于有时人们讲得十分坦率（不过总是取怀疑态度，而且说出的话总要引起争论），我不觉得有何不妥。因为按我的想法，一个人激烈的见解或疑义讲出来让大家评论（当然不是在广场上，而是在朋友之间），要比憋在心里变为成见好得多。众人讨论胜过冥思苦想。真理总会显现出来，健全思想会占上风；我这样看待这些聚会，据此才有时去彼得拉舍夫斯基那里。而经验证明我是对的。因为，譬如傅立叶的观点最后就再也没人谈起了，因为它受到了各方的嘲笑，甚至作为一种学说也不例外。要是有谁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谈论把傅立叶的体系应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那他准遭到不留情面的当场嘲笑。我这样说是因为相信我讲得没有错。

彼得拉舍夫斯基周围的一群是否有某种秘密的、隐藏的目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不可能。只要看一看所有这意见分歧，所有这见解、性格、个性、专业的差异，所有这些争论，几乎要反目成仇却仍以争论告终，看看这一切并稍加思索，便可肯定地说，在一片混乱中不可能有某种秘密的隐藏的目的。这里毫无一致可言，到世界末日也不会有。虽然我不了解彼得拉舍夫斯基一群中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但据我的所见判断，可以肯定地说，我不会错。现在我需要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并以这个答案来结束我的剖白。那就是：彼得拉舍夫斯基是否是个坏人，他对社会有多大的危害？第一次问到我这个问题时，我没能直接地回答。在回答之前我先得自己弄清楚一系列突然出现在我的头脑中的问题和疑惑，对这些问题我不能当场马上作答，需要一定的思考。因此我站着竟不知说什么好。现在经过考虑，我已明确了考虑后的想法，也明确了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亦即我思考的结果。

首先，如果问我彼得拉舍夫斯基是否对社会有害，那么我理解首先指他是个傅立叶主义者，是傅立叶学说的追随者和传播者。曾让我看一个写得密密麻麻的本子，问我也许能认出笔迹。我不认得彼得拉舍夫斯基的笔迹，我们从未通过信，而且我根本没想到他会写东西。我现在还肯定这一点。正因此，我对于彼得拉舍夫斯基是傅立叶主义追随者和传播者毫无所知。我只知道他的学术见解。而且我和他很少、几乎从未进行过关于傅立叶的学术对话，因为我们一谈马上就会争论起来。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至于有什么计划和决定，彼得拉舍夫斯基从未向我透露过一点儿，我根本不知道有或没有。再说，即使有我也全然不知，他与我的关系既不密切，对我又无好感，肯定会瞒着我，一字不透（我相信这一点）。从我自己这方面说，

从未想探听过他的秘密。因此，关于作为傅立叶主义者的彼得拉舍夫斯基，除了他的学术方面，我一无所知。

我知道彼得拉舍夫斯基敬佩傅立叶的体系。作为傅立叶主义者，他当然不能不希望别人同情他的观点。我曾被问道：他是否培育自己的学生？他是否吸引各校的教师？争取他们，通过他们在青年中散布傅立叶主义？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我根本无法回答，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完全不了解彼得拉舍夫斯基的秘密。我被告知，彼得拉舍夫斯基的熟人里有教师，比如托尔[1]。但我完全不认识托尔，只在不久前才知道他是教师。至于亚斯特列任布斯基[2]，我知道他是教师只是在他谈起政治经济学之后。还有谁是教师我就不得而知了。我与托尔不仅没有亲密交往，连疏远的关系都没有，所以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他们什么时候认识的，互相间关系如何。一句话，我对此毫无兴趣。至于亚斯特列任布斯基，我偶然有两次听他讲话，知道了他的经济学观点。我觉得他是最保守的经济学家，他赞同社会主义的程度同最严肃的学者教授也差不多。因为社会主义本身，以其批判的分析和统计为科学带来不少益处。总之，我认为亚斯特列任布斯基远不是一个傅立叶主义者，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那里没什么可学的。但我要说明，亚斯特列任布斯基的为人我完全不了解。我与他从未交谈过，我觉得他对我的态度也一样。对他的整个思想方式我不了

---

① 费·托尔（1823—1867），当时是工程学校和军事学校的俄国文学以及历史的教师，相信无神论。案发后判死刑，后改为服苦役，之后移居托姆斯克，在该处与巴枯宁结交，并得到后者的热烈赞许。

② 伊·亚斯特列任布斯基（1840 年生，死于 1880 年之后）。当时一工学院里的政治经济学教师。案发后曾判处死刑，后改为服苦役。

解，同样他也不了解我的。总之，彼得拉舍夫斯基是怎样一个学说传播者，我只能根据猜测和想象来判定。

不过我不能凭猜测说什么。我的证词不会被当成最终的、主要的证词。但无论如何它也是证词。万一我错了呢？这会成为良心上的负担。给我看过一个手稿，原来我不知道它的存在。我在这手稿上读到一句话，话里表达了要傅立叶体系尽快胜利的热切愿望。如果整部手稿都是这类的东西，如果彼得拉舍夫斯基承认了它，那当然他是希望传播傅立叶的体系。但他迄今为止是否真采取了某些行动，我不得而知。我不了解他的秘密，我想这一点最终是可以被人们相信的。谁也不能证明我与彼得拉舍夫斯基曾有过非常密切的关系。我每逢周五去他那儿，只作为一个相识的人，仅此而已。我不知道任何他的计划，而且我第一次看见这手稿，除了这一句话，我又完全不知道手稿的内容。所以，他是否做了什么或采取了什么行动，我说不出来。但请允许我讲讲自己的一些想法。它们是我深信不疑的，经过了长时间考虑，至今没有改变。因此第一次问我他是否有罪时，我无法肯定。我知道，对审判官来说，书籍、手稿、片段谈话这些罪证是多么重要。但既然问起我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情况，那就让我讲讲对他的整个案件的看法吧。

彼得拉舍夫斯基信仰傅立叶。傅立叶主义是个和平的体系，它的精彩令人神往，他对人类之爱激动心灵。正是这种爱在傅立叶创立自己体系时鼓舞了他。他那严整的立论使人惊讶。它之所以吸引人，不靠愤怒的抨击，而靠对人类的爱心。在这一体系中没有仇恨。傅立叶主义不要求政治的改革，他的改革是经济上的。他既不反对政府，也不反对财产，在最近的

一次议会会议上维克多·孔西德朗[1]这个傅立叶主义的代表人物，庄严表示决不侵犯任何家族。最后，这是一种书斋式的体系，永远也不会普及。傅立叶主义者在整个二月政变[2]期间一次也没上街，一直待在自己杂志的编辑部里。在那里他们已度过了二十多年，一直梦想着未来美妙的法朗斯泰尔[3]。但毫无疑问，这个体系是有害的。首先就因为它是个体系。第二，无论它怎样精彩，仍是个乌托邦，最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但这个乌托邦产生的害处，如果允许我这样表达，更多的是喜剧性的，而不是令人恐惧的。在西方，没有哪一种社会体系，会像傅立叶体系那样受人嘲笑，冷落，引发一片倒彩的了。它早已死亡，它的领袖们自己没发现，他们已是木乃伊，了无生气。在西方，在法国，任何体系，任何理论现在都对社会有害。因为饥饿的无产者在绝望中不惜抓住任何稻草，而且会把任何破布当做自己的旗帜。那里是危机的时刻。饥饿把人们赶上街头。但傅立叶主义因遭到蔑视而已被人淡忘了。世上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了，甚至卡贝主义[4]也比傅立叶主义引起了更多的好感。至于谈到我们俄罗斯、彼得堡，那么只要在街上走上二十步，就会相信，傅立叶主义在我们的环境里，只能存在于尚未翻开的书本中，或者在平和无争、富于幻想者的灵魂中，形式只能是田园诗或二十四曲的歌诗。傅立叶主义不会带

① 维克多·孔西德朗（1808—1893），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信徒。曾主张成立生产者协会，以实现“阶级和解”。

② 指1848年法国巴黎爆发的二月革命。

③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设想的社会的基层组织为法朗吉。每一法朗吉约为一千六百人到二千人。每一法朗吉的成员住在一座公共的大厦。这种大厦名法朗斯泰尔。

④ 指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埃·卡贝（1788—1856）的学说。详见下文注。

来严重的危害。首先，即使有很大的害处，它的传播本身已是一种空想，因为传播会非常之慢。为了要真正理解傅立叶主义，就得研究它。这可是一门学问，必得读上十本书。这样的一个体系能在某一天变为普及的东西吗？能通过老师在讲台上宣传它吗？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单从傅立叶学说卷帙浩繁这一点来说就不可能！我要重复一遍，依我看，傅立叶体系不致带来严重的危害。而如果说傅立叶主义者已能对谁产生影响，那只能是对他们自己。人们大多这么看。因为对我来说，最可笑的东西莫过于*任何人都不需要的活动*。而傅立叶主义，以及任何的西方体系，很不适合我们这儿的土壤，不适合我们的情况，不符合民族的性格。从另一方面说，它又是鲜明的西方产物，是西方秩序的产物，那里无论如何是要解决无产阶级问题的。因此傅立叶主义及其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在我们这里显得极其可笑，要知道我们这里没有无产阶级。傅立叶主义者的活动是最不需要的，因而是最滑稽可笑的。这就是为什么据我猜测，我认为彼得拉舍夫斯基会聪明些，从未把他想得很严重，他对傅立叶充其量只不过有书斋式的尊重而已。其余的一切，事实上我只当成笑谈。傅立叶主义者是不幸的人而并非有罪的人。这就是我的看法。最后，依我看，任何一种怪论，无论它们有多少，靠自己的力量都不能坚持长久。历史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证据就是在法国，一年之内所有的体系接二连三地垮台，只消付之实践就自然垮掉。考虑到所有这些，即使我知道（我再重复一遍，其实我不知道），彼得拉舍夫斯基不顾任何嘲笑仍要竭力传播傅立叶主义，那么我也还是不能说，他是有害的，不能说他肯定会带来危害。第一，彼得拉舍夫斯基作为傅立叶主义的传播者能有何危害，我无法理解。是可笑，但不是有害！这就是我的见解，这就是我凭良心对提出的问题所

能作的回答。

最后，我还产生了一个看法不能不说，纯粹是生活方面的想法。我很久以来就有一种见解，彼得拉舍夫斯基沾染上了某种虚荣心。出于虚荣他在自己家举办周五聚会；出于虚荣他对此聚会才不感厌烦；出于虚荣他弄了很多藏书，而且愿意让人知道，他有些珍贵稀有的书。不过这些只是我的观察与猜测，因为正如我说过的，对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了解是不完整、不全面的，是以我所见所闻为基础所作的猜测。

这就是我的回答。我说的是真话。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对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正式审讯

致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

对最高审讯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应据实做出简明的回答。

(1)〈问〉您的名字、父称和别名，年龄，宗教信仰，是否按时履行宗教仪式？

〈答〉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二十七岁，信东正教，希腊–俄罗斯教派。宗教规定的仪式，我都按时参加了。

(2)〈问〉您的父母是谁，如果健在现在哪里？

〈答〉我父亲是军医，六级文官米·安·陀思妥耶夫斯基。母亲出身商人家庭。两人都已去世。

(3)〈问〉您在哪儿受的教育？由谁供给，何时毕业？

〈答〉我曾在普通工程技校上学，自费。1843 年毕业于该校的军官班。

(4)〈问〉您是否服役，何时入伍，是何职务和军衔？此前是否受过审讯或判刑？如果有，是何原因？

〈答〉1843 年从技校军官班毕业后入伍，到工程局测绘部。1844 年以中尉军衔退伍。至今未受过审讯或判刑。

(5)〈问〉是否有不动产或自己的资金？若没有，靠什么维持生计和赡养家庭（如果有家室）？

〈答〉父母死后，我们全家继承了他们留下的一块不动产庄园，大约有一百农奴，位于图拉省。但 1845 年我与亲属协议，放弃了庄园中我的份额而取得一次性款项。现在既无不动产，也无资金。以文学创作维持自己生活，直至今日。

(6)〈问〉与谁有深交且经常往来？

〈答〉与谁也没有完全坦诚地往来，除了我哥哥——退伍工程兵少尉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外，再无他人。有些朋友，最亲近的是：艺术家迈科夫一家①，还有医生亚诺夫斯基②、

---

① 艺术家迈科夫一家：父亲尼·阿·迈科夫（1794—1873），画家、院士。母亲叶·彼·迈科娃（1803—1880）。其长子阿·尼·迈科夫（1821—1897），诗人、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1853）。次子瓦·尼·迈科夫（1823—1847）是文学评论家、政论家，著有评论尼·瓦·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家的文章，强调意识的社会使命，积极宣传彼得拉舍夫斯基派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先与兄弟俩相识，后进入这个十分好客的家庭，瓦·尼·迈科夫死于 1847 年。因此没有受到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的牵连。阿·尼·迈科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交往甚密。他思想保守，后因 1870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革命民主主义者、诗人涅克拉索夫主办的《祖国纪事》上发表了长篇小说《少年》，认为他叛变了自己的阵营，此后与之疏远。

② 斯·德·亚诺夫斯基（1817—1897），医生。自 1846 年起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看病。1846—1849 年间他是作家推心置腹的朋友，但作家一直劝阻亚诺夫斯基接近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医生因此后来十分感激他。据说，在作家后来的作品里，《永久的丈夫》中特鲁索茨基的身上有亚诺夫斯基的因素，《群 （转下页）

杜罗夫①、帕尔姆②、普列谢耶夫③、戈洛温斯基④、菲

(接上页) 魔》中斯捷潘·韦尔霍文斯基也许是由医生的原型演变而来的。医生写有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录。

① 谢·费·杜罗夫（1816—1869），诗人、散文家及翻译家。自1847年初起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很快在他的周围成立了另一个“圈子”，这是由温和的反对派们组成的文学-音乐沙龙和由激进分子组成的严肃的政治小组，在星期六聚会。小组成员有尼·亚·蒙别利，阿·尼·普列谢耶夫，亚·伊·帕尔姆，帕·尼·菲利波夫，尼·亚·斯佩什涅夫，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等。但在他兄弟中，长兄米哈伊尔与杜罗夫关系并不密切，在作家眼中，这是个“宗教迷信到可笑地步”、“病态地歇斯底里的”人。杜罗夫被判死刑，后改为服四年苦役。在行刑台上杜罗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阿·尼·普列谢耶夫站在第二个“三人组”中，他们曾拥抱、诀别；服苦役期间杜罗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起，但两人关系相当冷淡。

② 亚·伊·帕尔姆（1822—1885），猎骑兵团近卫军中尉，文学家，1847年与杜罗夫住在一起。参加“星期五”聚会并且是杜罗夫小组创建的倡导者之一。他原被判处死刑，后获释放，并仍任原职，不过被调到立陶宛的猎骑兵团。帕尔姆后来回忆1849年的情景时，谈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拥抱诀别时，后者表现得乐观、充满希望。40年代他曾在首都的重要杂志上发表过若干诗作和散文作品，代表作是长篇小说《阿列克谢·斯洛博金》。后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葬礼上，帕尔姆第一个致辞。

③ 阿·尼·普列谢耶夫（1825—1893），诗人、文学家。1846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最早参加者（约在1845年），是他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彼得拉舍夫斯基认识的。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加入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激进的杜罗夫小组，小组有几次活动就是在他家进行的。他曾被判死刑，临刑前他曾与站在一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杜罗夫拥抱诀别。后改为服兵役。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时，他和帕尔姆是最先抬起作家灵柩的人。

④ 瓦·安·戈洛温斯基（1829年生），法学家，枢密院官员。由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进入彼得拉舍夫斯基聚会。作家在他那里借到了蒲鲁东的《节日的庆典》。戈洛温斯基两次在“星期五”聚会上发表抨击农奴制的言论。据他人回忆，他认为只有 (转下页)

利波夫①。来往较多的是：我哥哥米哈伊尔，医生亚诺夫斯基，他给我治了两年病。还有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克拉耶夫斯基②，因为我经常参加他出版的杂志《祖国纪事》的工作。

(7)〈问〉国内与国外有哪些关系?

〈答〉除了在彼得堡有熟人外，与莫斯科的亲属有来往。国外无任何关系。

退役工程兵中尉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供词

〈问〉与彼得拉舍夫斯基相识已久吗?

(接上页)依靠农民自己的起义。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自己也对此感兴趣，但在审讯过程中，作家却极力为他开脱，否认戈洛温斯基有意反对地主阶层。他被判处死刑，后改为去奥伦堡充当列兵。1857年恢复权利。1859年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特维里见面并将其介绍给特维里的省长П. Т. 巴拉诺夫，后者帮助作家获得返回彼得堡的许可。后来，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时，戈洛温斯基一直捍卫农民的利益，激怒了地主们，他们曾因此向政府告密。

① 帕·尼·菲利波夫(1825—1855)，1848年夏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别墅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并被引入杜罗夫小组。作家说，他真诚、直率、彬彬有礼，而又勇敢无畏。他在杜罗夫的星期六聚会上提出用石印方法传播思想。他曾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准备石印或手抄进行传播。阿·尼·迈科夫称菲利波夫是阴谋的参加者之一，是印刷机图纸的作者。他被判死刑，后改为在伊兹迈尔囚犯连中服苦役。1855年被派入作战部队，当年即因伤死亡。他在离开彼得堡时还将自己的二十五卢布留赠陀思妥耶夫斯基。

② 安·亚·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9)，新闻工作者、出版家。1839—1869年任《祖国纪事》主编。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前的作品都在该刊发表。

〈答〉我与他相识整三年了。1846 年春天我第一次见到他。

〈问〉是什么原因促使您与彼得拉舍夫斯基结识？

〈答〉我们的相识是偶然的。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当时与普列谢耶夫一起在波利采桥旁的甜食店里，我在看报纸。我看见普列谢耶夫停下来与彼得拉舍夫斯基交谈，但我没看清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脸。过了五分钟我走出来，还没走到大海军街，彼得拉舍夫斯基赶上我突然问道："请问您下一部小说的主题是什么？"因为我在甜食店里没看清彼得拉舍夫斯基的面孔，而且他在那里没跟我说一句话，我觉得彼得拉舍夫斯基完全是街上邂逅的陌生人，而不是普列谢耶夫的熟人。这时普列谢耶夫赶上来消除误会。我们说了两句话，走到小海军街便分手了。这样，彼得拉舍夫斯基从第一次见面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那是在我动身去特维里[1] 之前。后来我再见到他已是冬天了。我觉得他是个很独特的人，但不浅薄；我发现他博览群书，有知识。我第一次到他那儿去，已是 1847 年斋期[2] 前后。

〈问〉您是否经常参加他的晚会？

〈答〉在相识的最初两年我很少去彼得拉舍夫斯基那儿，有时三四个月或更久的时间不去一次。今年冬天我去得多一些。但也是个把月一次。而且，不平均。有时一连去两次，有时一个月也不去一次。比如 3 月份我就一次也没去。是出于好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兄米哈伊尔当时住在特维里。

② 按东正教教规，每年四季各有斋期。此处说 1847 年冬天，当为冬季的圣诞节斋期。但据下文较可靠的材料，他首次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家聚会是 1848 年春季的斋期，这次"大斋"是在复活节前的七个星期。

奇我才去得经常些。此外在那儿还可以见到一些熟人。后来，我有时也加入谈话和争论，有时一次没有谈完，不由得吸引我下次又去，争出个结果。

〈问〉这些晚会通常来多少人？他们中谁是经常参加的？

〈答〉十个，十五个，二十个，有时甚至有二十五个人。

彼得拉舍夫斯基的熟人中有一些我至今说不出姓什么。比如阿赫沙鲁莫夫①、别列斯托夫② 的姓氏，我是被捕时才知道的。还有克罗波托夫③，我在彼得拉舍夫斯基那儿好像只见过一次。至于卡申④，甚至不认识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那儿也没见过。有些人我比较熟悉。再说，这些人我不都是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结识的。我较熟悉的人有：普列谢耶夫、杜罗夫、帕尔姆。此外，我认识小杰布斯特⑤、凯达诺夫⑥、利沃夫⑦、

---

① 德·德·阿赫沙鲁莫夫（1823—1910），曾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被捕后因经受不住监狱的折磨，供出许多重大案情。曾被判处死刑，后改为四年苦役。他后来著有《一个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回忆录》。

② 阿·伊·别列斯托夫（1814 年生），艺术家，没有受审判。

③ 德·阿·克罗波托夫（1818 年生），曾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积极参与编写的《袖珍外来语词典》（此书后遭查禁）的工作。但据一不可靠的人说，他是派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的密探。案发后没有受审判，但受到秘密监视。

④ 尼·谢·卡申（1829—1914），外交部亚洲司官员。先被判处四年苦役，后改为充当列兵。

⑤ 小杰布斯特，即小杰布，全名为伊·马·杰布（1824—1890），外交部亚洲司官员。曾参加过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聚会。被判处枪决，后改为四年监狱苦役。

⑥ 弗·伊·凯达诺夫（1821—1894），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在贵族中学的同学，俄国国有财产部官员，释放后受监视。

⑦ 费·尼·利沃夫（1823—1885），莫斯科兵团禁卫军上尉。从 1848年秋起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后又参加杜罗夫的星期六聚会。被判处枪决，减轻为十二年的苦役劳动。

蒙别利[①]、巴拉索格洛[②]、菲利波夫。他们较常去彼得拉舍夫斯基那儿，但我记得他们也不是每次都到。凯达诺夫整个冬天去了大约四次，库兹明[③] 一次，普列谢耶夫不多于四次。大杰布斯特[④] 我几乎不记得。他和弟弟，还有凯达诺夫、帕尔姆几乎从不参与大家的谈话。我带到彼得拉舍夫斯基那儿的有戈洛温斯基和我哥哥。戈洛温斯基曾想去喀山。彼得拉舍夫斯基偶然从我这儿听到这事，就说他想托戈洛温斯基往喀山带封信，我就主动把戈洛温斯基带到他家。我让戈洛温斯基来，是因为他先已听说过彼得拉舍夫斯基，还向我问起过一次。我带戈洛温斯基去，仅仅是为了让他结识一下彼得拉舍夫斯基和他的熟人们。我知道，他走之前最多能去彼得拉舍夫斯基那儿两次，就是说，在所剩的短时间内，我不想强加给任何人这样枯燥无味的结交。戈洛温斯基总共只去过两次。

我哥哥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特维里回来后与我同住时，也是通过我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他第一次见到彼得拉舍夫斯基是在我这儿，彼得拉舍夫斯基当即邀请他参加聚会。我带哥哥去是为了让他结识些人并得到消遣。因为从特维

---

① 尼·亚·蒙别利（1823—1891），莫斯科兵团禁卫军中尉。在1846—1847年曾在家中组织熟悉的军官们的文学讨论会，讨论他的作品。1848年秋起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并参加杜罗夫家的会议，进入旨在发动政变的秘密小组，判处枪决，后改为服苦役十五年。

② 亚·潘·巴拉索格洛（1813—?），俄国外交部亚洲司档案处官员。彼得拉舍夫斯基“星期五”聚会的积极参加者。没有判刑。

③ 帕·亚·库兹明（1819—1885），总参谋部上尉。参加过彼得拉舍夫斯基“星期五”聚会的几次座谈会，没有受审判。

④ 大杰布斯特，即大杰布，为小杰布之兄，全名为孔·马·杰布（1810—?），外交部亚洲司译员。参加过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被判处枪决，后改为四年监狱苦役。

里回来后，他在彼得堡谁也不认识，在家里很寂寞。但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我哥哥从未参加过任何谈话。我没听见过他说过一句话。所有去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他不如我去得勤，他去也是出于好奇，因为他是有家室的人，并不富裕，靠劳动生活，自己几乎放弃了一切娱乐，他不能再失去唯一的消遣：保持一个不太大的熟人圈子，免得关在家里变成野人。我这么说是因为哥哥是通过我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他们相识是我的错。同时，哥哥和他全家的不幸也是我的错。因为如果说我和其他人在两个月监禁中遭受了痛苦和寂寞，那么与我们相比，他所受的苦难要多十倍。他天生体弱，有肺结核的征兆，对家里人牵肠挂肚，家里人离了他也难免会痛苦，会穷困以至饥饿而死。因而这次被捕对他来说无异于绞刑，而他的错比谁都小。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说出这些，因为我知道他没有任何错，不仅是言谈上，甚至思想上。

去得最多的是奇里科夫①、杰耶夫②、马杰尔斯基③，但他们是住在彼得拉舍夫斯基那栋楼里的。

〈问〉人们知道，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 3 月 11 日的聚会上，托尔发了言，讲了宗教的起源，还证明宗教在社会的意义上不仅不需要，甚至是有害的。请对此做出解释。

〈答〉我是从菲利波夫处听说托尔讲到了宗教，菲利波夫说他反驳了这个观点。当天晚上我本人不在场。

---

① 米·尼·奇里科夫（1803—?），国家商业银行职员，自 1846 年起向彼得拉舍夫斯基租房。未受审判。

② 普·亚·杰耶夫（1824—?），彼得堡大学学生，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房客。未受审判。

③ 亚·季·马杰尔斯基（1825—?），彼得堡大学旁听生，教师。据说他住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楼里，几乎参加了所有聚会并以主人身份出现在这些聚会上。

〈问〉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的3月18日聚会上，亚斯特列任布斯基谈论科学，其中讲到统计学，其实不应该叫统计学，而应叫公众性的社会学，因为大公要人们叫它统计学，那就没办法了，只好这样叫它了。请把这番话解释一下。

〈答〉我不在场，也没听说过。3月份从1日到25日我生病了，只有极必要的事情才出家门。

〈问〉大家知道，3月25日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的聚会上，谈到怎样才能怂恿下属的官员反对政府。杜罗夫认为，应该向所有的人揭示恶事的源头，也就是法律和国王。相反，别列斯托夫、菲利波夫、凯达诺夫和巴拉索格洛说，应该鼓动下属反对他们的顶头上司，这样从下而上，不由得顺藤摸瓜，就找到了恶的源头。把这一点解释一下。

〈答〉那次我没去彼得拉舍夫斯基处。我是从菲利波夫那里听到这次谈话的。

〈问〉那次谈话中间，菲利波夫说："我们的宣传体系是最好的，放弃它意味着放弃实现我们思想的可能性。"解释一下这番话。

〈何人笔迹不详〉没参加会议，因而没问及。

〈问〉4月1日会议上，彼得拉舍夫斯基谈到书刊审查时说，它虽然也有碍于更好地发展，却也带来好处：从某部作品中删除一切荒谬之处，可使它更有条理、有见地。相反，如果取消书刊审查，那就会出现许多受个人欲望和动机驱使的人，虽然他们凭自己的天分理应在文学史上占得一席之地，但也将成为人类发展的障碍，人类实现自己目的的障碍。请您解释一下。

〈答〉从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讲话里听到过类似的观点。

〈问〉在那次会上谈到解放农民时，曾说解放这些受压迫

的劳苦人应当成为每个人的思想，但政府不能解放他们。因为不能不给土地而解放他们。但要给土地再解放他们就得赔偿地主，可没有这笔钱。解放农民不给土地，或者不补偿地主的地价，政府只得采取革命的方式来办。但不靠政府的意愿怎么才能去解放农民，这些话中没有提到。您讲一下为此准备采取什么措施。

〈答〉我听到了整个的谈话。我能想起戈洛温斯基的话，他讲得很激动。但至于说要用暴力来解放——我不记得有过这样的最终结论。而且我确证，对这个问题没有得出任何解决办法就走散了。最后是以激烈的争论而告终。

谈话时我曾表示，同意戈洛温斯基意识到农民有自己突然起义的可能，因为他们充分感受到自己处境的悲惨。向我提出的问题，其实质正在于此，但我起初没能理解。不过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补充一句：戈洛温斯基讲到这一思想，是作为一个事实而不是作为自己的愿望。因为他虽然看到农民解放的可能性，却离暴乱和革命行为相去甚远。从与戈洛温斯基的谈话中我总有这种感觉。

〈问〉为反驳戈洛温斯基的话彼得拉舍夫斯基说过，解放农民就势必引起各阶层之间的矛盾，这种冲突本来就已是灾难性的了，可能变得更糟，产生军事独裁，或者更坏，产生精神独裁。请解释一下，军事独裁与精神独裁各指什么？

〈答〉我记得彼得拉舍夫斯基反驳过戈洛温斯基。戈洛温斯基的回答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他发挥了一大通。可能当时我在听别人说话。我完全不记得当时的情形，不能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因此我不得不放弃回答。

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我记得他谈到法律的改革和书刊审查的改革需要先于农民改革，甚至列举了按照现行诉讼法农奴

阶层占有的好处。但我记不清楚军事独裁与精神独裁这些词指什么了。而且彼得拉舍夫斯基有时说话含混不清，不连贯，因此很难理解他。

〈问〉在那次会上，彼得拉舍夫斯基谈到诉讼程序时说，在我们混乱繁杂、有诸多约束的诉讼程序里，是不可能做到公正的。如果说一千次里有一次做到了公正，这就是公开的诉讼程序——juri。[1] 对此作一下解释。

〈答〉说过这些话。

〈问〉在同一次谈话中，彼得拉舍夫斯基讲不需改变诉讼程序，而应给皇帝上书。因为政府不管是拒绝还是答应请求，自己都会处于更糟的境地。拒绝某一阶层的请求，政府就会促使它反对自己，那我们的思想就会前进。答应请求，政府则要削弱自己，并让人们有可能向它提出更多要求。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思想都会得到进展。解释一下这些话。

〈答〉说过这些话。我觉得这意思不用解释就很清楚了。

〈问〉在这次会上，戈洛温斯基说，改换政府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到，但首先应该确立专政。对此做出解释。

〈答〉尽管时隔很久，我努力回忆了那个晚上的事，记起了许多谈话，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关于我们的政府讲过这样的话。

戈洛温斯基有两次高声讲话。第一次他谈到农奴制问题的迫切性，说所有的人都关注着这个问题，而且农民的处境的确值得关注。第二次是回答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话，他坚持自己的观点：解决农民问题比要求法律和书刊审查制度的改革更重要。两次他都说得很简短。第一次不超过十分钟，第二次不超

① 法文：有陪审的审判。

过一刻钟，对此我记得很准确。两次谈话从头到尾他都讲的农民问题，没有转到其他题目。在那样短的时间内，他没有可能谈及其他任何东西，除了上面列举的话题之外而要说更替政府这一点，甚至还深入到细节中。因为他若说，政府的更换不是一下子能做到的，那么他就必须哪怕先说几句，以便解释清楚自己的意见，因为题目本身的重要性决定了就该如此。再说，从向我提的问题来看，他果真深入到细节中去了。因为如提问所说，他提出了措施，即他说过："应当确立专政"。那么自然应该说上一句：是怎样的专政。我重复一遍，如果谈到这一问题而且深入细节之中，他就会突然从自己原来的话题跳到完全另一个话题。除此之外，他还得说些原来根本没讲的话。第三，他若这样做，总得有某种起因，而当时没有什么起因。最后，他的讲话得远远超过一刻钟或是二十分钟（关于戈洛温斯基讲话持续的时间，我相信我的回忆是准确的，我想谁也不会说出不同的证词）。因而，就算说过某些类似的话，由于上面我所列举的各种原因，也是在这之前顺便说的，一带而过，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也难怪我不仅现在忘了这些话，甚至当时也听漏了。另外，依我看，话也不是这么说的，可能类似于：在一个政府更替时，情况通常是这样的，而不是指我们的政府。

我上面写了："就算说了类似的话"。我完全不想用这句话来证明别人对戈洛温斯基的供词是不真实的。我这是想说，对戈洛温斯基的这些话（就算是说过）所能有的意义，显然是夸大了。我是想仅从客观上就可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时间上不够谈论一个如此重要的新话题，且不说从原来题目要急速转到新题目上，我也弄不清新话题是什么事引出的。所以，有可能他说过这些，我记不清了。但讲到时是一带而过，而且泛指

一般，绝非希望我们的政府更替。我在回答关于戈洛温斯基的问题时，有一次说过我认识戈洛温斯基本人，了解他的思想，从未听他说过希望以暴动或任何暴力方式实现他自己的想法。现在我也肯定这一点：我从未从他那听到一句关于改换政府的话。戈洛温斯基谈得最多的是农民的状况，因为他对这个问题很着迷。据我记忆，只要有类似的谈话，他甚至从来没提到过其他的话题。至少我没听他讲过任何别的东西。

我刚刚想起来，有一次我与戈洛温斯基两人交谈，是在我家里，我们谈到了农民和解放农民的可能性。因为我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于是就问戈洛温斯基，他认为怎样（以何种方式）能够解放农民而又不使地主破产，也就是给地主以补偿。我当时向他说明，这个问题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因为并不是今天的地主本人奴役了农民，这事发生在二百年以前，也就是说在这件事上他们一点儿也没有罪过。而失去对农民的权利，他们也就失去了劳动力，因而失去了资本。我记得很清楚，戈洛温斯基不仅同意了这一点，甚至对我说，按他的想法，解放农民而给予补偿，并没有什么直接的障碍；相反，补偿也是可能的。他甚至讲到某种财政措施，就是可延期几年付款，最后再付清。但说到这种措施，他只是一带而过，我们的谈话又被打断了，所以我记不清楚了。

我回忆这段，是为了证明戈洛温斯基不想以革命或任何暴力方式行动，我的最后的意见是：他只是非常关心农民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很有意思，也值得关注。戈洛温斯基仅限于和平的解决办法，是可能实行的而非破坏性的办法。这就是我对戈洛温斯基的了解。

〈问〉众所周知，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 4 月 15 日的会上，他讲话，说需把诉讼程序问题提到第一位，而且还说，诉讼程

序一改变将暴露出所有其他的弊端，还说没有彻底胜利的把握就不能实施起义，诉讼程序的改革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达到，即向政府提出它觉得是正确的因而不能拒绝的要求；在达到诉讼程序的变革后，还可以向政府提出别的要求。请你对此作出说明，并讲一下在这次会上你为什么读了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

〈答〉既然这符合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想法，这话也可能说过。* 我读完信后一直在另一个房间里，好像跟凯达诺夫和帕尔姆在一起。

在杜罗夫家与彼得拉舍夫斯基相遇时，我自告奋勇要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所以才念了信。我答应下来就不能再推脱。彼得拉舍夫斯基在自家的聚会上又提醒我许诺的事。其实，他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信的内容。我读信的时候努力不表现出对通信的一方或另一方带有好感。读完信后，我也没和在场的人谈论过这封信。对信的意见更没听到。在读的过程中，有时听到个别的赞叹，有时是笑声，随听者所得到的印象不同，但由此我得不出一个整体的反应。再说我忙于读信，现在我甚至说不出是谁发出的赞叹和笑声。我现在意识到，我此举不够谨慎。

* 当对这一问题考虑较成熟后，我认为不能不就我上面的回答作出一些解释。问题中引述了这么一句话来证明彼得拉舍夫斯基有罪："……没有彻底胜利的把握就不能实施起义"。我上面回答说，问题中提到的那些话符合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想法。我在这里指的只是大家都知道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关于改革和完善诉讼程序的愿望，他所期待的，首先就是实现这一愿望。至于起义的话，则我认为有责任申明，我从未听彼得拉舍夫斯基说过任何关于起义的方案，无

论是单独谈话还是当着大家的面说的。我不知道彼得拉舍夫斯基这方面的情况，所以我不能说，这些话也符合他的想法。他讲话期间我一直在另一个房间里，所以关于这句话我不能提出任何确证。但我猜测和估计，这句话指的并不是迫切而必须的行动方针，而是指事实，证明不可能举行任何的武装起义。我确信如此是因为，我不止一次发现，有谁在他家晚会上一时兴起，讲话偏激和不慎，他都非常不高兴。我又发现，他总是设法去冲淡类似的疏忽和某些不理智的话语。我不能也根本不想以这番说明来替彼得拉舍夫斯基做什么担保，不是保证他没有秘密的企图，如果他有的话（但我从来不知道），不是保证他没有秘而不宣的想法。可能我真得承认，我对他的了解比我原来预想的要差。我也不想以自己的话为他的那种秘而不宣的思维方式辩白。不是的，我做出我的说明，仅仅是出于正义感。我应该说真话。我要重复一遍，正因此过分尖锐的话，比如讲暴动，讲武装起义，彼得拉舍夫斯基不会在*自家的晚会上当做愿望*说出来，也就是说，似乎可以把这句话单独抽出来，作为关于起义与暴动手段的一个论断，在下星期五成为谈话的题目。我确证并重申：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聚会完全不是那种性质的，不是能谈什么暴动手段的聚会。在我的回忆中，找不到任何一次类似的谈话、任何一个类似的思想，不管是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或哪个客人说的。最后我坚信，倘如彼得拉舍夫斯基说了那样的话题，或是允许某个别人发挥类似的思想，那么下一个星期五他那儿就不会有客人了。至少我能替我熟悉的那些人担保。且别说彼得拉舍夫斯基与任何客人的秘密意图和隐秘计划（只是设想有可能存在这些计划），我也丝毫不通过否定这些计划来为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聚会辩护，我只是想在我这番说明的结尾表明：彼得拉舍夫斯基和他的客人们不会这样不理智地如此公开、如此不谨慎、如此轻率地进行*阴谋活动*，即使他们想搞阴谋的话（说到这儿我又要重申，我绝不肯定是这样，

只是作一种假设)。

我所以必须做出这番解释，既是为了说出实情，也为了不让我上面的回答给许多去彼得拉舍夫斯基那儿的人投下不公正和危险的怀疑的阴影。这些人的意见我很了解，而且甚至能为他们担保。

〈问〉除了您指出的那些谈话外，彼得拉舍夫斯基家聚会上特别关于政府的还讲过些什么话，是谁说的?

〈答〉除了我有幸作了说明的之外，我再记不得哪一次特别值得一提的谈话。事实上去年冬天彼得拉舍夫斯基家几乎所有的聚会，从 10 月份起，都是讲的那些内容。不过我只能讲那些我亲自参加了的晚会。季姆科夫斯基[①] 讲话就占用了两三个晚上（我参加过两次），亚斯特列任布斯基说了五个晚上(我到场大概三次)，还有我听人们说发言的有托尔、菲利波夫，还曾有过关于官吏的争论。我有两次亲自参加了讨论文学的晚会，后来又谈起了一些问题：农民，书刊审查和法庭。这两次我参加了。这些就是我知道的全部发言和谈话，不算非政治性的和无关紧要的内容，比如蒙别利说到过打牌的坏处和对道德的腐蚀。按他的想法，纸牌让人脑去干虚假与欺骗的活动，于是使人背离真正的需求，放弃了教育和有益的事情。

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不总是有人当众发言（如前面列举的那样)，因为多数情况下是让那些不同意多数人观点的人讲话，免得每个持不同意见的人同时反驳而拖长时间，没必要地中断

① 康·伊·季姆科夫斯基（1814—1881)，海军退役军官、内务部官员。他长期居住在特维里，偶尔在彼得堡时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星期五”聚会。在一次聚会上他向大家介绍傅立叶的学说。他的一封有关在特维里组织两个小组的信在斯佩什涅夫家中被查，因而被捕。先被判流放，后改为在囚犯苦工连服刑。

人们的谈话。但在多数情况下，尤其有人当众发言之后，人们立刻分成一堆一堆的，谈话都是交叉的，因此不可能回忆起来，也无法听到所有的谈话。很多要我说明的内容，看来就是在这种吵吵嚷嚷的分散谈话中说到的。但请允许我就这些谈话和发言总的说几句。

我们中间谁也没有习惯并且不善于当众发言。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晚会上所以要立一个当众发言的规矩，完全是为避免过分吵闹。因此发言的人很困窘，感到陌生不惯。而且我不止一次发现，经常是说话人为了给自己鼓劲，有意地使用些手腕，这既不符合他的性格，又不合他的习惯。这种手段之一就是先用尖锐的词语、令人发笑的话、粗野的话、嘲笑、出格的举动。周围响起的笑声，便可使说话人振奋起来，他自然而然地渐入佳境，言辞越来越激烈，口若悬河地陷入了虚假的激昂、愤怒，甚至仇视，而他心里完全没有这些东西。因为我了解，说话人往往是一些最不易发怒和最平和的人。这里虚荣心也起了作用，怂恿着说话者；还有他想迎合所有人，有时就装作同意别人的看法，其实全然不同意；这样做是希望别人也不会碰他自己的某种心爱的想法。最后就是自尊心，它刺激人，让人一再要求发言，而且急不可待地等下次聚会驳斥自己的反对者。总之，对许多人来说（我真心相信是对非常多的人来说是如此），轻信了这些晚会、这些发言、这些谈话的认真程度。依我看，非常多的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的这种游戏中欺骗、蒙蔽了自己，把游戏当成了严肃的事情来做。人们分堆进行的谈话也是如此。所有未尽之意，所有矛盾的东西，在不能反驳地听完一个很长的发言之后，都一股脑儿地说了出来；原来的发言越长，同意的人越多，发言中的自我矛盾越多，人们纷纷讲话的劲头也就越大。这时难免忍不住说些激烈的言辞，或是

极为不慎的想法。而这都极不符合发言者惯常的性情，以至于说完的第二天或是说后刚过一小时，马上就意识到而想放弃这种说法，但已经晚了。此外，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聚会，向来被认为是朋友熟人的聚会，而不是俱乐部或是成心组织的政治聚会。

我所以肯定地说这些话，是出于这样的判定：如果（这是假设）真有人想参加政治集会、秘密组织、俱乐部，那么他可能不会认为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晚会是个秘密团体。因为这里只是清谈，有时言辞激烈些是因为主人保证这只是朋友的家庭聚会。没有任何议事规则和任何保障，只有一个小铃铛，谁想发言摇晃一下。正因为这些晚会是朋友间的，家庭的聚会（如果可以这样叫的话），人们才不太提防以至说话不慎，在大庭广众之中便不会这么说。谁能没有一点儿错呢，如果看任何人的最隐秘的想法，看他在熟人、朋友圈子里说的话，甚至是自言自语，那谁能没有错呢？在家里和公众场合，人是不一样的。第一次审问我时，我当时很惊讶，高级委员会向我提出了杜罗夫说的一句话，让我解释。那句话的意思是，“应该通过文学向官吏们或是向最高的官方展示恶的根源所在”。我认识杜罗夫这个人。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我两次与彼得拉舍夫斯基争论文学问题时，他都热情地支持我。在争论中我论证说，文学不需要任何倾向，除了纯艺术性之外。因而更不需要那种如杜罗夫罪名所指的倾向，即表现恶的根源（不需要是因为，把倾向强加给作家，会限制他的自由，变得愤怒、谩骂，艺术性也就因此毁掉[1]）。

---

① 彼得拉舍夫斯基完全同意了上述内容。原来我们的争论是出于误解。彼得拉舍夫斯基所有的客人都能作证。

谈到官吏的那个晚上，我没在彼得拉舍夫斯基那儿，这我已有幸报告过了。争论我是第二天或是第三天偶尔听到的（记不清楚是什么时间），杜罗夫的话我不知道。但我了解他的思路，我相信，这些话或者没有被报告者理解，或是讲在气头上，因意见矛盾而沮丧，不够冷静的时候。我了解杜罗夫是个最平和的人。但与此同时他又病态地易怒，甚至暴跳如雷，忍不住要大发议论，忘乎所以，出于矛盾有时说出不合自己想法、不合自己内心信念的话。与杜罗夫关系亲密的谢尔科夫[①]和帕尔姆，比我更了解他不幸的性格，所以我相信，谈到杜罗夫，他们会同意我的看法和观点。发生在杜罗夫身上的这种情况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也能发生在其他每一个人身上。我提出自己这些观察与看法，是出于维护公正的责任感，是出于自然的感情。我坚信，现在，当我做出回答时我没有权利隐瞒这种看法。

〈问〉请讲一下，季姆科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会议上读了什么，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答〉季姆科夫斯基去彼得拉舍夫斯基家是在初冬，仅参加了四次或五次晚会。在我看来他是非常独特的人，他如果接受了某种思想，那就认为这思想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其他都不屑一顾。他感到惊讶的只是傅立叶体系的精彩的一面，却没发现其他方面，否则他对傅立叶的过分迷恋就会冷却下来。除此之外，他接触这一体系不久，还没来得及以自己的批判态度来对待。这一点可从各方面看出来。而大家知道，傅立叶的体系乍看上去是多么有魅力。

在其他所有方面，我觉得季姆科夫斯基完全是个保守主义

---

① 阿·德·谢尔科夫（1825—?），曾在彼得堡军事总督办公厅任职。加入杜罗夫小组后，与杜罗夫、帕尔姆住在一起。没有受到审判。

者，而并不是自由思想分子。他信宗教，也接受专制思想。大家知道，傅立叶的体系不否定专制制度的统治方式。谈到季姆科夫斯基个人的性格，不说政治信念，那么我可以说一条：我觉得他是个非常自尊的人。

尽管时隔已久，据我所能忆起的，他的讲话内容如下：

第一，他感谢大家对他的热情接待，虽然当时大厅里四分之三的人连人的姓氏也弄不清。就是说开场白颇有文采，整个发言我觉得也是那种风格。然后他宣布很快要离开彼得堡，将为得到大家理解而感到慰藉。接着他很虔敬地谈了傅立叶。我记得他涉及到了傅立叶体系中的许多优点，也希望这个体系得以实现。不过季姆科夫斯基也明白这一体系不可能得到很快的应用。之后他劝人们在思想见解上应该协调，无论谁坚持怎样的社会体系，同时又申明，他不是号召大家造反，也不想搞秘密组织。最后，他请求说，如果他得到了我们的认同，就与他握手示意。讲话说得非常热情，看得出季姆科夫斯基作了一番推敲，想迎合所有人的口味。但依我看，季姆科夫斯基的取向是不严肃的。他年龄不小，却还处在傅立叶主义的第一阶段。在偏僻的外省生活中，这种主义偶然地闯入了他的道路。外在生活的不足，内在热情的过剩，与生俱来的对精巧的敏感，他要求有食粮的补充，而特别是没受过扎实认真的教育，依我看正是这些使他成了一个傅立叶主义者。在他这个年龄，比起刚迈入青年时代，一切都应该理解得更深入一些。在我看来，他应与自己许多的傅立叶主义信念决裂，那样，傅立叶体系留给他的就只是有益的东西了。因为他那渴望求知的头脑，不断地要求食粮，而教育是避免各种歧途的最佳药方。这是我个人对季姆科夫斯基的看法。

谈到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留给人的印象，那么，我觉得

是很不一样的。有些人对他是带着嘲笑味道的好奇，有些人怀疑他的真诚，有些人认为他是地地道道的堂吉诃德的翻版，很可能并没有看错。不过，所有人都对他非常谦恭，彬彬有礼。

〈问〉您是否参加过斯佩什涅夫①，卡什金，库兹明，杜罗夫，丹尼列夫斯基②家的会议？或者在其他什么人家里还有类似的会议？

〈答〉斯佩什涅夫我认识，去过他家，但没参加过他家的聚会，而且每次去他家都是他一个人在家。

① 尼·亚·斯佩什涅夫(1821—1882)，一个富有的地主，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中是最最激进、最有地位、最为神秘的一个人物。他的名字与各种革命活动——组织秘密团体、地下印刷所、团结一切反政府力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曾在瑞士从事革命活动，表现出惊人的毅力。善于以惊人的逻辑推理，而更多地是用恶魔般的沉默使交谈者折服。斯佩什涅夫在一切场合都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性，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并且同情空想社会主义。他了解卡尔·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也许还知道《共产党宣言》，在由他起草的《秘密团体成员必须签名的盟约》中，明确地以武装起义作为最终目标。他无疑是创建秘密的七人小组的倡议者。1848年秋，斯佩什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交往较为密切，并对后者的性格起了很大影响，使他与长兄在政治观点上发生分歧。斯佩什涅夫原被判枪决，后改为十年的苦役劳动。后来留在西伯利亚居住。自1861年起，他在普斯科夫省奥斯特洛夫县任和平调停官，坚定地捍卫农民的利益。

② 尼·雅·丹尼列夫斯基(1822—1885)，植物学副博士(1847)、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曾参加过彼得拉舍夫斯基组织的聚会，被公认为傅立叶学说专家。1848年冬，曾参与普列谢耶夫、斯佩什涅夫等人讨论在国外印刷的可能性。他曾被捕，却未被判刑，只是被驱逐出京城彼得堡。自1853年起，他游历俄罗斯，多次参加鱼类考察。自1865年起着手写作《俄国和欧洲》一书。他以斯拉夫派理论为基础，否认世界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力图证明历史生活的唯一领导者是相互替换的、前者与后者有着天壤之别的“文化-历史类型”。按照他的意思，这按时间排列最新的“文化-历史类型”，非俄罗斯、斯拉夫莫属。陀思妥耶夫斯基激赏他的观点，在1869年写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称该书将是“此后长时间内俄国人案头必备的一本书”，而且惊喜地表示，丹尼列夫斯基与自己“殊途同归”。

卡什金与库兹明两位先生我根本不认识。

同丹尼列夫斯基去年我在别人家里碰见过两三次。认识他，但不太熟，也没参加过他的晚会。此外，从1848年5月起我根本没见过他，只是他刚回来时见过几分钟，没来得及与他说上两句话。

杜罗夫的晚会我参加过。

我与杜罗夫、帕尔姆相识，是从去年冬天开始的。我们能接近是因为想法和兴趣很相近。他们两个人，杜罗夫，尤其是帕尔姆，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我熟人不多，因此很珍惜新结识的这两个朋友，不想失去他们。杜罗夫的熟人圈子纯是演艺界和文学界的。很快我们几个人，即我、我哥哥、杜罗夫、帕尔姆和普列谢耶夫，商定出版一个文学作品集子，因此见面更频繁了。哥哥写出了出书方案，开始了关于出版编辑的讨论。由于我们想自己负责编辑，要由大家一起判定中长篇小说的优劣，自然我们就产生了这样的需求：把大家的文学思想总结一下，最后就出版的几个问题达成一致。我们聚会通常在杜罗夫家，在那里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最方便。因为我们每个人家里都不太方便，哥哥有家室，我和普列谢耶夫的住处太小，不能接待客人。很快我们的碰面发展成了文学晚会，音乐也加入进来。杜罗夫把自己熟人中最亲密的请来，我们把自己的熟人也带到杜罗夫家。后来这种聚会每星期都有，通常是星期六①，但哪一天却没有固定。

这些晚会纯是文学的、音乐的晚会，好友的聚会，因为我们大家关系都已变得亲密。这一切一直以这种方式持续着，但

① 杜罗夫小组多在星期六聚会。这个小组参加人数不多，但却有较多的秘密活动与计划。

一个不幸的提议在一瞬间改变了聚会的性质。

当时出现了这样一个想法：我们的聚会甚至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无所获。我们中的许多人在某些知识和科学领域里比别人更精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眼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察。如果我们能互相交流观感与认识所得，那对大家都有益有利。这个想法本会得到支持，但菲利波夫作为首先提出想法的人，却在它之上附了另外一个建议，后者完全改变了前者的性质，而且为我们的聚会投下了令人不快的阴影。那就是他建议用石版印刷出版一些作品，我们中的某个人也许可以绕过书刊审查做到这一点。

〈问〉谁还参加了这些会议？并且做了什么？

〈答〉我与菲利波夫相识于去年夏天，在纳尔戈洛瓦的别墅。他很年轻，血气方刚，极其没有经验。他随时准备去干疯狂的行为，非到闯出祸事才能醒悟过来。但他身上有许多好品质，使我喜欢上了他。这就是正直、彬彬有礼、无所畏惧和直爽。此外，我还发现了他一个非常好的品质：他能听别人的劝告，无论是谁提出的，只要他意识到是对的，马上就能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一旦被说服，就愿悔过。但他急躁的气质加上非常年轻，常常压过了他的理智。此外他还有个非常不幸的特点，这就是好面子，或者更精确说是爱慕虚荣，这在他身上发展成怪癖。有时他的举止让人觉得他仿佛在想，世界上大家都怀疑他的勇敢。如果他珍视某人的看法，而这个人在他身边，怀疑他不敢从伊萨基耶夫教堂[①] 上跳下去，那他就一定跳下去而不会胆怯。我这么说是根据事实。我对霍乱从其出现的初

① 在彼得堡，建于1818—1858年，这一建筑物高约一百零一点五二米。

期就害怕它。而对菲利波夫来说，却没有什么比每时每刻整个向我表现他一点儿都不害怕霍乱更令他愉快的事了。仅仅是为了让我吃惊，他便对饮食毫不在意，生吃蔬菜，喝牛奶。有一次，我出于好奇，想看看他会怎样，只给他看一枝花楸果，还完全是青的，花刚刚凋谢，我说如果吃下这些果子过五分钟就会得霍乱。菲利波夫折断整个枝条，我还没来得及拦他，当着我的面已吃下了一半。这种很可怜的不理智的童稚热情，不幸却是他性格的一个主要特点。也是由于好面子，他成了个极爱争论的人，对什么都喜欢争论，甚至是争论他从来都不了解的事。别看他受过教育，还是数学物理学的专家，由于缺少实际的生活，他很少有深思熟虑的信念。反倒因为年轻，产生的兴趣往往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我觉得菲利波夫的性格就是如此。

几乎所有人对他的提议都极其反感。大家都感到走得太远了，都在等着一个个出来表态。也许我弄错了，但我感觉，在场的有一半人仅仅是怕另一半怀疑他们胆小才没有马上反驳菲利波夫的意见，他们想不用直接的而是某种间接的方式推翻这建议。加上尽管大家都很友好，但杜罗夫、帕尔姆原来的熟人认识我们这些新人还不久，还不完全信任我们。我忘了说，杜罗夫与帕尔姆最密切的老熟人有：谢尔科夫，拉曼斯基兄弟①和卡舍夫斯基②。菲利波夫是我带去的，我还请了斯佩什涅

① 拉曼斯基兄弟：叶·伊·拉曼斯基（1824—1902）是国家机关监察司的科长；波·伊·拉曼斯基（1824—1875）曾在外交部对外贸易司供职，后成为交通部重要官员。兄弟俩都曾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家和杜罗夫家的聚会，都未受到审判。

② 尼·阿·卡舍夫斯基（1820—?），海军部官员、音乐家。曾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和杜罗夫家的聚会，没有受到审判。

夫。顺便说一句，菲利波夫和斯佩什涅夫有时去彼得拉舍夫斯基家，已经认识了杜罗夫和帕尔姆。大家议论起来，所有的人都感到不自在。许多人沉默地坐着，另一些人相互交谈，说话最多的是蒙别利和菲利波夫，但我不记得蒙别利是否支持菲利波夫的看法。渐渐地我们之间的友好气氛消失了。杜罗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脸阴郁，我看得出要发火了。卡舍夫斯基和谢尔科夫对演艺界以外的一切都很漠然，为了缓和气氛就到乐器旁坐下演奏。一些人走得早，一吃过晚饭马上离去。最后杜罗夫对菲利波夫的怒气爆发出来。他把菲利波夫带到另一个房间，抓住他的某个用词，说了些难听的话。菲利波夫表现得很理智，他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没有以什么激愤的话回敬。那个晚上我走得比平时早。

第二天哥哥对我说，如果菲利波夫不收回自己的建议的话，他不能再去杜罗夫家了。同样的话，我记得他两天后碰见菲利波夫，好像也对他说了。据我的观察，我发现，许多人都会像我哥哥那样做。至少，我确切地知道，杜罗夫想尽快地取消自己的晚会。再次来聚会时，我请求大家都听我说，我劝解所有的人，努力在我的讲话中用轻松的嘲笑来影响大家，但尽可能顾全每个人的面子。我成功了，而且我觉得所有人都期待着这样做。当时也就否决了菲利波夫的提议。在那之后又聚会过一次。这已经是斋戒周以后的事了。这段时间我在家里忙于我的文学工作，见的人只有极少几个朋友，而且是匆匆忙忙。但我知道，由于帕尔姆生病，晚会完全停了下来。这就是关于杜罗夫家聚会我能说的一切。

事实上在杜罗夫家没有人正式发言。我那次讲话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总共只有这一次。

〈问〉您去斯佩什涅夫家吃过饭。请讲一下，席间发生过

什么特别的情况?

〈答〉斯佩什涅夫吃午饭时,谈论过菲利波夫的建议。顺便说一句,那是一个枯燥无聊和无精打采的上午,因为在斯佩什涅夫与杜罗夫间,我觉得发生了误会。这种误解据我了解是由菲利波夫的建议引起的。杜罗夫正在生菲利波夫的气,便与蒙别利吵了起来,声明他不想办晚会了,他说,为什么别人不办?蒙别利建议在斯佩什涅夫家聚会,并一定要斯佩什涅夫在上午搞一次聚会。杜罗夫这么说,是为了无论如何了结菲利波夫建议的事,他有些故意找碴儿。斯佩什涅夫向一些人坚决表示,这次午餐会是强加于他的,他也不便再办了。大家议论了一下,什么结果也没有。格里戈里耶夫朗读了《士兵座谈会》[1],但没有说明作者是谁,我也不知道,虽然有所猜测。再说我也没兴趣要知道。印象不深,因为大家情绪都处在各种不同影响之下,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想听这次朗读。吃过午饭,大家都马上散了。

在我的第一次供词中,没讲到这次午餐。第一,因为这只是那次争论的继续;第二,不想讲出蒙别利和杜罗夫之间不愉快的争吵。我也没有讲到格里戈里耶夫,因为没有确切地知道谁是《士兵座谈会》的作者。

〈问〉大家知道,在杜罗夫的晚会上有几个人朗读过。米

---

① 尼·彼·格里戈里耶夫(1822—1886),精锐部队近卫军中尉。先后积极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和杜罗夫家的聚会。1849年4月在尼·阿·斯佩什涅夫家午餐时朗读了自己的作品《士兵座谈会》。在被捕时又在他家中搜到禁书——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克拉旺的牧人》。被判处死刑,后改为十五年苦役。1857年因病,政府将他交他的家庭监视。

柳科夫[1] 读了自己翻译的"Paroles d'un croyant"[2] 片段，你读了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通信，格里戈里耶夫读了《士兵座谈会》。请解释一下这一点。

〈答〉米柳科夫真的读了自己的翻译，还在那以前他就说过他翻译了这篇东西。于是别人请他拿来读读，是出于好奇。

几月几日我记不清了（好像是五月份）[3]，我顺便去杜罗夫家，是下午两点多，我拿到了寄给我的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通信。我当时就读给杜罗夫和帕尔姆听了。他们请我留下吃午饭。我留了下来。五点多彼得拉舍夫斯基也过来了，坐了一刻钟。他问："这本子里是什么？"我说是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通信，又不慎答应到他那里朗读一下。我这么做是因为初读的印象在脑子里很深。彼得拉舍夫斯基走后马上又来了些人，我就留下来喝茶。话题自然说到那篇文字，我又读了一遍。但除杜罗夫和帕尔姆外听众不超过六个人。就这么几个客人。记得有蒙别利、利沃夫、拉曼斯基兄弟。还有谁我忘了。这些事都发生在收到文章的当天，当时我还处在初读印象的影响之下。

关于格里戈里耶夫的作品《士兵座谈会》，我已解释过。这作品是读过，但不在杜罗夫家，也不在晚会上，而是在斯佩涅夫家的午餐桌上。开始读时出于偶然（也就是说预先没有解

---

① 亚·彼·米柳科夫（1817—1897），文学史家、教育家、批评家。接近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但拒绝参加他们的聚会，而参加了在他看来较为温和的杜罗夫家的聚会。他的活动没有被密探安东内利注意，因此未受牵连。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并不亲密。作家的后一个妻子阿·格·斯尼特金娜是由他介绍认识的。

② 法文：《信徒的话》。按：这是法国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拉门奈（1782—1854）的著作。参阅下文注。

③ 据确切记载，是在 1849 年 4 月 10 日左右，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的前几天。

释)，我甚至不知道作者是谁，读的什么。我与格里戈里耶夫从未读过这篇作品。它的印象不值一提。坐在格里戈里耶夫附近的什么人可能说了几句赞美之词。但恐怕仅仅是出于礼貌。但我在听时坐得比谁都远，对此没注意到。

〈问〉在那些晚会上蒙别利提出建议，要密切参加者的相互联系，通过互相影响更坚定方向，并更成功地在社会舆论方面坚持自己的想法。对此解释一下。

〈答〉这是刚开始在杜罗夫家聚会的事，好像就是在第一天晚上。蒙别利的确说了些类似的话，但我记不得他所有的话了。我记得他没有说完，别人半道儿打断了他，开始听音乐。蒙别利笑起来，没因为别人不注意他而生气，马上同意自己讲这些话不是时候，他的话再也没人提过。聚会时间很长，纯是文学和音乐的内容。

〈问〉就是在那些晚会上，大学生菲利波夫建议大家共同整理有自由精神的文章，涉及俄罗斯的法制和行政现状问题的文章，然后在家庭印刷厂出版。对此请解释一下。

〈答〉不是在校的大学生，而是过去的大学生，叫帕维尔·菲利波夫。至于在校的大学生菲利波夫，是他的弟弟，这人不认识杜罗夫，也不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好像不认识我们当中的任何人。我知道是因为见过两三次，是去找他哥哥帕维尔的时候。帕维尔·菲利波夫是提过这个建议。但在问题中说到家庭印刷厂。我从来未在杜罗夫或其他任何地方听到过关于出版的事。从来未提起过这事。菲利波夫只是建议石版印刷。这我记得很清楚。

我已在前面的回答中说明了这个建议。它的提出很突然，也就是说在纯文学音乐的聚会上讲的，这建议作为新闻一下子吸引了很多人。但是我记不得菲利波夫说过什么自由精神的，

而只是请大家从事关于俄罗斯作品的整理。一些人起初赞同这个建议，完全出于好奇，但一说到石版印刷，就都放弃了。这里大部分人，可能是所有的人（因为不知道每个人都默默想些什么），不喜欢这个建议。不过关于这个建议的话题，又在两次聚会上议论过（其中一次是在斯佩什涅夫家午餐时）。这个话题谈得很勉强，因为看来大家都不再想议论。最后它被拒绝了，那时大家才声明说自己是反对的。当时如何拒绝的，我在以前的回答中已有幸作了说明。

我想起开始时，杜罗夫家的晚会还没办时，还只是在筹划、议论举办晚会，我和杜罗夫作为首先同意的人，曾经不止一次说，办晚会纯是为了文学和音乐的目的，而没有其他任何秘密的目的，现在没有，将来也没有。请人来参加晚会也是公开、直接的、没有任何诱惑；谁也不是被其他目的吸引过来的，对所有的人都说过（甚至还不止一次），聚会纯是文学和音乐性的，没有别的性质。

〈问〉在那些晚会上说过，学校里的老师应努力尽可能多地以自由精神讲授。对此解释一下。

〈答〉这话我根本不记得。

〈问〉如果在上述会议之外你还了解什么罪恶预谋，必须彻底坦白地供出一切情况。

〈答〉我不知道任何这类事。

〈问〉关于教师别列茨基[①]，你了解什么？

〈答〉对于教师别列茨基我毫无了解。

〈问〉请讲一下从什么时候起，由于什么原因，在你身上

① 彼·伊·别列茨基（1819—?），第二中等武备学校的通史教师，参加过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没有受审判。

出现了自由主义的和社会性的倾向?

〈答〉我再一次十分真诚地说，我全部的自由主义就在于盼望我的祖国变得更好，希望它能不断地前进完善。这一愿望从我懂事之初就产生了，而且不断增强，但从来没超出过可能做到的范围。我总是相信政府和专制的。我不敢说自己的愿望都没有失误，亦即不敢说这些愿望全是对的。也可能，我希望完善与公共利益的愿望便是犯了很大的错误，因为实现这种愿望会导致普遍的危害，而不是公益。但我自己问心无愧，而且常常地修正自己的意见。可能我有时传达这种愿望过于激动，甚至流露出愁苦，但这只是短暂的瞬间。愤恨和恼怒我从来没有过。而且我的动机向来是对祖国最真诚的爱，它指引我正确的道路，并避免了极有害的失误（我相信这一点)。

我期待过许多改良与改革。我抱怨过众多的舞弊行为。但我的政治见解的全部基础，是由专制制度做出这些改革。我所期望的，仅仅是谁的声音也不被淹没，任何的需要都尽可能得到倾听。我知道，法律保护大家每一个人，我相信这一点。但确有滥用权力的行为，而且不幸的是数量很多。正因如此我才研究，自己思考，也愿意听比我博学的人谈论如何变革和改良。但我重复一遍，我心中所怀的改善的期望从未超出过可能做到的范围。至于谈到社会性的倾向，那么我从来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愿意阅读和研究各种社会问题。首先，社会主义同样也是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而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我喜欢研究。而且我酷爱历史各门学科。这就是我以极大的好奇心关注西方变革的原因。这出可怕的悲剧整个引起我强烈的注意。第一是作为一场悲剧；第二是作为重要的事实，这事实至少可以激起好奇心；第三是作为历史；第四是出于对人的爱心，因为西方的真实状况是极其悲惨的。我有时谈

论政治问题，但很少宣扬，几乎从来如此。我认为西方目前有出现真正转折的历史必然性，但期待的只是情况好转。

社会主义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数以千计的措施，又因为这些书都写得很有才气，很热情，又往往怀着对人类真挚的爱，所以我读得很有兴趣。但正因为我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体系，而是笼统地研究社会主义，包括它所有的体系，正因此我（虽然我的认识远不是最终见解）看到了每个社会体系所具有的错误。我相信，无论运用哪一个体系，都会导致必然的失败。且不说在我们这里，甚至在法国也会如此。这个观点我不止一次地表达过。最后，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社会主义是酝酿中的科学，是一片混乱，是化学之前的炼金术，是天文学之前的占星术。虽然我觉得，通过目前的混沌会总结出一些有序的、合理的、高尚的、于社会有益的东西，犹如从炼金产生出化学，从占星术产生出天文学一样。

在我对所提问题的上述回答中，我写的都是实情，没有什么可补充的，我签名为证。

退役中尉工程师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问〉请讲一下，你是什么时候、怎样和切尔诺斯维托夫[①] 认识的。

〈答〉我第一次见到切尔诺斯维托夫是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原来从未见过他，见他总共不超过两次。

---

① 拉·亚·切尔诺斯维托夫（1810—?），退役军官，参加过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他在聚会时说过激烈的反政府的话，以致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疑心，怀疑他是第三厅派来的密探。后来他被流放。

〈问〉大家知道，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一次聚会上切尔诺斯维托夫努力宣扬一个思想，说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对这一次谈话的内容与倾向，你能做出肯定的回答吗？

〈答〉关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是一回事的谈话，以及切尔诺斯维托夫的意见，我没听清楚。

〈问〉大家知道，还是那次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会议上，切尔诺斯维托夫在自己的谈话中竭力挑动大家的激愤，那个晚上的谈话果然比以往更尖锐些，而且利沃夫又朗诵了一篇什么寓言。对此能做出肯定的说明吗？

〈答〉挑动大家的激愤我没有发现。但他说得很痛快，很尖锐，他的话引起大家的笑声。讲过一篇寓言，我果真记得有这事。

〈问〉大家知道，在同一次会议上切尔诺斯维托夫还说过："先生们，咱们俄罗斯人糟就糟在我们习惯挨棍子了，打棍子对我们算不了什么"。当斯佩什涅夫反驳说打棍子也有两个方面时，切尔诺斯维托夫说："可我看不到它的另一面"。就这件事你能作个肯定的说明吗？

〈答〉我没听到。

〈问〉还是在那次会议上，切尔诺斯维托夫说东西伯利亚是在俄罗斯之外的单独的国家，它注定应是个独立的帝国，并叫所有的人都去西伯利亚，说："先生们，咱们一起去西伯利亚吧，那是个很好的地方，人也不错"。你说明一下这次谈话的细节和目的。

〈答〉这些话我想起来了，但不记得切尔诺斯维托夫话里有这样的含义。他说东西伯利亚真好像是个俄罗斯以外单独的国家，但据我的记忆是指气候条件和居民的独特性说的。说什么西伯利亚应注定成为独立帝国，那样激烈的见解我根本没听

切尔诺斯维托夫说过。他的话里，依我看也完全没有那样的意思。

而且针对提问中说到的切尔诺斯维托夫关于居民独特性的议论，我要回答说：我记得听到他讲，曾同一位工人谈起了中国，据工人的意见，进入中国是非常容易的。

〈问〉你在路上与斯佩什涅夫谈起切尔诺斯维托夫时，你说："真见鬼，这个人说俄语，简直像果戈理写俄语一样。[①]然后你走近斯佩什涅夫说："我觉得切尔诺斯维托夫简直是个特务"。解释一下切尔诺斯维托夫的哪些话使您产生了他是特务的想法。

〈答〉不是切尔诺斯维托夫哪一句特别的话，而是他的整个讲话使我产生了这个想法，其实是一闪即逝的想法。我觉得，他的话中有某种支吾搪塞的东西，仿佛正如人们说的那样极有心机。在那之后我只见过切尔诺斯维托夫一面，所以这次要我回答这个问题时，我甚至忘了自己对他的想法。

〈问〉在你的文箧中找到了一封别林斯基给你的便条。那是邀请你去一个人家里聚会。你当时还不认识这个人。请解释一下，这是个什么会议，你是否去了，去过几次。

〈答〉别林斯基的便条我丝毫也记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现在才第一次知道我有个别林斯基的便条。但这么说我完全不想否认我认识别林斯基。与他认识的第一年，我们关系不错，第二年已非常疏远，第三年与他吵了架，就再也没见过一面。

如果这是张请柬，那它一定是写在我们相识的最初日子里，而且假如他请我去哪儿，那只能是去做客，而不是参加会议。别林斯基的熟人圈子，据我所知是非常小的，仅限于文学

---

① 可能因为果戈理是乌克兰人——小俄罗斯人。

界。他不参加人多的聚会，也忍受不了，因为他不合群，身体又不好，老是坐着不动。他一定是介绍我结识某个文学家。当时，即在我们相识的初期，他对我非常感兴趣。因为我的第一部小说[①] 他非常喜欢，他对我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夸大了我的才能和我的意义。我正是通过小说与他结识的。据我回忆，我们当时谈论的仅仅是文学而已，我们之间就一些纯粹的文学见解热烈争论了几个月。所以，我重复一遍，如果我被邀请去某处，那不是去开会，而是去做客，去见某个文学家。但去哪儿，怎么回事，我记不得了，因为这个便条我完全给忘了，不知道有它。至于经常性的聚会，谁也没有举办过。

〈问〉在你的书里有两本禁书，书名：一本是“Le Berger de Kravan”[②]，另一本是“La Célébration du Dimanche”[③]。你说明一下，这书你是从谁手里，怎么得到的。

〈答〉被捕的前一天晚上，4 月 22 日，我去格里戈里耶夫家，从他桌上拿了“Le Berger de Kravan”。这本书连一行我都没有来得及读，因此不知道它的内容。另一本书“La Célébration du Dimanche”，多半是被捕前一周从戈洛温斯基那里拿的。我在戈洛温斯基家只读了这本书的几页，由于很感兴趣，我就拿了。但我不能肯定戈洛温斯基是否知道，因为我记得当时忘了问他。

〈问〉大家知道，你参加过普列谢耶夫的晚会，会上读过一篇幽默文章，题目是《彼得堡和莫斯科》，是格尔涅茨[④]写

① 指《穷人》。

② 法文：《克拉旺的牧童》。按：这是欧仁·苏的作品（1847）。

③ 法文：《节日的庆典》。按：此为蒲鲁东的著作。

④ 《彼得堡和莫斯科》（1842），实为俄国革命家、作家亚·伊·赫尔岑的作品。当是审问者或笔录者把“赫尔岑”误写成“格尔涅茨”。

的。你说明一下是否经常参加这些晚会，它的倾向如何？

〈答〉普列谢耶夫从来没有经常举办晚会。他只是很偶然地请大家去家里喝茶。据我回忆，整个冬天不超过三次。在这些晚会上什么都谈，却没有特别谈到什么。也就是说，这是平常的朋友聚会，仅此而已，没什么特别的目的，也没什么特别的倾向。在这里每个人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也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据我所知，客人都是很要好的朋友。这就是我能记起的一切。《彼得堡和莫斯科》一文确实读过一次，但目的完全不是为了激怒人们，而且预先也没有安排。那是偶然读起来的，好像是因为手边刚好有这么一篇轻松的讽刺小品文，里边有许多俏皮话，尽管也有很多荒唐的东西，看它是从纯粹文学角度。据我回忆，至少是这样。

〈问〉从斯佩什涅夫与丹尼列夫斯基的供词看，在普列谢耶夫家的晚会上议论过在国外出版禁书的可能性。对此作一下解释。

〈答〉在普列谢耶夫的聚会上，我上面的回答已经说过，从来没听到过一句是讲这个话题的。但我记得，有一次，确切是什么时候忘了。不过是很久以前了，是一年多以前，我有一次很晚，约十一点去过普列谢耶夫处，在他那儿碰到了丹尼列夫斯基和斯佩什涅夫。我并且记得，当时真的说到了几句关于在国外出版的可能性。我当时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有众多的原因。这事往后再没提起过。总之，谈后再无任何结果。

在弗·拉·佐托夫案卷中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供词

〈问〉你解释一下，《文学报》发行人佐托夫[1]的名字和父称，有何职衔，在何处任职？住在何处，以及他与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关系，去参加聚会时是什么角色？

〈答〉他的名字，如果我没记错，是弗拉基米尔·拉斐洛维奇。在何处任职和居住，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不认识他。我从不知道他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现在第一次听说，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聚会上我从来未见过他。

在阿·尼·迈科夫案卷中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供词

〈问〉瓦列里安·迈科夫[2]的父称是什么？据你的供词他参加过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一些聚会，还有他头衔是什么，在哪儿工作，住在哪儿？他是否已死亡？

〈答〉看来这个问题弄错了。我的供词从来没提到过瓦列里安·迈科夫，没说过他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我对此的回忆是准确的。

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整整两年前去世，1847年7月13日。他作为文学家与我结识，我们相识不过一年。他上过大学，毕业后就过职，但在哪儿记不起来了。在彼得拉舍夫斯基那儿，我一次也没见过他。*他认得彼得拉舍夫斯基，但不喜欢他，

---

① 弗·拉·佐托夫（1821—1897），俄国文学家、记者，1847—1849曾任《文学报》主编。

② 瓦·尼·迈科夫是阿·尼·迈科夫的弟弟（见上文注）。此处是在他哥哥的案卷中涉及他，他实际上早已去世。

也不喜欢他的聚会，尽可能少与他见面。我两次亲眼看见，当彼得拉舍夫斯基去他家拜访时，他谎称不在家。他把彼得拉舍夫斯基当做怪诞的人。而且我记得，他说他永远也不会去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星期五”聚会，还说这帮人他一点儿也不喜欢。

关于瓦列里安·尼古拉耶维奇·迈科夫我能说的就这么多。

* 除了一次例外，那是彼得拉舍夫斯基过生日时的招待晚会。

在亚·彼·米柳科夫案卷中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供词

〈问〉米柳科夫先生在杜罗夫家聚会上都做了什么，他是否经常去参加？

〈答〉米柳科夫先生在杜罗夫家的晚会上像所有客人一样。由于他本人是文学家，所以他与杜罗夫以及杜罗夫家聚会的人们，也是一种文学交谊。我觉得，大家都喜欢米柳科夫的快活和温厚的性格。此外，他善于讲笑话——这就是他的主要特点。有一次他说过，记不得在哪次谈话里，他把拉门奈[①] 的一篇著名文章译成了斯拉夫语。这使人感到奇怪而有趣，就请他拿来看看。米柳科夫后来把它带来读了。当菲利波夫提出自己的建议时，尽管米柳科夫出于自己的活泼性格，起初参与了大家的议论，但我觉得，对第二个建议即石版印刷，他感到害怕。我得出这个结论，是根据两点回忆。第一，当议论仍在继续时，他完全不说这件事了。甚至杜罗夫家的晚会有一次他也

① 拉门奈（1782—1854），法国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社会主义创始人之一，政论家、宗教哲学家，从基督教社会主义立场出发，抨击资本主义。米柳科夫译的是他的《信徒的话》。

没去。斯佩什涅夫家的午餐他也没参加，尽管邀请了他。这后一个情况我记得，是因为回忆起来，大家当时都问“米柳科夫呢，他为什么没来?”第二，我觉得好像听到可靠的人说，米柳科夫自己讲，他跟不上菲利波夫的提议，还说他不喜欢这个建议。这一切都还发生在我的提议（反对菲利波夫）之前。我认为，米柳科夫也打算完全不再参加杜罗夫的晚会。这由各方面都看得出，而主要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他不再露面了。接着我们被捕了，所以我就没有机会验证我的观感了。

〈问〉米柳科夫先生在杜罗夫和普列谢耶夫的聚会上做了什么?

〈答〉米柳科夫在杜罗夫和普列谢耶夫的聚会上在任何方面都没有特别的表现。除了一点，他是个快活的人。有很好的讲述才能，令人爱听。在杜罗夫那儿，如上所说，他读了自己翻译的拉门奈的作品。

在尼·亚·莫尔德维诺夫[①] 案卷中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供词

〈问〉请讲一下，在普列谢耶夫的聚会上尼古拉·莫尔德维诺夫起了什么作用?

〈答〉尼古拉·莫尔德维诺夫据我所知是普列谢耶夫的老熟人，他的大学同学。他作为关系密切的熟人来这里，但他总是沉默不语。我什么特别的也没发现。

---

① 尼·亚·莫尔德维诺夫（1827—?），当时俄国内务部官员，除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和杜罗夫的“星期六”聚会外，还参加斯佩什涅夫的秘密小组。他后来没有受审判，只受到秘密监视。

在罗马绍夫、萨尔蒂科夫①、别尔嘉耶夫、亚什维利、车夫费多特与米哈伊尔·雅科夫列夫、布卢姆案卷中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供词

〈问〉从何时起九级文官米哈伊尔·萨尔蒂科夫开始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会议，何时起不再参加，在会议中充当何种角色？

〈答〉我不记得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碰见过萨尔蒂科夫先生。因为我对萨尔蒂科夫先生极不熟悉，我对他与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关系也一无所知。在彼得拉舍夫斯基那里我没听见一句关于萨尔蒂科夫先生的话。

〈问〉你是否知道，曾参与基辅大学阴谋的亚什维利与彼得拉舍夫斯基是什么关系，现在何处，有何头衔？

〈答〉我根本不认识亚什维利先生，第一次听说他，也第一次听说基辅省的阴谋。对他与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关系一无所知。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相关人② 案卷中的供词

〈问〉别佐布拉佐夫与帕尔契科夫先生是否经常参加普列谢耶夫家的聚会，他们在会上起何作用？

〈答〉在普列谢耶夫处我一次也没见过帕尔契科夫先生。

---

①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689），俄国作家。他从 1845 年起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当时他就醉心于法国的圣西门、卡贝、傅立叶、路易·勃朗，特别是乔治·桑的著作。早在 1848 年 4 月，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案发前一年，曾因发表一部揭露性的作品，被流放到维亚特卡，因此没有受到彼得拉舍夫斯基案牵累。尼古拉一世死后，他才获准回到首都彼得堡。

② 这里涉及的人实际上都与彼得拉舍夫斯基案无关。

别佐布拉佐夫先生去过一次。他待了半个小时左右，同所有请来喝茶的人一样，他没有任何地方引起我的注意，因此关于他我说不出什么特别的。

〈问〉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会议的维特科夫斯基的名字、父称是什么，什么职衔，在哪儿工作，住在哪儿，以及他从何时起开始参加会议，何时停止的？

〈答〉我从不认识维特科夫斯基先生。没听说过他，现在是头次听到。因此我无法说他是否去过彼得拉舍夫斯基那儿。

我记得在一次回答中我说过，去彼得拉舍夫斯基那儿的人有一些我根本不认识，我甚至不知道他们姓什么。可能维特科夫斯基就属于这一类。我要再说一遍，维特科夫斯基先生我一无所知。

〈问〉弗拉基米尔·凯达诺夫的官职是什么，在哪儿工作，住在哪儿，还有他是否经常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与杜罗夫处的聚会，在聚会中他起何作用？

〈答〉我认识一位凯达诺夫先生，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碰见过他，但不知他的名字，同样也不知他的官职和任职地点。好像他与彼得拉舍夫斯基一块儿在贵族中学受的教育，与彼得拉舍夫斯基是同学。他不经常去彼得拉舍夫斯基家，至多是每月一次。我觉得最多是这样。他从不参加大家的讨论，当大厅里大家说话时他总是一个人坐在隔壁房间里看书或者是和自己的某个熟人在一起。他一次也没去过杜罗夫的晚会，因此我想他们两人不认识。

〈问〉请说明下述一些人是否经常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会议，从何时起参加，他们的名字、父称、职位、何处就职、居住地点。韦尔纳茨基。

〈答〉在彼得拉舍夫斯基那里我从未听到过这个姓名，也

没见过韦尔纳茨基先生。

〈问〉阿夫杰耶夫。

〈答〉这个人我完全不认识。也不知道他是否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

〈问〉斯塔利尼茨基。

〈答〉不认识。也不知道他是否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

〈问〉格里戈里耶夫。

〈答〉名字和父称记不得了，职位也记不得。好像在近卫军龙骑兵团任职。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我大约只见过他四次。他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我记得是1849年1月认识的。住在豌豆街，谢苗诺夫桥附近，谢瓦斯季亚诺夫楼里。

〈问〉拉托夫斯基。

〈答〉对拉托夫斯基先生一无所知，也不知他是否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

〈问〉斯捷潘诺夫。

〈答〉对斯捷潘诺夫先生一无所知，也不知他是否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

〈问〉阿斯兰。

〈答〉对阿斯兰先生一无所知，也不知他是否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

〈问〉格连科夫。

〈答〉对格连科夫先生一无所知，也不知他是否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

〈问〉波利亚斯基。

〈答〉对波利亚斯基先生一无所知，也不知他是否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

〈问〉莫特拉申科。

〈答〉对莫特拉申科先生一无所知，也不知他是否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

〈问〉米哈伊洛夫。

〈答〉只知道米哈伊洛夫先生的姓，不知道他的官衔和名字。不知道他何时认识了彼得拉舍夫斯基，但好像去年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见过他一次。不过记不清了。他住在哪儿，我不知道。

〈问〉马克耶夫。

〈答〉对马克耶夫先生一无所知，也不知他是否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

〈问〉第一个斯塔索夫。

〈答〉从未听说过第一个斯塔索夫先生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也没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见过他。不知道他的官衔，他的名字和他的住址。

〈问〉第二个斯塔索夫。

〈答〉从未听说过第二个斯塔索夫先生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也没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见过他。不知道他的官衔，他的名字和他的住址。

〈问〉西普科。

〈答〉对西普科先生一无所知，也不知他是否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

〈问〉第一个孙杜科夫。

〈答〉对第一个孙杜科夫先生一无所知，也不知他是否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

〈问〉第二个孙杜科夫。

〈答〉对第二个孙杜科夫先生一无所知，也不知他是否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

〈问〉纳扎罗夫。

〈答〉对纳扎罗夫先生一无所知，也不知他是否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

〈问〉彼得罗夫。

〈答〉对彼得罗夫先生一无所知，也不知他是否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

〈问〉弗兹梅特涅夫。

〈答〉对弗兹梅特涅夫先生一无所知，也不知他是否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

〈问〉布尔纳舍夫。

〈答〉对布尔纳舍夫先生一无所知，也不知他是否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

〈问〉彼得·彼得罗夫·谢苗诺夫①。

〈答〉对谢苗诺夫先生一无所知，也不知他是否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

〈问〉卢金（教师）·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

〈答〉对卢金先生一无所知，也不知他是否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① 彼·彼·谢苗诺夫（1827—1914），俄国地理学家、统计学家、社会活动家、彼得堡科学院名誉院士（1873）。1856—1857 年考察了天山。1906 年他在姓氏谢苗诺夫后加上天山斯基，成为复姓谢苗诺夫-天山斯基。

相关的资料和文件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军事法律委员会的供词上的签字

退役中尉工程师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

最高军事法律委员会依据战地军事法律要求你回答：你对审讯中所做的供词是否还有补充，对自己的过失还有何辩护？

对自己没有任何新的辩护，只是有一点，我从来没有怀着恶意反对政府。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不慎，而且许多事是无意间造成的，比如读别林斯基的信。如果说有时我说话随便，那也只是在关系亲密的熟人之间，他们能够理解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我从来都避免扩散我的一些疑虑。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9 年 10 月 20 日

在 O. A. 米柳科娃[①] 的纪念册中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被捕的回忆

4 月 22 日，准确说是 23 日（1849 年），我三点多钟从格里戈里耶夫处回到家，躺下马上就睡着了。最多没过一个小时，我在睡梦中发现我的房间里进来可疑的不同寻常的人。是

① O.Л.米柳科娃是文学史家、批评家亚·彼·米柳科夫的女儿。

佩刀碰到了什么，发出响声。真是怪事！我用力睁开眼睛，听到一个柔和动听的声音："请起床吧！"

我一看，是街区或辖区的警官，留着漂亮的连鬓胡。但说话的不是他，那是一位穿浅蓝制服①、带有中校绶带的先生。

"出了什么事？"从床上抬起身来，我问。

"遵照命令……"

我一看，果真是"遵照命令"行事。门口站着一个士兵，也是浅蓝的制服。刚才就是他的佩刀发出声响……

"哦！原来如此！"我想。

"请让我……"我开口说。

"没关系，没关系！你穿上衣服吧……我们等一会儿。"中校用更悦耳的声音补充说。

我穿衣服时，他们翻出我所有的书，开始找起来。找到有用的不多，但整个翻了一遍。我的文稿信件被整齐地用绳子捆起来。警官这时表现出极高的警惕性：他伸手到火炉里，用我的长烟袋在死灰里拨弄了一阵。宪兵军士照他的要求，蹬凳子爬上火炉，却从横梁上猛摔到椅子上，接着从椅子摔到地上。至此警觉的先生们才确信，火炉上面什么也没有。

桌子上放着一张五十戈比的一张票子，很旧，卷着角。警官仔细看了看，最后朝中校点了点头。

"不会是伪钞吧？"我问……

"哼……不过得查一查……"警官说道，结果把票子也和案件连到了一起。

我们走出来。出来送我们的有吓坏了的女主人和她的丈夫伊万，他虽然也非常害怕，但目光里有某种愚钝的庄严神情，

① 当时宪兵穿蓝色军服。

是逢到大事才有的、却非常喜庆的庄严神情。门口停着辆马车。士兵、我、警官和校官相继坐进车里。我们向喷泉方向驶去，直奔夏花园旁的环桥①。

那里有许多人走来走去，我看见许多熟人。大家都还睡眼惺忪，默然不语。受理的一位先生，是个文官，但官衔很高……有位蓝衣军官先生不停地带进来牺牲品。

“好哇，这么个尤里节！”有个人在我耳边说了一句。

果真4月23日是倒霉的尤里节②。

我们渐渐把文官先生围了起来。他手里拿了份名单，安东内利③先生名字前用铅笔写着：“调查此案的特务”。

“原来是安东内利干的！”我们心想。

我们被分别带到不同角落，等待最后决定，谁去什么地方。在所谓的白厅里，我们被抓来的一共十七个人……

这时列昂季·瓦西里耶维奇④走进来……

到这里我就不再讲下去了。因为说来话长。不过我要向大

① 此处是当时特务机关第三厅的所在地。

② 俄国15—16世纪，尤里节在俄历11月26日，在这节日前后一周间，农奴可以由一个农奴主转到另一农奴主。但在1343年爆发的尤里节起义，却在4月23日，这次爱沙尼亚反日耳曼封建主的起义被镇压下去，故此处说“倒霉的尤里节”。但“尤里节”怎么会有两个日期，只好存疑。

③ 彼·得·安东内利（1825—?），彼得堡大学的学生。1848年12月起为沙皇政府收买，被派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充任卧底的特务。

④ 列昂季·瓦西里耶维奇·杜贝尔特（1792—1862），当时是宪兵团团长，兼任第三厅（见下文注）厅长。下文提到他时，或单称其姓杜贝尔特，或简称列·瓦·杜贝尔特。

家保证，列昂季·瓦西里耶维奇是极可亲的人……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0年5月24日

第三厅关于逮捕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密令（秘密）

沙皇陛下御前办公处第三厅① 致圣彼得堡宪兵营少校邱迪诺夫先生

圣彼得堡　1849年4月22日　No. 675

奉沙皇旨意命令您，于明天晨四点钟逮捕退役工程兵中尉兼文学家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住在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住宅，查封他的所有文稿、书籍，将它们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押至沙皇陛下御前办公处第三厅。

在此事件过程中您应严加监督，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任何手稿都不要漏掉。

可能您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处找到大量文稿和书籍，因而不能马上把它们都送到第三厅。在这种情况下您应该把它们集中堆放在一两个房间里，视情况而定，并把这些房间封好，而

---

① 第三厅（或译第三局）最早是在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后，沙皇尼古拉一世鉴于谍报人员疏忽，酿成剧变，根据侍从将军亚·本肯多夫《建立最高警察机构草案》的表奏，于1826年在御前办公处下设立的。它编制不大，但却在俄国政治生活中起了巨大作用，这是由于有一批秘密警察即独立宪兵团充当打手。第三厅厅长一般兼任宪兵团长，厅长最亲近的僚佐——督办则兼宪兵团参谋长。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立即押送第三厅。

如果在查封文稿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其中一些是别人的，那么不要理会他，也将其一并查封。在执行交给您的任务时您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谨慎，以您个人的责任担保。

宪兵中将杜贝尔特先生会下达命令，以使您身边有圣彼得堡警察局军官和足够数量的宪兵。

总参谋长　奥尔洛夫伯爵

摘自《今年（1849）3月11日以来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星期五”聚会的人员名单》（绝密）

姓名、职衔及何处供职	住址（略）	附　注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退伍工程兵中尉 文学家 主要参加者		3月11日、25日和4月1日参加了三个问题的讨论：书籍印刷自由、解放农民、诉讼程序改革，与戈洛温斯基意见相同(……) 4月15日到会并朗读了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这封信大胆激烈、有罪。是菲利波夫抄写的(……)据彼得拉舍夫斯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和迈科夫兄弟在文学协会中占重要位置。

罪犯文稿调查委员会主席致秘密审讯委员会主席的公函（复印件）（秘密）

1849年5月16日

尊敬的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先生：

在审查中尉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稿时，没发现任何直接与本案有关的东西，但找到了别林斯基给他的便条，是请

他参加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家的会议，还有普列谢耶夫从莫斯科寄来的信，信中讲到沙皇家族在莫斯科留下的印象，并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向与这个协会有联系的所有人转达问候。这些文稿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处找到的两本禁书，书名分别是“Le Berger de Kravan”(《克拉旺的牧人》) 和 “La Célébration du Dimanche”(《节日的庆典》)，有幸随本函寄给大人阁下，敬请查收。顺致我完全的信任与忠诚。

（签名）亚历山大·戈利岑公爵

No. 49 1849年5月16日

关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的说明[①]

1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米·瓦·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相识，据他本人证实，是于1846年春天，次年三四月份开始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审讯委员会的供词看，在他们结识之前，彼得拉舍夫斯基已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诗人普列谢耶夫认识。大概普列谢耶夫已读到出版不久的《穷人》和《化身》，因为据陀思妥

① 俄文版全集第18卷（1978年）在附录中有一篇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卷入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中的详尽说明，但编者未指出说明的作者是谁。现全文照录。

耶夫斯基说，彼得拉舍夫斯基偶然在糖果店里遇见他和普列谢耶夫，后者介绍了他是谁并与之交谈，彼得拉舍夫斯基便主动迈出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的第一步，马上向他提了个问题："您下一部小说的主题思想是什么？……"

从对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审问材料中可以看出，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赋"在我国的文学中并非无足轻重"（彼得拉舍夫斯基案卷，卷Ⅰ，148 页）。大概正是这一点促使彼得拉舍夫斯基努力结识这个初登文坛的作家，并请他参加自己的聚会。彼得拉舍夫斯基认为非凡的天才"是社会的财富，全民的财产"，并把文学看做是重要的宣传手段，因此他竭力吸引文学家加入聚会，而且赋予他们"向公众传播自己的思想"的责任（同上，148、331 页）。

自从 1848 年春"斋期[①]"前后首次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后，如果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为准，他在后半年之前"很少"去彼得拉舍夫斯基处，三四个月去一次。到 1848—1849 年之间的冬天，他才开始较经常地出席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聚会，并带着自己的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同前往。1849 年 4 月 23 日晨，陀思妥耶夫斯基连同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星期五"聚会的其他人同时被捕，在彼得保罗要塞中阿列克谢三角堡[②] 经过了一个月的审讯。由于被认为是彼得拉舍夫斯基案涉嫌者的"最重要犯人之一"，犯有

① 东正教在四季都有斋期。春季的"大斋"是在复活节前的七个星期。

② 彼得保罗要塞位于圣彼得堡的兔子岛（一名快活岛），始建于彼得大帝。它被称为"俄国的巴士底狱"。阿列克谢三角堡的机密房是后来补建的正规大牢。彼得拉舍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十三人，作为要犯，被羁押在阿列克谢三角堡的机密房。在这里囚禁了八个月，并从此处押赴刑场。

“蓄谋推翻现有国家法律与国家秩序”的罪行(《俄罗斯残疾军人报》，1849，No. 276，12 月 22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处枪决。根据军事法官裁定，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判决改为期限不等的流放苦役。遵照沙皇决定，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服役四年，取消贵族头衔，服苦役后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再服兵役。可是直至 1849 年 12 月 22 日，在彼得堡的谢苗诺夫校场，犯人们经受了一场精神折磨——听到了宣读死刑决定，而且传达了对第一批人行刑的命令之后，才向犯人们宣布取消死刑的消息。

俄国和外国出版物最早提到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是在 19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1905 年革命后，马上开始了对其档案材料的系统研究。不过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消息和材料的发表与学术研究，在数十年间一直逐渐地在进行。这一点以及流传至今的种种证据本身具有的性质，决定了后来的历史学家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诸多细节的评价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那些人中间占有的地位，产生很大的分歧看法。

我们了解彼得拉舍夫斯基运动依据的基本来源，是审讯材料，其主要部分分编三卷，发表于 1937—1951 年间（参见彼得拉舍夫斯基案卷)。最重要的补充材料，则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作品和有关回忆录。

尽管这些材料都很重要，但仍不能提供所有环节和细节的完整、全面、清晰的画面。在证词中，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中最了解内情的人都尽量向政府隐瞒聚会告密者安东内利不知道的和未引起审讯官注意的一些问题。而每个写回忆录的人，又都仅仅以自己知道的情况来评述运动和参加者。因此我们看到的关于运动的许多阶段和状况的材料，是不完整和相互矛盾的。根据目前的资料来源，只能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推测来补足

这些情况。陀思妥耶夫斯基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的一系列情况，也同样如此。

审讯此案时出现的一个特殊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审讯材料的内容和性质，这就为研究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增加了困难。1848 年 3 月尼古拉一世得知彼得拉舍夫斯基家反政府聚会的情况后，应内务大臣瓦·亚·佩罗夫斯基[①] 的请求，把监视彼得拉舍夫斯基聚会的任务交给了得到其信任的 И. П. 利普兰季。在 1825 年 12 月 14 日以后，政治犯罪不再归佩罗夫斯基掌握的部管辖，监视政治犯罪的任务转给了专门为此设立的秘密警察——第三厅。依据回忆录作者的材料推断，我们可以认为佩罗夫斯基和利普兰季决心利用交由他们监视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案来破坏第三厅的威信，以达到取消其特殊地位、划归内务部管辖的目的。而第三厅头目列·瓦·杜贝尔特了解到佩罗夫斯基和利普兰季意图后，他自己也不热心扩大案件事态，否则将有利于在尼古拉一世眼中增大佩罗夫斯基及其密探们的功劳，损害第三厅的威信。彼得拉舍夫斯基案的一系列审讯材料的偏颇失实反映了这一争斗。这一事实也说明，要全面完整地说明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活动，不能仅以这些材料为基础。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自己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小组和聚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在 1873 年的《作家日记》中，回答《群魔》的批评者，曾回忆自己以及青年时代的朋友们，

---

① 瓦西里·亚列克谢维奇·佩罗夫斯基（1795—1857），1855 年后曾封伯爵，任骑兵上将。但此处当为列夫·亚列克谢维奇·佩罗夫斯基。按：列·亚·佩罗夫斯基（1792—1856），当时为内务大臣。《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十卷集》第 18 卷中将“列夫”误为“瓦西里”，大概因二人姓氏与父称都完全相同。

写过这样的话:“我们当时被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感染……”“早在1848年巴黎革命前很长时间我们就受到了这些思想的魅力的影响”。同时他指出，早在1846年别林斯基就使他知道了“即将到来的更新世界的真理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部神圣性”。他后来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就是一种必然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了(《作家日记》，1873年，第16章，《当代谎言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强调，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行列并不是彼得拉舍夫斯基个人（或某个别人）对他影响的结果，正如不是他经历中一个瞬间即逝的偶然插曲。那是“当时新思潮”对其影响的结果，新思潮有力地占据了他自己和伙伴们的“心灵和头脑”，“……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当时甚至被有些发起人比作基督教，只是对后者着手作了与时代和文明相符的修改和完善化。”人们把他和朋友称作“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这在当时的历史文献和政论中已成固定名称)，引起了作家的反对。因为他认为这一名称人为地缩小了运动的规模，误解了它的涵义。“……依我看，这个名称不对；因为与站在断头台上的人们相比，数字要大得多，那些与我们一样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没有受到牵累。的确，他们从不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但当时问题完全不在彼得拉舍夫斯基这个人，而在于这整个一段已经久远的历史，我只想指出这一点”（同上)。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运动，据作家的理解，较之调查委员会的看法，其规模要广泛些。彼得拉舍夫斯基“星期五”聚会的参加者，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只是“被当时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所感染的青年中的一部分人，其中许多青年的名字一直不为政府所知，他们虽然不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却与被审讯者

有同样的信念。

应该指出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只是19世纪40年代反对派广泛社会运动被政府发现的一个分支，这一见解完全为他的第一个传记作者奥·费·米勒[①]所接受。后者认识许多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并以他们的口头证言为依据。“40年代形成了一些独立的小组”，米勒写道，“据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伊·马·杰布的证实，彼得堡大学就有一个……小组，大家想到要读书，想到建立一个特别的大学生图书馆……学生们渐渐地自己开始研读，一方面是Л. 施泰因[②]和哈克斯陶森[③]，另一方面是路易·布朗[④]、傅立叶和蒲鲁东。小组成员有（据其成员伊·马·杰布先生的话）哈内科夫[⑤]和冯维津[⑥]（十二月党人之子，1847年离开彼得堡去南方）。后来大学之外也开始建立小组……”（传记，第80页）。按米勒的看法，许多类似小组的存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是知道的。“他

① 奥·费·米勒（1833—1889），俄国民间创作和俄国文学研究者。著有《果戈理以后的俄国文学》（1874），其中论及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伊·亚·冈察洛夫等人的创作。

② Л. 施泰因，可能是洛伦茨·冯·施泰因（1815—1890），德国社会学家和法学家，研究现代社会学和国家法。

③ 哈克斯陶森（1792—1860），普鲁士官吏，经济学家。1843年周游俄国。他所撰写的关于俄国土地和村社的著作，对19世纪中叶俄国社会思想有影响。

④ 路易·布朗（1811—1882），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认为，不必革命斗争，只须通过建设公共作坊，实行普遍选举，就能消除资本主义关系和社会压迫。他是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先驱。

⑤ 亚·瓦·哈内科夫（1825—1853），当时是大学生，也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也被判处死刑，后改为发配奥伦堡边防营充当列兵。

⑥ 冯维津系俄国十二月党人米·亚·冯维津（1788—1854）之子。

希望那样的小组越多越好，他们可在各处作宣传；而且不仅不需要甚至不希望他们互相知道……”（同上）。一些回忆录作者指出，彼得拉舍夫斯基“星期五”聚会的参加者，同别林斯基圈子里的人有着个人的与社会思想上的联系（参阅索科洛夫回忆录，“Academia”出版社，列宁格勒：1930 年 78～90 页。此处也提及了著名的狄更斯作品翻译家伊里纳尔赫·韦坚斯基[①]的小组，青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曾参与其中，还有许多其他的 40 年代末的小组和秘密聚会）。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指出，那些负责调查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的政府机构，低估了 40 年代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传播的广泛程度，他们低估了受这一思潮影响的人数，相比之下他们只逮捕到一小部分。同样地，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调查部门也没能彻底搞清案件中一些个人的作用，包括他本人的作用。他看到 1875 年莱比锡出版的《1849 年的宣传团体》一书，那是第一本描述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的作品，据米勒证实，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对妻子说，这本书“是可信的，但不全面。我在书里看不到自己的作用……”他补充说，“许多情况完全漏掉了，整个密谋不见了。”（传记，第 90 页）“后来各种密谋的内容，在这里都已经有过了，它们不过是这次密谋的翻版”，米勒讲到，“这里是指秘密印刷厂和石版印刷，尽管这里当然没有策划攻击”（同上）。所谓“策划攻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米勒指的是 70—80 年代革命者的恐怖行动。

① 伊·伊·韦坚斯基（1813—1855），俄国社会活动家。1842 年起在彼得堡教授俄罗斯文学，非贵族出身青年小组的组织者。曾翻译狄更斯及其他英国作家的作品。这个青年小组在他家集会，人数不到二十人，其中有车尔尼雪夫斯基、亚·彼·米柳科夫等人。

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的回忆，不仅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起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内发生的讨论，也想起其中的政治密谋。能生动地说明这一点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1876 年在《作家日记》中写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段落。谈到自己的哥哥卷入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49 年他由于涉嫌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被捕，押在彼得保罗要塞里，在那里待了两个月。两个月后释放了他们一批人（释放的人还比较多），视为无罪，视为与案件无涉的人。事实也正如此：哥哥既没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小组，也没参加杜罗夫家的有组织的秘密团体。不过，他多次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聚会，而且从秘密的公共图书馆借书，其书库就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他当时是个傅立叶主义者，研究傅立叶主义热情很高……他是傅立叶主义者并从图书馆借书的事实败露了。当然，作为可疑的人，他可能即使不去西伯利亚，也得流放远处。"（《作家日记》，1876 年 4 月号，第 4 章，第 2 节）。

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同哥哥作了区分，后者也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被捕，但很快就解除审讯而获释（虽然现在据我们所知，他终身一直在警方的监视之下）。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常去彼得拉舍夫斯基和杜罗夫家中，但据其弟弟说并没有参加"有组织的秘密团体"。相反，作家把自己归入参加秘密团体（或是"密谋"）的犯人之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上面列举的这些不容置疑的作家本人的实证，使我们现在分析彼得拉舍夫斯基运动和研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参与其中的具体情况时，不仅需要依据审讯材料，还要借助我们能得到的其他材料加以校正，如历史文献、回忆录与自传材料。

在这方面，最有意义的是 1922—1956 年间发表的阿·尼·

迈科夫写给彼·阿·维斯科瓦托夫[1] 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以及诗人阿·阿·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2] 记录的阿·迈科夫就这一题目作的口头讲述。阿·尼·迈科夫提供的证明（他的弟弟、早年去世的评论家瓦列里安·迈科夫，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及其同伙关系密切。而他本人也受了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的牵连，熟悉许多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第一次使我们有可能破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密谋”之说的含义（1849 年政府终究未能得知此事），也有可能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参与的情况。尤其应该强调的是，阿·尼·迈科夫从年轻时起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知心密友。正因如此，他把作家告诉他的秘密保守到作家死后才说出来，即便如此也还是只告诉个别人，而不打算在报章上发表。

从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的审讯材料和本卷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供词可以看出，除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家（广泛而庞杂的参加者）的聚会之外，从 1848 年起也开始举行了一些范围较小的志同道合者的聚会。于是产生了杜罗夫的“文学”的（或“文学和音乐”的）小组，参加者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一些文学家：普列谢耶夫，帕尔姆，米柳科夫，斯佩什涅夫，蒙别利，格里戈里耶夫，菲利波夫，以及其他一些激进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从迈科夫的回忆中可了解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同党中有一个最坚定的派别是由斯佩什涅夫于 1849 年元月组建的，它有秘密印刷厂。这一派别的最终目标，斯佩什涅夫认为是“在俄国实行政变”。

---

① 彼·阿·维斯科瓦托夫（维斯科瓦特伊）（1842—1905），文学史家，后曾主编六卷本莱蒙托夫全集（1888—1891）。

② 阿·阿·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1848—1913），诗人，阿·尼·迈科夫的好友。

阿·迈科夫证明了也解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话：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在供词中“得以对审讯委员会隐瞒了案件的一系列情况，否则将会加重他们的罪名”。同时，必须考虑到迈科夫披露的一些情况，才可能准确地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的情绪，以及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成员中的地位。

总的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47—1849年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聚会期间的观点演变，可概括如下：还在结识彼得拉舍夫斯基及参加其聚会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早自30年代末就迷恋乔治·桑的小说并密切关注法国文学与报章新闻的新作，了解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能接近那些为1848年西方革命作了思想准备的欧洲社会思潮流派，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他结识了别林斯基，因为他认识瓦列里安·迈科夫，因为1846年他参加了别克托夫兄弟[①] 的聚会。他们兄弟两人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影响下，组织起一种独特的生活“团体”（公社），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参加了（1848年初由于别克托夫兄弟去喀山，公社解体）。

19世纪40年代下半期的思想氛围，与别林斯基、瓦·尼·迈科夫、别克托夫兄弟、阿·尼·普列谢耶夫、德·瓦·格利戈罗维奇[②]的交往，研读法国报章，读席勒、乔治·桑、欧仁·苏[③]、

① 别克托夫兄弟：阿·尼·别克托夫（1823—?），尼·尼·别克托夫（1827—1911）。前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工程学校的老同学，后者后来成为院士。在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他们两人的家里常常有民主和社会主义思想情绪的青年们聚会。

② 德·瓦·格利戈罗维奇（1822—1900），俄国作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著有《乡村》(1846)、《苦命的安东》(1847)等。

③ 欧仁·苏（1804—1857），法国作家。作品有社会小说《巴黎的秘密》(1842—1847）等。他描写人民的苦难和“底层”的生活，以小市民情调宣扬傅立叶的社会思想。

巴尔扎克、雨果、赫尔岑的书，接触圣西门、傅立叶、孔西德朗、拉门奈、路易·布朗、布·鲍威尔①、马·施蒂纳②、费尔巴哈的思想，围绕这些人在作家周围经常爆发热烈的争论（他经常出席）——这一切都促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小组。

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最初两年很少参加他的聚会。这并非由于他与彼得拉舍夫斯基一伙没有共同的利害或是他们思想上有分歧，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尽管1847年初起别林斯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开始冷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之后不久第一次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而此后，他在1847年中还继续去别林斯基那儿。紧张的文学创作，1846年夏天去特维里的哥哥家里长期度假，1847—1848年在帕尔戈洛瓦别墅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向性格，与别林斯基及周围的文学家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发生的令他痛心的冲突，与普列谢耶夫，雅·彼·布特科夫③、迈科夫的友好交往——以上这些原因足以说明为什么1847年和1848年上半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少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

不过也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结识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拉舍夫斯基产生反感，而且此时他对思想上形形色色、

---

① 布·鲍威尔（1809—1882），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批判基督教和福音的可靠性，认为"批判的个人"的自我意识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② 马·施蒂纳（1800—1856），原名卡斯巴·施米特。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主要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提出彻底的自我中心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激烈批判其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

③ 雅·彼·布特科夫（1821—1856），俄国作家。

数量上众多的彼得堡各种小组总的形成了一种怀疑态度。

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个人表示反感的，不仅有他的供词，也有回忆录作者作见证，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群魔》的某一阶段上认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如同涅恰耶夫[①]）与彼得·韦尔霍文斯基[②] 心理上很接近。

在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审讯期间，审讯委员会的注意力集中在安东内利和被告人供词中讲述的小组活动的最后阶段。因此我们无法准确列举出 1847—1848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的所有彼得拉舍夫斯基“星期五”聚会，无法完全弄清这些聚会上进行争论的内容。但彼得拉舍夫斯基成员的文章和供词说明，这些争论几乎涉及到那个时代全部的哲学、社会经济、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问题。相比之下如果说十二月党人主要是政治革命家，他们关心的首先是革命策略和准备未来的宪法，那么彼得拉舍夫斯基成员则依靠哲学评论、政治经济学说和 40 年代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努力把政治变革的讨论，与全方位分析传统哲学、宗教、道德以及在俄国与西方业已形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整个体系联系起来。这一点就是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圈子里所受的哲学洗礼，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的意义。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证词看得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他听到季姆科夫斯基的讲话，他主张停止毫无实效地讨论“某种

① 谢·格·涅恰耶夫（1847—1882），俄国革命运动参加者、秘密团体“人民惩治会”的组织者。1869 年在莫斯科密令部下杀死有叛变嫌疑的大学生伊凡诺夫，一度曾逃至国外，被引渡回来，后死于彼得保罗要塞。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的人物，他以上文谈到的涅恰耶夫为原型。

社会体系比另一种更优越”，而应是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小组”里行动起来，争取“新思想的胜利”，趁着反动势力还没镇压“社会运动”。正如我们知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参加了亚斯特列任布斯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座。除了社会问题的争论，作家也了解彼得拉舍夫斯基处关于宗教与无神论哲学的讨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聚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发言，讲了他所熟悉的题目：关于书刊审查，尼古拉时期俄国文学与作家的处境，文学中社会性与艺术性的相互关系。在讨论到三种改革——解放农民、出版自由和诉讼改革中哪种对俄国最迫切的问题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发言的戈洛温斯基一样，主张首先废除农奴制，而不同意彼得拉舍夫斯基主张优先进行诉讼改革。1849 年 4 月 15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星期五”聚会上朗读的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反对农奴制的信，给在场的人以深刻的影响，读时慷慨激昂，并在杜罗夫小组中重读了一遍，正如我们知道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聚会上讲到的话题之一，是“个性和自私”，这与他 40 年代和后期创作中的基本哲学问题相关联。据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说，他在这次发言中总结了自私和虚伪“自尊”的恶果（使人变得渺小)，并提出了自己理解的“人的真正尊严”。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我们知道，是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他所以看重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聚会，首先是因为讨论的问题广泛，自由，见解冲突很尖锐。“这里是一经开始，就抱着无休止争论下去的目的”，我们在他对审讯委员会的解释中读到，“整个团体正是为了这个争论聚集起来的，为了争论和一争到底，因为几乎每次大家散会时都决心下次继续以新的力量恢复争论……”这些话对于这位作家来说是极有意义的，他后来写了《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

在每一部小说中，核心内容就是无休无止地争论道德、社会与哲学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聚会吸引来了新成员——戈洛温斯基和自己的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这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反感以及作家1847年4月在《彼得堡纪事》中（亦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初识彼得拉舍夫斯基成员时）表现出的对各种小组的怀疑态度，并没有妨碍他于1847—1849年继续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聚会，而且正是在这一阶段的末尾，在聚会成员被捕前的几个月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得更频繁，参与得更积极了。

对此只能作一种解释：在1848年欧洲革命事件的影响下，以及与此相关的俄国反动势力的强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8年末和1849年初对专制农奴制的不满日益强烈。由于许多其他彼得拉舍夫斯基成员也经历了同样的思想变化，他们的相互接近和共同努力，便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共同活动的新阶段奠定了基础。

1848年末，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部分成员组成了杜罗夫小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参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位传记作者写道，“参加杜罗夫小组的，看来是最激进的人，这种激进导致了他们的不谨慎，而彼得拉舍夫斯基是完全不赞成这一点的”。

彼得拉舍夫斯基“是个笨蛋、戏子、会胡扯的人。他成不了什么大器，而……去他那儿的人里有一些干才筹划了大事，彼得拉舍夫斯基并不知道，人们也不接纳他……”，阿·尼·迈科夫这样转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的话。在这个问题上，他的

回忆与米勒的讲述是一致的，这就证明了回忆是可信的。①

我们不可依据米勒和迈科夫的讲述就作结论说，杜罗夫的小组完全由“激进者”组成。无论是杜罗夫本人，还是他的朋友帕尔姆和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其他一些参加者，都不属于最激进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他们甚至不知道“密谋”的存在（更不是它的参加者）。从另一方面讲，据米勒的话可知，彼得拉舍夫斯基不赞成杜罗夫小组中“最激进者”的“不谨慎”，并非不同意他们的最终目标，而是在当时条件下，从政治的观点来看，认为他们的行动是不折不扣的“不谨慎”，也就是说在1848—1849年极端反动的统治下会被警方视为危险行动，而且也不符合他所理解的当前任务。

彼得拉舍夫斯基认为“俄国社会不可能靠少数浪漫年轻人的秘密组织来重新改造……在40年代俄国的条件下，斯佩什涅夫的密谋策略过于浪漫、激进，也不太现实。”——一位研究者正确地写道。

在审讯官的正式报告中，谈到杜罗夫小组时说：“文学家杜罗夫与帕尔姆合住的宅子里，聚会的次数不多，从今年（指1849年——编者）3月初到4月中旬，每周一次。他们起初是为了音乐和文学的目的……但四五次聚会后，不再是听音乐与读纯文学性文章了，而是读具有自由思想的文章。具体说，十级文官米柳科夫读了自己翻译的“Paroles d'un croyant（信徒的话）”（拉门奈的作品——编者），标题是《安东尼总主教的新启示》。被告陀思妥耶夫斯基读了别林斯基与果戈理的通信，

---

① 说彼得拉舍夫斯基“是个笨蛋、戏子、会胡扯的人”是完全违反事实的。阿·尼·迈科夫对他可说是完全不理解。实际上，彼得拉舍夫斯基有远见卓识，老成持重，知道在当时形势下轻举妄动，适足败事。他正以这种沉着的态度被误会为愚蠢无能。

内容狂妄而且违法。被告杜罗夫读了两封信，是文学家普列谢耶夫写给他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在杜罗夫和帕尔姆的晚会上，除他们自己外，参加的还有被告斯佩什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列谢耶夫、蒙别利、利沃夫、格里戈里耶夫、菲利波夫、戈洛温斯基和其他五个熟人”。①

从引用的报告材料看，杜罗夫小组在很短时间里经历了两个阶段。其他材料也能证明这一点。第一阶段中，至少表面上占主导的是音乐、文学的题目和兴趣。但就在前面的一次晚会上，蒙别利已经发言号召紧密团结有“同样情绪和思想”的人。斯佩什涅夫证明这个小组从一开始成立就具有政治目的，而且甚至发起者之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斯佩什涅夫在审讯供词中说到，“1848 年 11 月或 10 月末……普列谢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到他那里说，他们想同自己的熟人另找个聚会地点，而不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提出的理由是怕有特务。这就成了小组聚会的开端。据在斯佩什涅夫文稿中找到的一份关于秘密的“俄国研究会”成员必须签名的草稿来看，斯佩什涅夫早自 1845 年就醉心于武装起义的思想，认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建立高度保密的革命组织（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卷Ⅲ，445～446 页）。过了不久，小组的政治目标便显露出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读了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后，菲利波夫建议“同心协力着手整理具有自由思想的文章，涉及到俄国法律、行政的现状……”（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卷Ⅲ，202 页）。也就在那时，菲利波夫建议为印刷反对政府的文章搞一个家庭石版印刷厂。这个新建议导致小组分裂，因为米·米·陀思妥耶夫斯

① 据说，除上述人员外，还有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卡舍夫斯基、拉曼斯基兄弟、米柳科夫、莫尔德维诺夫、谢尔科夫。

基、谢尔科夫、卡舍夫斯基和其他一些成员，害怕菲利波夫的提议，也不赞同，发言激烈反对。不过小组思想上的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杜罗夫聚会自1849年4月中旬正式停止，并不意味着在此产生的密谋也已消失。

正如我们所知，彼得拉舍夫在成员中的一些人，即蒙别利、斯佩什涅夫、利沃夫，早就有意建立一个从事密谋活动的小范围秘密团体，由态度最坚决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组成，他们要敢于承担并马上着手有组织的实际行动。据迈科夫讲，正是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秘密团体”出现于1848年末至1849年初，由斯佩什涅夫领导。参加者有莫尔德维诺夫、蒙别利、菲利波夫、格里戈里耶夫、弗·阿·米柳京[1]、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还有我们尚不知的第八个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建议阿·尼·迈科夫作第八个，但他拒绝了，那么他的位置有可能为另一个人所代替）。参与斯佩什涅夫密谋的成员把“在俄国实现政变”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也就是把反对专制的政治斗争摆在第一位，看来他们认为，解决1847—1848年其他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热烈讨论过的关于俄国未来社会经济制度的广泛问题，不应在这一政治斗争之前，而应是这一政治斗争的结果），并从购置印刷机入手，开始了实际行动（因为最初建立石版印刷的方案太费钱，效率也低）。“为的是印刷各种书籍，甚至杂志”。这样他们便走上了18世纪拉季舍夫[2]先已指出的道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以自己的计划预示了创建自由俄国刊物的设想。几年之后在伦敦，赫尔岑实现了这一设想。彼得

① 弗·阿·米柳京（1826—1855），哲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

② 亚·尼·拉季舍夫（1749—1802），俄国作家、革命家。主要作品为《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

拉舍夫斯基成员被捕前，已被监视了几个月。他们的被捕，也包括斯佩什涅夫小组成员的被捕（尽管政府密探安东内利没有了解到他们的秘密），妨碍了他们实现这一计划：分部件订购的印刷机，存放在莫尔德维诺夫家里，他被捕后被他的亲人们销毁。

米勒与阿·迈科夫关于作家参加斯佩什涅夫领导的"密谋"的说法，得到了一个间接的证明。这就是医生亚诺夫斯基的话，他不太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40年代的精神生活和思想关注，但他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8年末"外表上"发生了他所不理解的"变化"。米勒写的作家传记出版后，医生（亚诺夫斯基）1885年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与此书展开辩论，坚决拒绝把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密谋"分子。但思想保守的亚诺夫斯基不得不承认，1848年冬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明显地受到了"斯佩什涅夫的"权威"的影响，此人"当时大家都认为是个无可怀疑的社会主义者"。当亚诺夫斯基问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生变化的原因时（这"变化"表现为他显得郁郁寡欢，更易发火，动辄生气，为不值一提的小事大动肝火，又常同哥哥争论政治问题，批评傅立叶的空想主义，反而大谈路易·勃朗的"某篇文章"），作家对亚诺夫斯基隐瞒了这一变化的真实原因，却解释说从斯佩什涅夫处借了五百卢布，说他现在不能、而且可能永远也还不起这笔钱。"您知道吗，从现在起我有个自己的'梅菲斯特'[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亚诺夫斯基说这些话时，是强调他感到斯佩什涅夫让他承担的责任的危险，对此必须保密，还想到与此相关的危险。显然，这些对他造成了精神压力（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卷Ⅰ，171

① 歌德的《浮士德》中的魔鬼。

～173 页）。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 40 年代社会主义文献及其流派了解的程度，同时代人之间，作家各种传记之间，观点互相矛盾。1849 年 4 月 22 日，在被捕前最后一次“星期五”聚会上，彼得拉舍夫斯基责备参加其聚会的文学家，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说他们受的教育不够（彼得拉舍夫斯基案卷，卷Ⅱ，163～164 页）。他的朋友亚·潘·巴拉索格洛补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罗夫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聚会已有三年了，本可以利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藏书，或光靠耳濡目染也可受到教育了”，可他们两个却“一本正经书也没读，不论是傅立叶还是蒲鲁东，甚至连爱尔维修[①] 也没读过”（瓦·伊·谢梅耶夫斯基[②]《布达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第 165 页）。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私交的杰布后来也对米勒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没有研究过‘社会主义者的著述’，仅从哈内科夫那里了解了一些”（传记，第 91 页）。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关系较近的亚·彼·米柳科夫持另一种观点，他回忆说：“杜罗夫小组中有几个狂热的社会主义者……凡是新出现的这方面的法国著作，都能不断收到、传播，并在聚会上讨论。讨论罗伯特·欧文的‘新拉纳克’[③] 和卡贝的‘伊加利

---

① 克·爱尔维修（1715—1771），法国 18 世纪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代表人物。

② 瓦·伊·谢梅耶夫斯基（1848/49—1919），俄国民粹派历史学家。

③ 罗伯特·欧文（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于 19 世纪初制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改善工人生活的慈善计划，并试图在他所担任经理和股东的位于苏格兰的新拉纳克纺纱厂内推行。1813 年提出一个从根本上改革社会的方案，即建立一个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剥削等等的自己管理自己的“共同合作的新村”。他于 1820 年在其《致拉纳克部的报告》中首（转下页）

亚'[1]，尤其是傅立叶的法朗斯泰尔[2]和蒲鲁东的累进税理论，常常占了晚会的很多时间。我们大家都学习过这些社会主义者的作品，但远非所有人都相信他们的计划能够实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后者。他读了这些社会主义理论家的作品，但对他们持批判态度"。亚诺夫斯基也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段时间里"了解……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著……"（米柳科夫：《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卷Ⅰ，165，185页）。米柳科夫和亚诺夫斯基的这些证言，无疑更值得信赖。这不仅因为他们是从近处观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也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审讯供词和后来的自白都印证了这一点，更别说他40年代和后期写的短篇和长篇小说了。

（接上页）次明确而系统地概述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观点，1824年他和四个儿子和信徒们去美国印地安纳州购置三万英亩土地及地上的建筑物，进行"新和谐公社"的试验，至1828年公社瓦解。1828年回国，在工人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实践活动。此处的"新拉纳克"，似指他的"新拉纳克纺纱厂"。按：俄文全集本中作"新拉马克"，当为"新拉纳克"之误。

① 埃·卡贝（1788—185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主张消灭私有财产，主张财产公有，但他企图用和平方式宣传社会主义，主张逐步改革，而不用暴力进行革命。他于1840年著哲学和社会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在书中他描写他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国——伊加利亚，这个理想共和国是在他所虚构的人民领袖伊加利领导的用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个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人人平等、人人幸福的社会。1848年，一批伊加利亚派共产主义者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即命名为"伊加利亚"，至1856年趋于瓦解。此处的"伊加利亚"似指这一移民区。

② 法朗吉是傅立叶所设想的和谐社会的基层组织，它具有人们共同劳动的协会的性质，它由许多小组组成，其基本规模为每一法朗吉为一千六百人到二千人。每一法朗吉的所有成员都住在一所共同的大厦中，这一大厦名为法朗斯泰尔。

我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供词，阿·迈科夫和米柳科夫的回忆中了解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情况，补充了其他一些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讲述，如杰布·帕尔姆·谢苗诺夫–天山斯基，以及作家本人后来的回忆。

米勒曾经讲到："斯佩什涅夫的一个熟人说，从外表上看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是个密谋者的类型：他沉默寡言，喜欢个别交谈，性格与其说是开朗不如说是内向……但这个最沉静谦虚的人，据伊·马·杰布说，讲起话来能够达到令人震撼的激情"。因此，用杰布的话来说，"各小组的成员都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热情洋溢的个性最适宜做宣传，他对听者产生惊人的感染力"。他又说："现在我眼前栩栩如生地呈现出彼得拉舍夫斯基一次聚会上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看见、听见他在讲：芬兰军团的一个司务长因为连长对他的同事态度粗暴而向连长复仇，结果被列队士兵鞭打[①]"。又如他讲地主如何对待农奴，杰布补充说，"我同样生动地记得，他讲述自己的《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比刊登出来的要充实得多。我还记得他当时就以生动的人道主义感情，对待社会上存在的、后来体现于他所写的索涅奇卡·马尔梅拉多娃[②]身上的那一类人（当然这里不无傅立叶学说的影响）"（传记，90～91、95页）。

在长篇小说《阿列克谢·斯洛博金》(1873)[③]中，据米勒

① 指由士兵列队（分列两行），鞭打从其中穿过的受罚者，即所谓"穿绿街"。列·托尔斯泰在其小说《舞会之后》就写到士兵受这种酷刑的场面。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的人物。

③ 亚·伊·帕尔姆的主要作品。在这部小说里，他再现1845—1849年间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情况，它以П. 阿尔明斯基的笔名发表（1872—1873）。小说中主要人物具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青年时代的许多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不大喜欢（转下页）

证实，帕尔姆在斯洛博金身上再现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时的一些特征。小说描写在一个小组中进行一次普通的争论时，“一些人拍着胸脯主张实行公开的诉讼，另一些人认为救国出路全在于出版的自由，第三类人宣布选举制最重要，如此等等……斯洛博金低声缓慢地说：‘解放农民无疑是我们走向伟大未来的第一步’。这句话表明了早已有之、矢志不移的信念，又以平静的语调说出，对面红耳赤的争论者们产生了很大影响，调和了所有的意见”。这部小说还展现了另一场关于法国政变的争论，当时斯洛博金说：“政治问题引不起我的兴趣……他们那儿谁当政对我都无所谓——是路易·菲利普①或者某个波旁②，甚至是什么共和国……这能使谁好过些呢？人民只是听到几句漂亮话，在自己的蒙难者名单上读到几个新名字，然后仍做那只对资本家有利的工作。结果呢，生活一丝一毫也不会变好……我不相信把老一套的政治形式花样翻新会有什么益处”。斯洛博金在帕尔姆先生的小说里与分裂派分子发生往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果真也想过与分裂派分子接近”（传记，85～87页）。“……帕尔姆记得有一次争论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事实上除了起义就无法解放农民该怎么办?”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他通常那种感染力大声说“哪怕通过起义呢!”（传记，85页）

（接上页）这部作品，在他主编《公民报》时，发表过弗·伊·梅谢尔斯基写的批评该作品的文章。

① 路易·菲利普（1773—1850），1830年七月革命后为法国国王，至1848年革命被推翻。

② 波旁，法国公爵，他的家族于1589—1792、1814—1815、1815—1830年先后在法国建立波旁王朝，至1830年因法国七月革命而结束统治。这里所指的“某个波旁”，泛指19世纪的波旁家族中的某个人。

2

1903年弗·伊·列宁指出，俄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到19世纪初就已经“创建了半个世纪”，它的历史“大体上应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算起。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是十二月党人的后继者。但与后者不同的是，他们努力把反对沙皇君主制和农奴制的斗争任务，同19世纪40年代西欧社会主义思潮提出的问题联系起来。

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首位传记作者说，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在内，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的运动与十二月党人的运动相比较。他们在要塞中议论说：“那些人罪过更严重，因为他们渗透到军队里，手中拥有炮和武器”（据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讲）。斯佩什涅夫生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说：“十二月党人在广场上斗争，在人民当中，而我们只是在房间里说说”（传记，99页）。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强调，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无论在奋斗的最高目标上，还是在其要求的实际激进程度上，都超过十二月党人。“十二月党人的思想是限制专制，成为绅士”，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对妻子说过：“他们想解放农民，但不给土地。”（传记，89页）。相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和杜罗夫小组的朋友们来说，则要解放农民并给他们分地。按作家的想法，这才是俄罗斯政治与社会经济变革中最首要和最重要的。米勒转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社会主义者产生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播下许多种子……他们同样相信人民在他们一边……而且是有理由的，因为农民是农奴制下的人民。”（传记，80、83页）

早在19世纪30年代，赫尔岑和奥加辽夫① 依据圣西门及其学生的思想批判地研究了伟大的法国革命的经验，意识到为了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只以共和国代替君主制是不够的，还需要更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但欧洲社会主义不同代表人物提出的各种各不相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蓝图，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尚在探求的未来理想呢？其中哪一种是最为合理并且最符合人类社会的需要呢？为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要求而建立必须的前提条件，应该选择怎样的具体道路呢？怎样把争取民主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结合到一起，在社会各阶层和人民中广泛确立民主和社会主义意识呢？这些问题得到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热情思考。他们从同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出发，首先从傅立叶的学说出发，在俄国革命者中第一次努力领会这一思潮在西方发展的历史经验，详尽地对比这一思潮的各种不同变体，并把反对农奴制和反对专制压迫的斗争不仅同民主改革、也同社会主义变革的纲领联系在一起。

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各个小组对俄罗斯的艺术、科学和文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通过参加小组在不同年代接受其思想影响的，除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外，还有评论家瓦·尼·迈科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诗人阿·尼·普列谢耶夫和杜罗夫，小说家和剧作家帕尔姆，《俄国与欧洲》的作者尼·雅·丹尼列夫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中有未来的地理学家谢苗诺夫-天山斯基，青年的鲁宾施坦②。而在1849年，有一

① 尼·普·奥加辽夫（1813—1877），俄国诗人、政论家、革命家、活动家。1856年后流亡国外，与赫尔岑合办《北极星》、《钟声》，号召人民推翻沙皇政权。

② 安·格·鲁宾施坦(1829—1894),俄国钢琴家、作曲家、指挥家。

次格林卡① 也参加了他们小组的聚会。还有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的第一位俄译者哈内科夫（也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而后来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很接近的有韦坚斯基和И. Д. 米纳耶夫(《火星》周刊派诗人德·德·米纳耶夫之父)，后者认识少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并对其信念的形成起过促进作用。

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努力与彼得堡以外（波罗的海沿岸和西伯利亚）的革命小组取得联系，在对沙皇君主制不满的（包括分裂派分子）各阶层人民中，在农民、士兵中寻求支持。其中斯佩什涅夫领导的一部分，正如我们所知，曾想在彼得堡印刷反对政府的非法书籍。但在 19 世纪 40 年代俄国的条件下，所有这些转向实际革命工作的努力都遇到了巨大的、往往是无法克服的困难。下述情况又使这一点难上加难：尽管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依据的傅立叶和其他早期社会主义者学说中，蕴涵有天才的预想和批判的领悟（这得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评价），这些学说终究具有空想的性质，而且或多或少地与实际的现实脱节。把这些学说同俄国农奴制生活迫切的首要的实际需要联系起来，是很不容易的，有时简直是不可能的。如果考虑到俄国 40 年代农民大部分还依然故我，不为所动，而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只是极其狭窄的圈子，那么便可理解为什么熟悉情况的同时代人把彼得拉舍夫斯基聚会称作“思想的密谋”，尽管许多成员热切地希望（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如此）通过实际步骤有力地推动社会变革。

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活动的历史环境，不允许他们把自己

① 米·伊·格林卡（1804—1857)，俄国作曲家，俄罗斯古典音乐的创始者。

的实际计划变为现实，因为由于环境的困难，他们组建革命组织的进程迟缓，到被捕时实际尚未完成，那时仍只是倾向不同的分散的小组。

但是尼古拉一世的警察与沙皇本人并没有被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和平”外表所欺骗。甚至在没能了解运动的所有环节、不知道斯佩什涅夫小组秘密的情况下，他们准确地感觉到那时还处于空想阶段的社会主义思想一旦传进俄国解放运动，会对农奴君主制构成多大的危险。看来正是这一点，说明了为什么尼古拉一世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实行特别残酷地清算，致使当时的人们长时间震惊不已，而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成为清算的牺牲品。

3

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活动引起了政府的注意，是由于1848年2月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在彼得堡散发了石版印刷的纲领，供首都贵族聚会时讨论。

内务大臣列·阿·佩罗夫斯基从手下的一名特务官 И. П. 利普兰季那里得到一份彼得拉舍夫斯基的纲领草案，就此事和宪兵上司阿·费·奥尔洛夫伯爵[①] 碰了头。佩罗夫斯基和奥尔洛夫“同样重视这份文件内容的重要性”，他们两个人认为，这应是秘密地详尽策划的结果。经由他们“双方同意”，搜集有关彼得拉舍夫斯基材料的工作交由利普兰季负责，因为他是第一个察觉此事的人。同时，他承担的这一任务，要对无所不能的第三厅保守秘密。

完全可以看出，把责任如此重大的案件从第三厅的管辖中

① 阿·费·奥尔洛夫（1786—1861），当时任宪兵长官。

拨出来给了与它争权的内务部，这一史无前例的安排是由尼古拉一世批准的。佩罗夫斯基首先向尼古拉一世报告了彼得拉舍夫斯基计划，沙皇当时对秘密警察不满，第三厅的声誉受到了损害。知情的回忆录作者写道，奥尔洛夫公爵声言谁敢把内务部佩罗夫斯基负责的案件大肆渲染，就把谁的“脖子扭断”。“而认为第三厅没必要单独存在的佩罗夫斯基，则力图证明普通警察就可以防止一切政变，能在第三厅之前了解到这种企图的萌芽。在这个方面，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出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1848 年 3 月 10 日以后，利普兰季着手搜集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不利的材料。对他完成任务有利的一个情况是，据同时代的人回忆，“全城都知道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利普兰季作了特别的努力，才把自己的密探安东内利安插进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圈子，后者为此放弃了大学的学业。

安东内利写给利普兰季的第一份汇报材料，署的日期是 1849 年元月 9 日。但这一密探很长一段时间未被允许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聚会。他第一次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星期五”聚会是 1849 年 3 月 11 日。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不请自来。从这时起，利普兰季从安东内利和其他两个密探处定期取得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和参加聚会者的情报。那两个密探是洛莫夫和沙波尼什科夫。他们于 1849 年 4 月在彼得拉舍夫斯基那栋楼里租了间房子开了个烟摊。

在 1849 年 3 月 1 日报告中，安东内利首次提及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今天午饭前该人（指彼得拉舍夫斯基）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处（作家）。我问他们两人认识多久了，他说相识已久，而且与他们兄弟俩友情很深。”接下去的一次报告，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参加“星期五”聚会，并且与

主人就“写作风格”争论起来。很快利普兰季就得知有个“团体”，由文学家组成，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迈科夫兄弟[①]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最后，1849 年 4 月 16 日的密探报告说，前一天在彼得拉舍夫斯基聚会上，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读了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在安东内利的其他报告中，也出现过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

这样，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被捕时，利普兰季已收到指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足够的材料。而关于调查的进展情况，利普兰季经常向自己的顶头上司佩罗夫斯基报告。

1849 年 4 月 20 日晚，奥尔洛夫把利普兰季请到自己家里，当着宪兵团长杜贝尔特的面对他说，遵照沙皇的意旨，利普兰季必须停止进一步的侦察，并把所有的材料转交给杜贝尔特。杜贝尔特非常生气，因为这件非常重要而又直接属他管辖的案件，他的上司和老朋友居然一直瞒着第三厅。

1849 年 4 月 21 日，奥尔洛夫向尼古拉一世呈递了自己的概述及根据安东内利报告列出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名单和逮捕他们的计划。几小时后他又向沙皇尼古拉一世报告，第三厅已做好了逮捕的准备。尼古拉一世在这个文件上作了批示：“我已全部看过。案情重大，即使只是胡说八道，也极为有罪，不能容忍。按你的意见立即逮捕。要抓那么多的人最好能不声张。”

1849 年 4 月 22 日，奥尔洛夫签署了逮捕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命令。当天晚上，彼得拉舍夫斯基家举行最后一次“星期五”聚会，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参加了。

---

① 此处疑有误：迈科夫兄弟中，弟弟瓦列利安·迈科夫早在 1847 年去世。此处似指此前的情况。

1849年4月23日凌晨四时许，大多数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均遭逮捕，包括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错把他弟弟安德烈[1] 当成他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逮捕了）。逮捕的同时进行了搜查。所有被捕者以及从他们那儿搜到的书籍文件，都被押送至第三厅（除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外，其他一些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对这一夜的情况也有回忆）。

刚刚被捕还关在第三厅时，大家就知道了告密者是安东内利。第三厅官员的这一“疏忽”，证明了杜贝尔特及其宪兵对与之竞争的部门极为敌视，希望把利普兰季的功绩一笔勾销。清晨，奥尔洛夫向沙皇汇报：“三十四人已被带到第三厅”，“一切做得十分秘密，毫不声张，行动干净利落”。晚上十一点左右，被捕者被送到彼得保罗要塞。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先被关在阿列克谢三角堡垒7号，后来在9号。

4月23日当天，尼古拉一世为审讯蓄谋造反者任命了“彼得保罗要塞最高秘密审讯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彼得保罗要塞司令И. А. 纳博科夫将军（主席），国务会议[2] 成员П. П. 加加林公爵，军事部总参谋长В. А. 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军校管理局参谋长Я. Н. 罗斯托夫采夫和杜贝尔特。陆军大臣亚·伊·切尔内绍夫把沙皇关于迅速彻底进行审讯的命令交给了委员会。1849年4月25日А. Ф. 奥尔洛夫在致莫斯科省长А. А. 扎克列夫斯基将军的密信中说：“关于

① 安德烈是作家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弟。他因被误认为是大哥米哈伊尔而被捕。

② 是1810—1917年间俄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它审议大臣们提出的法案，呈送沙皇批准；审议国家机关的编制和预算；有时处理超出其他机关权限的行政和司法事务。议长和议员由沙皇任命。它的办公厅下设四个部、处。办公厅由国务秘书领导。

押在圣彼得堡的九级文官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十分倾向于共产主义和其他西方思想，狂妄地宣扬自己的一套。

“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聚会纯粹是政治教育性的，其目的在于：改变俄国现有的秩序，培育思想观点完全相同的人，以便在统治发生变革或暴乱的情况下，立即找到初衷一致、随时准备占据政府要职、继而号令群众的人。彼得拉舍夫斯基及其同党的行动，第一是通过老师影响年轻一代，第二是通过公职人员影响人民。这些公职人员要把当局的所有行动抹黑，说成卑鄙和谬误，以此挑唆民众憎恨手中握有任何行政权利的人，煽动民众反对政权本身……”（H. Φ. 别利奇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一案审讯过程中》，201～202 页）

自 4 月 26 日起委员会开始举行会议。当天又成立了“调查被捕者文稿特别委员会”。它的任务是“清理缴获的被捕者的大量文稿（包括书籍），选择或多或少与案件有关的材料报送审讯委员会”。这一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是负责呈文的大臣 A. Φ. 戈利岑公爵。成员有：第三厅特务官三品文官 A. A. 萨格腾斯基，宪兵首长秘书四品文官 A. R. 格杰尔什捷伦和利普兰季。（同上书，218～219 页）

由于没有掌握足够的材料（只有密探的报告），审讯委员会决定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星期五”聚会的参加者进行预审（“轮审”）。正式的审讯留待获得更详细的材料之后，这些材料一方面来自文稿委员会，另一方面则来自预审。

1849 年 4 月 28 日，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里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轮流被传去受审，之后则要他们在自己的牢房里写出更为详细的书面交代。同日第三厅给《祖国纪事》杂志发行人安·亚·克拉耶夫斯基发出一份机密公函：

尊敬的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阁下！获悉5月1日即将出版的一期《祖国纪事》将刊登退役中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猎骑兵团禁卫军少尉帕尔姆的两部中篇小说后，我荣幸地将此事报告了参谋总长奥尔洛夫伯爵先生。

伯爵大人复示：已经书刊审查部门审核批准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帕尔姆的小说，可以保留在此期发表，但不能署他们的名字。

通知您此事的同时，先生阁下，我荣幸地请您相信我对您的尊敬与忠忱。

公函中提到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的第3章（标题为“秘密”），发表在5月号的《祖国纪事》上，未署名。这封公函是对克拉耶夫斯基询问的答复，他问在他的杂志上是否能发表被捕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帕尔姆的作品。

被告预审的结果，是审讯委员会又发现一些人与该案有关，于是继续进行逮捕。新一轮被捕者的名单里，首当其冲的是亚·瓦·哈内科夫和 A. И. 叶夫罗佩乌斯。

1849年5月4日，戈利岑领导的委员会作为审讯材料报来了第一批文稿，分别是彼得拉舍夫斯基，亚斯特列任布斯基和费·托尔的。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在他人之后被传讯，先已从别人口供中搜集到有关他的情况。

1849年5月6日凌晨，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同一天他的三弟安·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后者的无罪早在5月3日就得到证实，但在拘留他哥哥（指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前没有释放他。

1849年5月6日，对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了预审

（见 1849 年审讯委员会日志）。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的记述，“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审是 5 月 6 日在审讯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开头他坚决否认彼得拉舍夫斯基聚会是犯罪的任何看法，接着声称在这些聚会上有过关于傅立叶理论的热烈争论，读过关于社会主义的东西。他本人，即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过别林斯基的一封信”。（见列·彼·格罗斯曼：《生平与著作》[①]，59 页）。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要塞后又就对他提出的预审问题写了详尽的回答。

米勒记下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口述的有关这次审讯的一些细节：“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记得，罗斯托夫采夫将军让他讲出全部案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对委员会的所有问题回答得含混其词。这时 Я. И. 罗斯托夫采夫说‘我不信写《穷人》的作者会与这些罪犯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您陷得不深，如果您愿意讲出全部案情，我被授权以沙皇的名义宽恕您。’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说：‘我沉默不语。’于是杜贝尔特就笑着说：‘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这下子罗斯托夫采夫喊了起来：‘我再也不想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接着跑到另一个房间锁上门，然后从里边问：‘陀思妥耶夫斯基走了吗？他走了请告诉我，我不愿意见到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是装出来的。”（传记，106～107 页）

委员会从口头与书面的供词中逐渐了解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家中谈话的三个基本方面：“出版的自由，律法改革，解放农民”。在审讯的最初阶段还查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处讨论过

---

①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与著作》（1935）为俄苏批评家列·彼·格罗斯曼（1888—1965）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之一。他写有多种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著。

在俄国实行宪政的思想，讨论过下级对抗上级的可能性，而且所有谈话都贯穿着“社会主义精神”。不过在 1845 年 5 月 16 日这个侦讯的关键时刻之前，委员会还能相信，彼得拉舍夫斯基“星期五”聚会的参加者只是“倾向于改革现存的秩序”，“但这些聚会是否属于秘密组织，至今没有任何材料能够证明……”。(委员会报告)

随着委员会的材料不断积累，已经有可能着手进行正式的审讯，为此 1849 年 5 月 10 日责成文书什马科夫准备每个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综合材料，对已有的材料加以归纳概括。什马科夫还应准备好“以法律形式”提出的问题：关于职衔、出身、所受教育、生活来源等。审讯委员会本来计划从 1849 年 5 月 16 日起开始审讯。然而，随后几天的事态发展使这一意图未能立即实现。

1849 年 5 月 16 日对彼得拉舍夫斯基进行第一次审讯，在这之前他就主动向审讯委员会提出，要求给他看起诉书。被带到委员会后，彼得拉舍夫斯基表现得很勇敢，不承认自己有罪。彼得拉舍夫斯基拒绝作书面交代，只是简短地写了他在审讯委员会上说过的话。

但也就在 1849 年 5 月 16 日这一天，委员会收到了德·德·阿赫沙鲁莫夫① 写的详细报告。精神颓丧的阿赫沙鲁莫夫在报告中背弃了第一次供词中坚持的原则。他在 1849 年 4 月 30 日曾写道，彼得拉舍夫斯基“意在建立更好的社会秩序，却不愿意以暴力形式推翻一切”。而到了 5 月 16 日，他却是另外一

① 德·德·阿赫沙鲁莫夫（1823—1910），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主张广泛宣传社会主义，进行人民革命。后被判处四年苦役。19 世纪 60 年代后曾任疗养院医生。著有《一个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回忆》。

种说法："彼得拉舍夫斯基是一切的罪魁祸首，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他们（指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客人们）的目的是通过公众舆论进行政变……最终目的是在俄国实现社会性的生活……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读了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这信已是众所周知。还有一天晚上，坚科夫斯基（指季姆科夫斯基）先生谈起了行动的手段，对社会的影响，建议把彼得拉舍夫斯基所有的熟人联合起来，即在职务上互相协助，互相庇护，以取得高位，还让每个人汇报在一定时间内做了什么事……"（彼得拉舍夫斯基案，卷Ⅲ，115～117页）

从委员会的报告可以看出，在阿赫沙鲁莫夫招供前，对委员会来说存在秘密组织的事实尚不明显。但它如今"知道了这样的歹意"，便积极去探究密谋。

与此同时，1849年5月16日，戈利岑的辅助性委员会就逮捕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搜出的文稿和两本书做出了结论。第二天，5月17日，戈利岑把同文稿和书籍一起搜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退役的命令，送到审讯委员会。

1849年5月20日，根据阿赫沙鲁莫夫供词已下令逮捕季姆科夫斯基的审讯委员会，又收到斯佩什涅夫的文稿，着实令杜贝尔特及其同事大为不安，因为其中发现了季姆科夫斯基的信件，讲到他在特维里建立了两个革命小组；还有斯佩什涅夫起草的"参加秘密的'俄罗斯团体'者必须签名"的文件手稿，以及尼·彼·格里戈里耶夫《士兵座谈会》的手稿。

利普兰季出席了这天的审讯委员会会议。斯佩什涅夫立即受到审问。他向委员会发誓说，早就忘了那份草稿的存在，而且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看过。但委员会还是加深了对"斯佩什涅夫思想中有害倾向"的印象。据杜贝尔特的意见，斯佩什涅夫的活动"远比彼得拉舍夫斯基表现出来的罪行严重得多"（彼

得拉舍夫斯基案件，卷Ⅰ，18页）。因此，为了促使躲在阴暗处的罪犯“坦白供认”，委员会请求允许给他带上镣铐。

第二天，5月21日，审讯委员会又收到了菲利波夫的日记，其中提到“由一些人”组织的“某个团体”。从这时起，审讯委员会要考虑存在密谋的现实可能性。因此，委员会觉得无法完成沙皇关于尽快结束审讯的命令。

1849年5月24日和25日，在委员会议上详细审问了从特维里押解回来的季姆科夫斯基和А. П. 别克列米舍夫。季姆科夫斯基声明，说他“指的互相协助不是政治意义上，而是学术发展上的”，还说他只是设想建立小组，并没从事组织活动。这一情况又得到了别克列米舍夫的证实。这几天受审的斯佩什涅夫，看来比以前较为可信地说明了关于暴动的“思考”，最终也只限于思考，“没有付诸实施”。

1849年5月26日，委员会开会审查了彼得拉舍夫斯基的长篇供词。他几经拖延才决定详细解释自己的行为并证实自己的思想。彼得拉舍夫斯基坚决否定了蓄意造反的怀疑。与此同时，他表达了自己的一个愿望，想把自己关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建议奏明陛下。5月27日，彼得拉舍夫斯基被带到审讯委员会，审问了关于在斯佩什涅夫那儿搜到的文稿一事。5月28日，彼得拉舍夫斯基交了书面供词。他在其中坚决声明，他不知道“有关俄罗斯团体及团体草案”的任何事，并解释说在理解团结这个词时，应看做是意见相同者之间存在的精神上的关系……（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卷Ⅰ，47—48页）

根据这些人提供的材料，也根据其他被捕者提供的情况，5月30日审讯委员会再次得出结论：秘密组织存在的可能性极小。

1849年5月31日，审讯委员会重又研究关于每个被捕者

的摘录材料，以期在此基础上进行正式审讯。在最后定稿的综合材料中，包括了斯佩什涅夫于1849年6月2日所作的供认，它被审讯委员会看做是“有诚意”的供词。关于这文件的内容，只能根据委员会成员不全面的简要转述来判断，还有就是根据他们案卷中的证词。原件已同斯佩什涅夫的整个案卷一起丢失。委员会最关注的，是斯佩什涅夫的如下交代：给彼得拉舍夫斯基巨大影响的是切尔诺斯维托夫。他从1848年末开始在“星期五”聚会上露面。他说话极为坦率，据斯佩什涅夫说简直是个特务。切尔诺斯维托夫向斯佩什涅夫详细询问了关于在莫斯科起义的计划（斯佩什涅夫说他自称存在所谓的密谋，是为了探听切尔诺斯维托夫的意图），并强烈暗示应在彼得堡创建秘密组织以实施政变。供词接着说，斯佩什涅夫本人写了秘密组织的计划，之后马上烧掉了。这一计划的基本思想是，联合一切反政府的各种途径：耶稣教的途径，宣传的途径和起义。

彼得拉舍夫斯基也证实了关于切尔诺斯维托夫的情况。委员会根据得到的情况，要迅速采取措施去逮捕切尔诺斯维托夫，而根据斯佩什涅夫和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供词，此人到莫斯科和雅罗斯拉夫去了。

根据斯佩什涅夫的供词，在其住宅里进行了搜查，寻找印刷机。但1849年6月9日杜贝尔特向委员会报告说，没找到铅版，也没找到铅字。

1849年6月8日，审讯委员会对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了正式审问。陀思妥耶夫斯基案卷的大部分是对出身、信仰等一般问题的回答，还包括关于具体问题的供词。准确判定每次供词的日期已不可能，只能知道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于6月11、17、20日也受了审问。关于最后一次审讯，陀思妥

耶夫斯基夫人有这样的记述：“6 月 20 日在委员会第 42 次会议上，宣读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面供词。供词中他说(为确证委员会已知的事实——编者)，被告们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极端倾向的大部分供词都是真实的，在彼得拉舍夫斯基聚会上戈洛温斯基谈到了通过暴动解放农民的必要性，而在杜罗夫聚会上讨论过建立秘密印刷厂的问题，但在会上被否决。依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彼得拉舍夫斯基聚会总的说来更像朋友的聚会，而不像有组织的政治团体。”

同一天，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弟弟的信中要他寄来 10 卢布和 5 月号的《祖国纪事》，其中刊有《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的第三部分。关于自己，他写道：“远还没有沮丧”。1849 年 6 月 24 日的审讯委员会日志中，有关于释放他哥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记载。

从 1849 年 6 月 13 日到 20 日这段时间里，委员会研究了在审讯中了解到的有关杜罗夫小组的“新细节”。委员会弄清了杜罗夫聚会起初是纯文学性质，后来具有了政治色彩，聚会时甚至建议以石版印刷的途径传播反政府的书籍。但与此同时委员会感到满意的是，供词说杜罗夫聚会很快便停止了，因为大多数成员对聚会改变了方向表示不满。至于切尔诺斯维托夫，参加杜罗夫聚会的人们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情况。

1849 年 7 月 9 日，已获自由的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要塞里的弟弟写信，通知他寄去了二十五卢布和 5 月号的《祖国纪事》。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9 年 7 月 18 日的回信中可以看出，他 7 月 11 日收到了哥哥的信。关于自己，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总的说我感到时间不均衡，有时过得太快，有时又太慢。偶尔甚至感到已习惯了这种生活，一切都无所谓。我当然极力驱散想象力带来的种种诱惑，但有时难

以驱散,从前的生活连同以前的印象直涌心头，于是重温过去……现在是天气晴朗，至少大部分时间如此，人也快活一些了……我也有事做，没有虚度时间，构思了三个中篇小说与两个长篇，其中一部正在写[①]，但害怕工作得太多。

“这项工作，尤其当情愿做的时候（而我从未像现在这样con amore[②]），总是弄得我很疲惫，影响到我的神经。过去自由时工作，我常常要停下来消遣一下。而在这里，写作后的兴奋只好让它自己平息。我一昼夜睡五个小时左右，每夜都要醒四次……我们的案子何时完结我说不上来，因为我连日期都忘了，我只是记日子，过一天就消极地划上一天，算打发了！”

1849 年 7 月 23 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往要塞给弟弟寄了回信，讲了些生活上和文学上的新闻。同一天，审讯委员会接到通知，在鄂木斯克被捕的切尔诺斯维托夫 7 月 22 日被押至彼得堡保罗要塞。在初次审问新来的犯人时，“他说的确认识彼得拉舍夫斯基与斯佩什涅夫，但在他们那儿没听到任何犯罪的事情，也不知道什么秘密团体”。

1849 年 7 月 24 日到 8 月 6 日，审讯委员会的主要精力用于取得切尔诺斯维托夫的口头和书面供词，推测此人与有组织的策划暴动的团体有关。而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和斯佩什涅夫的类似推测，委员会早些时候已经排除；杜罗夫小组作为这种团体的可能的基础，也已不在考虑之列。这样，切尔诺斯维托夫对审讯委员会来说是最后一个疑团。委员会重又觉得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有罪的谈论终究只是谈论而已。他们狂妄的计划

① 他在要塞中构思并写成的只有一部小说《小英雄》，后来发表在1857 年 8 月号《祖国纪事》上。

② 意大利文：喜欢。

和意图都没能实施。

切尔诺斯维托夫在自己详尽的供词中，以下列三点说服了委员会。(1)“他从未想过改变我们统治的方式”；(2)“他没说过组织秘密团体，但的确表示过自己的怀疑，而不是坚信，是否有纵火的团体，因为俄罗斯的火灾猖獗”；(3)“如果这计划真的在他脑中成熟了，他切尔诺斯维托夫也不会把它告诉斯佩什涅夫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因为据他的理解，提出这样的建议必须是对人很信任，而且这人要能够行动，他们或是身居高位，或者对社会具有精神上或社会方面的影响力。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和斯佩什涅夫身上，他根本看不到这一点”。从 7 月初已开始释放无罪者和轻罪者的审讯委员会，在取得切尔诺斯维托夫的供词后，着手起草关于审讯结果的总结。不过对与案件有牵连者的审问，一直持续到委员会存在的最后日子。

1849 年 8 月 18 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弟弟寄去一封信，以及几期《祖国纪事》，还有席勒的《三十年战史》①。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9 年 8 月 27 日写了回信，其中说“关于自己，我说不出什么准确消息。我们的案子如何，仍然一无所知……至于我的健康状况，没什么好消息……”

与此同时，1849 年 8 月 25 日，审讯委员会“完成了调查案件的详情草稿”。1849 年 8 月 31 日，委员会“听取了利普兰季的报告”，这是他在 8 月 17 日写成的。利普兰季在报告中企图说服委员会同意存在着一个“有组织的宣传团体”。但委员会认为利普兰季的说法没有根据，并且这样表述了自己的判断：“委员会认为利普兰季先生理所当然地建树了重要的功绩，在把此案移交委员会之前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及其他人进行了长

① 发表于 1793 年。

时间的观察。但是，委员会十分认真地研究了他的判断之后，无法同意他的观点，原因如下。

“……委员会对最初报告中列举为秘密团体成员的各阶层人员相互间是否存在联系，进行了极其认真的调查，但委员会没找到证据，甚至没有足以可信的线索，而委员会的责任在于依据确凿的事实，而非猜测性的推断……

“没有发现有组织的宣传团体，尽管有过一次有目的的不成功的尝试，尽管一些人想成为宣传者，甚至也确有宣传者，但无论是利普兰季先生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所有行动长达一年的明智而敏锐的观察……还是对被捕者的多次审讯……无论是四个月的牢房监禁，还是许多人的真心悔过，都没有使任何人交代出这种事实。”

9月17日，审讯委员会审查了案情报告和起诉条款。这些材料以及此案中有罪的二十八人名单，还有呈请皇上批准的不经司法判决而释放的人员名单，一并上报军事部长，审讯委员会就此结束了工作。

审讯委员会的主要结论是：所有这些聚会的特点是，精神上普遍地反对政府，希望改变现存秩序，但既无一致的行动，也无相互的协调，它们同样也不属于有组织的秘密团体。关于它们在俄国国内有哪些关系，也没有任何正面的材料证明。据科尔夫[①] 男爵的回忆，审讯委员会的成员“把这个案件称为思想的密谋”。

9月10日，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往要塞给弟弟写信寄书。9月14日，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回信给哥哥：“再次

① 莫·阿·科尔夫（1800—1876），俄国国务活动家、历史学家，1834年起任国务秘书。

感谢寄书来。这至少是种消遣。快有五个月了，我全是自力更生，也就是只靠自己的脑袋，什么别的都没有。机器暂时还没散架，还在运转。不过总是思考，而且只有思考，没有任何外界的观感来促进和支持思考，太难受了！我整个人像是在往外抽空气的气泵下面，我的一切都抽入头脑里，从头脑再抽到思想里，一切的一切，可尽管如此，这个工作还是有增无减。”

尼古拉一世看了审讯材料，下令把罪犯交特别法庭审理。1849年9月25日成立了混合的军事审判委员会，审理了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它的主席是国务会议成员、总参谋长B. A. 佩罗夫斯基公爵（内务部长的兄弟），成员有：国务会议成员、总参谋长A. Г. 斯特罗加诺夫，H. H. 安年科夫，A. П. 托尔斯泰，参议员、三级文官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A. P. 魏马恩，Ф. A. 杜拉索夫。

9月30日，军事审判委员会开始工作。很快它便责成文书编写每个被告人犯罪程度的简述，因为审讯的案卷足有九千印张之多，委员会既无可能也无愿望全部审读。10月18日起，委员会开始提审罪犯以听取他们可能有的辩解。每个受审者都在委员会的最后供词上签了字。

军事审判委员会未做补充的调查，便在自己的结论中同意了审讯委员会的意见，即未发现存在秘密团体。军事审判委员会成员杜拉索夫对参议员列别杰夫说：“案件并没有原来认为的那么意义重大，它的重要性在于触犯法律条文，也在于是当代的瘟疫。”（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案卷，卷Ⅰ，129页）

军事审判委员会判处十五人（包括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枪决。之后，11月13日案卷送至军事大法官手中。1849年11月19日，军事大法官决定把被告所有的死刑均改为刑期不等的苦役。尼古拉一世在批准判决时作了最后的改变。其

中，他把大法官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杜罗夫判定的八年苦役，改为四年苦役，并在此后以普通士兵身份再服兵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这就是使他两人恢复了公民权，因为按法律凡被判苦役者都将永远失去公民权。

4

关于自己哥哥向审查委员会所作的有关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案件的供词，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他没有提供任何诿过于人的供词以为自己解脱，而他是能够说些东西的，因为……他知道很多情况。我要问：在他的位置上，有很多人会这么做吗？我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知道而且看到：在类似的不幸中，有的人会如何表现，并不是抽象地如此议论……甚至为了救自己，他也不想做那种违心的事。"（《作家日记》，1876 年，4 月号，第 2 章，第 4 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用同样的话来说自己。

根据安东内利的汇报，"委员会早就认定秘密团体是彼得拉舍夫斯基组织的"，阿·谢·多利宁[1] 在分析彼得拉舍夫斯基一案审讯的过程时准确地写道，"它主要是围绕着彼得拉舍夫斯基寻找线索。这个失误使许多被告从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中理应猜测到的，正因此许多人得到了拯救。杜罗夫小组成员在审讯过程中，与其说是本小组的成员，不如说只是彼得拉舍夫斯基'星期五'聚会的参加者"。（多利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中间》，539 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

① 阿·谢·多利宁（1883—1968），俄文学批评家，主要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除有关论著外，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全集》（1～4 卷，1926—1959）的编纂者。

的说明和后来给委员会的回答中，如同斯佩什涅夫小组的其他成员一样，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双重身份。

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供词的分析说明，在审讯中他表现得极为谨慎，每次都遵循某种确定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策略。

在向委员会作的第一次说明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划定了某些问题，尽量少回答，委员会不知道的情况则只字不提。他的这些问题涉及到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关于他的晚会的性质，他这伙人是否有“秘密”的即革命的目的。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正如从他的说明中清楚地看到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竭力强调彼得拉舍夫斯基是个抽象的理论家，是狂热的“幻想”家、傅立叶主义者，而且十分好面子，又秉性“怪癖”。这也正好是他迷恋傅立叶和行为“古怪”的原因。彼得拉舍夫斯基聚会没有任何秘密的革命目的，就连它的全部活动与其说有害，不如说可笑。况且，彼得拉舍夫斯基宣传的傅立叶学说本身，第一，性质是和平的而不是革命的；第二，早已过时，也不适用于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从来与彼得拉舍夫斯基没有密切关系。他常去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晚会，但说的都是文学话题（或是接近文学的话题：书刊审查，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和道德、精神话题。热烈期望祖国变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处的“争论”，但从未接受“共和思想”，他等待着自上而下的改革。关于委员会尚不知情的杜罗夫小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只字未提。而从接近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人里，他只说出两个名字：托尔和亚斯特列任布斯基，这只是因为特地向他问到了这两个人，怀疑他们在学校里有组织地宣传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思想。同时，关于他们，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说出任何具体的事情，以自己与两人不熟为托词，对“在青年中宣传傅立叶主义”的问

题他推脱说，自己不了解，也不愿妄加“猜测”。

在后来的回答和供词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每次都力求严格局限于回答委员会向他提出的问题。在1848年6月8日审问中最初的简短回答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到自己朋友时，除了他知道与他同时被捕的几个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外，只说出了迈科夫一家，还有极其远离任何政治、情绪保守的亚诺夫斯基，而没提别克托夫兄弟、德·瓦·格里戈罗维奇和其他熟识的文学家。在与他有密切“联系”的人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除指出亚诺夫斯基外，还指出同样不容怀疑的第二个人，《祖国纪事》的发行人克拉耶夫斯基①。后来，当审讯委员会得知杜罗夫的聚会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咬定一个说法：杜罗夫的熟人小组“纯粹是演艺性和文学性的”。关于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声称，他不属于任何的社会体系；他尽管激动地关注着西方1848年的革命事件，但在俄国，他期待的是“来自专制制度的改革”。在自己的案子审查完毕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几次被委员会叫去讲其他被告或嫌疑人的案情时，他每次或者说不认识他们，因而说不出什么，或者局限于说些不足作为罪证或不致牵连他们的情况。

这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供词中，有实情也有对他知道的案情的掩饰之词，更多的则是有意掩饰自己和其他被告的意图和行为的真实含义。因此不同研究者多次提出一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回答中在多大程度上讲的是实情，这些回答作为传记的依据，有多大的可信程度。针对这个问题，在学术界自然而然地存在着各种意见，有时是极不相同的意见。对比陀

① （指安·亚·克拉耶夫斯基）说他们“不容怀疑”，因为他们思想保守是众所周知的。

思妥耶夫斯基在审讯各个阶段的供词，以及比较他的证词与其他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供词及回忆录提供的事实，可以得出结论说：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审讯时没有说出他了解的全部情况，极力隐瞒他所知道的却被审讯者忽略的案情，尽可能地排除对其他被告的怀疑，或减轻自己和他们的罪过，可是在其他方面一般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是准确的。因此，考虑到上面指出的两点，他的供词可以视为可靠的和重要的传记材料，这对了解他的思想演变过程，对恢复作家生活的许多方面与他的真实观点的原貌，都至关重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供词令我们高度评价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禁期间他所表现出来的坚毅精神和公民勇气。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审讯期间他一贯坚持保护自己和同志不被扣上动摇专制国家基础的罪名，否认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存在有秘密的革命意图，但他却没有向委员会成员隐瞒自己观点的实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原告面前描绘了一幅欧洲的画卷，那里“若干世纪以来的秩序发生了崩裂、遭到破坏。”他承认 1848 年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一如西方出现社会主义学说的必然性，同时又敏锐地指出他所见到的 40 年代的社会主义形态具有空想性质；他清醒而且深刻地评价道：它们还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如今是它的前奏，是“化学之前的炼金术”。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任何有思想的人，包括在俄国，有必要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按他的话说，社会主义“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学，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罢了”。“这些书籍写得很有智慧、热情，且往往贯穿有对人类真挚的爱”。他在写给审讯委员会的、关于 40 年代社会主义文献的供词中曾这样说。不难想象，仅这些话本身就足以使委员会大为愤怒，尽管被告保证说，他和其他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革命理想，并没有影响他

们耐心等待俄国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不企图加快事情的自然进程。而且，尽管作家与其他犯人在审讯中得以隐瞒斯佩什涅夫小组的纲领和印刷宣传品的实际准备，从审讯材料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农奴制情绪，他对现存秩序的不满和对社会变革的热切渴望。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世界观中存在一些因素导致后来他转向了“根基主义”。在《彼得堡纪事》（1847）一文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追随别林斯基与斯拉夫派进行辩论，维护了彼得大帝改革的意义，并表明自己对彼得大帝创立的新俄罗斯的前途抱有极大的信心①，相比之下，他的审讯供词却意味着他对19世纪40年代西方派与斯拉夫派斗争的中心问题，态度有所变化，也更加复杂。在自己的供词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傅立叶主义评价为“西方状况”的产物，而“西方与俄罗斯不同，西方要解决无产者的问题”，“俄国则没有无产阶级”。他说：“我们的国土也不是按西方的方式形成的”。而同时，与斯拉夫派也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如既往地正面评价彼得大帝，也正是以彼得大帝来证明，俄国在政府正确理解社会与人民需要并同情他们的条件下是可以避免“俄国暴乱”的。所有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为作家晚期在《时代》和《时世》阶段② 的思想做了准备。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对彼得大帝的改革是持否定态度的。

② 《时代》与《时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他的长兄米哈伊尔共同创办的刊物，分别于1861—1863、1864—1865年出刊。所谓在《时代》和《时世》阶段，是指他在19世纪60年代的前半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变化主要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发生的。

据米柳科夫证实，早在1848年至1849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说过，“我们的人民不会走欧洲革命者的路”，“我们不应在西方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中寻找俄国社会发展的出路，而要在我们人民的生活中和世代相传的历史制度中去寻找。在村社、互助组和连环保中早已存在着这种基础，它比圣西门的幻想及其学说更牢固、更正常。”（亚·彼·米柳科夫，《文学的会见与结识》，175，181页；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卷Ⅰ，185页）

米柳科夫见证的准确性，不止一次引起了部分研究者（包括多利宁）的怀疑。他们认为，晚年趋向保守的米柳科夫，在这里同其他情况下一样，力图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的观点与他晚期的“根基主义”信念一致起来（多利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中间》，529页）。但事情看来要复杂一些。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位传记作者米勒说，“按杰布的看法，傅立叶主义者（指由彼得拉舍夫斯基“星期五”聚会一批参加者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小组——编者）也把目光转向了俄国村社。像我们许多人一样，他们也是从哈克斯陶森那里了解村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属于“傅立叶主义者”小组的人（小组参加者有杰布和丹尼列夫斯基）。但他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可能同意这个小组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米柳科夫记录下来的和在审讯词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俄国和西方社会制度存在根本对立的话，与其说与40年代斯拉夫派的观点相类似，不如说与赫尔岑以及后来的民粹派分子的村社学说更类似，也就是说这是俄国村社社会主义理论早期萌芽之一。后来在改革的条件下，青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农村公社、互助组和连环保”的信仰，这个曾经造就了他世

界观中“根基主义”成分的信仰，改换了一种形式融入其世界观中。看来，正是以此为根源，陀思妥耶夫斯基供词中说到的俄国发展道路与西方相比自有特色，同他1860—1870年间论及同一问题时的话，部分地是相吻合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供词中，还有一点无疑与他后来的观点有着渊源关系，只有与之比较才能正确理解。这就是19世纪40年代他的审美立场。在对委员会作的说明与回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复强调自己对文学使命有着特殊的独立的理解，既不完全与别林斯基的观点相一致，又不同于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得拉舍夫斯基、托尔和其他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对文学中“艺术性”与倾向的关系理解不同，彼得拉舍夫斯基对《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和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作品持批评态度，还得到了其他一些供词的证明。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断“作者应该关注艺术性，思想是自然而来的，因为它是艺术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异体字是我们标出的——编者），这与后来在《——波夫先生与艺术问题》一文中分析同一问题的思想是相近的。这就表明，早在184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一问题上就已持有后来与杜勃罗留波夫争论时的立场。在捍卫思想是“艺术性的必备条件”，没有它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艺术这一观点时（与此同时又与1861年一样坚持悲剧和讽刺具有艺术意义，坚持作家不仅有权利描写“美德与勇敢”，也有权描写“罪恶”、“生活的阴暗面”），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真正的天才在选择生活素材和进行艺术加工时，有权走自己的路，哪怕这条路不能完全为评论界理解，以致被认为是偏离了正确“方向”也好。

考虑到自己供词的官方性质和总的趋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极力向审查委员会表白自己的这个观点与传统的“纯艺术”派

相一致。然而，他反对尼古拉一世时期严厉的书刊审查，致使“艺术的许多种类都将消失”，“一些作家将不能存在……如格利鲍耶托夫、冯维辛，甚至普希金”；他维护文学描写当代社会“阴暗面”和“罪恶”的权利；他表现出对别林斯基文学和美学思想的尊重；还有，在讲完与彼得拉舍夫斯基的争论后有些突如其来地总结说，这场争论是由误解产生的，因为后来表明，他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关于文学的见解是相同的”。上述这些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和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分歧在作家自己的意识里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他以克雷洛夫、格利鲍耶托夫、冯维辛、普希金为方向，坚持当代文学必须沿着他们的道路走下去，并创造性地发展他们的现实主义创作。

5

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看待对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的惩治？从作家回忆中看出，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受难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表示，国家惩处了他与其他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从而保卫了自己”，“它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是有道理的”，“既然他们一方处于上风，那么别无办法，只能接受惩罚。”——在宣判结束后他用这句话表达了自己的心态。

就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73 年的《作家日记》中写道：“我们这些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站在断头台上，毫无悔愧地听了对我们的判决。毫无疑问，我不能证明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但我想，我这样说是不会错的。当时，在那一分钟，如果不是每个人，那么至少也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会认为背弃自己的信念是一种耻辱……判处枪决，对我们事先都读了，宣读判决完全不是开玩笑。几乎所有被判决的人都相信枪决会执

行，至少度过了等待死亡的极端恐惧的十分钟。在这最后的时刻，我们中的一些人（我敢肯定）下意识地反省自身，瞬间回顾整个尚且年轻的人生，很可能确也后悔自己犯下的别的什么罪过（在每个人终生都在良心上隐藏的事）。但我们因之而受过的事，那些支配我们心灵的思想和观念，我们觉得不仅不需追悔，它们甚至以某种东西使我们纯洁化，是殉教行为，由此我们的许多过错可得宽恕。这种感觉持续了很久。流放的岁月，承受的痛苦，并没有摧垮我们。正好相反，什么也没能摧垮我们。我们的信念一直支持着我们的精神，因为意识到完成了一个使命。”（《作家日记》，1873年，第16章）

在这之前，1856年3月2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艾·托特列卞① 写信说：“我错了，我完全认识到这一点。我被人察觉有从事反对政府的意图（仅仅是意图）……多年沉重与痛苦的经历令我清醒，并且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我的想法。但当时我是盲目的，相信了乌托邦的各种理论……”（异体字是我们标出的——编者）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保留：“在许多方面”（即不是在所有方面）。

但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信念“改变”之后，在他从西伯利亚回来之后，作家个人参与19世纪40年代末先进的思想运动的经历，也还经常成为他创作的营养与源泉。这一经历的不同方面，在他60—70年代的中篇与长篇小说中得到了艺术地再现和复杂的哲理思想上的反思，从《死屋手记》和改写《化身》的未实现的提纲，直到《白痴》、《群魔》、《一个荒唐

① 艾·托特列卞，当时是俄国沙皇的侍卫长。陀思妥耶夫斯基此次给他写信，主要是为了要后者协助他恢复从事文学创作的权利。

人的梦》和《卡拉马佐夫兄弟》。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传和政论作品中，也不止一次回忆起自己参与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的情况，以及与此相关所感受到的一切。1860 年 5 月 24 日，作家在朋友亚·彼·米柳科夫（他同样被卷入彼得拉舍夫斯基案）的女儿的纪念册里，详细叙述了自己 1849 年 4 月 23 日清晨被捕的情况，把这天早晨的一系列印象作了幽默的“发挥”。

十三年后，在 1873 年的《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当时评论界对《群魔》所作的评价进行争论，阐述了自己对小说的理解。为此他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给予了详尽的评估（与涅恰耶夫之类对比）。作家尤其强调了三个情况：（1）他本人和其他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在这自己的活动中是出于高尚的思想动机，他们相信这种动机的“神圣性”，完全不应被诬为“狂热分子”、“怪物”和“骗子”，而反动报刊恰好是这样看待他们（以及后来的革命者）；（2）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如处于另一种情况和另一种事态发展时，很容易成为涅恰耶夫，即参与反对专制制度的直接的实际革命斗争；（3）他们由于热忱地相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面对被捕与判刑而“毫不后悔”。

在 1876 年《作家日记》复刊[①] 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次利用机会提到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和鼓舞他们的 1840 年代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1876 年 4 月，在《作家日记》中他收

① 《作家日记》最初于 1873 年在《公民》周刊上刊出，此后中断了两年，至 1876 年才再次复刊，两月一期，但已是作为独立的刊物，并且专门发表他个人的创作，每期为二个印张。1878—1879 年又停刊。以后只出了 1880 年的 3 月号和 1881 年的 1 月号。

入了关于米·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卷入彼得拉舍夫斯基案的传记材料。同年6月，收入了乔治·桑悼文，讲到她在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史中的地位和1840年代俄国青年对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接受。1877年1月，书刊审查官从《作家日记》中删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纪念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专门一节。他与《彼得堡报》辩论，该报以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为例，要证明19世纪下半期的俄国革命者与十二月党人相比每况愈下。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十二月党人的成员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相比，受教育程度要差得多。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大多是从最高学府出来的人，来自大学，来自亚历山大高等法政学校，来自法律学校和高等专门学校。有许多教师和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我重复一下，就受教育方面讲，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高于十二月党人”(《作家日记》，1877年，1月号，第1章，第3节)。也是在那几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妻子口授关于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短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官方的说法（作家强调，官方尽量缩小运动的历史规模和他本人的作用)，提出了新的解释，如我们在上文看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40年代末反对政府的反对派具有巨大规模，并强调斯佩什涅夫“密谋”的参与者具有革命的情绪和革命的最终理想。他评价说，在这个密谋中预示出其后1860—1870年代各革命小组的几乎所有主要特点，虽然只是萌芽状态。这证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经历了后来的精神变化，尽管对19世纪的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持批评态度，在晚期的作品尤其是《群魔》和《作家日记》中，直到生命的最后，也不愿缩小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历史作用和自己青年时代的激进情绪。

对俄国社会生活的深切关注，对它的热情思索，放到整个欧洲历史的广阔背景上去分析其矛盾，正是这些因素在1840

年代和以后，如同他自己供词所强调的那样，将他带入了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圈子。使他相信，如不考虑社会主义思想所提出的那些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人类现在与将来的问题。虽然服苦役后作家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同新一代的俄国革命者在探索未来的道路上分了手，他的世界观中在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年代中形成的特有的批判精神，从未枯竭。相反，他在 1860 年代和 1870 年代的小说中以复杂多变的形式继续反复而尖锐提出的许多社会道德、哲学问题，对他来说最早是出现在 1840 年代，是在作家思想与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相互作用的时期，是在他与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亲身接触之中。可以明显证明这一点的，不仅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的证词，还有他后来作为艺术家和政治家的全部创作。

题　解

龇牙一笑

最早发表于《祖国纪事》，1845 年，第 11 期，署名：龇牙一笑者。以小品文风格预告并介绍计划出版的一套幽默文集。在此之前作者在一封信中提到，经诗人涅克拉索夫倡议，计划多人合做出讽刺性小册子，意在讥讽国内外各方面的可笑现象。书名定为《龇牙一笑》，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格里戈罗维奇、涅克拉索夫负责编辑。但文集因其针砭社会的揭露性遭到书刊审查机关的禁止而未能问世。

彼得堡纪事

最早发表于《圣彼得堡新闻》，1847 年，第 93、104、121、133 期，署名：费·陀·。《彼得堡纪事》是该刊的一个专栏，每逢周日以小品文形式述评彼得堡社会生活。陀思妥耶夫

斯基于1847年4—6月为专栏撰稿人之一。文中出现的叙述者是个具有一定社会、历史、文学观而且深通艺术的人，从思想倾向上看无疑是很接近作者其人的。此刻正是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关注社会现实，对周围世界逐渐施以批判眼光的阶段。小品文的写作为后来的小说人物塑造积累了经验。

《时代》杂志1861年征订启事

这是创刊杂志的征订启事，发表在1860年9月的多种报刊上：《祖国之子》、《北方蜜蜂》报、《圣彼得堡新闻》等，署名：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按：当时《时代》名义上的主编是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兄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0年夏季，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两人最后决定创办一个杂志，而不是原先计划的周报。此事于7月初获得官方批准，随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经过深思熟虑写出了这篇启事，被认为是新出大型文学刊物《时代》的办刊纲领，反映了编者60年代初的基本思想倾向。

从内容上看，启事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阐述编辑部对当时社会最为关注的现实问题所持的立场，从中引出一项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从人民的精神中，从民众的根基中创造出俄罗斯自己的新生活、新形式，从而克服少数受教育阶层同广大俄国民众的分离状态。作者认为，在彼得大帝强制的改革之后，俄国重又面临一场社会巨变；而即将到来的改革，应该是和平的和谐的变革。通过和平与和谐的方式解决俄国问题，这一信念成了《时代》以及后来的《时世》两杂志一贯始终的中心思考，也反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晚期的作品中，如《作家日

记》。不仅如此，宽容的精神，联合、融合、综合的思想，还被提升为全人类的普遍原则，在作者的作品中多次得到发挥。不过，启事讲到当前具体的任务时，则以为识字读书，普及教育是走向宽容和和谐的第一步。

后一部分是分析文坛形势，提出自己扶持文学创作与开展文学批评的宗旨。文章鲜明地反对膜拜文学权威，反对文坛上商业投机作风。它的矛头所向，首先是米·卡特科夫主编的《俄国导报》，还有安·亚·克拉耶夫斯基与斯·谢·杜德什金主编的《祖国纪事》。正是《时代》创刊时这一鲜明独特的立场，引起了报刊界和文坛上旷日持久的论战，推动了那个时代社会思想的发展。

俄国文学论丛

一　引言

最早发表于《时代》杂志，1861 年，第 1 期创刊号，没有署名。

早在 19 世纪 50 年代后期，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酝酿写一组文章，表示自己对文学发展和文坛形势的见解。1858 年底思想完全成熟，并且已经草成了几篇文章的初稿。1850 年获准创办《时代》后，他于年底完成了第一篇文章的写作，这就是《俄国文学论丛——一　引言》。同时也构思完毕第二篇《——波夫先生与艺术问题》。原计划在《时代》杂志上每期刊出一篇，由于小说创作和编辑工作耗时费力，这组文章断断续续只发了几篇，到 1862 年再没能继续写下去。

论俄国文学的系列文章其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主题思想，但也不是各不相关的独立文章。它们都围绕俄罗斯文学这个中心，分论它的社会功能、教育功能和美学功能，涉及到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文学批评的状况。从这个视角出发，《引言》论及多人的创作，如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谢德林、托尔斯泰。第二篇文章则分析了主要评论家的立场，如别林斯基、瓦·尼·迈科夫，并同杜德什全、杜勃罗留波夫、卡特科夫、斯拉夫派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从这一方面说，系列文章又具有统一的思想倾向，体现着作者的原则立场。

系列文章实际上确立了《时代》杂志的社会立场和文学观念，可以看做是创刊征订启事中主要思想的展开和发挥。而第一篇《引言》又堪称“根基派”的宣言，全面阐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文学并透过文学对俄国社会的思考和结论。文中涉及了当时社会思潮中的许多迫切问题，如外国对俄国的看法，俄国人对欧洲的看法，俄罗斯人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特点，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分歧，俄国发展的非欧洲道路，和平与和谐的社会变革，亚历山大二世的农民改革，教育阶层与民众的关系，普及识字与教育等等。作者遵循征订启事中宣布的原则，不盲从权威而大胆质疑探求独立见解，所以形成了“根基”论的系统思想，所以也触痛了《祖国纪事》、《俄国导报》、《现代人》等多种刊物。在思想观念的交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最诟病的是所谓“明智的平庸者”，认为他们是破坏教育阶层各种派别团结一致的主要障碍。

《引言》发表后获得了普遍的好评。眼界开阔，立论公允，没有门户之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文中申说的观点，自然引起了多家刊物的争辩。

二 ——波夫先生与艺术问题

最早刊于《时代》杂志，1861年，第2期，没有署名。

此文批评杜勃罗留波夫的两篇文章：《俄国民众的特征》(1860)、《伊凡·尼基京的诗作》(1860)。作者通过与杜勃罗留波夫的辩论，表述了自己的审美原则：艺术虽然有其社会的功能，但不应片面地实用地理解艺术服务于社会，评价艺术作品不能简单地根据它的社会政治倾向来判断它的价值和艺术性。乌克兰作家沃夫乔克的小说，在杜勃罗留波夫看来是俄国民众出现革命觉醒的征兆。这一观点遭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对，由此引发一场广泛的争论。1861年第9期的《祖国纪事》上，杜勃罗留波夫发表了《逆来顺受的人们》。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篇作品。文中深刻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对作品的人道主义倾向深表同情；同时又强调文学作品即使在艺术上对文学史无所贡献，仅凭主导倾向和意蕴就堪称佳作。而有时评论家专注于作品的“实用”方面，是由于它没有提供审美分析的材料。

摘录与批语

此件据手稿刊印，写于1859年10—11月间，是对И. В. 帕夫洛夫文章《俄国文学中的东方与西方》的批注。帕夫洛夫（1823—1904），笔名Л. 奥普图欣，医生兼作家、记者，与谢德林、屠格涅夫过从甚密，经常为周报《莫斯科纪事》撰写政治述评和通讯。《俄国文学中的东方与西方》是代表周报办刊方向的纲领性文章，在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争论中

采取一种折中立场。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帕夫洛夫的基本见解与自己暗合。据认为此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所办杂志的“根基派”取向有相当的影响。

谢梅夫斯基评乌斯特里亚洛夫著《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皇子》一文的批语

此件据手稿刊印，大约写于1860年初。Н. Г. 乌斯特里亚洛夫（1805—1870）——历史学家，院士，圣彼得堡大学教授，著有《彼得大帝执政史》，其中第6卷为《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皇子》（1859）。历史学者 М. И. 谢梅夫斯基（1837—1892）著文评论此书。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他对历史事实的理解上表现出偏见与武断。

俄国文学论丛

三 读书与识字 第一篇
四 读书与识字 第二篇

这是论俄国文学的系列文章中的第三、四两篇，最早发表于《时代》杂志，1861年，第7期和第8期，没有署名。

两文的出现不是偶然的。19世纪50—60年代编辑出版大众读物成了时尚，各种读本、文选大量涌现，随之书评与专论文章也层出不穷，形成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也为各种社会思潮的交锋提供了一个新话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

看来，俄国社会的发展将会走和平与和谐的道路，不可能像以民族征服立国的欧洲国家那样出现阶层的矛盾与对抗。但同斯拉夫派不同，他又认为彼得大帝师法西欧的改革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现在倘能在民众中普及教育，传播文明，便可实现民众联合、和谐发展的理想。他从这个观念出发，形成了独特的视角，并在与《俄国导报》、《祖国纪事》以及斯拉夫派的争辩中充分展开了自己的见解。

第三篇文章从理论上阐发民众、民族性的概念，分析民众学习文化科学的深远意义。核心的思想在于揭示俄国社会中受教育阶层严重脱离大众百姓，如隔深渊，同时思考如何消除这种分裂状态。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信贵族知识分子中的优秀部分是可能同民众"根基"结合到一起的。文章强调：文学家的人民性或民族性，不在乎他对广大民众是否理解或熟知，而在于他是否把握了人民的性格和精神。

第三篇文章通过分析谢尔比纳的《读书》方案，从启蒙民众的角度论述了如何给广大民众提供普及文化的读物。作者坚持《时代》杂志的宗旨，克服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极端立场，力图得出一种综合的全面的见解：不仅我们给民众带去文明，民众也能教会我们不少东西，所以编写大众读物不可采取居高临下的教训人的态度。不仅如此，真心为大众写作，还必须实际地了解民众，知道他们的需求和心理，尊重他们的信仰、习俗。仅有对民众的书面认识，仅有善良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

《读书与识字》一文，在60年代讨论如何向解放了的农民进行文化启蒙的报章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人道主义的立场，民主平等的精神，现实主义的清醒认识，与作者人生经历的切身感受相结合，构成了文章的鲜明特色。

五 晚近的文学现象。《日报》

最早发表于《时代》杂志，1861 年，第 11 期，没有署名。

本文是系列文章的第五篇，也是最后的一篇。如果说此前的文章主要是同西欧派观点辩论，那么此文则是反驳斯拉夫派的，对手就是 И. С. 阿克萨科夫主编出版的《日报》。这份代表斯拉夫派立场的报纸，自 1861 年 10 月 15 日在莫斯科创刊，每周一期，一直出到 1864 年底。《时代》杂志对斯拉夫派的态度，总的说是温和同情的，因此《日报》创刊之际，寄予了很大期望。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最初几期后大失所望，以严厉批评口气写下这篇评论。他通过分析《日报》上阿克萨科夫等人的文章，指出斯拉夫派无视时代的精神，抱残守缺，一成不变；奢谈俄罗斯的民众基础，却丝毫没有民众的宽容，把一切不同意自己的人全视为仇敌。对斯拉夫派思想的可取之处，陀思妥耶夫斯基虽肯定却较为矜持，倒更加看重西欧派的追求进取，贴近现实。他认为西欧派的倾向同斯拉夫派一样，也是地道的俄罗斯现象，并非舶来的异端邪说。较之空想的教条的且又排斥异己的斯拉夫派，西欧派之长在于重现实，重分析，有清醒的观察，勇于自省。所以，此文可以看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论与斯拉夫派划清界限之作。

彼得堡的诗与散文之梦

最早发表于《时代》杂志，1861 年，第 1 期，没有署名。

创刊号的这篇讽刺性小品文，原来请德·德·米纳耶夫执

笔。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发稿付排时对米纳耶夫的作品很不满意，临时撤下，自己又草就了一篇，却保留了原稿中的一些诗句（当时撰文，在散文中融进一些诗作是一种风尚）。

作者在文中表示了自己对小品文这一体裁的看法，认为它的作用远非随意抓些城市热门话题，揶揄一番。在现代社会，讽刺小品几乎是最主要的文章。作者希望能像欧仁·苏写小说《巴黎的秘密》一样，写出长篇小品“彼得堡的秘密”。这便是作者立意的一个来源。作为小品文的体裁，此文一个重要特点是主体的凸显，叙述者以耽于幻想的浪漫气质，披露了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文章开头是轻松的幽默，随即转入深情的追忆。在艺术手法上，作者把彼得堡移入梦境，无论是此地往昔的见闻，还是日后可记的人事，全处在真实与幻觉的交汇点上，亦实亦幻，引人遐想。

刊出《扎克·卡扎诺瓦在威尼斯（铅顶）监狱囚禁和越狱的奇迹》（回忆录片断）的前言

最早发表于《时代》杂志，1861 年，第 1 期，署名：编辑部。

扎克·卡扎诺瓦是 18 世纪意大利著名冒险家，晚年用法语撰写了回忆录，描绘自己一生的冒险经历。回忆录全书在作者去世后于 1822—1828 年译成德语出版。作者生前只发表了一个片断，就是《时代》刊载的这一篇。回忆录第一卷出版后，受到青年海涅的高度赞扬，从此赢得世界声誉，被译成各国文字。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半读过回忆录全书，除这篇前言外，在小说《舅舅的梦》里也曾提到卡扎诺瓦的作品。此文点出了回

忆录所包含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以及回忆录作者坦诚、平易的文风。

刊出《爱伦·坡的三篇小说》的前言

最早发表于《时代》杂志，1861 年，第 1 期，署名：编辑部。

美国小说家爱伦·坡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末开始介绍到俄国，翻译出版了他的某些小说和传记。60 年代初随着译介的增多，逐渐形成独立的视角来研究爱伦·坡的创作。此篇前言就是俄国最早的独立而深刻的研究之一。文中论及的诸方面，在日后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掘和发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强调爱伦·坡的文学幻想与霍夫曼不同。霍夫曼同欧洲其他浪漫主义作家一样，通过形象体现大自然的威力，在尘世之外寻找自己的理想。而爱伦·坡的幻想只是外在的东西，他没有脱离人世的物质现实。这里反映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文学幻想的看法：创作需要幻想的勇气，但文学的力量最终来自现实，来自现实中人的性格和典型。在这一层面上，他与爱伦·坡的创作观念是息息相通的。

《拉萨涅尔案件》一文附识

最早发表于《时代》杂志，1861 年，第 2 期，署名：编辑部。

由这一期开始，杂志陆续刊出了一系列西欧著名的刑事案

件的材料。这个选题无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兴趣相关。作为擅长心理开掘的艺术家，他十分关注社会新闻，尤其是形形色色的刑事案件，认为此类材料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心理内容。

拉萨涅尔（1800—1836）是个凶狠的强盗和杀人犯，1835年在巴黎被判死刑。审判经过在法国各报刊上得到广泛的报道，引起普遍的关注。行刑后，1836年巴黎又出版了拉萨涅尔在狱中写的辩解诗和回忆录。他在诗文中把自己打扮成“社会的牺牲品”，为社会公正奋斗的自觉复仇者，自诩为“社会利剑”和“革命诗人”。这理所当然地招来当时进步人士和诗人的痛斥。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意到这个不同寻常的凶犯有着神秘的心态。他青年时代立志学习法律，后来成了一个不走运的文学作者，受过不错的教育，也知道当时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却企图装扮成一个“知识分子凶犯”，实现个人向社会复仇的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拉萨涅尔的心理特征同当时的一些年轻人颇为相近。

尼·尼·斯特拉霍夫《席勒小议》一文附识

发表于《时代》杂志，1861年，第2期，没有标明作者。

该期发表的尼·尼·斯特拉霍夫文章《席勒小议》，是回答《世纪》杂志的一篇书评（1861年，第1期）。书评针对刚出版的俄文版《席勒文集》（第9卷）写道：“我们并不特别看重作为诗人的席勒，尤其是作为历史家和哲人的席勒，但认为格贝尔先生的举措是十分有益的……”（此处指H. B. 格贝尔主编俄文版的席勒文集）。这句话遭到斯特拉霍夫断然的驳斥：

“如果这话是《现代人》说的，我们一点儿不奇怪，可这是《世纪》呀！难道它也附议吗？”于是，在斯特拉霍夫短文的最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加了两小段话，即这里所指的附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支持斯特拉霍夫站出来维护席勒，不是偶然的。60年代在俄国展开了一场广泛的讨论：在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新阶段，在社会对文学提出新要求，人们形成新的审美感的情况下，过去的古典文学是否还有价值，应该怎样加以评价呢？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来虚心学习俄国和外国古典作家的经验，希望借鉴古典文艺来创立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后来他们研究席勒、乔治·桑、巴尔扎克、雨果等人的创作，在道德激情和思想艺术倾向方面把他们引为同道，获益匪浅。这就决定了他对待西欧文学的基本立场。不仅如此，他还一再证明：真正的严肃的艺术永远不会过时，于社会总是有益的，即使评论家一时还看不清楚。

德国作家席勒生前于18世纪就在俄国广为人知。18世纪已经出现了席勒作品的俄文译本。19世纪初俄国许多作家都译介过他的诗文。30—40年代别林斯基指出：席勒创作的巨大教育意义，定将使过去、现在、未来的人们都能受益。之后，在俄国民主思想高涨的形势下，H. B. 格贝尔编印了十二卷的俄文版席勒文集，1857—1860年间于彼得堡出版，成为文坛一大盛事，并以此纪念席勒百年华诞（1859）。

诚恳的典范

发表于《时代》杂志，1861年，第3期，没有署名。

这一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时代》上发表过两篇文

章，与米·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争论妇女问题和普希金的《埃及之夜》。《诚恳的典范》是第一篇，另一篇是《答〈俄国导报〉》。

此文的写作是由一场文坛风波引起的。1861 年 2 月，《圣彼得堡新闻》登了季梅尔曼的一篇报道：《从圣彼得堡到伊尔库斯克的旅途见闻》。他记述了彼尔姆市举行的一次捐助孤儿的文学音乐晚会，托尔马乔娃女士朗诵了普希金《埃及之夜》里一个意大利即兴诗人的讲话。报道发表后，一位诗人兼翻译家 П. И. 魏贝格（后来成为荣誉院士），化名卡缅·维诺戈罗夫，在他担任主编的《世纪》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小品文，题为《俄罗斯奇闻》，在不经意间惹出了麻烦。他嘲笑《圣彼得堡新闻》的记者对托尔马乔娃的表演欣喜若狂，同时流露出对这位女士人品的怀疑。对此《圣彼得堡新闻》立即做出了反应，于 3 月初刊出民主派诗人 М. Л. 米哈依洛夫的文章《〈世纪〉的恶劣行为》。作者谴责《世纪》杂志和卡缅·维诺戈罗夫，说但凡有人心，明知如今的社会条件和妇女处境，绝不该公开侮辱女士，任意嘲弄。这样，米哈依洛夫就把一次偶然事件提升为对待妇女的原则问题，这正好与当时 60 年代民主思潮中解放妇女的口号相呼应。《世纪》编辑部赶紧发了一则简讯，说它已采取一切措施向托尔马乔娃女士表达诚恳的歉意，并将就米哈依洛夫文章的内容做出解释。果然，《世纪》周刊在下一期发表了编辑部的解释和卡缅·维诺戈罗夫的答复。可是，这两篇文字在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此前做出的道歉。因为《世纪》编辑部不好过分严厉谴责自己的主编，又不能再为魏贝格的行为辩护。陀思妥耶夫斯基撰写此文时，可能还不知道维诺戈罗夫其实就是魏贝格。

“口哨”与《俄国导报》

最早发表于《时代》，1861 年，3 月号，没有署名。

这是一篇翔实的论辩，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对米·卡特科夫主编的《俄国导报》所持的社会立场和文学观念。卡特科夫在《俄国导报》1861 年第 1 期发表《替代“当今记事”的几句话》一文，向读者宣告他打算放弃“自己在文学中所承担的那一份警察的责任”。这句话带有明显的反民主的性质。他虽然骂的是《现代人》杂志的幽默副刊“口哨”，实际上对整个俄国文学取一种傲慢鄙视的态度，说俄国文学“贫乏”，“不足道”，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发展。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以为，在俄国唯有文学是独立自主地发展着，承担了最重要的社会使命——从道德上培育人们。

陀思妥耶夫斯基办的《时代》，同其他不同倾向的杂志如《俄国导报》、《现代人》，特别是《祖国纪事》的争论之一，就是本文所讨论的普希金创作的意义问题。不难看出，二十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关于普希金的著名讲话（1880 年）中阐述的见解，在此文中便已露端倪。至于对社会上文坛上各种力量的态度，他不主张对峙而主张团结，但团结的中心应该是根基派的理想。这一倾向也反映在后来与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双向争论中（见 1862 年文章《理论家的两个阵营》）。

《Л. К. 自瓦西里岛致〈时代〉编辑部的信》附识

此信刊于《时代》杂志，1861 年，第 4 期，没有署名。

据研究，该信作者是尼·尼·斯特拉霍夫。《俄国导报》1861 年第 3 期载文尖锐抨击了《时代》与《现代人》。于是一匿名读者投书《时代》编辑部，表示赞成《时代》的宗旨，并欢迎它同其他刊物（《祖国纪事》、《现代人》、《俄国导报》）开展辩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明，是针对信中的一句话而发的："甚至《俄国导报》自己也认为有必要出来说话了。"

答《俄国导报》

最早发表于《时代》杂志，1861 年，第 5 期，没有署名。

本文是继《诚恳的典范》之后的第二篇辩论文章。

针对《世纪》的表态，尼·尼·斯特拉霍夫为《时代》写了小文，答复《世纪》编辑部和维诺戈罗夫的解释。此外他还写了一篇答《俄国导报》的文章。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均不满意，自己动手写了此文，而把斯特拉霍夫第二篇文章的一段作为书信附于文后。

米·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站在保守立场上，攻击为托尔马乔娃辩护的人们，特别指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者在此文的答辩中，阐发了在创作《死屋手记》后形成的很具代表性的见解：整个的解放问题，可以归结为基督教的博爱，人与人

的互爱。这也就是他所主张的人类情爱，普遍和谐的社会理想。

在尼·尼·斯特拉霍夫《争论小议》一文中加入的话

刊于《时代》，1861年，第8期。

“口哨”是在《现代人》杂志上由杜勃罗留波夫主持的一个讽刺栏目的名称，它引申开来代表讽刺的时评以至一切幽默讽刺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很赞赏伏尔泰的讽刺作品，而且在自己的政论和小说中一向不回避幽默讽刺的笔触。

文学界的歇斯底里

最早发表于《时代》杂志，1861年，第7期，没有署名。

此前（1861年4月）该刊曾发表И. А. 库斯科夫一篇讽刺性小品文，题为《某些问题上的某些思考》。接着《俄国导报》刊出了主编米·卡特科夫的反驳文章，把矛头指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由此引出《文学界的歇斯底里》一文，作为对卡特科夫的回答。

《时代》杂志1862年征订启事

刊于《时代》，1861年，8月号，署名：编辑米·陀思妥耶夫斯基。

本文虽系征订启事，却带有明显的论战意味：坚持文学的独立作用而反对视为手段，坚持“根基”、“爱”、“发展规律”等基本范畴。启事作者不满于《俄国导报》、《祖国纪事》、《日报》的立场，厌恶它们说漂亮空话，妄自尊大和盲目的自尊心。但此后在论争中，则把《俄国导报》同《现代人》、《俄国言论》等量齐观，一概视之为西欧派的刊物。

美术学院1860—1861年画展

最早发表于《时代》杂志，1861年，10月号，没有署名。

学术界普遍认为本文作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文章后半部的写作可能有他人参与。它出现时，在美术学院内外正激烈辩论俄国现代造型艺术的发展前景。作者通过讨论俄国绘画的发展道路，尖锐批评了学院派艺术，热情支持了新生的现实主义倾向，并阐明了现实主义的真正含义。

有感于《俄国导报》一则哀伤的短评

最早发表于《时代》杂志，1861年，10月号，没有署名。

先是本年《俄国导报》7月号刊出米·卡特科夫的文章《简评〈时代〉杂志》，反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见《“口哨”与〈俄国导报〉》、《答〈俄国导报〉》、《文学界的歇斯底里》等文）。接着卡特科夫又在下一期的《俄国导报》上著文《哀伤的短评》，再次不指名地攻击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这则短评。文中流露出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敬

重，尽管对其观点主张屡有微词。此外，在作者看来推动任何进步的动力，全来自少数富有文化教养又有忧患意识的干练的人们。

尼·瓦·乌斯宾斯基先生短篇小说集

最早发表于《时代》杂志，1861年，12月号，没有署名。

尼·瓦·乌斯宾斯基（1837—1889），俄国小说家，民主主义者，擅长描写民间百姓的生活，得到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等人的高度赞扬。1861年8月在涅克拉索夫支持下出版了乌斯宾斯基小说集两卷，被认为是民主主义派60年代小说的纲领性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举出乌斯宾斯基写民众的创新之处，在于能正视人民的弱点与不足而不只是基于理想化的同情和赞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并不赞同。他认为乌斯宾斯基写平民的小说体现了对人们生活真正深刻的认识，这种对人民大众发自内心的挚爱，使他的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真诚和真实。为此不仅需要熟悉平民生活，还必须具有现代的社会眼光。但他对乌斯宾斯基作品的艺术水平评价不高。

俄国文学论丛

关于大学问题

最早发表于《时代》杂志，1861年，11月号，没有署名。

据研究，此文的写作除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外，还可能有别人的参与，主要是中间的部分。这是俄国文学论丛一组文章中的第 5 篇，也是最后的一篇。

在 1860 年以前，俄国实行的是 1835 年颁布的大学章程，由政府任命督导员监管，规定各系必须讲授神学、宗教史、现行法等课程，设立大学校内校外的警察管制。50 年代末社会上变革思想高涨，沙皇政府也意识到改革教育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遂于 1858 年由国民教育部设立了制定俄国大学新章程草案的委员会，并在报刊上广泛展开了讨论。此文就是《时代》杂志对社会大讨论的一个回应。

俄国大学应进行怎样的改革，当时表现出几种不同的立场。《圣彼得堡新闻》上的一些文章，强调大学的自治权利，主张取消对师生的警察监护，课程设置应向西欧大学靠近，给科学以自由的发展机会等等，但同时却局限于把大学问题视为一个局部的专门问题，只能由学校行政和教授来解决。另一种立场是《现代人》、《俄国言论》所代表的革命民主派观点，认为高校改革是彻底革新俄国政治经济制度问题的一个部分。全局问题不解决，大学不可能得到革新。《时代》则持有第三种立场，一方面视大学问题为整个俄国状况的反映，因而不可孤立地加以解决；另一方面又主张需要的不是改革而是渐进的变化。这就是此文的基本思想。

理论家的两个阵营

最早发表于《时代》杂志，1862 年，第 2 期，没有署名。是反映作者 60 年代思想倾向的重要文章之一。

1861年12月号的《现代人》杂志，刊出马·阿·安东诺维奇的文章《论根基》，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主办的杂志《时代》的主导思想——根基论的思想（见《时代》征订启事和《俄国文学论丛》）。《论根基》文中说：《时代》的理论纲领，它所号召的民众与教育阶层的和解，无非都是毫无内容的乌托邦，只会阻碍对民众的革命启蒙。而要让民众获得教育，首先须从地主压迫下解放他们，保证他们的物质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进行答辩，曾在笔记中作了准备，但后来没有使用这些材料，而是另起炉灶写了《理论家的两个阵营》，同过去一样他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反对《现代人》的政论家们，又反对斯拉夫派的《日报》。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斯拉夫派与西欧派的批评，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虽然都是真心为民众福祉着想，却终归只知讲理论，也就是说光从抽象的书本理论出发，而不是从现实生活出发。预设的抽象的理论原则蒙蔽了他们的眼睛，所以看不到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复杂性和俄国民众的心理。这里反映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重大失误：他不善于也不愿意把《现代人》杂志的领导者同自由主义西欧派和斯拉夫派的“理论家”们区分开来；他认定《现代人》的“理论家”对民众表现出“可怕的贵族态度”，不相信民众的理智和创造潜能。这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那种自发的民主倾向具有致命的弱点，不相信革命知识分子能同民众联合并且领导民众。

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积极一面，是他看出上层阶级既然脱离了民众，在改革的新环境里无法再成为俄罗斯文化和国家的推动力量。俄国民众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已经能够独立地参与政治生活，而这是社会取得真正进步的必备条件。正是这种热切的民主精神，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超越了斯拉夫

派，尽管存在有内在的矛盾却与《现代人》的立场有些接近。

此文主观上力求客观地分析两个营垒各自的长短得失，但就其基本观点而论显然较多地倾向于斯拉夫派。

斯拉夫派、黑山人与西欧派，最近一场争吵

最早发表于《时代》杂志，1862 年，第 9 期，没有署名。

从 15 世纪起，土耳其同黑山地区的斯拉夫居民之间，不断发生战事。正是为了逃避土耳其的侵扰，人们才逐渐去黑山定居。1499 年黑山正式划入奥斯曼帝国版图，但仍保留很大的自治权。1711 年黑山与俄国建立了政治关系。1857—1858 年间黑山人开始反对土耳其的战争，打败了土耳其军队，把占领的土地划入黑山。1861—1862 年爆发反对土耳其的起义，结果黑山、波斯尼亚再遭惨败。根据和约，黑山不得不承认土耳其的管辖。只在当俄国在俄土战争（1877—1878）中得胜后，黑山人才得到独立。

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译文前言

最早发表于《时代》杂志，1862 年，第 9 期，没有署名。

雨果作为法国浪漫主义向古典主义冲击的首领，早在 19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就已享誉俄国。到了 40 年代，随着俄国文学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雨果的影响显然减弱。而他的创作重新引起俄国读者的广泛兴趣，是在 50 年代开始之后。原因是多方面的。俄国社会在尼古拉一世死后

(1835)，思想一度活跃，求新求变。而雨果也从自由主义的浪漫派变成民主左派的重要活动家，1852 年后更成了政治侨民，大胆揭露拿破仑三世帝国。1862 年《悲惨世界》问世后，雨果的政治诗人、社会小说家、思想家的声誉达到了顶峰。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从青年时代就喜爱雨果，而且首先是他的抒情诗，认为雨果与荷马有相近之处，并反映了欧洲的现代文明。50 年代末，正值陀思妥耶夫斯基形成自己独立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时，雨果的小说创作引起他极大的兴趣。《悲惨世界》一出版，他就发现雨果作品的基本主题和主旨，有许多与自己暗相吻合。在其后的二十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雨果，同雨果作品对话，便从未间断。

由此可见，《时代》杂志刊载《巴黎圣母院》的全译本绝非偶然。

一个微妙的问题

最早发表于《时代》杂志，1862 年，第 10 期，没有署名。

陀思妥耶夫斯基同米·卡特科夫(《俄国导报》) 的争论，在这篇文章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激烈程度。如果说一年前《时代》还看《俄国导报》有些可取的长处，如今却只见一群无原则的势利小人，见风使舵，投机取巧。因此，此文写法也从揭露式的斥责抨击一变而为讽刺性的模拟取笑。事有凑巧，1862 年 10 月初的一期《现代言论》报上，刊载一篇匿名文章《谁的过错?》，该文指责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鼓吹虚无主义，否定一切，又出尔反尔，自相矛盾。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助这篇

匿名文章提供的材料，用讽刺性模拟手法来组织自己辛辣的论辩文。

对种种牟利问题和非牟利问题必要的文学解释

最早发表于《时代》，1863 年，第 1 期，没有署名。

《时代》杂志登载 1863 年征订启事后，一些杂志做出了自己的反应。因为这份征订启事阐述了《时代》根基派思想的实质，同时也暗含对《现代人》编辑部的尖锐批评。此文就是对各种刊物的反应做出的答辩。它针对《祖国纪事》、《现代人》、《火星》周刊、《读者文库》、《俄国导报》等不同倾向的报刊的编辑部而发，进一步阐发了启事中的主要观点。

杂志评论：新的文学刊物和新的理论

最早发表于《时代》杂志，1863 年，第 1 期，没有署名。

此文反映了 1862 年底至 1863 年初俄国报刊的境况。当时正值社会情绪低落，政府统治趋向反动。进步刊物遭到迫害，《现代人》与《俄国言论》被迫停刊。而另一方面，宣传又制造出一种假象，似乎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派的报刊呈现活跃的样子，例如安·亚·克拉耶夫斯基的政治与文学报纸《呼声报》创刊（1863），《圣彼得堡新闻》宣布彻底改版，《股东报》与《日报》两编辑部合并，如此等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中继续与米·卡特科夫斗争，指责他不了解民众，不懂得俄国社会的状况和需要，盲目崇拜英国的

国家制度，尤其是在教育问题上采取了不可容忍的贵族立场。文中还揭露了其他一些问题，如安·亚·克拉耶夫斯基的《呼声报》虽标榜自由主义却温和听话，伊·谢·阿克萨科夫的《日报》面对现代社会的进步表现了悲观主义。应该说，这篇文章的立场本身也包含着矛盾，一方面反对卡特科夫之流的照搬西欧制度，主张民众独立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又反对革命行动，寄希望于社会同“根基”的和解。

杂志评论

一 答“吹口哨者”

二 年轻的笔杆子

最早发表于《时代》杂志1863年第2期，没有署名。

此文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此后是《时世》）同《现代人》的论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论战的对手就是谢德林。当时革命民主主义思潮陷入危机，近期实行农民革命的前景已经破灭。陀思妥耶夫斯基积极倡导根基论的思想，用以抵制革命民主主义。他认为在杜勃罗留波夫去世、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入狱后，他们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被后继者所歪曲糟蹋，已是面目全非。而后继者之一，便是谢德林。

这场长达一年半的论战，是由《时代》杂志1862年9月号刊登下一年杂志征订启事引发的。启事以激烈的口吻抨击腹中空空，没有头脑的大喊大叫者，吹口哨者。时值革命民主派的主要杂志《现代人》、《俄国言论》自1862年6月被政府勒令停刊八个月，无法与《时代》答辩。但自由主义派的《祖国

纪事》还是做出了反应，这促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3年第1期《时代》上发表了《对种种牟利问题和非牟利问题必要的文学解释》。此举更加剧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矛盾。1863年初，《现代人》一复刊便发了一篇匿名短文《我们的社会生活》，作者实为谢德林，公开抨击和嘲笑《时代》杂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就在同时，《现代人》的一个副刊《随笔》登出一封信，署名“吹口哨者”，批评《时代》编辑部别有用心，自相矛盾。上述这两篇文章引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杂志评论。

尽管论战双方剑拔弩张，誓不两立，而且嘲弄挖苦，不遗余力，甚至难免人身攻击之嫌，但历史地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谢德林两人既有原则的思想分歧，又有创作思想上的根本一致。这就是人道主义的立场与理想。两人都无情地否定现有世界秩序，都为人格遭受屈辱而痛心疾首。

又是“年轻的笔杆子”

最早发表于《时代》，1863年，第3期，没有署名。

《〈时代〉的担心》一文，是谢德林详尽反驳《时代》杂志的第一篇长文，针对《时代》一系列责难做出了答复，同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不少诘问。不仅如此，其他一些革命民主派刊物也纷纷著文支持《现代人》，抨击《时代》杂志。这就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答辩文章时集中力量剖析谢德林其人，不点名地断言谢德林是为艺术而艺术。论辩的语言也更为尖刻。

自1863年5月起，《时代》杂志遭禁停止出版。1864年

复刊时更名为《时世》，论战才得以继续。

《时代》编辑部答《莫斯科新闻》的攻讦

最早发表于《时代》杂志，1863年，第1期，署名：《时代》编辑部。

《莫斯科新闻》发表K. A. 彼得松的评论《评〈时代〉杂志文章〈不祥的问题〉》，称《时代》的文章是反对爱国主义的，而不署名又无异于强盗蒙面去抢劫。时值俄国西部发生波兰人起义，米·卡特科夫唆使彼得松写这种评论，等于是政治告密。陀思妥耶夫斯基预感《时代》的命运岌岌可危，试图避免打击，来不及等下一期《时代》的出版，就写了答《莫斯科新闻》的文章，寄给《圣彼得堡新闻》要求尽快刊载。文章已经排版待印，可是审查官得知政府对《时代》文章极为不满，就下令撤掉。于是在彼得松评论见报两个月后，即1863年5月下旬，奉"上谕"封闭了《时代》杂志。斯特拉霍夫作为《不祥的问题》的作者，专门致函卡特科夫，解释了自己对波兰人和波兰问题的立场，希望《莫斯科新闻》澄清此事。在《时代》被封两个月后，《俄国导报》刊登了卡特科夫执笔的文章，重评《不祥的问题》。此文虽也抨击了原作者对波兰人的有意无意的恭维，却收回了原先的责难。

谢德林先生，或虚无主义者的分裂

最早发表于《时世》杂志，1864年，第5期，没有署名。

谢德林在1864年5月号的《现代》杂志上刊出《文学琐谈》一文，围绕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发表的《地下室手记》，重开论战，讽刺的锋芒直指《时世》杂志及其编辑。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在数日内完成此文作为回答。文中责难谢德林在信念上模棱两可，缺乏真诚。

关于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句话

最早发表于《时世》杂志，1864年，第6期，署名：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二人幼年一起求学。后来弟弟费奥多尔就读技术学校时，哥哥米哈伊尔在特维里服役，两人书信往来不断，对文学与社会表现出共同的兴趣。1847年米哈伊尔返回彼得堡后从事翻译、小说写作和评论，兄弟间感情日深，创作联系日多。经费奥多尔介绍，米哈伊尔结识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一度曾迷恋过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费奥多尔去西伯利亚服劳役以及迁往特维里和彼得堡时，唯一给他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的，就是米哈伊尔。米哈伊尔出面（担任名义上的主编）创办的两份杂志《时代》与《时世》（费奥多尔因犯过罪，遭过流放，不能申请出版刊物。但《时代》与《时世》两刊物的实际负责人都是他），成为费奥多尔施展文学才能的园地。

必要的声明

最早发表于《时世》杂志，1864年，第7期（1864年9月出版），署名：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现代人》杂志1864年第7期（1864年8月出版）上，马·阿·安东诺维奇发表了两篇文章《是非小人的胜利》、《致老雨燕》，回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谢德林先生，或虚无主义者的分裂》。他言辞尖刻，几近谩骂，招来报刊一片不满之声。陀思妥耶夫斯基于9月上旬写了短文《必要的声明》，表示坚决不与《现代人》进行这种人身攻击式的唇枪舌战，因而态度较为克制，行文显得简要。

为了结束。给《现代人》的最后一次解释

最早发表于《时世》杂志，1864年，第9期，没有署名。

实际上确实是作者从《年轻的笔杆子》到《必要的声明》等一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论战文章。

尼·斯特拉霍夫的《回忆阿波罗·亚历山大罗维奇·格里戈里耶夫》一文附识

最早发表于《时世》杂志，1864年，第9期，署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同期刊出的斯特拉霍夫回忆文章，收录了阿·亚·格里戈里耶夫致斯特拉霍夫的十一封信，是1861—1862年间从奥伦堡寄出的。信中格里戈里耶夫提出了一些根基论的观点，谈到对当时某些文学家的看法，也讲到与《时代》的一些意见分歧。这篇附识作为后记出现，涉及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关切的一些问题。

生活与文学中的双关语

最早发表于《时世》，1864年，第10期，没有署名。

本文是针对《呼声报》刊登的《祖国纪事》1865年征订启事而发，但却反映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报人对刊物宗旨的见解。与安·亚·克拉耶夫斯基相反，他一方面强调大型月刊杂志对文学发展的重大意义，同时又不同意把日报降低为单纯而肤浅的照录事实。他也不满意克拉耶夫斯基的报纸过分欧化地自由随意，几乎是随声附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办报不只需要聪明，还要能理解事物，要有独立的自己立场，要有见地，有方向。

德·瓦·阿韦尔基耶夫《从两个彼得堡人的自白谈起》一文附识

最早发表于《时世》，1864年，第12期。署名：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阿韦尔基耶夫在文中称“哲学的彼得堡”变得“毫无意义

地疑心重重”，而“文明的彼得堡”退化为欧洲的毫无个性的城市。他又认为彼得堡人丧失俄国根基的原因，在于孩子接受了“非俄式”的教育；他还说到一些孩子忘记了俄语，成了半个德国人、法国人。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在这里附带谈到自己在日内瓦的一次见闻。

谈瓦西里耶夫在《孰能无过，孰能免祸》中的表演

这篇没有写完的评论，大约写于 1863 年 1 月至 3 月间。直至作家逝世后，第一次在《北方导报》（1891 年，第 1 期）上发表，署名当为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一向评价甚高。《孰能无过，孰能免祸》一剧发表于 1863 年第 1 期的《时代》杂志上，1 月 23 日在彼得堡上演。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加赞赏，计划就瓦西里耶夫的表演发表评论。П. В. 瓦西里耶夫（1832—1879）是俄国著名的悲剧演员，擅长扮演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中的人物。

阿·安·戈洛瓦切夫论古典教育一文读后感

这是对阿·安·戈洛瓦切夫 1864 年为《时世》撰写的一篇文章的评论草稿，当时并未发表。戈洛瓦切夫（1819—1903）是位民主派的社会活动家和政论家，1860 年在彼得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

有感于 1854 年欧洲事件
1855 年 7 月 1 日
加冕与和约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三首诗在他生前没有发表过。第一首《有感于 1854 年欧洲事件》写于 1854 年 4 月。当时作者正在服兵役，通过营长把诗稿送给了西伯利亚独立军的参谋长，再由他正式呈送彼得堡的第三厅长官，要求在彼得堡的杂志上发表，但未得到批准。第二首《1855 年 7 月 1 日》（这是亚历山大·费得罗芙娜皇后的生日）作于 1855 年夏天，经由西伯利亚独立军的军长转交军事部长，要求"呈献皇后陛下"。1856 年春又写了第三首《加冕与和约》，也送往彼得堡，希望"获得最高层的批准，在彼得堡的杂志上发表"，但都没有获准。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哥哥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当时极力想重获公开发表作品的权利。1856 年 10 月他被授予准尉军衔，处境才开始好转，1857 年 4 月起允许他出版著作。

由于是以政治流放犯身份在军营服役，他在这里写的几首诗中提到历史人物和事件，都严格遵从克里米亚战争时期俄国报章的观点和说法，实即政府的立场。又由于他献诗的目的在于重返文坛，所以研究者难以确定作者对事件的真实见解和情感。不过据他那时的书信判断，作者同样为当时社会上的爱国热情所感染，而且从中看出了俄罗斯对解放诸斯拉夫民族具有特殊的作用。关于这一点，他后来在《作家日记》中作了充分的发挥。

拟巴伐利亚团长

大约作于1864年中期，作者生前未发表。是讽拟安·亚·克拉耶夫斯基《呼声报》上出现的诗歌。此诗的口气模仿一个侨居国外的俄罗斯人，他竟至于忘记用俄语讲话和思考。

说吧，你为啥如此折磨人……

大约作于1864年中期，作家生前未发表。也为了讽刺安·亚·克拉耶夫斯基的《呼声报》，伪托一个忘记了俄语的诗作者。

一个蹦蹦跳跳的姑娘……

作于1866年夏天，作家生前未发表。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莫斯科郊区别墅度夏，与许多学生一起游玩，喜欢即兴说些笑话，编排故事，这就是记录下来的笑谈。

虚无主义与诚实的斗争

这首讽刺诗的第一稿写于1864—1865年间（作家生前未发表），与一篇描写鳄鱼吞人的小说(《鳄鱼》）同时构思，并计

划把此诗纳入小说中。所谓虚无主义，作者讽刺说，这或者是女人剪发，或者是否定一切存在。他构想让女虚无主义者在小说中同被吞进鳄鱼腹中的官吏辩论妇女解放问题。后来讽刺诗未收入小说中，原拟单独发表，又因《时世》杂志停刊而作罢。1873年完成第二稿，打算在《公民》杂志的幽默讽刺栏目《尾页》上发表。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离开了这一栏目的编辑工作，而栏目后来充斥了反对维护妇女权利的文章，发表的愿望未能实现。此诗是对当时文坛和报章上种种人物与事件的回应，既有观点上的争论，也有尖刻的讥讽，表现出时评家的关注和眼光。

一路描写下来全是牧师……

这是讽刺作家H. C. 列斯科夫的小诗，大约写于1874年，作家生前未发表。当时《俄国导报》正连载列斯科夫的小说《衰败家族》。此前他以写神职人员擅长，现转而描写贵族的败落。在创作思想上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分歧并有过争论。他赞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但责难说人物多显怪诞。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着重挖掘内心，不主张局限于某种职业类型的生活描写，如只写教会人士或只写商人等等。小诗反映了这种争论。

拜马科夫银行的破产……

写于1876年12月（作家生前未发表），讽刺当时社会上

的不良风气。拜马科夫和卢利等资金微薄的银行家，因好大喜功盲目膨胀，于 1876 年底招致破产。社会上又广泛流行招魂术，生活动荡，精神无所寄托，于是祈求神灵指点。评论家尼·尼·斯特拉霍夫就此写有三篇文章，合称《关于招魂术的三封信》，发表于 1876 年 11 月的《公民》上。诗中“无稽之谈”即指第一封信里对招魂术的批评。第三封信中提到表演招魂术者，将一堆面值十戈比的硬币分成各十一枚和十九枚两组，而后混合一起竟可得三十一枚，即多出一枚。最后一行诗即指此。

孩子是费钱的……

这是作家给妻子写的戏谑诗，作于 1876—1877 年间。作家生前未发表。

不要蛮干，费杜尔……

写给儿子费杜尔、女儿和妻子的打油诗，约作于 1879 年底。作家生前未发表。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１８卷 文论 下
作者＝陈燊主编
丛书名＝世界文豪书系
页数＝８６４
ＳＳ号＝１２８２５７５４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０１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原书定价＝２０００．００（全集）
主题词＝陀思妥耶夫斯基，Ｆ．Ｍ．（１８２１ １８８１） 全集
参考文献格式＝陈燊主编．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１８卷 文论 下．石家庄市：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０１．